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美林证券:致命的代价

——我与华尔街巨鳄的战争

[美] 基思·斯古利 著
(Keith Schooley)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美林证券：致命的代价

——我与华尔街巨鳄的战争

[美] 基思·斯古利 著
(Keith Schooley)
王煦逸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林证券：致命的代价——我与华尔街巨鳄的战争/(美)斯古利(Schooley,K.)著;王煦逸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1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Merrill Lynch:The Cost Could Be Fatal-My War Against Wall Street's Giant

ISBN 978-7-5642-0658-1/F·0658

I. ①美…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证券交易所-企业管理:人事管理-研究-美国 IV. ①83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684 号

- ☐ 责任编辑 温 涌
- ☐ 封面设计 钱宇辰
-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MEILIN ZHENGQUAN ZHIMING DE DAIJIA
美林证券：致命的代价
——我与华尔街巨鳄的战争

[美] 基思·斯古利 著
(Keith Schooley)

王煦逸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4.5 印张(插页:3) 237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29.00 元

图字：09-2007-352 号

Merrill Lynch ; The Cost Could Be Fatal
—My War Against Wall Street ’s Giant
Keith Schooley

Copyright © 2002 by Keith Schoole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the author.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2009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丛树海

编委会执行主任

张 晖 于东升

编 委

黄 磊	袁 敏
韩贤旺	钱 慧
曹翊君	刘劲文
郭 君	魏小君
益 智	林 皓
金德环	田晓军
柳永明	骆玉鼎
周继忠	崔世春

策 划

黄 磊 曹翊君

总 序

“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大时代，无数投资人渴望着有机会感悟和学习顶尖投资大师的智慧。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素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有句名言：成功的捷径是与成功者为伍！（It's simple to be a winner, work with winners!）

向成功者学习是成功的捷径，向投资大师学习则是投资成功的捷径。

巴菲特原来做了十年股票，当初的他也曾经到处打听消息，进行技术分析，买进卖出做短线，可结果却业绩平平。后来他学习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投资业绩很快有了明显的改善，他由衷地感叹道：“在大师门下学习几个小时的效果，远远胜过我自己过去十年里自以为是的天真思考。”

巴菲特不但学习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还进一步吸收了费雪的投资策略，将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称自己是“85%的格雷厄姆和 15%的费雪”，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成功的原因——“如果我只学习格雷厄姆一个人的思想，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富有”。

可见，要想投资成功很简单，那就是：向成功的投资人学投资，而且要向尽可能多的杰出投资专家学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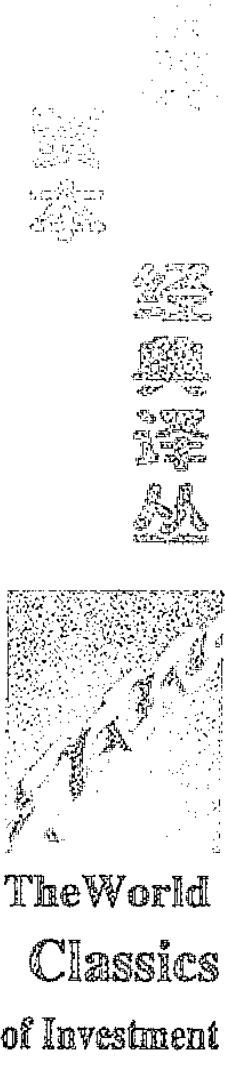
源于这个想法，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携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这套“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开卷有益，本套丛书上及 1873 年的伦巴第街，下至 20 世纪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人和当代“股神”巴

菲特,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汇添富基金希望能够藉此套丛书,向您展示投资专家的大师风采,让您领略投资世界中的卓绝风景。

在本套丛书的第一、二、三、四辑里,我们为您奉献了《伦巴第街》、《攻守兼备》、《价值平均策略》、《浮华时代》、《忠告》、《尖峰时刻》、《战胜标准普尔》、《伟大的事业》、《投资存亡战》、《黄金简史》、《华尔街的扑克牌》、《标准普尔选股指南》、《华尔街 50 年》、《戈尔康达往事》、《铁血并购》、《先知先觉》、《共同基金必胜法则》、《华尔街传奇》、《大熊市》、《证券分析》、《股票估值实用指南》等 28 本讲述国外金融市场历史风云与投资大师深邃睿智的经典之作。而在此次推出的第五辑中,我们还将向您推荐 6 本同样具有震撼阅读效应的经典投资著作。

漫漫投资路,经典诚可贵。不了解货币,就很难真正理解投资的本质。本辑丛书中的《货币简史》一书堪称资本类书籍中讲述货币历史的经典。《货币简史》是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线,以货币变革的历史走向为依托,批判有关货币理论的种种传统理念,揭示货币运行的规律,指出周期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正在经受着巨大的考验,流动性益发滞缓,信任危机愈加强烈。这种情况下,此书无异于一盏指导人们重新认识货币、了解金融本质的明灯,发人深省,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汇集了《纽约晚报》金融编辑梅里尔·斯坦利·鲁凯泽先生给出的富于常识的投资指导建议的《货币与投资》一书初版于 1924 年,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次以书本的形式讨论了没有经验的小投资者所面临无形财产方面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将其推荐给朋友时这样写道:“随信寄上的此书……显然其中提供的观点依然有效……我粗粗翻阅了一遍,发现这是一本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一流之作。”“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阅读该书中语言简明朴素、说话直截了当的篇章,读者可以全面了解作者提出的诸如对安全投资的检验,怎样发现证券行业的骗子,有关华尔街的预测专家,怎样挑选诚实正直的股票经纪人等问题。正如曾任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劳伦斯·张伯伦所说的那样:“正是这些金融编辑,而不是那些投资银行家,对小投资者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本书将会让你发现,人们依然是这样的人们,他们依然拥有这样的缺点和弱点,资本依然遵循着其固有的规律,不管是



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还是今天，本书依然都有着同样的指导参考价值。

投资本质上是选择能够持续成功的优秀企业。《新金融资本家》一书则描述了一家金融企业的创业成长史。书中的主角 KKR，是美国一家以收购重整企业为主营业务的合伙投资企业。在本书中，KKR 自创立至今近三十年经营活动中的方方面面——从投资理念、投资策略、融资手法、收购后的重组，到其经济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详细描述。并且，本书远不止是一本企业传记和金融史著作，它更多的是一本探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著作。这种公司治理机制体现为债务、经理持股和董事会监督。债务的硬约束作用能迫使管理阶层吐出企业中“闲置的现金流量”；通过经理大量持股，能使他们像所有者一样决策；通过强化企业内部约束机制——董事会，KKR 向读者展示了它是如何妥善处理董事会和管理阶层间的职能分离的。在某种意义上，KKR 的利润正是来源于代理成本的降低。全书通过 KKR 这个案例，向世人揭示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再生。

叱咤风云的金融大鳄背后，原来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问题和秘密，而这很有可能成为投资的陷阱所在。《美林证券：致命的代价——我与华尔街巨鳄的战争》一书通过向我们讲述一个金融业中“鸡蛋碰石头”的故事，揭开了金融巨鳄美林证券公司的神秘面纱。书中的主人公基思，作为美林的前理财顾问，与这个曾经的金融巨头展开了长达 10 年的艰难而激烈的诉讼。虽然以主人公的败诉而告终，但整个过程揭露了美林的种种不道德操作和违规、欺瞒行为，直指美国金融业中暗藏的问题。事隔数年，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中，美林未能幸免，因亏损严重，被美国银行收购。曾经纵横华尔街的美林已不复存在，如今借助本书重温这场诉讼战争，相信读者会感触更深。

了解资本富豪的发家史，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财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美国豪门巨富史》是美国“暴露”文学（所谓“扒粪运动”）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书中生动地描绘了美国一些著名大富豪的发家史，客观地披露了这些在土地、贸易、铁路、钢铁等产业创造了巨额财富的资本家们如何巧取豪夺、财富暴涨的记录，旨在揭露资本的“原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产阶级寡头集团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做出有计划的努力，试图把这些财产的起源描绘为诚实劳动和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产物。每一个探索真相的人都有权知道，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但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种依靠私有财产和工薪劳动制度而生存的体制，其累积效

应是什么？如果这一体制有很多据说拥有的优点，那这些优点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它是文明的高级秩序，那这种高级又体现在何处？本书将会满足读者刨根问底的精神，帮助解释这些问题，因为，一种优秀而高尚的秩序应该能产生优秀而高尚的人。那些被这一特定文明推向前台的成功人士，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其种类和性质将在这一解释中得到阐明。更重要的是，查明这些巨大财富来自何方，了解它们特殊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方法和制度，对于读者来说应该有着非凡的意义。该书材料搜罗广博，视野恢弘开阔，叙事沉稳，立论有据，自 1909 年初版以来，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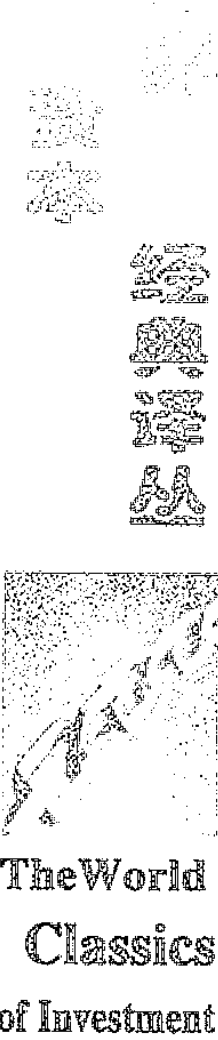
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都充满了未知与神秘，这是一块充满诱惑和神奇的投资领域。《交易员、枪和钞票——衍生品花花世界中的已知与未知》描述了作者达斯在金融衍生品行业 25 年的真实经历，详尽剖析了衍生品行业的运作及其存在的意义。这本书并不旨在评价衍生品，而只是向读者展现在交易所和主要金融中心每日的运作，正是这些活生生的戏剧和充满理性的疯狂造就了现代异常繁荣的衍生品交易市场。该书主要是为两类读者而写：一是在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行业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有没有直接参与到衍生品交易中），在字里行间他们将会找到他们自己或者他们身边同事的影子；二是想进入衍生品这个奇妙世界的人，通过阅读该书将可能证实他们对于这些陌生金融工具的恐惧和偏见。

投资者也许会问：我们向投资大师、投资历史学习投资真知后，如何在中国股市实践应用大师们的价值投资理念？

事实永远胜于雄辩。中国基金行业从创立至今始终坚持和实践价值投资与有效风险控制策略，相信我们十年来的追求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基金行业成立十余年来的投资业绩充分表明，在中国股市运用长期价值投资策略同样是非常有效的，同样能够显著地战胜市场。几年来我们旗下基金的优秀业绩，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价值投资最基本的安全边际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坚守基于深入基本面分析的长期价值投资，必定会有良好的长期回报。

其次，我们的经历还表明，在中国股市运用价值投资策略，必须结合中国股市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勇于创新。事实上，作为价值型基金经理人典范，彼得·林奇也是在总结和反思传统



价值投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共同基金业绩。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比巴菲特、彼得·林奇等人更加幸运,中国有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有一个经过改革后基本面发生巨大变化的证券市场,有一批快速成长的优秀上市公司,这一切将使我们拥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坚持深入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理念,不断积累经验 and 总结教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中国基金行业必将能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较好投资回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十余年前,当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阅读过大量海外经典投资书籍,获益匪浅。今天,我们和上海财大出版社一起,精挑细选了上述这些书籍,力求使投资人能够对一个多世纪的西方资本市场发展窥斑见豹,有所感悟;而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亦可为我们所鉴,或成为成功投资的指南,或成为风险教育的反面教材。

“辉煌源于价值,艰巨在于漫长。”对于投资者来说,注重投资内在价值,精心挑选稳健的投资品种,进行长期投资,将会比你花心思去预测市场走向、揣测指数高低更为务实和有意义得多。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站在东方大国崛起的高度,不妨看淡指数,让你的心态从容超越股市指数的短期涨跌,让我们一起从容分享中国资本市场的美好未来。在此,汇添富基金期待着与广大投资者一起,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基金业的不断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张 晖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10年1月8日

总
序

译者序

你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一本单纯的小说、一部普通人的自传，或者是一部个人与金融业大亨的战斗回忆录。

作者基思·斯古利(Keith Schooley)在石油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转行金融，投身美林。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理财顾问，他成绩优秀，本以为可以在这一行业中大展拳脚，却意外地发现，美林的一些实际操作与它自诩的道德楷模形象并不一致。在失望和犹疑中，作者拨通了美林的秘密投诉热线，希望自己可以对美林当时的现状做一些改变，却发现美林所谓的投诉保密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随后进行的美林内部审查也绝非彻底。随着事情的逐步推进，双方的梁子越结越深，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基思被迫离开美林，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诉讼。

这是一场大卫(David)与巨人歌利亚(Goliath)之间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执拗员工，而他的对手却是美国国内最庞大、最富有、最成功的重量级经纪行之一。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基思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是如何在压力重重之下越挫越勇，绝不言败的呢？

基思的故事之所以与众不同，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输了。仲裁者让他大失所望。他试图获得陪审团审理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美国上诉法院拒绝了他对陪审团审理的要求。每当我读到书的最后，总不禁对这场悲壮的战役唏嘘不已。基思本可以对那些内部弊端和违规操作保持沉默，专心赚取自己高额的佣金，以此换得家庭的稳定和幸福，可是他没有，他选

择了自己的良心；他也本可以在咄咄逼人的美林面前放弃诉讼，选择庭外和解，可是他也没有，他选择了战斗到最后一刻。他是真正的勇士。

然而，这个故事并不仅仅是基思一人的。他的经历有力地揭露了美国证券监管系统的不健全和存在的漏洞，也说明了仲裁议程并不真正公正合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股票购买者是否已经准备好继续无限地宽容这些弊端？他们是否能够对那些监管漏洞继续熟视无睹？他们是否能够接受管理机构对证券公司的庇护？他们是否放心把自己的心血交到这些机构手中？在全球经济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而风雨飘摇的时候，本书的出版有着很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谁吹出了那些金融泡沫？监管部门是否能够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书中不留情面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参与本书翻译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没有以下各位的帮助和支持，如果没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热情，如果没有李成军编辑的积极参与，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我要衷心感谢我的硕士生蔡海燕、谭薇、许小乔、周寒晓和陶晓晶，她们的努力对于本书的翻译出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在此衷心祝愿所有购买本书的读者都能有一段美好的阅读体验，希望基思的故事能给那些阅读本书的人稍许的感动。

本书的末尾，基思把审判权交到了公众的手里。每人心里有一杆秤。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判？

王煦逸
于同济大学本部校园
2009年11月23日

目 录

总序	1
译者序	1
序	1
致谢	1
绪言 发光的不都是金子	1
缘起	2
第一章 基思·斯古利	5
第二章 是快速升迁还是堕落沦陷？	10
第三章 斯古利宣战	22
第四章 第一次答复	25
第五章 第二轮——董事会之战	35
第六章 准备更多的战斗	46

第七章 监管者

第八章 预诉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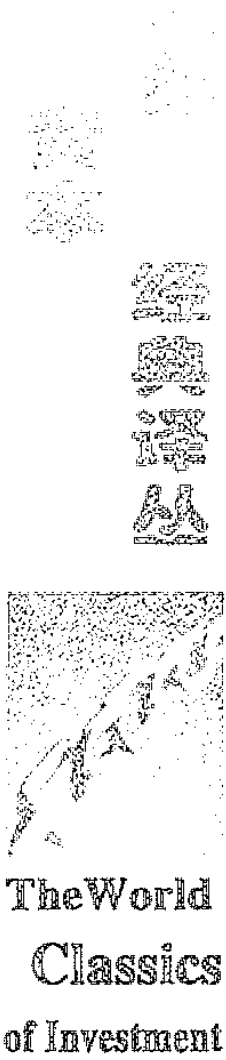
第九章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仲裁

第十章 冗长的诉讼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较量

第十二章 公众法庭

第七章 监管者	55
第八章 预诉讼	63
第九章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仲裁	83
听证会拉开序幕：表演时刻	92
开案陈词：布鲁斯·戴谎话连篇	95
基思·斯古利：大地也会为之颤抖	99
拜瑞·克拉克：托马斯说斯古利是一个毒瘤	122
斯古利继续战斗：不会有暴力行为	128
盖瑞·薛皮恩：我可以向你保证	132
丽莎·布琳娜德：被误认的身份	135
比尔·哈尔：小抄绝对存在	136
布兰特·巴顿：这越来越像水门事件了	143
艾利斯·爱德华兹：美林应当解雇一些人	150
海尔姆特·麦迪茨：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得知道它必然会被一路 送达高层	152
拜瑞·曼德尔：我不知道当经理以起诉相威胁时，我能不能在 办事处继续待下去	161
杰克·托马斯：我会用任何可能的罪名起诉斯古利	166
迈克尔·鲁斯塔德教授：铁证如山	174
艾伦·罗克勒：我有点糊涂了，这件事拖得太久了	178
总结陈词：一件极不寻常的案子	180
第十章 冗长的诉讼	192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较量	205
第十二章 公众法庭	209



绪言 发光的不都是金子

不要担心产品好坏，卖出去就行。

——昆特·艾利斯(Quinton Ellis)

“假如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存在，那就必须采取行动——无论牵涉到谁。一开始处理问题，也许会感到难以下手，但是，如果掩盖一个问题，那么当它一旦浮出水面，就会变得难以消化。也许我们不能计算出‘正直的回报’，但是，让正直屈居收益之下，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将并不仅仅是金钱。这个代价可能会是致命的。”

以上是杰出的美林公司法律总顾问和董事会副主席斯蒂芬·海默尔曼(Stephen Hammerman)在美林发行物《美林人》(*We The People*)1992年5/6月刊中的声明，他创立了华尔街最好的法律及合规部。当这份声明问世之时，美林的某位新晋理财顾问正准备对其第一手发现采取行动，这个发现便是，在华尔街最大的证券公司里，至少有一部分高层毫不理会查理·美林(Charlie Merrill)建立的公司基本原则。这位新晋理财顾问开始相信，尽管美林对外宣称自己依然维护这些原则，然而实际上它的理念已演变为“胜者为王”、“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以及“让我们来掩盖事实”。

美林内部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潜在问题。然而，当美林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潜在问题时，华尔街并没有可以与它分庭抗礼的对手。不管怎样，这家公司都能用钱买到最好的法律服务。然而，美林算错了一件事，那就是，这

位新晋理财顾问给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那些美林高层来说,幸运的是,查理·美林已经不在了,否则他们就会丢掉饭碗,露宿街头——但绝不可能是在华尔街的街头。假如查理·美林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这位新晋理财顾问所知道的一切,我相信他在坟墓里也会暴跳如雷。我就是那位新晋理财顾问。我的名字是基思·斯古利。

缘 起

在四个月的高强度训练和学习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证券经纪人执业资格,并在资格考试中获得了高分。我热切地希望在美林全力开展这份令人振奋的新职业。

我还不至于坐立不安,但无疑有些初来乍到的紧张。我在培训项目中表现出色,但也知道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在和潜在的客户进行接触时,我有些不安,害怕自己会答不上他们提出的问题。尽管有着种种担忧,但是我认为,既然之前已有这么多人取得了成功,那么,我也一定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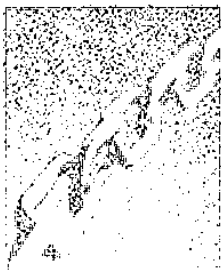
事实上,我认识镇上一些经验丰富的经纪人。他们入行已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他们的年薪超过 25 万美元。我自认并不比他们逊色,因此坚信自己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功。

这对我来说尤其重要,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本身,更是因为过去我在油气业的工作给家庭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巨大的波动。事实上,到那时为止,拮据的境况已经持续了好些年,我们早已失去了内心的平静。财务状况导致了婚姻关系的紧张,我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善现状。

我相信,美林所给的机会将顺利地解决我的难题。美林,这个家喻户晓、受人尊敬的名字,我带着它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伊尼德,这个社区对我们一家表示了欢迎。我妻子在距离此地不过 15 英里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岳父是代表该地区的一名州议员,岳母在社区内也是相当活跃。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他们的朋友和同事网络来获得一些难得的机会。

华尔街和证券经纪人一直令我着迷。在我看来,他们是这个令人振奋的世界中一呼百应的人物。同样吸引我的是这份职业的独立性。尽管我隶属于美林公司,这份工作依然有着创业的特性。工作收入与个人努力直接挂钩;因此,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收入。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这令我兴奋不已，因为我一直拥有强烈的职业道德感。我年轻时在运动上花了许多精力，我相信这有助于培养雄心壮志和竞争意识。当我需要激励自己达到某一目标时，这些能量就会派上用场。

从父母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端庄得体、品德高尚的人。我们定期做礼拜，父母经常提醒我们：对待他人要像对待自己一样。

事实上，我的价值观也是我对美林的工作感到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刚加入公司时，我曾相信美林的管理根基是无懈可击的正直以及对道德的至高尊重。这样的公司显然很适合我。

美林对其高尚品德的宣扬，表现在所有的公司出版物中。例如，1992年——我在职的主要时期，美林在年度报告中提到了公司的价值观。这份注释性文件声明：“美林的公司文化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客户至上、尊重个人、团队协作、公民责任以及刚正不阿。公司经常提醒员工们，任何人的个人底线都没有公司的名声重要。《商业行为准则》(Guidelines for Business Conduct)，作为每位员工入职培训的一部分，是定期发行的，它是商业道德在公司政策上的体现。美林要求所有员工都遵循这些政策，并把它作为管理层评估过程的一部分，对经理们的评价将以其对公司价值的体现为依据。”

这份年度报告还说：“由于坚持正直行事和以客户利益为先，理查·美林成为了将华尔街带入美国千家万户的著名人物。作为美林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理查·美林是公司全体成员的道德榜样。”

我同样相信这些基本原则，能找到一位拥有相同信仰的雇主，我倍感放心。同样令人高兴的是，这不是家族式企业。这是美林——金融业的巨头。

1992年，美林发布报告，称其连续第二年创下盈利纪录。普通股东和普通股的净利润达到了全美公共证券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排除收入税和会计方法变更的影响，美林的收入超过16亿美元。世界范围内的客户委托资产增长了近10%，资产总额达到476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对手。根据2001年4月发布的2000年度报告，普通股的净利润达到183亿美元，税前收入达到55亿美元，客户资产为1.7万亿美元。

1999年，埃德温·J. 佩金斯(Edwin J. Perkins)在其著作《从华尔街到千家万户》(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中称：“作为一家在金融服务领域中有口皆碑的公司，美林已然崛起；它或许是全球范围内最受认可的品牌。

今天，美林在 45 个国家拥有办事处。除了南极洲之外，美林的代理人遍布各个大洲。美林还有超过 800 万的零售客户。”

显然我加入了冠军团队，但我在这一行依然是一名新人。作为一名理财顾问，我的责任是帮助客户达到其财务目标。无论他们是想为退休生活和子女教育存钱，还是想从投资中获益，我都会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达到目标。此外，我根据内心的道德准则行事，这不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为，也是对公司政策的遵守。

我有不少东西要学，也有很多目标尚未达成，我已做好出发准备。然而，就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我很快发现，迈出的第一步就出了差错。事实证明，使我摔跟头的并非工作本身，而是我工作的环境。

在美林任职尚不满一年，我便清楚地意识到，它声称拥有至高的道德标准只是表面文章而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我目睹了无数管理层参与或默许的不正当行为，并痛苦地意识到，我的工作环境浸染在怎样的一种文化和思维模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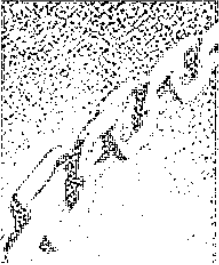
有一个具体事例令我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与经理布兰特·巴顿 (Brent Barton) 进行交涉，我对他在客户面前对某些基金的介绍持有异议。不久，他的上司小昆特·艾利斯 (Quinton Ellis, Jr.) 跑来与我交涉。他拖了一张椅子坐到我的桌前，逼视着我并责备道：“不要担心产品好坏，卖出去就行。”

我震惊了，接着便感到崩溃。我以为，在一家以维护无懈可击的道德标准为荣的金融服务公司里，不会存在这样的言论。我感到既困惑又失望，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在美林工作，而且还担任了经理一职。

我曾经以为，每个人加入美林，都是因为他想要在一家功成名就、受人尊敬的公司里任职，是因为这家公司能够反映出他自身持有的价值观。然而，我还不至于过分天真。我知道，在如此庞大的机构里，难免会有害群之马，人总是难免想走一些捷径。然而，艾利斯的声明依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我自问，是否我的直接上司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我被美林自我标榜的形象所欺骗。我也曾对它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这里有一个值得一听的故事。假如此刻你还相信那些美林重视正直品质和客户利益的宣传，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我的切身体会。然而，不是要你听信我的一面之词，记录可以证明一切。这就是我为你呈上的记录，现在，你是法官。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一章 基思·斯古利

我总能明辨是非。

——基思·斯古利

我在俄克拉荷马市出生和长大，与生活在美国中心地区的大部分人一样，我接受了典型的中产阶级教育。这种教育使我坚信日常礼仪和爱国主义的价值，以及那位有朝一日将审判全人类的上帝。

父亲拥有法律文凭，不过他从未执业。他曾在中学执教，也在石油公司待过一阵，其主要职业身份是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系统分析师。40年来，他一直担任俄克拉荷马市郊一个小镇的议员，也曾任过几届市长。父亲保守、节俭、博学、自律且言出必行。

我已故的母亲是在西南密苏里州(Southwest Missouri State)的大学里与父亲相识的。她具有多重身份：母亲、主妇还有志愿者。和父亲一样，她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附近的一家奶牛场长大。母亲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我至今仍未遇见像她这般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多年来，母亲一直同情那些为争取与白人平等权利而苦苦挣扎的非洲裔美国人。因此，30年来，她都以非正式会员的身份为俄克拉荷马市的基督教循道宗圣公会(Christi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服务，同时也在一家我们全家定期做礼拜的教堂里担任全职工作人员。

父母都强调道德品质的价值，因此，我总能明辨是非。

我是家里四个兄妹中的老二，大姐叫安(Anne)，较为年幼的两个弟妹分别叫做布兰特(Brant)和吉尔(Jill)。我们是一个普通而快乐的家庭，生活简单舒适。我们参加过幼年童子军、唱诗班、少年棒球队、篮球队和足球联盟，也一起野餐、游湖，每年暑假都过得其乐融融。另外，我们每年都会拜访密苏里的亲戚一两次，一次在圣诞节，另一次通常在夏天。我们兄妹四人都已从大学毕业，其中三人拿到了硕士学位。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充满斗志、目标明确的人，对于那些我渴望的重要事物，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

在成长过程中，我热爱运动。棒球赛、足球赛和篮球赛总也看不够、玩不够。我会在前院练习几小时的传球、踢球和悬空球等足球技巧，我日复一日地反复练习以上动作，追逐着那只四处乱窜的足球。我的苦练在 10 岁那年有了回报——获得了由福特公司资助的俄克拉荷马州悬空球、传球和踢球比赛的同龄组冠军。因此，我很早便体会到了天道酬勤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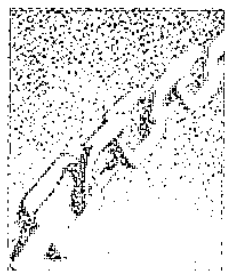
六年级时，父母要求我学习小提琴。以运动员自居的我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反对意见却被父母驳回。还好，这没有给我留下太大阴影，然而，至今我仍记得九年级时不得不背着琴盒上学的那种难堪。我认为这种境遇塑造了我的性格，因为我必须去做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事，包括四年来干巴巴地练琴。谢天谢地，小提琴练习随着中学生涯的开始而结束。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初中：挨家挨户地推销贺卡和花籽。在艾森豪威尔初级中学时，十几岁的我开始为《俄克拉荷马州报》(*The Oklahoma Journal*)送早报，为此我必须每天 4:00 起床。有一次，这家报社举办了一项竞赛：争取到最高订阅量的前 20 名报童将获得芝加哥三日游的奖励，这一奖品令我兴奋不已。我告诉父亲我将成为 20 位赢家之一，父亲让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俄克拉荷马州报》拥有许多报童，而我属于最年幼的那一组。然而，最终我赢得了去芝加哥旅游的机会。

父母在大萧条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因此，他们很重视工作和劳动的意义。我在中学除了送报之外，还在当地的“矮胖子”超市(Humpty Dumpty)兼职。夏天里我也做了不少园丁工作，在自家院中的自然是义务劳动，替邻居工作则能获得报酬。

父母——尤其是父亲出于多年来的地方从政经验——一直鼓励我们兄妹参加学校活动。我依然对运动比较感兴趣，因此并不热衷于课外活动。不过，我曾在公益组织钥匙俱乐部(Key Club)和当地的基督运动联谊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会(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分会担任过一届主席。

在整个初中阶段，我都坚持运动——春夏打棒球，秋冬玩篮球。自从
我参加田径比赛后，我就开始全年练习田径。最后田径成了我的主要项
目。

中学二年级时我开始跑步，出于健身目的，我决定参加越野跑——一
种定距离跑。小组的每日训练量都会超过 5 英里，我很快意识到越野跑究
竟有多艰苦，你必须不断挑战极限才能取得最好的成绩。越野跑没有暂
停，也不设替补。

在第一个赛季末，我成了约翰·马歇尔中学(John Marshall High
School)最好的定距离跑选手。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定
距离跑并不那么热衷，也从未参加过比赛。

越野赛在秋季举行，而田径比赛则在春季。在田径比赛中，我同样参
加了定距离跑并蝉联了冠军。1971 年，已升入高年级的我，在俄克拉荷马
州田径锦标赛的 2 英里跑中获得亚军，同年我被中学教练选中并获得了
“杰出高年级运动员”的称号。这一荣誉非比寻常，因为约翰·马歇尔中学
是本州最大的高中之一，1971 年它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高年级运动员，至
少有 10 人获得了运动员奖学金，其中 4 人被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录取，2 人就读于塔尔萨大学(Tulsa University)，1 人则去了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我觉得也许别人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不过我也相信，自己之
所以获奖，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在田径比赛中所取得的成绩，更是因为教练
们知道我的努力程度无人能及。我是一个渴望胜利的竞争者，中学时代所
培养出的自律、执著、耐力以及心理韧性，成为 20 年后我同美林较量的重
要筹码。

中学毕业后，我原本希望能够获得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田径奖学金。然
而，定距离跑选手的名额被两位美国国家队的预科学生占用，因此，我决定
接受来自州立中心大学(Central State University)的奖学金。然而，春季
学期过后，我决定中止田径运动，很快我便离开了校园。

父母担心我可能会就此放弃学业，可我知道自己还会重回校园。我在
俄克拉荷马市“矮胖子”超市的全职工作足以养活自己，在那段时间里，我
的体重骤增 30 余磅。我不断回想自己没能参加的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田径
比赛。我想得越多，就越是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一水准的竞赛中取胜。熊熊

斗志在我臃肿的体内燃起，1973 年夏季，我决定加入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田径队，看看自己能取得怎样的成绩。

学籍变动使我丧失了一年的参赛资格，之后我很快赢得了田径奖学金，最终在室内 2 英里赛跑中取得了 9 分 06 秒的成绩。这比我中学毕业时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纪录快了 1 秒。我再次懂得了相信自己，相信勤奋终会有回报。

1977 年春季，我从俄克拉荷马大学毕业，并获得石油土地管理的工商管理本科学士学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中，我开始频频拿 A，因为我终于意识到我的运动生涯即将结束，最好还是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事实上，这份认真使我进了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是美国西南部最好的 MBA 项目之一。

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坚信，假如你勤奋工作，做正确的事，成为一个高尚而正直的人，那么一切都会变好。那时我尚未接触现实世界，不过我终将大展拳脚。

我打算发挥石油土地管理专业的作用，并于 1979 年在油气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正值石油业蒸蒸日上，我觉得自己似乎在正确的时间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不到一年，27 岁的我便拥有了 125 个油气井的股份，并因此而获得了 1 300 万美元的资本净值。我开着一辆新凯迪拉克，戴着价值 10 000 美元的金色劳力士，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1981 年，我和唐娜结婚了，她来自俄克拉荷马州中北部的一户显赫家庭。我们相识于妹妹吉尔安排的一次相亲，她是唐娜在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女生联合会中的朋友。我们在欧洲渡过了非常愉快的 10 天，无论是乘着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客机往返，还是住在巴黎的丽兹酒店，蜜月旅行的一切都是一等一的。回国后，我们定居于俄克拉荷马市，新居背靠绿色乡村俱乐部 (The Greens Country Club) 高尔夫球场的第 17 个发球区。几年后，我们就有了两个讨人喜欢的孩子：1984 年出生的泰勒和 1988 年出生的泰瑞。

一切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然而很快我便体会到世事难料，好景不长。一帆风顺的石油商生涯很快就终结了，犹如当初开始一般迅速。

当油价飙升至最高每桶 42 美元的天价时，我自认为比较谨慎地将资产净值中的一小部分变成了能源借贷银行的产品。我丝毫没有意识到，1982 年石油业的繁荣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接下来便是油气业的艰难时期，这导致了家庭财务困难和我的婚姻问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题。然而，1984 年我获得了一个经理职位，并最终成为一家小型油气勘探和生产公司的副董事长。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 1986 年石油业的状况继续恶化。油价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公司砍掉所有的大型勘探和开发项目，不久我就离开了那里。

石油泡沫的破裂，导致我在此后的几年里都陷于个人财务困境，1985 年我根据《破产法》第 7 章申请破产，这是我生命中非常令人沮丧的一刻。不过困境里总会有一些闪光点。而且很快我便意识到生活还将继续，而时间会抚平一切不快。同时，我也体会到了以下说法中的真知灼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以后几年中，我开始振作起来。我推销了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中不少盲目勘探的油气矿区，但只取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在石油业中运气至关重要，但它却总是不肯眷顾我。正因为如此，1990 年，37 岁的我开始考虑转行，以便更好地供养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分别是 5 岁和 2 岁。

我从岳母那儿得知，美林证券将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伊尼德开设办事处，该地距离俄克拉荷马市 80 英里，距离妻子的故乡仅有 15 英里。搬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对唐娜很有吸引力，我也认为美林的证券经纪人职位也许比较适合我。我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且一直以来对华尔街颇感兴趣；我阅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并为金融文化而着迷；我还觉得证券经纪行业令人兴奋、充满魅力。

人口约为 45 000 的伊尼德是俄克拉荷马州西南部最大的城镇。它是该地区的零售业、农业、能源业、卫生保健和文化活动的中心，那里还有万斯空军基地(Vance Air Force Base)和一家小型私立大学。

鉴于伊尼德素以富人云集而著称，成为当地的证券经纪人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岳父一家在当地人脉颇广。唐娜的父亲是来自伊尼德地区的州议员，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州立大学评议员。岳母是一名为当地大学工作的成功筹款人。在一度辉煌的石油职业生涯暗淡终结之后，我认为加入美林的伊尼德办事处是一个能够扭转局势的明智做法。

1991 年 7 月 1 日，我成为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美林办事处的理财顾问培训生。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次转行不仅会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严重后果，也将对我的个人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的开端，而对手是在华尔街声誉显赫的美林证券公司。

第二章 是快速升迁还是 堕落沦陷？

在我的工作场所——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Oklahoma City Complex),我开始遇到麻烦,很快这里变得危机四伏。

——基思·斯古利

1991年,美林证券的伊尼德办事处规模尚小。其面积约为1 000平方英尺,仅有5名雇员。和美林的大部分办事处不同,它位于大城市市区之外,因而被称为“特别市场办事处”(Special Market Office)。特别市场办事处的扩张是美林成长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驻地经理布兰特·巴顿在伊尼德长大,不过如今他需要每天在俄克拉荷马市和伊尼德之间往返。他的父亲在一家全国性货运公司担任总裁,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伊尼德的成功企业。巴顿走路昂首阔步,个性强硬,他说话随便,有时做事冲动。在美林证券的俄克拉荷马办事处担任理财顾问4年后,他在伊尼德办事处获得了第一个经理职位。我时常听到巴顿在电话中提醒对方,他是布兰特·巴顿,伊尼德办事处的驻地经理。

在被录用之前,我在面试中第一次遇见了巴顿的上司、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高级驻地副总裁小昆特·艾利斯。伊尼德办事处即将被纳入该综合办事处。艾利斯过来只是为了与巴顿说上一两分钟的话,不过这点时间足够让他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比较特别的第一印象。

艾利斯身材高大，约 6 英尺 2 英寸，重达 220 磅。他身体健康，走路来自信十足，外表颇具威仪。艾利斯尽管皮肤粗糙，满面痘疮，但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身着名贵西服，打着丝绸领带，以此显示自己成功人士的身份；头发全被光滑地梳到脑后。后来，一位理财顾问告诉我，有一次他看见艾利斯从盥洗室回来时手中拿着一把刷子、头发定型剂和牙刷。

我觉得对艾利斯来说，展示自己的权势与成功非常重要。在第一次碰头会上，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似乎对他来说，我过去的成功从商经历根本无足轻重，我只是某位籍籍无名的潜在理财顾问。即便我可能很快就会加入他旗下的某个办事处，为他的奖金添砖加瓦。我意识到，艾利斯不会在小人物身上花费时间。

在我加入美林的第一个月中，巴顿告诉我，艾利斯非常注重物质，在俄克拉荷马市的办事处也不大受欢迎。驻地经理对上级的坦率评价令我惊讶不已。巴顿告诉我，艾利斯因为几年前动员职工参加大型竞赛时的滑稽表现，而在全国各地的美林证券出了名，他曾鼓动手下的理财顾问身着戏服参加销售动员会。我相信巴顿甚至说过，艾利斯有一年穿过猫王的孔雀演出服。

除我本人之外，伊尼德办事处还有拜瑞·克拉克 (Barry Clark) 和乔·巴采尔 (Joe Bazzelle) 两位理财顾问。他们是巴顿和艾利斯从威奇塔 (Wichita) 的保诚证券公司 (Prudential Security) 挖过来的。克拉克和巴采尔是真正的绅士，我非常喜欢与他们共事。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他们思虑周密、对人体贴，将客户的最佳利益置于重要地位。伊尼德办事处的行政助理是金·费特纳 (Kim Feightner)，她曾为俄克拉荷马州的其他几家证券公司工作过。

最初的四个月培训，美林证券提供了 2 000 美元的标准月薪，我非常担忧，因为这不足以供养妻儿。我和埃利斯进行了协商，不仅向他说明了我的家庭负担，同时也指出岳父家的人脉关系能让我迅速获得成功。艾利斯表示赞同，他认为我拥有巨大的潜力，因此将我的月薪提升至 3500 美元。

我立刻表现出自己对成功的强烈渴望——不仅要在证券经纪业取得成功，更要成功得拔尖。作为为期四个月的职业发展项目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简称 PDP) 377 班的成员，我的总成绩在 32 名理财顾问培训者当中名列三甲。377 班培训项目包括为系列 7 考试做准备，这是一场以高难度著称的考试，但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证券业经纪人所必须

通过的。

我的系列 7 考试得分为 93.2，巴顿告诉我，艾利斯说这是他在美林 20 年来所听说过的最高分。我很自豪，勤奋有了回报，不过这种感觉没能持续多久。巴顿在转述艾利斯赞语的同时也指出，考试高分和职业成功往往成反比。巴顿认为，任何以学术为导向的人，或者说基本上所有会读书并能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人，都永远无法在销售领域取得成功。上司对雇员在某些方面的良好表现居然做出如此反应，我感到既奇怪又失望。我本以为他会用我的成功来激励我，而不是打击我。

1991 年 10 月 29 日，我从 PDP 培训的 377 班毕业后获得了美林的生产编号，这意味着我已是一位合格的证券经纪人，能够为我自己的客户提供服务。在新的家乡伊尼德，我积极发展与企业主、律师、会计、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关系。我准备先搭建起足够的人脉，以便日后在这一行获得成功。我并未采取完全以销售为导向的做法。我认为，在初期建立稳固的人际网更有价值，它可以在日后逐渐发挥作用。我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参加了当地著名的扶轮社(Rotary Club)，成为当地一个慈善机构的社长，并就证券投资进行了无数次公开演讲。

很快，我的业绩在美林西区销售部约 400 名新晋理财顾问中跻身前 10 位。我和家人迫切渴望的财务稳定似乎已是触手可及，我走上了一条平步青云的阳关道。我在华尔街最著名的证券公司的新职业看上去一片光明，前途无量；只有一个问题：当我每次凭借个人努力取得了良好进展的时候，公司方面总会有一些事打击我的热情。在我的工作场所——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我开始遇到麻烦，很快这里变得危机四伏。

1991 年 7 月，我加入美林时对它的第一印象是，这家公司有着无懈可击的正直以及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作为入职的条件，我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该文件声明，我已读过公司的《商业行为准则》并将严格遵循这些条款，其中包括：“美林请求并要求每位雇员都严格遵守最高道德标准，并在其进行商业交易的所有领域进行适当判断。”

美林对其正直品质进行了巧妙的宣传，它的声誉成为我加入它的关键因素。

最先令我犹疑的一件事牵涉到同事巴采尔。在我获得执照前后，巴采尔曾就一家房地产合股公司的 VMS 抵押投资者基金(VMS Mortgage Investors Fund)，向他在保诚保险公司的一些老客户做出了口头建议。这家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美林证券：致命的代价

第二章 是快速升迁还是堕落沦陷？

公司向投资者保证将会有 3 年的高收益，随后可返还原始投资。但是，VMS 倒闭了，投资者的大部分本金有去无回。巴采尔建议这些客户，去联系一位有可能在 VMS 倒闭事件中提高其投资价值的律师，并与这些客户进行了书面联系。那位律师将这些没有美林笺头的信件分装几个盒子里，并寄到了伊尼德办事处。这些盒子在巴顿办公室外行政助理的桌子上放了一两天，看上去很是醒目。巴采尔花了大半个下午及第二天上午在办公室里签署和装填了大约 100 封信件。我很清楚，巴顿至少知道巴采尔以口头方式建议客户去咨询某位律师，我也毫不怀疑巴顿可以看出巴采尔在与客户进行书信联系。

在得知其前理财顾问的做法后，保诚保险公司对美林证券提出了抗议。美林立即声称巴采尔在某些方面违反了公司政策，他可能在未经经理许可的情况下对客户做出书面建议。这样，尽管这些信件并没有用美林的笺头，巴采尔还是被解雇了。

我对管理层在巴采尔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感到困惑不解，但很快便将其抛诸脑后。我想在这份蒸蒸日上的新工作中大展拳脚。然而，1991 年 11 月以及接下来几个月的情形使我大开眼界。各类事件纷至沓来，层出不穷，使我很难再相信公司的道德品质。

1991 年 11 月 15 日，我和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美林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管理员莎拉·格拉汉姆(Sarah Graham)通了一次电话。我被告知，根据俄克拉荷马州的继续教育法，我必须通过保险考试才能继续持有寿险执照，所以我需要与她联系，以便了解如何参加函授考试。她向我透露了美林的不正当行为，这是我发现的所有不正当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桩。

在通话中，格拉汉姆说：“嗯，我会给你寄一份小抄(Cheat Sheets)，让你通过考试。使用小抄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这样一来，理财顾问们就可以随意查看资料，不用为考试费神。”格拉汉姆的语气表明，这是一种沿用至今的惯例。她说得很轻松——似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被她的说法弄得措手不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我唯一知道的是，那张小抄已经寄出。

11 月 19 日左右，我收到了她所说的小抄。使用小抄直接违背了所有考生必须签署的宣誓书，宣誓书规定，考生不得借助任何外部辅助工具。

当月，我发现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俄克拉荷马市。某日，鲍勃·谢曼(Bob Sherman)来到小镇，谢曼是艾利斯的上司、美林在特克索马

(Texoma)区的地区总裁,这是一个囊括了大半个得克萨斯州和全部俄克拉荷马州的超级大区。谢曼和艾利斯来伊尼德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鹌鹑狩猎大赛(Grand National Quail Hunt),这是一个旨在吸引全国各地商业领袖与名流的盛会。有一次,谢曼、艾利斯和巴顿都待在我的办公室。巴顿告诉艾利斯和谢曼,他接到了橡树乡村俱乐部(Oakwood Country Club)的一个电话,俱乐部的经理怀疑巴顿为了群发邮件而滥用了一张俱乐部专有的成员名单,这位经理因此而感到不快。巴顿说,他在那位经理面前否认了这一点。(之前,巴顿获得过这张名单的一次性使用授权。)接着巴顿便自夸,他实际上是如何利用这张名单疯狂群发信件的。

艾利斯说:“很好,继续这么办。”谢曼则沉默不语。

这一幕令我难以置信。在高级驻地副总裁艾利斯和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这是雇用我的美林零售部)的四大高级执行官之一——地区总裁谢曼——面前,驻地经理巴顿公然吹嘘自己的不正当行为。同样令人警觉的是,艾利斯在地区总裁面前对这一行为的赞扬。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在一位此时入职尚不足一个月、曾读到和听到过美林所有雇员都必须遵守的最高道德标准的新晋理财顾问面前,这三个人显然都缺乏判断力。这件事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这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相比,也只是小菜一碟。

11月初,我与巴顿一同拜访客户时,发现他在不正当地代理一只名为“市政收益”(MuniYield)的债券基金。他在出售该基金时,称债券购买者可得到预先偿付,然而,根据我对信息的解读,这并非事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预先偿付的债券将获得最高的评级 AAA。然而,市政收益基金的说明书表明,这只基金可能在其有价证券组合中包含了大量的垃圾债券,因此,AAA 的评级具有误导性。我和巴顿谈过这件事,然而他不同意我对该产品的评价。

由于这件事,数周后,艾利斯逼视着我说:“不要担心产品好坏,卖出去就行。”

艾利斯的警告表明了他的立场,但我并不喜欢这一说法。暗示是一回事,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又是另一回事——我感到震惊。我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模式,他们居然以这种商业和营销方式为傲。在我看来,艾利斯的立场完全没有顾及客户的利益,其目标仅仅是让客户在虚线上签字。不需要知道你卖的是什么,也意味着客户无须了解自己买的是什么,我不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喜欢艾利斯做生意的方式。

在我和巴顿有关市政收益基金的进一步谈话中，他告诉我，假如过分注重细节，我将永远无法在这一行取得成功。因此，巴顿和艾利斯似乎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很快，我就收到了美林市场部的电报，电报称市政收益基金不应作为预先偿付的产品出售。我之前对该产品的研究得到了证实，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林暴露出了我所不喜欢的一面。

这些事件以及我在美林短期工作过程中所目睹的种种现象，令我感到困扰。11月末，我决定咨询律师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琼斯后来因在俄克拉荷马市的爆炸案中代表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辩护而声名远播。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所处的环境已让我开始怀疑，在美林，不道德的甚至非法的商业行为不仅不会遭受谴责，而且会受到鼓励和期待。另外，我不希望在这种持续的沉默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为琼斯编录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概述了我在美林目睹的种种令人不安的事件。我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事件将会发生。

12月初，费特纳告诉我，巴顿要她伪造8份在橡树俱乐部举行的专家讨论会的与会者名单，每个名单应拥有20名与会者。他指使费特纳从电话簿中随机抽取名字，以便伪造这些子虚乌有的会议。巴顿在美林报销了这些并不存在的费用，公司将款项直接汇到了他在乡村俱乐部的个人账户上。

不久之后，我参加了继续教育人寿保险考试，我曾为此收到一份在我看来属于小抄的资料，但没有在考试中使用它。之后我告诉巴顿：“布兰特，保险考试可比我想得难多了。为了它，我不得不非常努力。”

巴顿大笑起来：“嗯，我和其他五六名理财顾问所做的不过是在某个周六上午聚到一块儿，让来自达拉斯的驻地保险专家比尔·哈尔(Bill Hall)帮我们通过这场持续25个小时的考试。”巴顿还说，这一做法得到了艾利斯的允许。

从巴顿的描述方式来看，我感觉到，他明白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他用这种说法为自己开脱：“嗯，我们卖的其实不是人寿保险，我们只是需要通过人寿保险执照来获得佣金。”我并不感到惊讶。我的印象是，他们不会遵守规则、条款和法律。对于艾利斯、巴顿和美林的其他人来说，“获得佣金”似乎是唯一重要的事。

每年，美林都会举办旨在鼓励雇员达到特定目标的竞赛。1992年的

第一项重大赛事是环法现金管理账户(Tour de France Cash Management Account)竞赛。现金管理账户(CMA)是一种收费账户。它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能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而佣金所带来的收益则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高层的目标是提高现金管理账户的数量,因此,美林极为重视每位驻地副总裁的团队在竞赛中的表现,这对驻地副总裁的年终奖至关重要。假如他获得的评价是“遥遥领先”而不是“符合标准”,那么他的年终奖金额可以轻易提高 10 万~15 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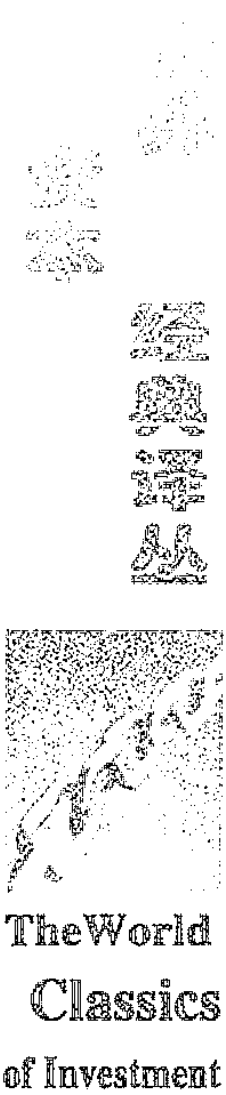
在 1992 年 2 月的环法 CMA 竞赛开始前不久,艾利斯在俄克拉荷马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销售动员会,并要求来自伊尼德和劳顿联合办事处的理财顾问参加。艾利斯很清楚,他的年终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在竞赛中的表现。他之所以千方百计地争取胜利,也是为了赢得上司的赞扬,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沿着美林的权力阶梯往上爬。

销售动员会即将开始,理财顾问和其他人员很好奇,艾利斯今年又会上演什么好戏。来自联合办事处的 60 名理财顾问和另外 25 名工作人员,端坐在位于俄克拉荷马市中心著名的领袖广场(One Leadership Square)第 18 层的美林办事处大型会议室里。

突然间,从会议室后方传来一阵巨响。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骑在哈雷摩托上的小昆特·艾利斯。他身着黑色皮夹克,手戴同色手套,油光发亮的头发被梳到脑后。当他沿着中央过道缓缓前进时,许多理财顾问和员工被摩托车排出的废气呛得开始咳嗽。响声震耳欲聋,艾利斯似乎充满了自豪感。

艾利斯就环法竞赛进行了动员演说,他向理财顾问们说明了由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提供的所有奖品。他指向会议室后方,那里沿墙堆放着 6 英尺高、10 英尺宽的奖品,包括水晶球、电视机、立体声音响设备、贵重的红酒、酒杯、家庭娱乐系统和奖状。艾利斯说,除了这些奖品之外,美林还会提供晋升机会和物质鼓励,其中包括一次巴黎国际游和太浩湖(Tahoe Lake)国内游。他解释说,在俄克拉荷马市,拿奖的方法是收集“昆特币”(Quint Bucks),竞赛将于 4 个月后即四月份结束,它们可以在赛后的综合办事处拍卖会上派上用场。

昆特币是一种玩具钞票,中央印有艾利斯装扮成猫王埃尔维斯(Elvis)的图片。理财顾问可以根据他们在 CMA 竞赛中新开设收费账户的数目,来赢得昆特币。艾利斯的风头无人能及,就连猫王也不如小昆特·艾利斯



华丽耀眼。

为确保所有的理财顾问参赛，艾利斯要求行政经理向前一周里未能开设可得分 CMA 竞赛账户的理财顾问发放“违章罚单”。她戴着警帽，身着皮夹克，在办公室里穿行，向那些违章的理财顾问发放罚单。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一名高级理财顾问每周都会穿上黑色长袍，摆出其他法官装备，然后在全体理财顾问和员工参加的销售会议中开庭审讯。每位收到罚单的理财顾问都必须向法院和监察员解释，为何前一周自己未能在竞赛中得分，法官会扣除每位违规者相应数目的昆特币。艾利斯最擅长这一套，看似玩乐，实为恐吓。

为了进一步激励伊尼德的理财顾问，巴顿告诉大家，艾利斯承诺，将根据他们的竞赛表现分配2 000万美元的客户资产。这些资产来自那些在俄克拉荷马州西北部拥有客户的俄克拉荷马市理财顾问——这些客户可以在伊尼德办事处得到更好的服务。

在环法 CMA 竞赛开始前数周，巴顿在艾利斯的指示下通知伊尼德办事处，为了使办事处看上去更齐整，他们将对人数统计进行处理。这意味着，他们将暂时取走部分理财顾问——包括我——的生产编号。我将不再属于美林系统，尽管事实上我仍是该公司的在职理财顾问。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得分的新账户被划分给依然拥有生产编号的理财顾问。这样便可提高办事处的人均输出及其竞赛成绩。换言之，艾利斯和巴顿并不打算和美林的其他经理公平竞争。优异的竞赛成绩将带来更高的年终奖和其他好处。

我强烈反对这一变动。尽管失去了生产编号，我依然不顾经理的指示，在所有的新账目表上签名。我担心这种欺骗行为会限制我的签字管理权，最终影响我进入客户的账户。根据我对系统的理解，我的电脑只能登入在我的生产编号上存在的账户。这同样意味着，当客户的债券溢价赎回和到期时，我无法接到电脑系统的通知。我也得不到研究部降低客户持有股票评级的通知或改买为卖的建议。尽管我提出了抗议，管理层依然我行我素。

巴顿对环法比赛非常着迷，他从其他理财顾问那里买下了所有能买到的昆特币。比赛结束后，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奖品拍卖会上，巴顿的比赛成绩遥遥领先，赢得的奖品数量超过了任何人。巴顿看起来很自豪，大概是因为知道，他将在几个月内被他的导师艾利斯任命为俄克拉荷马市

综合办事处的销售经理。

艾利斯的表现也很不错。他本人即将赢得梦寐以求的巴黎游，因为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在全国的 174 个综合办事处中名列前 20 位。艾利斯知道如何激励自己的团队，他知道如何取胜，至少他认为如此。

我知道操纵人数是一种欺骗行为，因此在三月份，我决定通过美林热线，举报自己目睹的不正当行为。据称这个热线是保密的，每位使用者的身份都不会外泄。我通过热线和全球证券主席(Director of Worldwide Security)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进行了交谈，谈话主要涉及环法 CMA 竞赛。为帮助墨菲了解欺骗手段，我和他又通了数次热线电话，纽约方面很快确认欺骗行为确实存在。墨菲告诉我，纽约方面将告知艾利斯，骗局的败露纯属偶然。

在美林对艾利斯的比赛分数进行调整之后，他被踢出了驻地副总裁的前 20 名，并失去了去巴黎的机会。然而，作为奖励，艾利斯和巴顿最终得到了太浩湖之旅。但在之后的进一步调查和确认中，他俩不得不向公司返还太浩湖的旅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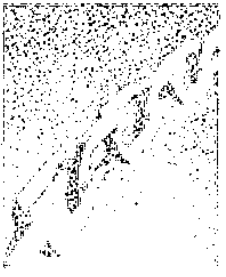
在环法 CMA 竞赛的 4 个月当中，除了人数造假这件事之外，其他一些麻烦事也纷至沓来。

我得知，理财顾问无须在州外登记，便可在该州开设账户。他只需要把账户挂在已经注册的理财顾问名下便可。我立即担心这可能是违法行为。

1 月末，我写信给巴顿，要求对今后的薪资进行调整。在信中我解释说，我因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工作。原因之一是我虽然收到了来自达拉斯美林人寿的小抄，仍花了 3 天时间来准备继续教育人寿保险考试。虽然巴顿或艾利斯一定是看过我的备忘录后，才批准我的薪资调整请求的，但他们对小抄一事并未做出任何回应。虽然有可能他们是没看见信件的这一部分，但我认为他们既然看了备忘录，就一定知道作弊的事，却仍毫不关心，视若无睹，或是袖手旁观，希望问题能自生自灭。

同样是在 1 月末，巴顿获得了一次升职。在晋升为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销售经理之后，他离开了伊尼德办事处。接替他的是杰克·托马斯(Jack Thomas)，他举止得体，深思熟虑，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我希望伊尼德办事处的困扰也可以随着巴顿的离开而结束。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托马斯到任的几天后，电脑系统在计算我的一位客户佣金时，出现了一个偶然的错误。这位客户因此多付了 15 美元。因为客户很不高兴，希望能立即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所以我在得知此事后，向他寄了一张价值 15 美元的私人支票。

托马斯得知退款之事后，严厉地斥责我，要求我签署一份确认书，上面注明正规机构禁止退还佣金，假如我再打“折扣”，公司将会立即解除合同。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即使有错，那顶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最近数月中，我目睹了管理层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却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被解雇，或者就我所知，也没有人受过这样的警告。我为他对这件事如此极端的反应而感到不解，我怀疑托马斯之所以做出如此反应，也许是因为艾利斯对我在环法计划中的不合作感到愤怒。

不久，我便知道热线的保密性不过是一个幌子。4 月 9 日，托马斯走进大厅，来到迈克尔·迪兰（Michael Deline）的办公室。迪兰是一名最近被伊尼德办事处聘用的理财顾问，他的办公室正好在我的隔壁。我听到托马斯说：“迈克尔，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东部（Back East）、普林斯顿（Princeton）或者其他人，抱怨自己作为一个 PDP 受到了不公待遇？”（PDP 不仅指美林的培训项目，也常代指任何参加此培训的人。）

迪兰说，他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于是托马斯走进我的办公室，问了同样的问题。我不打算告诉他，所以也说没有。但那一刻，我心里很是吃惊。我马上给墨菲打了电话，并在同一天和他通了两次热线电话讨论发生的一切。墨菲告诉我，他把整件事都告诉了西区销售部的全国销售经理鲍勃·迪恩（Bob Dineen）。他还告诉我，迪恩向谢曼透露了部分内情，后者告诉了艾利斯，而艾利斯也和托马斯谈过。我相信，艾利斯已知道，是谁让他失去巴黎游并遭遇随后的尴尬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对此始终难以释怀。

至少我的一些上司可能知道，除了竞赛舞弊之外，还有许多事令我感到困扰。假如我在竞赛问题上不愿与他们合作，那么他们担心我也会把别的事给抖出来。或许纽约方面也在为这位俄克拉荷马市伊尼德的新晋理财顾问而心烦。

我这样想，是在六月中旬偶然看到伊尼德办事处收到的一份电报后。这是美林员工注册部直接发送给艾利斯的，要求提供我的证明文件的名称，以查证 1987 年 7 月～1991 年 6 月我的自由职业阶段。上面写道：“请

尽快回电。”

这封电报使我相信，美林正试图寻找我在求职方面的一些污点和失误，并想以此为借口解除合同。我想不通除此之外，一位雇主还有什么理由要在员工入职不到一年时核查证明文件。

在得知纽约方面要求艾利斯对我进行背景调查的数天之后，终于有一件事超过了我的忍耐极限。托马斯走进我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我某个新开账户的事。

我解释说，我最近向一些客户寄了俄克拉荷马收费公路（Oklahoma Turnpike）债券的广告。其中就有这位新客户的丈夫。她看到这个邮寄广告单后便打电话给我，说想要投资这只债券，并打算将在俄克拉荷马市的账户转移到伊尼德。

这位客户来了一趟办事处，我们便完成了交易。我让她签署了一份授权书，将俄克拉荷马市的账户转移到伊尼德办事处我的名下，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嗯，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托马斯说。

“那么，你听到了什么？”我问。

“你知道的，你拿到账户的方式显然带有欺骗性。”托马斯说。接着他告诉我，他曾和俄克拉荷马市两位失去账户的经纪人交谈过。他们说，债券书上有一个注脚说明，他们曾负责这个账户。

“这不是真的，”我说，“情况和我告诉你的一模一样。”

“那么，我会打电话给客户。”他说。

我很激动，难以相信他居然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和我说话，但我表面上还保持冷静。我不想让托马斯看出他激怒了我，因此说道：“那好啊，我们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我转动椅子，打开电话号码簿，翻到印有客户号码的那一页。当我开始拨号时，托马斯开始绕着桌子踱步。

“我不是要……”他结结巴巴地说，试图挽回，“我不是说你是个骗子或者别的什么。”

“无所谓，”我说，“我们继续，还是得给她打电话。”

就这样，托马斯和客户谈了，并确定我所言非虚。

我开始感觉到，我做的事多半会遭受管理层的挑剔。这次对质使我深感受伤。它本身并不是一桩大事，然而在经历了其他种种之后，它将我推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到了爆发的边缘。

我可以理解有些人走捷径或者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这里的双重标准令我困扰不已。我从管理层听到的说法是，价值 15 美元的“折扣”非常严重，假如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将会被立即解除合同；而巴采尔因试图帮助在 VMS 倒闭事件中的客户而被解雇；克拉克告诉我，艾利斯曾以客户资产引诱他从保诚保险公司跳到美林来做理财顾问，然而，他并未兑现这一承诺。

在美林工作的第一年，我常会告诉妻子，当天的所见所闻令我难以置信。我发现身处的环境与我本人的道德标准及美林所宣扬、要求和公布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这令我感到惊奇、震惊和恶心。不仅如此，我觉得艾利斯利用下属的做法太不体面。我越来越感到烦恼和不安。

然而，我们搬到伊尼德是为了在美林重新获得财务稳定。妻子总是劝我不要捣乱，并安慰我情况总会好转。我同意保持耐心，但愿她是对的。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一直持续下去。于是，我下定了决心，去做我认为该做的事，不去考虑后果。我知道，我要做的这件事属于一种极具攻击性的行为，它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我没有告诉唐娜。我希望我做每一件事都是出于自己的本能，不受外界任何干涉。我希望她不用为无法避免的焦虑而头疼。

鉴于我对当前工作环境的认识，你会认为，我应当心中充满了疑虑，担心办事处的不当行为很难被纠正。然而，我当时的确坚信，纽约高层将会处理最近几个月来我所目睹的种种问题，并消除我的忧虑。但是，我大错特错了。

第三章 斯古利宣战

我必须采取行动。

——基思·斯古利

如果不是工作环境的缘故，我在美林的职业生涯会很顺利。我在系列 7 考试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创建了令人瞩目的客户网络，销售业绩在西区销售部的新晋理财顾问中排名前 10 位。1992 年 1 月，伊尼德办事处在橡树俱乐部举办了专业理财项目，在 95 名与会者中，有 70 人是我带来的。当晚，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举办了同样的项目，而全体理财顾问仅吸引了 92 名与会者。项目结束后，艾利斯在给伊尼德办事处的电报中称，四位理财顾问争取到的出席人数是迄今为止他听到过的最高纪录。

我渴望在美林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家庭财务稳定，这对我来说已是触手可及。

我可能会失去很多——那么或许我该继续沉默，继续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像过去 8 个月那样。我可以努力地继续静默，在美林谋生度日，就算我已不再信任这家公司。对我来说，维持现状无疑更为有利。

然而，这不是我。我不能在发现这一切后随波逐流，听之任之，我必须采取行动。

美林的《商业行为准则》称：“维护公司的声誉是一项集体成就。雇员应当勤于质疑那些在自己看来违背重要美林道德标准的情况。应将不正

美林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当行为上报给任何一级可以处理该问题的管理层。”根据这些原则，我创建了一份在日后美林的起诉状中被称为“斯古利战书”(Schooley Declares War)的文档：一份4页的备忘录。1992年6月29日，我将备忘录交给了经理托马斯，其中记录了我目睹的种种事件。

我认为，要开除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管理层，我必须向其他人呼吁，但我对纽约高层是否会采取行动感到怀疑。我的怀疑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之前我曾通过美林的秘密热线，举报艾利斯在环法CMA竞赛中的作弊行为。有关人员违背了热线的保密原则，将这件事透露给了俄克拉荷马市的高层。

对高层产生怀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发现美林曾要求艾利斯对我进行背景调查。美林正在寻找我在求职中的过失，以便与我——俄克拉荷马市伊尼德办事处的一位爱惹麻烦的新晋理财顾问——解除合同，这令我感到担忧。

第三，在拨打秘密热线电话时，我曾向墨菲提及，我担心艾利斯会因我平时的不合作态度而怀疑是我打的电话。我向墨菲提到过我给巴顿的信，里面涉及在继续教育人寿保险考试中使用小抄的事。艾利斯也读过这封信。然而，无论是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管理层还是墨菲，都对小抄一事漠不关心。直到后来我才得出结论，之所以他们对小抄事件不做回应，是因为他们早已知情，我怀疑他们想要掩盖这件事。

我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高层的行动意愿。但是一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怀疑是多么合情合理。尽管如此，我依然决定提交备忘录，并建议伊尼德办事处的同事们做好准备。

提交备忘录和传统意义上的揭发行为大相径庭。我将事情直接捅到了托马斯那儿，而他正是当局者之一。我的行为无疑是一次迎头痛击。

这份备忘录声明，我在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观察到的许多事，都不符合美林所宣扬的重要专业和道德标准。我概述了其中的十大事件，并建议托马斯或许可以做出解释或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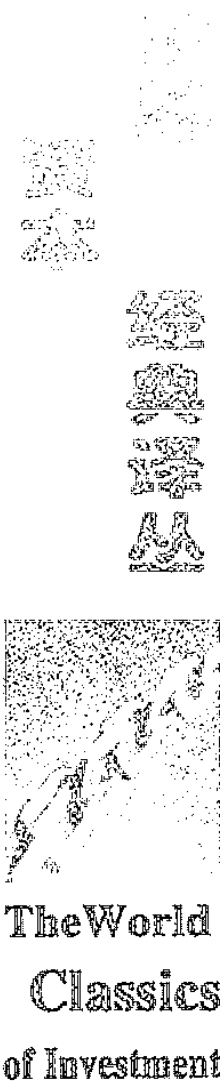
以下是我揭发的事情：

- 管理层在环法CMA竞赛中的舞弊行为；
- 在自治式人寿保险考试中，特克索马区明目张胆地使用了类似于小抄的辅助工具或其他不正当手段；

- 管理层对乡村俱乐部专有名单的使用未经授权；
- 管理层伪造费用单；
- 管理层错误宣传市政收益基金为预先偿付类型的基金；
- 管理层以不正当手段在俄克拉荷马州外开设账户；
- 管理层未能兑现承诺，给予克拉克 500 万～1 000 万美元的“管理资产额”；
- 管理层未能兑现承诺，给予伊尼德办事处 2 000 万美元的“管理资产额”；
- 以不公正的方式解除与巴采尔的合同；
- 对于我的 15 美元“折扣”的过度反应，包括一旦重犯就解除合同的威胁。

备忘录的结论是：“我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这迫使我写下这样一份备忘录。在一家像美林这样高度重视声誉的令人尊敬的公司中，我一直期待，所有管理层都会鉴于其行业领袖地位做出表率。然而我发现，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管理层并非如此。”

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管理层已令我极度失望，然而很快我就发现，面对这些被检举的不正当行为，纽约高层的反应更令人失望。



第四章 第一次答复

假如无法达成正确的解决方案呢？基思·斯古利又会怎么做？

——海尔姆特·麦迪茨(Helmuth Meditz)

我的备忘录犹如炸弹一般掀起阵阵波澜，并波及了整个公司。1992年6月29日晚，我将备忘录传真至俄克拉荷马市的艾利斯和阿科马(Arkoma)区(由于最近的一次重组覆盖了部分特克索马区)的地区总裁里奥·诺布克(Leo Roepke)。由于谢曼已被升至纽约总部，负责东区销售部，诺布克成为艾利斯的新上司，在美林长达32年的职业生涯使其成为公司元老。此外，美林纽约总部的合规部(Compliance Department)也收到了我的备忘录传真。我很快就发现，纽约的高层们将迅速动用手段来控制局面。

美林采取的即时措施之一，是内部审查经理海尔姆特·麦迪茨的直接介入。负责公司内部调查的麦迪茨在证券行业的合规领域服务逾20年。7月1日，他打电话给我，称事情性质严重，希望7月7日与我在伊尼德见面。

我同意事情性质严重，却没有意识到，麦迪茨本人在调查中亲自拜访一家地方办事处是多么不同寻常。之后麦迪茨证实，他每年要会见超过100人，大部分在纽约，偶尔才会下访地方办事处。不仅如此，后来他还证实，我的备忘录令他感到惊讶和不安，以至于他在收到传真的几天内造访

伊尼德,动用各种手段以便立即介入此事,找出解决方案。

我知道,尽管备忘录里所写的几乎每件事都暴露了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管理层特有的不良决断,但纽约高层要处理起来也并非难事。只有一件例外,这就是在特克索马区自治式人寿保险考试中普遍使用小抄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尽管我相信,保险考试中的作弊行为普遍存在,但其广泛程度依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7月7日,麦迪茨和来自洛杉矶的西区销售部副主任里奇·科德尔(Rich Cordell)一同来到伊尼德与我会面。为了全面理解我的举报,科德尔将从商业视角出发,对麦迪茨的合规专业知识进行补充。

麦迪茨和科德尔认为,最好在伊尼德办事处之外碰面,因此,我们选择了当地的最佳西方酒店(Best Western)。我发现,负责本次会面的麦迪茨有时过分热情,但总是和蔼可亲。他说,纽约高层希望继备忘录之后进行一项独立审查;科德尔则称,正如我在备忘录中引用的一样,董事长兼CEO丹·塔利(Dan Tully)和副董事长兼法律总顾问斯蒂芬·海默尔曼(Stephen Hammerman)都指出了正直的重要性。

在会议的开头,我们每人都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麦迪茨和科德尔认真听取了我对有关细节的叙述。看上去,他们对环法CMA竞赛的舞弊行为格外关注,得知我不顾俄克拉荷马市管理层的要求,在因竞赛作弊需要被取走生产编号之后,依然作为在册理财顾问,为约30份客户签署了CMA新账目表,他们似乎非常震惊。由于我的这一行为,艾利斯先后指使巴顿和托马斯,用另一位依然拥有编号的理财顾问的签字,覆盖了我在新账目表上的签字。我告诉麦迪茨和科德尔,艾利斯的计策会引起那些公平竞争的美林经理们的不满,因为他的优秀年终评估带有欺骗性。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对保险考试作弊的指控,似乎完全无法引起麦迪茨和科德尔的注意。我告诉他们,在艾利斯知情的前提下,哈尔帮许多美林理财顾问逐题通过考试,对此他们也未表现出任何不满。我还告诉他们,我从格拉汉姆处收到了她所说的小抄,她说这样理财顾问们就可以不用为考试费神,可以在方便时学习课程。

听了上述信息,两人似乎没有表现出我所预期的严重担忧。甚至当我暗示可能会有全国性的丑闻时,亦是如此。之后我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兴趣索然,是为了低调处理美林想要隐藏的一切。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5个小时后，麦迪茨和科德尔前往伊尼德办事处和托马斯闭门商谈了一小时。接着他们再度拜访了我的办公室，并试图说服我，我收到的小抄很可能是用于模拟测试而不是真正的考试。我说我不这样认为，格拉汉姆在电话里对我所说的也不是这样。于是麦迪茨建议，鉴于格拉汉姆发给我的小抄题为《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Estate Planning Training Course)，这更像是一种财务规划而不是人寿保险课程。我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只文件夹，向他们展示了一份庞大的文件，上面列出了继续教育要求的各种人寿保险相关课程。事实上，其中一项课程便是《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此时在我看来，麦迪茨和科德尔碰了一鼻子灰。

麦迪茨说他理解我的感受。顿了几秒，他问道：“基思·斯古利想从中得到什么？”

“正确的处理方案。”我答道。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处理？”麦迪茨问。

“昆特·艾利斯和布兰特·巴顿得走人。另外，根据你对杰克·托马斯介入程度的评估，也许他也得走，”我说，“至少他应当被调回俄克拉荷马市。我只想要一个能够好好做事的合适环境。”

“你知道的，我不怎么了解艾利斯，但他已经在公司待了20多年——”麦迪茨说。

“艾利斯和巴顿不是美林人，”我打断了他，“他们得走。”

“假如不能达成正确的解决方案呢？基思·斯古利又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盯了他俩各几秒，再次说道，“我真的不知道。”

麦迪茨接下来的一系列说辞和提问使我恍然大悟，我相信美林害怕保险考试作弊的丑闻有可能会散布开来。麦迪茨说这件事“的确很严重”，我不语，他又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把备忘录发给杰克？你得知道，它必然会被一路送达高层。你得知道会这样。”

我答道，这种想法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事实上，我一直都知道备忘录会被送达纽约高层。因为假如不是这样，我将亲自寄出备忘录。我认为，公司的经营者应该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麦迪茨甚至提出，从备忘录的撰写方式来看，很明显，我打算让外人看到这份文件。的确，我之所以采取这种编撰方式，是为了使不熟悉当事人或其背景的人了解情况。

“假如你没有写这份备忘录，那么事情可能已经得到解决，”麦迪茨说，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你知道的，就好比你在一段桥的中央，你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桥可能会托住你，也可能坍塌。在这场好戏过后，基思·斯古利会做什么？”现在我感到，麦迪茨知道我对这次举报后果的想法——它可能会导致一桩损害公司的丑闻。

“一场好戏从来不是我的初衷。”我说。

麦迪茨和科德尔对我抽出时间见面，礼貌地表示了感谢，我让他们在需要进一步帮助时告知我。他们离开后，我精疲力竭地坐在椅子上，回想发生的一切。我相信美林因牵涉到似乎极普遍的保险考试作弊而遇到了大麻烦，也可以想象出接下来可能的发展。不过，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这是我永远无法想象的。

7月16日，麦迪茨打来电话，和我谈了20分钟。他告诉我，事情正在处理当中，高层已介入审查，但尚未得出任何结论。调查人员动作缓慢，但有条不紊。麦迪茨承认，我检举的一些不正当做法确实存在，但很多问题并未得到证实。我告诉他，我撰写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假如不是确信这些问题存在，我不会将这些付诸笔端。

我觉得麦迪茨想要低调处理此事，而不是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我对他说：“听上去你认为管理层没有什么问题。”麦迪茨向我保证，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我告诉他，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如果理财顾问必须遵守比管理层更高的标准，这一点我无法接受。

在回顾了与麦迪茨的谈话之后，我担心他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得出相同的结论，因此，我决定给他写封信。7月18日，我向他寄出了一封信。在信中，我首先感谢他在16日的电话中告诉我最新的调查情况；接着指出，备忘录中提及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接受调查，假如他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可以提供帮助。我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害怕他们已经开始掩盖事实。

为了激励麦迪茨做正确的事，我用副主席海默尔曼在美林的一份发行物《美林人》中的说法提醒他：“假如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存在，就必须采取行动——无论牵涉到谁。一开始处理问题也许会感到难以下手，但是，如果掩盖一个问题，那么当它一旦浮出水面，就会变得难以消化。也许我们不能计算出‘正直的回报’，但是让正直屈居收益之下，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将并不仅仅是金钱。这个代价可能会是致命的。”

我希望这封信可以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我直接站到了美林的

对立面，并打算坚持到看到结果为止。

不久之后，高层发出了一则令我难以置信的通知，巴顿被提升为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销售经理。麦迪茨曾告诉我，调查正在进行当中，而调查的两个主要目标之一——巴顿——如今已是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第二把手。现在我确信，纽约高层并不打算做正确的事。

8月10日，麦迪茨打电话约我8月13日在俄克拉荷马市的豪华旅馆沃特福德(Waterford)会面。他说诺布克也会在场，但没有告诉我会议的目的。我以为他们需要我对检举之事做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我猜麦迪茨和诺布克预计在沃特福德旅馆的会面约为20分钟。但是正好相反，这次会面持续了3个小时。事实证明，麦迪茨和诺布克飞到俄克拉荷马市，只是为了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劝说我接受高层的决定，继续我在美林的职业生涯。我不打算接受其中任何一项建议。

会议开始时，我们进行了数分钟的闲谈。接着麦迪茨告诉我，美林已调查了这件事，并希望我知道，引起人们对这种情况的关注是正确的做法，为此向我表示感谢。不仅如此，麦迪茨还说，我在6月29日备忘录中的大部分举报都是正确的，但是美林并不认为这些事如我想象的那样严重。

诺布克告诉我，高层要求他参加这次会议，是希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把一切都处理完。我认真地听着，屏息静气地等待他们即将说出的每个字，希望可以听到我想要的方案。

麦迪茨向我保证，每件事都经历了详细的审核——费用高达数千美元。诺布克强调说：“几千块！”麦迪茨说，一切已成定局，他认为我无须了解每件事的处理方式。

麦迪茨说，3天前，他和诺布克会见了纽约高层并讨论了这一情况。他向我指出，地区总裁和驻地副总裁被召至纽约接受问询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诺布克告诉我，在他为美林服务的32年中，还从未因这种情况被召至纽约。

麦迪茨还告诉我，在一次3小时的会议中，他向10~12位高级执行官做了简要汇报。出席者包括合规部的前任和现任主任、法律法规及诉讼部的头头们、合规部的另一位高级执行官以及西区销售部的高级副总裁等人。法律总顾问也介入了此事，只是在开会时他并不在城里，但很快麦迪茨就要向他简要汇报情况。现在我可以得出结论，管理层已经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我认为唯一会引起他们重视的，是我所举报的某种不正当行为——保险考试舞弊。

麦迪茨说，对问题严重性的意见分歧之一，在于 15 美元折扣这一特殊事件。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但麦迪茨坚持说，这严重违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简称 NYSE)的相关法规。我相信，他正试图恐吓我，暗示我已被卷入一个严重事件当中。出于直觉，我猜到了会议的发展方向。之后，麦迪茨再次提及，折扣事件是多么严重。

尽管麦迪茨承认了我举报的某些事的确发生过，但我很清楚，他是在为美林做说客，使事情看上去不如我想得那么严重。例如，他说，高级执行官们并不认为，哈尔在周六上午的会议中帮理财顾问逐题通过考试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保险起见，理财顾问将会重新参加考试。麦迪茨绝不会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我看出了这一点。

我问他，我在 1 月 20 日给当地管理层的信中提及自己收到保险考试小抄，艾利斯、巴顿和托马斯对此有何评价。麦迪茨说，他们称自己并未注意到信的那一部分。我告诉麦迪茨，他们当然会这么说。我相信，他们若是对此感到惊讶，便会将此事报告给谢曼或合规部。

在 3 小时的商谈中，我注意到，麦迪茨和诺布克都在做频繁的深呼吸，其身体语言传达出他们的不安。我相信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也很清楚，他们不喜欢事情的发展。

后来，麦迪茨去了洗手间，他离开后诺布克告诉我，艾利斯和巴顿不会被解雇。他们只是做出了错误的决断，目前正在接受处理。震惊之余，我说道，理财顾问被解雇而管理层安然无恙，这种双重标准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困扰。

不久之后，麦迪茨问我：“那么现在基思·斯古利走到了哪一步？”

“你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方案都是错误的。昆特·艾利斯和布兰特·巴顿得走人。”麦迪茨和诺布克不高兴了。

当会议继续进行时，麦迪茨失去了冷静，说：“你知道备忘录肯定会被送达高层。”

“不，”我答道，“我不能肯定，但我希望如此。”气氛变得紧张。

诺布克坚持声称审查已经完成，对伪造研讨会费用的一切指控都不成立，之后当我问起这一点时，诺布克变得火冒万丈，大声说：“你说我在说谎。我告诉你，审查已经完成了！我不敢相信一位新来的理财顾问会这么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说,你还说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我没法相信这一点!”在会议中,诺布克数次失去冷静。他很恼火,也许是因为解决这件事所带来的压力,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未能如愿。

“那么现在基思·斯古利走到了哪一步?”麦迪茨再度发问。

我回答说,我很不满意高层的决定。我告诉他们,为了做正确的事,也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孤军奋战,但觉得仍未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案。鉴于目前发生的一切,我不希望艾利斯和巴顿继续做我的上司。另外,我害怕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报复我。诺布克强调说,他们已被告知,报复是不被允许的。我回答道:“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麦迪茨接着告诉我,我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不知道解除合同所必需的条件。在合规领域的20多年中,他每年都要处理许多重大事件,而我所说的那些问题并不算严重。听他这么说,我不由自问,假如 he 说的都是真的,假如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为什么高级执行官们以及诺布克所说的“大人物们”还都要插手这件事?

诺布克重申,他们正在处理艾利斯和巴顿,并试图安抚我:“让我们放下这一切,这样你就可以成为理财超级明星。你和我都知道,你能做得到。”我没有回答。此时此刻,成为一个我看不起的公司里的超级明星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真正希望的是,公司可以做出符合其名声的决定。

麦迪茨生气地告诉我,我既不接受高层的决定,也不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对此他非常失望。他说完后,站在一旁直摇头的诺布克强调说,他也非常失望。我看得出麦迪茨很不高兴,他知道自己得给纽约带去一个坏消息。麦迪茨和诺布克没能完成任务。我不会保持沉默。

在这3个小时中,我们三人之间几乎一直都是剑拔弩张的关系。在我彻底拒绝高层的决定之后,诺布克生气地说:“我不管了。我下楼了。你们两个自己了结这件事吧。”麦迪茨说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每个人都起身离去。

当我们从大厅过道走向电梯时,诺布克——我猜他是想尽最后一点努力来改变我的看法——转换了语气,说他是多么希望将伊尼德建设成为一个成功的办事处,他是多么希望我可以好好干。我觉得诺布克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我职业的成功,因此我没有回答。他的任务是保护美林。

当我们乘着电梯下楼时,诺布克继续念叨,他指出,这种情况必将影响

我的家庭生活。我回答说：“是的，一定的。”

接着，诺布克说：“你和妻子可能整天都在讨论这个。”我没有回答，也没有告诉他，我妻子对备忘录及随后的事件都还毫不知情。此后我们三人握手告别。麦迪茨和诺布克都不知道我的下一步打算，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觉得，举报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管理层是正确的做法，但是，艾利斯、巴顿和托马斯将继续担任我的上司，这让我觉得自己已是岌岌可危。

之后我驱车开往伊尼德，事情的处理结果令我感到震惊，高层显然未能得出我心中正确的处理方案。我失望地意识到，自己已无计可施，因为一切都被呈报至美林的最高层。我的确曾寄希望于高层，以为他们会积极地处理我的举报。

在通往伊尼德的路上，一个新的想法冒了出来——董事会？的确，法律及合规部的最高执行官已经审核了我的备忘录，但他们未能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我反复考虑了这个新的想法，越发觉得，作为公司股东的代表，董事会可能会有决心与意愿来正确处理此事。

假如高层对艾利斯、巴顿和托马斯进行严厉的处理，那么这一切都已结束了，我也会在这家公司继续理财顾问的职业生涯。相反，我很清楚，如今必须将冲突推向更高层，这样多少会有一点得出正确解决方案的希望。显然冲突已不再限于我和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管理层之间，它也同样存在于我和纽约之间。

美林和我都在继续执行各自的计划——我的计划是揭发，而美林打算让我闭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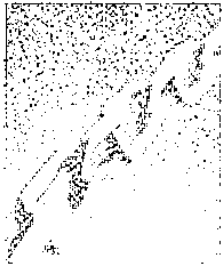
我知道，这样斩钉截铁的行动会使我与直接上司的关系恶化。诺布克说，上级不会对我有报复行为，但这很快被证明只是幻想而已。

在与麦迪茨、诺布克会谈的第二天，办公室的氛围便有所改变。艾利斯打来电话，我们谈了半分钟。艾利斯以一种在我看来相当于威胁的语气低声说：“很遗憾，过去你没有抓紧机会和我聊一聊。我会实行开放政策的。”

“我和适当的人谈过，也就是伊尼德的经理们，我知道，接下来他们就会和你谈，”我回答道，“以后我会谨记你的提议和建议的。”接着艾利斯提醒我，距离 TGIF（有关解释参见下文——译者注）还有一个月，问我是否会竭尽全力。我说我已完成了申请，打算和别人谈谈。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艾利斯提及的 TGIF，是美林于 7 月 1 日开始的另一项重大赛事，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层的年终奖。TGIF 是全球化 and 国际化基金会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Think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Funds)的简称,这是美林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个共同基金集团。竞赛期间我就遭遇了一些冲突,虽然后来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更多的不快还在后头。

我的办公室兼作伊尼德办事处的会议室;因此,托马斯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图表,上面列出了 TGIF 竞赛中所有伊尼德理财顾问的排名。在竞赛初期,我曾要求托马斯移走图表,因为它面前鼓励客户投资 TGIF 令我感觉不自然。他们会产生怀疑:我是否真正认为投资基金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或者仅仅想赢得比赛。托马斯拒绝取下图表,称这是诺布克的要求,是为了促进伊尼德办事处的销售。因此,我决定不参加 TGIF 竞赛。

竞赛是美林的重头戏,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激励销售人员和管理层推销某些账户和共同基金,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办事处的业绩会对地区总裁和驻地副总裁的年终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高层对地区总裁和驻地副总裁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正如地区总裁和驻地副总裁向理财顾问们施加压力一样。

为使 TGIF 的参赛率达到 100%,艾利斯和诺布克对托马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7 月 29 日,得知我是因为办公室的图表而拒绝参赛,托马斯看上去很生气。

第二天,托马斯与我会面,勉强同意取下图表。比赛只剩下 3 周时间,我同意向部分客户推销 TGIF 基金。然而,我发现自己很难竭尽全力,因为麦迪茨当时正在进行的调查以及在他调查结束后我自己展开的新调查,都分散了我许多精力。同时,我已开始执行我的计划——将事情上报至董事会,在这段长达 4 周的时间里,它占用了我约 100 个小时。最终,我在竞赛结束的 3 天后卖出了第一只 TGIF 基金。

在 TGIF 竞赛结束后,艾利斯写信给托马斯说,伊尼德办事处未能达到 100%的参赛率令他极为不悦。他指出,整个综合办事处中唯一没有参加 TGIF 的理财顾问隶属于托马斯的办事处。在他看来,这种糟糕表现的唯一理由就是无能或是不服从领导。他要求托马斯进行调查并做出回应。

最初是克拉克和迪兰叫我注意艾利斯的信。除了管理层之外,我在办事处颇受同事欢迎,他们提醒我,要注意艾利斯叫托马斯所做的调查。现在除了其他各个理由之外,艾利斯还可以以 TGIF 为借口,来摆脱我这个制造麻烦的新晋理财顾问。

8月下旬,在继续完成对董事会申述的过程中,我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含有重要的信息。这是我自8月13日与麦迪茨、诺布克的会面之后一直在等待的文件。它来自画刊公司(Pictorial Inc.)的执行副总裁、《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保险考试的提供者唐·费舍尔(Don Fischer),而这项训练课程正是我指控的主要内容。当我对保险考试调查的结果表示不满时,麦迪茨曾让我联系画刊公司。

我联系了费舍尔,告诉他我在帮助麦迪茨进行一项有关美林理财顾问不正当使用小抄行为的调查。费舍尔是一个好心人,他同意提供参加考试的美林雇员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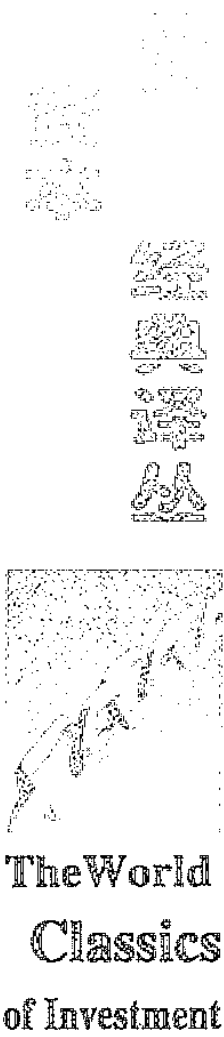
费舍尔的包裹是一份77页的电脑打印文件,上面列出了1990~1992年间所有通过这场25个小时的考试并收到证书的美林员工。文件显示,特克索马区有281名理财顾问和14名管理层成员获得证书。在哈尔因一件无关的事而被解雇后,接替他负责俄克拉荷马州和部分得克萨斯州的一位驻地保险专家只得了79分。令人奇怪的是,160名理财顾问和管理层成员的成绩远远超过这名专家,其得分均在90分或以上,其中有15名理财顾问的得分在95~98之间。总体而言,在295名参加考试的特克索马区理财顾问和管理层成员中,265人得分高于这名专家。这使我更加确信,舞弊行为普遍存在。

1992年9月2日,巴顿拜访了伊尼德办事处。当时我不在办公室,不过其他理财顾问告知我这次拜访的情形。他们说,巴顿戴着一条所谓的“流氓领带”,并向每个人大肆炫耀,说它是自己安然度过举报的标志。似乎令他失望的是,我不能当场见证他的胜利宣言。然而,他得意得太早了。

同一天,我和费舍尔进行了半小时的会谈。他同样审核了美林的考试成员名单,并告诉我,这些几乎同时参加考试的美林员工的得分极为相似,这种巧合并不常见。

例如,1991年和1992年参加《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考试的111名达拉斯区美林雇员中,有80人得了89分,分数在±1之间变动。费舍尔相信这些分数的集中度极不正常。试想,几乎3/4的员工都得到了几乎相同的分数,你就能很好地理解他的怀疑。

费舍尔在附信中表示,希望这一信息有助于我的调查。他不知道这对我的帮助究竟有多大。这份名单使我确信,有些事不对劲儿。我相信,我已拥有清晰的证据来证明一些可疑的事,它可以支持我对董事会提出的申述。



第五章 第二轮——董事会之战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的 PK 错的。

——基思·斯古利

1992年9月17日，伊尼德发生了两件大事。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于竞选活动中途莅临小镇。大会堂中挤满了共和党的追随者，包括我和7岁的儿子。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盛会，在没有空调的大厅里，气氛格外火热。接待一位如此杰出的人物，对伊尼德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总统的演说和拜访自然成了小镇热烈关注的话题。

9月17日，伊尼德还发生了一件同样激烈而不寻常的事。就在这一天，我完成了给美林董事会13位成员的长信。

这封长达31页的信非常详细，相当于一颗杀伤力极强的重磅炸弹。它不仅包括了我在第一份备忘录中提到的所有细节，还告诉董事们，在我看来，麦迪茨处理许多问题的方式损害了调查的信誉。这封寄给每位董事的信于1992年9月18日星期五连夜发往纽约，并于9月21日周一11:00（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到达目的地。

在信的开头，我引用了美林的《商业行为准则》中题为“举报不正当行为的义务”(Your Obligation to Report Misconduct)的一段：“雇员应当勤于质疑那些自己认为违背美林重要道德标准的情况。应将不正当行为上报给任何一级可以处理该问题的管理层。”

接着我告诉董事们，我目睹了违背美林重要道德标准的行为，并将其上报给各级管理层。我相信，最近结束的调查显然得到了高层的批准，却是极不完整且无法令人满意的。根据《商业行为准则》，我作为公司一员的义务是“将不正当行为上报给任何一级可以处理该问题的管理层”。我通过这封信向公司管理层的最高监察员董事会提出申述，告诉他们我所看到的一切。

我在信中继续写道，加入美林时，我以为美林的管理根基在于无懈可击的正直以及对道德的至高尊重。我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该文件称，我已阅读过公司的《商业行为准则》，接受并遵循所有条款。我再次援引了这份出版物，强调了以下几句话：“美林请求并要求（此处着重强调）每位雇员都严格遵守最高道德标准，并在其所有的商业交易领域进行适当判断。”

我同样引用了海默尔曼在 1992 年 5/6 月刊的《美林人》中的说法：“我们的客户、同事、股东和监管者如何看待我们，取决于两件事：首先，我们是否创造出一种工作环境，它能告诉和教育美林人，我们绝不宽容违规行为！因为假如我们创造出的环境允许阳奉阴违，那么我们就有问题。”我告诉董事们：“我相信美林有问题。”

我对不得不将此事申报至董事会表示遗憾，同样表现了对自己所有说法的信心，我在信中表明，愿意就任何一项声明接受测谎。

我告诉董事们，在 8 月 13 日与麦迪茨、诺布克会面之后，我实施了进一步的调查，我相信，不正当行为的严重性超过了我最初的想象。我很抱歉写下这样一封长信，接着便开始描述我所目睹事件的细节。

首先，我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保险考试舞弊。我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我曾收到一份所谓的小抄，而格拉汉姆在麦迪茨的调查中谎称从未发送过这样一份文件。我建议再次调查格拉汉姆，或者更彻底的做法是检验这份文件的指纹。我告诉董事们，艾利斯、巴顿和托马斯都声称，从未注意到我在 1 月份的信件中关于小抄的内容，这一说法让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不禁怀疑，他们这么做是否是因为对于作弊早已司空见惯。

接下来，我提到了巴顿等人在周六上午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以及他为此做出的辩解。我也转述了麦迪茨有关这一情况的说法。他声称，巴顿等人是在考试前而不是在考场上得到试题的，但后来我得知事实并非如此。我表示，参加了那次会议且声称自己在考试时未受到任何外部帮助的人所签署的宣誓书均有伪证之嫌。我告诉董事们，麦迪茨后来向我承认，这次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会议是“不适当的”。我表示，这不仅仅是不适当的，根据可靠的原始资料，它属于违法行为。

我分享了来自画刊公司的 77 页电脑打印文件中的信息。我还指出，这种不正当行为的影响范围可能很大，我猜想，全美 50 个州都有可能受到特克索马区理财顾问的不良影响。

在这一段的结尾处，我列出了一连串在我脑海中依然挥之不去的问题，相信它们也会引起董事会的兴趣。问题如下：

鉴于这些行为的公开程度，似乎考试舞弊在托克索马区已成为惯例，而且有可能牵涉到地区总裁、驻地副总裁、驻地经理、销售经理和理财顾问。还有哪些经理和理财顾问知晓或者参与了这些不正当的考试行为？

在列出 1991~1992 年获得《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证书的 14 名特克索马区经理之后，我问道：“他们是否知情？他们也是参与者吗？”

我认为，鲍勃·谢曼（他在 1991~199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特克索马区的地区总裁）不可能没有觉察到这种不正当行为。谢曼是否被询问过？

调查人员是否真的仔细询问过 1991~199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常驻保险专家的比尔·哈尔？

是否询问过其余达拉斯美林人寿保险人员——无论在职还是离职？

既然继续教育法的颁布是为了保护消费者，那么，美林怎能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并依然声称它要求成员遵守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客户的利益为先？

下一个我提到的问题是对乡村俱乐部名单的滥用。管理层告诉过我，如有这种行为，将被直接开除（就像大约一年前某位俄克拉荷马市理财顾问的遭遇一样），然而，麦迪茨称，巴顿的行为没有不当之处。

我也提到了伪造研讨会费用一事。我说，不难想象，如果一位理财顾问做了同样的事，会有怎样的下场。麦迪茨曾在 8 月 13 日的会议中告诉我，尽管巴顿伪造了研讨会费用报告，美林的审查结论是，巴顿并未滥用任何资金，因为他没有报销其他一些实际支出。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这些费用都被汇到了巴顿在乡村俱乐部的个人账户上。

我向董事们说明了对市政收益基金的不准确介绍，包括巴顿在某个场合称，只要收益达到 7%，它的评级是 AAA 还是 A 都无关紧要。我也提到了巴顿的观点：一个过分关注细节的人，永远也不会在这一行取得成功。

接下来，我陈述了以不正当手法在州外开设账户一事。我表示，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这已是司空见惯。如果这种行为在美林的其他办事处出现，那也是不足为奇的。我透露了环法 CMA 竞赛中的舞弊细节。我告诉董事们，艾利斯在人数上动了手脚，我又是怎样丧失了为客户服务的机会。我表示，麦迪茨之后的说法令我失望，他声称即使不在人数上动手脚，巴顿和艾利斯的得分都足以使他们赢得太浩湖之游。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尽管竞赛规则清楚地写明，任何被发现舞弊行为的参赛者都会被取消参赛资格，但管理层除外。

我批评艾利斯未能兑现给予克拉克和伊尼德办事处客户资产的口头承诺，并描述了巴采尔遭到的不公正待遇。

我希望能使董事们看清巴采尔的做法，与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管理层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差别。

我写道，当巴采尔“无辜地以客户利益为先”时，其他人以客户和雇员的利益为代价参与不道德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以公众的利益为代价，参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为什么美林会允许这种行为？”

接下来我讨论了 15 美元的“折扣”问题。我告诉董事们，我查看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简称 NASD）指南和美林的下属办事处指南。在这两份指南中，我都未找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一行为违规的规则或规定。我很困惑，假如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何得被迫签一份声明如有再犯立即开除的协议，为何麦迪茨两次向我强调这种行为有多么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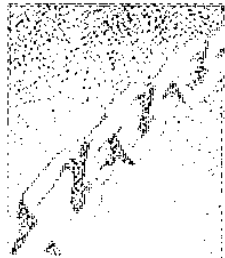
然后，我向董事会提供了自 6 月 29 日完成备忘录之后搜集到的新信息。这和艾利斯 7 月 8 日要求俄克拉荷马市全体理财顾问参加的一次销售会议有关。在这次会议上，艾利斯讨论了我的备忘录，并称我为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和麻烦制造者之类。

接着我告诉董事们，我在美林时日尚短，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还不多，那些事的实际程度肯定远比我所说的要严重。接着，我简述了另外 6 个问题。

我写道，我所看到的公司管理层的态度与文化似乎就是“用尽一切手段来提高佣金”，即使这是以我们的客户和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的，甚至是违法的。

同样，我请求董事们仔细想想这种虚伪的做法——理财顾问被解雇或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受到解雇的威胁，而管理层的不诚信行为甚至没有得到过警告。

我建议，为了对这些指控进行合法而独立的复查，需要任命一位拥有完美信誉和正直品质、了解证券业及其法律法规的第三方作为特别调查员。我推荐了像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这样的人，他曾长期担任纽约市市长，在短期内参加过美国国会议员的竞选，之前则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美国律师。在 80 年代，他对华尔街的白领犯罪提出了强有力的检控，并取得了成功。

接着，我引用了海默尔曼在《美林人》中的说法：令正直屈居收益之下的代价“可能是致命的”。

最后，我表示可以理解，利润是美林的根基。“但是，”我问道，“代价是什么？谁来埋单？美林的社会良心何在？”我以此结束了这封信。

这封 31 页的长信到达位于世界金融中心的美林总部时，就像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麦迪茨在日后的一次法律诉讼中称，这份文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就在同一天，美林从普林斯顿的公司学园和零售总部派人前往伊尼德，以便立即与艾利斯、托马斯会面，直到很多年后，我才能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为了抓紧时间保护美林岌岌可危的声誉，海默尔曼迅速地着手处理我的指控。

在我看来，海默尔曼肯定也知道，这些弊病相当严重。既然董事会已介入，副主席兼法律总顾问海默尔曼就得使董事们相信，他正以适当的方式处理此事。

当纽约的高层在处理我寄给董事会的长信时，我又写了一封信给艾利斯。在信中我对他数周前打电话告诉我他实行的开放政策表示了感谢，但遗憾的是，最近我忙于彻底审查，没能过去和他好好交流。接着我详细地说明了我是如何处理每件事的，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我都及时并适当地提请了他的注意。在结尾处，我写道：“令我失望的是，我们俩的观点截然不同。”

在长信到达纽约董事会的一天后，迪兰和我按计划飞往美林的普林斯顿学园参加培训。周二早上，迪兰接我去机场时迟到了半个钟头，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耽搁了一会儿，是因为托马斯要他顺路去一趟办公室露个脸，一位据称前来核查联合办事的普林斯顿专员将会造访伊尼德。托马斯并没有像对待迪兰一样，要求我在离开之前顺路去一趟办公室。

此时，我依然没有告诉妻子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希望能够争取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而不致使她担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和迪兰去机场时，妻子唐娜决定拜访伊尼德办事处。她久闻艾利斯大名，听说他在当地，很想瞧瞧他的模样。当我从纽约回来时，唐娜告诉我，托马斯向艾利斯引见了她。行政助理费特纳的办公桌正好在托马斯的私人办公室外，那天，艾利斯、托马斯和普利斯頓的专员正在这间办公室里会谈。她无意间听到了其中的一些话，并悄悄告诉了唐娜，还说：“基思可不喜欢听到这个。”

迪兰和我于晚上 8:00 抵达纽瓦克市(Newark)。我们打算在纽约待上一晚，这样便可在第二天回普林斯顿参加培训之前浏览风景。我急切地等待着董事会的反应，不过估计这需要几天时间。我希望他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整件事便可以很快结束。

令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早上 10:30，我便接到了美林法律总顾问助理乔治·谢林(George Schieren)的电话。他说，应海默尔曼的要求，他们希望与我会面。我希望根据原计划先游览纽约，因此建议在第二天即周四下午见面。谢林说可以，他要求我第二天早上首先与拜瑞·曼德尔(Barry Mandel)通话，以确定会面的具体时间

周四早上，在致电曼德尔之后，我还给最近被调至美林威奇塔办事处的克拉克打了电话，告诉他谢林周三来过电话。克拉克说，周三费特纳也从伊尼德办事处打来电话，告诉他一场风波正在兴起，她正往纽约传真文件。巴顿也致电称，就在周二下午普利斯頓的专员和艾利斯、托马斯会面时，他知道了那封 31 页的长信。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巴顿显然聘请了律师，他说：“拜瑞，你知道我犯了一些错误。你知道的，要是我犯了一些错误又会怎样？我会因为这个被炒鱿鱼吗？”克拉克告诉我，他想说的是：“我能让乔·巴采尔来回答么？”

我告诉克拉克：“美林一直按照它的规则行事。但是，现在我们得按斯古利的玩法来。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的 PK 错的。”

纽约的会议定于下午 1:30 开始，地点是世界金融中心北塔顶层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我待在普林斯顿的美林学园，从当地乘公司的班车赶往华尔街的总部。途中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想象可能出现的场景，我将如何反应，对每个人来说，我的立场是怎样的。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只想知道美林会说些什么。

我迟到了几分钟，走进会议室时，我看见代表美林的高级执行官们正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站着等我。我们立刻做了自我介绍。代表美林的是两位法律总顾问助理曼德尔和奥瑞斯忒斯·米哈利(Orestes Mihaly)，以及西区销售部的全国销售经理迪恩(Dineen)。墨菲曾告诉过迪恩有关我的举报电话的细节。

我们在会议桌边坐定，我坐在一边，迪恩在我左侧，米哈利在对面，曼德尔在桌子右侧一头。越过米哈利，我可以透过第34层的窗户看见雄伟壮丽的自由女神像。这里距离俄克拉荷马州的伊尼德很远。现在，我招惹了一帮大人物，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然而我不会被吓倒。我毫不怀疑所有的指控都是正确的，包括公司高层对保险考试舞弊的包庇。观察美林在董事会介入时的下一步举动，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很惊讶海默尔曼并未出席，因为前一天谢林告诉我，组织本次会议是出于他的要求。我怀疑他的缺席是一种淡化会议重要性的手段，因为首脑们的出现将会使我确信问题的严重性。同样，我认为，假如新的调查彻底失败，那么海默尔曼可以声称自己受到了调查者的误导。

曼德尔负责主持会议，他说会议本身就证明了，我给董事会的信已经引发了新一轮调查。接着，他要求每个人做自我介绍。几分钟后，会议真正开始，三位美林的高级执行官严阵以待。

很快他们问道，还有谁读过我的信，我说没有别人。他们又问是谁打印了信件，我说是我自己。

两位律师问我，是否改变了对信中任何一件事的看法，我说没有。

曼德尔说，他想就这封信进行讨论，以澄清某些事。他解释说，他们的任务是确定事实。

我告诉曼德尔、米哈利和迪恩，我做这一切的动机很基本也很简单——正确对抗错误、公平对抗不公、正派对抗卑劣，拒绝双重标准。迪恩说，这种情况在美林并非第一次出现，45 000名雇员不可能都是完人。我认为，迪恩试图暗示，我在长信中阐述的情况很一般；但我知道，信中提到的绝不寻常。

在我看来，曼德尔、米哈利和迪恩认同我的观点：大范围的保险考试作弊无疑是最严重的指控。两位律师呈上了我从画刊公司收到的电脑打印文件。鉴于其中包含的信息，他们对我能取得这份文件感到惊愕和沮丧。画刊公司作为卖方向我提供此类信息，显然米哈利对此紧张不已。我告诉米哈利等人，费舍尔在提供这份名单之前，确定画刊公司与美林的用户协议并不禁止这种做法。

我对三位执行官说，费舍尔告诉我，考试结果看上去很可疑，许多理财顾问的得分都在 89 分左右。

接着米哈利对我说：“你不是也得了大概 90 分么？”其潜台词是，我的分数同样可疑，或者说这种分数很常见。

“是的，”我答道，“但我啃了两天半的书，而且我是考试高手，我的系列 7 考了 93 分。但在 111 名达拉斯的理财顾问中，有 80 人取得了同样优秀的成绩，这是极不可能的。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推测出真相。”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我们讨论了我在信中提到的大部分指控和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但我很清楚，保险考试舞弊使它们都相形见绌。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大批理财顾问和地区的管理层成员，而且这个地区恰好处于谢曼的监管范围内，他如今已是美林总部的高级执行官。曼德尔、米哈利和迪恩很可能以为其他所有的不正当行为很容易处理，他们必须关注的是保险考试舞弊。

米哈利和迪恩告诉我，他们欣赏我的检举行为，并为此感到骄傲。迪恩说，美林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对这件事保持着极大的关注，否则他们也不会与我见面。他们说，大家来到这里共商此事是为了我好，我很怀疑这一点，我相信他们唯一关注的是美林的利益。迪恩说，美林不会因为个别人的缘故而放弃做正确的事，也永远不会因为过于珍视名誉而掩盖问题。

会议在友好而专业的氛围中进行，然而某一刻我却感觉到了敌意，当时我称自己履行了“勤于举报不道德行为”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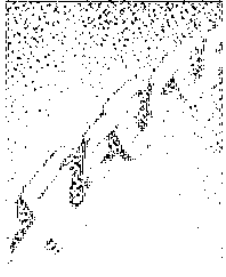
这时，米哈利用一种深沉洪亮而又带着讽意的声音说：“你当然做到了这个！”米哈利的评价表明了，他到底有多“欣赏”我的举报。

迪恩问道，是什么引发我写下 6 月 29 日的备忘录？我说这是逐步演化的结果，但托马斯指责我利用不正当手段来获取账户是导火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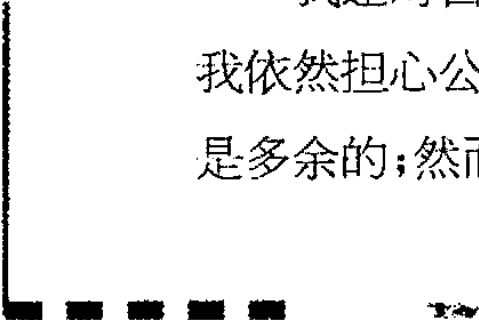
当会议继续进行时，我告诉其他人，艾利斯在对我的首次面试中称，在入行的 3~5 年内，他旗下 80% 的经纪人年收入可达 10 万美元。我说我不能理解这种做法——在他人决定是否转行和迁居的关键时刻，艾利斯给出了这样的误导性信息。在我看来，假如美林能够符合其宣传形象的一半，它就决不会有像艾利斯和巴顿这样的雇员。

我还对自己在美林的未来表示担心。尽管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我依然担心公开这些问题会影响我的职业前景。迪恩向我保证，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然而，他怀疑在美林可能没有人——包括 CEO 塔利在内——可

世界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以使我相信，自己拥有与别人同等的成功机会。我同意这一点。

我与执行官们分享了一篇我读到的有关美林的文章，上面写道：“年轻的土耳其人遭到排斥，他们不在公司的内部提拔名单上。”我继续说道，在做了正确的事之后，机会的大门已为我关上。迪恩试图再次向我保证，即使我现在不相信他，10年后我照样能成为市场部的高级副总裁。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美林剩下的时间已不足10天，更别提10年了。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即将结束之时，迪恩告诉我，他将给出两份方案，希望看看我对每份方案的不同反应。“方案A是甲和乙被解雇。你还想要什么？”

“我希望公司能够补偿乔·巴采尔和拜瑞·克拉克，伊尼德办事处可以得到允诺的2 000万美元客户资产。”我答道。

“你认为巴采尔应当得到什么？”曼德尔问。

我说不知道，只有问过他才能知道答案。

“还有呢？”迪恩接着问。

我再次说不知道：“在未经深思熟虑之前，我没法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迪恩要我认真考虑，我说我会的。

“方案B是没有人被解雇，基思·斯古利没能得到他想要的解决方案，”迪恩说，“接下来会怎样？”

“我不知道，但我不会开心。”我答道。

“鉴于你为这封给董事会的31页长信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你必须思考接下来可能做些什么。”迪恩强调说。

“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继续和昆特·艾利斯、布兰特·巴顿周旋，”我说，“家庭的稳定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不会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迪恩变得更为激动，他坚持说：“你必须有些想法，你必须有。”

“当然，脑子里总会闪过一些想法，怎么可能没有想法？”我回答，“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但我确实还没有做出什么决定。我真的不知道。7月7日麦迪茨就问过我，假如没能得到正确的方案，接下来我会怎么做，我说不知道。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给董事会写信。我真的不知道，假如还是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真的会全面思考这个问题并告诉我吗？”迪恩接着问。我同意这样做。

在会议结束后，迪恩邀请我第二天参观直接广播卫星(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设备，在那儿，美林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的办事处播送信息和节目。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设施，而我觉得迪恩在百忙之中抽空陪我这位新晋理财顾问私人旅游，实在很值得玩味。我回答说，看情况再定。

我觉察到美林的恐惧，它正竭力确定，假如第二次内部调查依然不能提出我所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我的下一步举动将会是什么。艾利斯、巴顿、托马斯、麦迪茨、诺布克，现在加上曼德尔、米哈利和迪恩，都知道我是一名为解决正确方案而奋斗的战士。只是美林尚未意识到，我究竟是怎样一名战士。

当美林的高级执行官们对我的举报致以谢意，并称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时，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上司们必定是暴跳如雷，自然也不会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或引以为荣。我的行动很可能损害了他们在美林的职业前途。艾利斯、托马斯和普林斯顿专员在伊尼德会面之后，这种敌意急剧扩大了。

第二天即周五，我决定，与其接受迪恩参观的邀请，还不如再多逛逛纽约。我在潘恩车站(Penn Station)给克拉克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前一天在拜访伊尼德办事处时，托马斯对他说，我是一个毒瘤，他不会让我在办事处对迪兰、格雷格·斯通(Greg Stong)和其他理财顾问产生不良影响。克拉克还说，巴顿对他说，他不希望纽约任命一位特别调查员来审查我的指控。

我在美林学园待了两个晚上，周五晚，我入住普林斯顿万豪国际酒店(Princeton Marriott)时，迪兰已在房中。他听说了我寄给董事会的信，为此非常生气。他愤怒地吼道，在我发出第一份备忘录后，高层已经解决了一切，他害怕美林会因为我的缘故而关闭伊尼德办事处。在这场持续了约20分钟的争论中，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情绪紧张的迪兰——这位刚刚毕业2年的新人——才冷静下来。

周六晚，回到伊尼德之后，我还没进门就遭到了妻子的质问。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丽莎·布琳娜德(Lisa Brainard)，巴顿担任伊尼德办事处驻地经理时的手下，在周四给妻子打了电话。布琳娜德称，巴顿告诉她，我是世界上最大的撒谎者，是一个思想扭曲的人。妻子被布琳娜德的话惊呆了，当时她对差不多3个月前的备忘录及其后续事件仍是毫不知情。她知道发生了一些大事，但对事情的细节毫无头绪。

当晚，两个孩子被安排到岳父家过夜。还没来得及问好，唐娜就直截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了当地说：“我要一些答案。”

我们接下来谈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2:30，我告诉了她自备忘录起发生的一切。在这场漫长的谈话中，妻子告诉我布琳娜德打来的电话，以及4天前拜访办事处时，费特纳私下告诉她的话。

唐娜担心这会影晌家庭财务稳定，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对这样一件大事绝口不提，使她感到失望和受伤。我坚持说，之所以保密是不想让她担忧。在谈话结束之际，唐娜感觉好了一些，并保证会支持我。

周日，我致电布琳娜德，证实了数天前她向妻子转述的巴顿对我的评价。

周一上午，在风波过后，我首次回到了伊尼德办事处的工作岗位。我知道这一天将会充满压力，非常难熬，我全神戒备，却没有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严重。那天上午的第一件事是向托马斯提供一张每周业绩表。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说：“早上好，杰克。”我努力地保持着基本的礼貌。

托马斯正低头查看桌上的一些文件，他没有抬头，冷冰冰地回道：“早上好。”

稍后，办事处的另一位新晋理财顾问告诉我，从普林斯顿来了一个名叫保罗的人，他负责评估美林的郊区办事处，在上周二与托马斯、艾利斯会面之前，他在伊尼德的华美达酒店(Ramada Inn)住了一晚。以后的事情证明，这是一条重要的信息。

同样是在这个周一早上，迪恩从纽约打来电话，和我讨论怎样补上因与他们会面而错过的培训。然而，我怀疑他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我是否考虑过4天前他在纽约提出的方案A和方案B。当迪恩问起这两套方案时，我说还没考虑过，因为我试着把这一切都抛诸脑后，清静几天。迪恩说，他能理解。我说，我很快就会考虑这些方案。

我以为迪恩等人正处于紧张之中，希望尽早知道我的下一步举动。然而，在我还没来得及制定计划——更别提做出下一步举动时，一些令人猝不及防的事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它发生得那样突然。

第六章 准备更多的战斗

……从头到尾我只是盯着地板，嘴巴张成了“O”型。

——迈克尔·迪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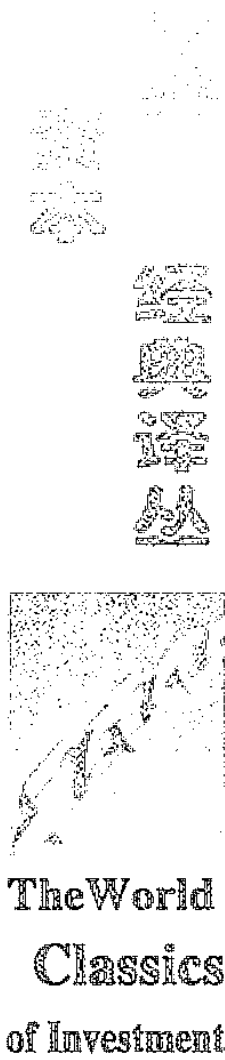
1992年9月28日，周一，这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至少是在这种情形下最大限度的普通。然而，下午3:55，托马斯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和我谈谈，我说完成手头上的事后就马上去见他。

走进托马斯的办公室时，我惊讶地发现，迪兰已经坐在那儿。托马斯让我坐下，因为他有些东西要读给我听。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拿起一张美林的信笺，读道：“我希望迈克尔在场，这样我对你所说的内容，不会在你未来的转述中遭到误读、误解或是以任何一种方式更改。”

接着，他否认自己在所谓的保险考试舞弊事件中有过任何不正当活动。最后他说道：“假如明日此时我还未收到撤回和道歉的书面声明——这份声明须提交给我本人，其副本应分别发送给美林的每一位董事、海尔姆特·麦迪茨、汤姆·穆勒(Tom Muller)、鲍勃·迪恩、里奥·诺布克、昆特·艾利斯，以及其他任何有可能收到你的信的人，我将咨询我的律师(我已与他商谈过)，起诉你及你的家人诽谤和人格污蔑。”

“以上是我对这件事所要说的这一切。”

“欢迎你迈克尔，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你可以在我的办公室想待多久就多久。基思——我不欢迎你——请离开。”



我发现，托马斯是以一种威胁、挑衅和恐吓的方式来宣读声明的，并不时抬头与我进行眼神接触。从头到尾我都紧盯着他。读完声明后，托马斯说，我可以复印一份，迪兰可以在上面签字。

我毫不犹豫地说了：“复印一份吧。”

接着我看着迪兰说：“签字吧。”

几天后，迪兰告诉我，在杰克宣读声明的过程中，从头到尾他只是盯着地板，嘴巴张成了“O”型。

这正是我的感受。我的老板刚刚说，他要对我及我所做的一切提起诉讼，这意味着他不仅在威胁我本人，还威胁到我的家庭。托马斯对我的敌意已经达到顶点，就差没用枪指着我的头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令我震惊不已。我无法相信，在纽约高层介入此事之后，托马斯本人居然威胁要控告我。这根本说不通——直到后来我得知保罗的身份后，才改变了这一看法。

在这次为时两分钟的会见结束后，我带着托马斯的声明副本回到办公室坐下，又把它仔细读了一遍，以确定自己完全理解托马斯刚刚所说的一切。就在这时，我发现，这份声明未标注日期。鉴于托马斯威胁说，假如“明日此时”没有收到书面道歉，他就会起诉我，我回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注明日期并署名，以明确最后期限及这次行动的始作俑者。托马斯署名后，我也应他的要求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再次回到办公室，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敌意和紧张已达到如此地步。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家人，然后是美林带给我的失望：我的职业生涯起初充满了希望，最后却呈现出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托马斯的威胁——假如我不在 24 小时内发出撤回声明，他就会提起诉讼。我不打算撤回指控或向他道歉，因为我确信所有的指控都是真实而有效的。我认为这场官司即将到来，我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托马斯没有直接说我被解雇了，然而这件事让我联想起几天前听到的说法——托马斯告诉克拉克，我是一只毒瘤，他不会让我留在办事处祸害迪兰和斯通。我还听说，巴顿告诉布琳娜德或者其他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大的撒谎者，是一个思想扭曲的人。另外，我知道，费特纳曾告诉我妻子：“基思可不会喜欢听到这个。”她指的是自己 6 天前无意间听到的艾利斯、托马斯和另一位人士的谈话。这位来自普林斯顿的保罗，负责评估郊区的办事

处,除此之外,当时我对他仍是一无所知。

我估计,由于我的备忘录和寄给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我在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上司们——艾利斯、托马斯和巴顿——正在采取防御措施,以免丢掉工作。事实上,我以为他们对我恨之入骨。在保险考试舞弊案发生时,如今已是美林零售部四大高级执行官之一的谢曼,正好担任特克索马区总裁一职,他显然有玩忽职守之嫌,对来自伊尼德的新晋理财顾问的做法肯定也会感到不满。

内部审查经理麦迪茨或许也会觉得遭到了攻击,因为寄给董事会的信本质上也是在指责他掩盖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海默尔曼以及美林法律部和合规部的其他高级执行官们当时可能认可了麦迪茨在调查备忘录时的做法,他们担心自己也会被揪出来。如今,曼德尔、米哈利和迪恩正在试探我对无所作为的新一轮调查将会做何反应。伊尼德的气氛已经够紧张了,不过我觉得纽约的局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我回办公室收集文件,我相信假如托马斯确实提起诉讼的话,这些文件可能会派上用场。回去的决定令我感到焦虑不安,我怕一旦我走进办事处,托马斯就会暴跳如雷,并要我解释为何被炒之后还在这儿出现。我毫不怀疑前一天托马斯打算解雇我,但我希望在面临官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所幸当我到达办公室的时候,托马斯不在,他回来后也未踏入我的办公室一步。我花了大半天时间收集材料,之后便去见了律师斯蒂芬·琼斯。

琼斯是俄克拉荷马州的知名律师。他以富于攻击性而著称,喜欢接可以吸引媒体关注的焦点案件。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人,曾于 1964 年担任当选前的理查德·尼克松的个人助理,也曾在竞选美国国会议员时败北。琼斯的法律头脑是有口皆碑的,根据某些人的看法,只有他的自尊能够胜过他的头脑。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种种,我认为琼斯将成为向美林宣战的人。

周二下午我就和琼斯见了面,因为距离托马斯的起诉已时日无多。琼斯首先阅读了托马斯事先准备的声明,他了解到托马斯威胁要起诉我,然后命令我离开他的办公室。

琼斯看着我问:“为什么托马斯要解雇你?”

我递给他数日前寄给美林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说:“因为这个。”

琼斯查看了这封信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他很满意我的指控是有理有据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的。接着他致电伊尼德办事处，并通知托马斯，我没有什么需要撤回的指控，因此不会根据他的要求行事。托马斯说，好的。琼斯说，通常他应当联络对方的律师，然而鉴于他不知道托马斯的律师是谁，只能联系他本人。托马斯说，他会让自己的律师与琼斯进行联系，然而，这位律师却是美林的法律总顾问助理曼德尔。

琼斯对我眼前最紧迫的法律问题——托马斯的诉讼——做了一些应对。然而，我还需要法律建议：在遵循美林的政策，举报公司员工的不正当行为之后，我该如何摆脱自己的艰难处境。

琼斯的忠告是，我若是坚持自己的法律权利，便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尤其是考虑到我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很敏感，它指控美林存在普遍的严重不正当行为，并且实际上也对高层掩盖事实的行为提出了指控。琼斯问我是否已做好准备，我说是的。

此刻，我无意赢回我在美林的职位。即使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相关人员被开除，我也不再信任这家公司。在我看来，就连这个组织的最高层都是伪善的，我不想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只想让美林做出符合其宣传形象的决定，并开除那些有损公司形象的人。

琼斯告诉我，重要的是提供一切可能的文件，因为在未来的审讯中，证据至关重要，鉴于证人的记忆会变得模糊，或者美林的现任员工可能会害怕在法庭上说出真相，琼斯建议，若是真的想和美林叫板，我需要记录我与知情人之间的谈话：包括托马斯称我为毒瘤，巴顿说我是世界上最大的撒谎者且思想扭曲，以及任何可能成为重要证据的说法。我同意，从此刻起记录每一件事。琼斯认为，除非能够达成和解，这场官司将于数月内开庭。

当时负责美林第二次内部调查的曼德尔，了解到琼斯成了我的代表律师。10月1日，在托马斯向我宣读声明的3天后，曼德尔致电琼斯，称托马斯与我之间有些误会，美林希望我回到公司继续担任理财顾问。琼斯告诉对方，他已读过托马斯的声明，在他看来，即使这不能算是直接解雇，至少也能推定为解雇。曼德尔重申，我并未被解雇。

琼斯答道：“我认为这是一次冷酷无情、缺乏策略、不得体的威胁，并且我认为这并非托马斯一人的单独行为……作为该领域的律师，我个人必须告诉你，托马斯先生在办事处任职期间进行威胁的事实，必须得到极其严肃的对待。”

那天晚些时候，曼德尔通过传真向琼斯重申美林的立场：托马斯与我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之间有些误会，我并未被解雇。琼斯立即回复了传真，他先是确认已收到对方的传真，接着描述了当前的情况，明确指出托马斯确实曾下定决心解雇我，而现在他对此感到后悔，所以曼德尔才要撤销对我的解雇。最后，琼斯称他很乐意在查看完我带来的文件之后，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仅仅数日之后，曼德尔再次对琼斯说，美林没有解雇我。此时琼斯已查看了更多文件，他告诉对方：“我确信，任何理性的人现在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事实上，斯古利先生已被美林解雇。我希望告诉你的是……托马斯的这一举动并非一时冲动，或是出于愤恨。事实上，在与斯古利先生对质或会见之前，他就已经告诉其他人——我说的其他人是指美林的其他雇员……他毫不掩饰对基思的怒气，并说要摆脱他。他甚至告诉别人，基思·斯古利是一个必须被拔除的毒瘤……如今托马斯先生解释说，自己仅仅是要求基思离开其私人办公室，这和他之前的言论是极不相符的……这不是某个单独的事件，也不仅仅意味着一些误会。”

在谈话中，琼斯还告诉曼德尔，我的指控将对美林的形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托马斯等人很有可能决定摆脱我，或是恐吓我闭嘴。他确实打算建议我提起诉讼，因为他可以坦率而真诚地说，在他长达 27 年的法律生涯中，我的案子是他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违法行为之一。

2 天后，曼德尔和美林的人力资源部首席律师汤姆·史密斯(Tom Smith)一起与琼斯通了电话。史密斯问，我没有返工是否意味着辞职。琼斯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被解雇的。

数日后，我收到了我的 U-5 表复印件，这是一份提交给证券管理机构的文件，用于陈述证券公司解雇员工的缘由。U-5 表上称我被解雇是因为“擅离职守”。在美林的《检查员手册》(*Supervisor's Manual*)中“严重不端行为”(Serious Misconduct)一章里，擅离职守被定义为“在未发出通知的前提下，连续 3 天未能到岗”。

就其定义而言，我并没有擅离职守。我确实没有出勤；然而，所有当事人都收到了有关我的去向及情况的通知。在托马斯要求我离开伊尼德办事处的 3 天后，曼德尔和琼斯有过交谈并相互发送传真。美林收到了明白无误的信号：我相信我已被解雇，而不仅仅是消失不见。然而，美林提交的 U-5 表却告诉证券管理机构、其他证券公司和公众，我不过是一个从工作中消失不见的失职者，因而被视为自行放弃工作。美林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似乎是决心摧毁一个危险的敌人——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

的前新晋理财顾问。

然而，我的决心也同样坚定：我要美林为其行为负责，在理财顾问和管理层当中实行统一标准。

我得知，艾利斯通知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 50 名理财顾问和其他 25 名员工，我由于缺勤而被解雇。艾利斯压根儿没有提到我寄给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托马斯威胁要起诉我并将我踢出办事处的事实，或是曼德尔与琼斯的沟通。根据艾利斯的说法，我只是自行消失了。

尽管遭到了我的举报——根据美林的政策，这是我的义务——艾利斯、巴顿、托马斯及其他人仍得以继续在公司收取佣金，而我却因为我的“严重不端行为”而被正式解雇。美林对我举报的不正当行为似乎毫不关心。尽管整个公司都确切地知道我的去向及原因，缺勤 3 天依然足以成为解雇的理由。美林对我辞职一事可以处理得更公道一点，但它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它选择“解雇”我，尽管众所周知，我认为自己早就已经被解雇了。

因此，我由于按照公司的政策行事而被解雇了，而其他人似乎都可以全身而退。大约一个月后，艾利斯和巴顿才双双收到西区销售部高级副总裁汤姆·穆勒三世(Tom Muller III)的警告信。

在给艾利斯的信中，穆勒对其所作所为的批评是温和的。他提到了环法 CMA 竞赛中的舞弊行为：“在仔细查看了调查结果之后，公司相信，你变更基思·斯古利职业类别的做法不符合公司的精神和传统。这给斯古利先生带来了很大的难堪，还有可能导致客户关系的紧张。”接下来，他责备艾利斯在对伊尼德管理层的监管方面失职。

然而，最后穆勒说，艾利斯在美林有着很长一段完美无缺的工作历史，对公司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称其为“一笔真正的财富”，他相信并希望艾利斯能够吸取宝贵的教训。穆勒说，他有信心艾利斯会采取必要的行为，保证此类事件在未来不会再度发生。最后，他表示相信艾利斯会以实际行动体现他本人和公司的价值，继续充当美林团队中“忠实而有价值的一员”。

穆勒对巴顿的口气则更为严厉。他说，一些问题已引起公司的关注，表示他“没有遵守公司政策和章程”。巴顿应该早就注意到许多可疑迹象，并且应当“严厉质问”某些相关的行为。

接着他写道：“鉴于此，我们将你在评定中心的资格延至 1994 年，从而推迟你的经理职位晋升时间。此外，我们要求你辞去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

销售经理一职。”他接着告诉巴顿，这封信既是一次责问，也是一个警告。

为了缓和批评的语气，穆勒在信的最后表示，除了被提及的问题，巴顿的表现出色，公司希望他在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一点。

这些信发出后没多久，克拉克就告诉我，巴顿称，已通过支票向美林偿付他在环法 CMA 竞赛中以不正当手段赢得的太浩湖之游的费用。他还说，主席兼 CEO 塔利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如今已知道了巴顿的名字。

令我感兴趣的是，就举报一事而言，美林终于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然而，对艾利斯轻描淡写的责备以及对巴顿的降级处理，并不能使我满意。在我看来，美林依然远未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案。

我非常期待公司采取其他行动，并渴望知道那将会是什么。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第二次内部调查是否会成功地揭发保险考试舞弊的丑闻——这一任务在第一次调查中彻底失败了。

我怀疑在揭露考试舞弊的牵涉范围时，美林法律及合规部的执行官们也许会遭遇重重困难，因此，我决定提供一些帮助。12 月 20 日，我致电美林达拉斯区的前驻地保险专家哈尔。在 1992 年 2 月被解雇之前，哈尔曾拜访过伊尼德办事处，我与他有过两次短暂的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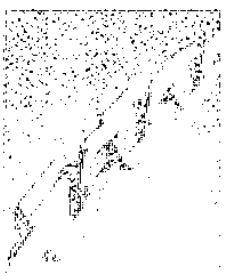
哈尔告诉我，之所以在那个周六上午开会，是为了让理财顾问们获得人寿保险继续教育规定的 25 学时，他的确是每一道题都给出了概述，上面有每道考题的答案。他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当之处，尽管每位理财顾问都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声明自己已读过那部庞大的房地产规划书，在考试中未得到任何外部帮助。

不仅如此，哈尔还告诉我，他觉察到小抄在俄克拉荷马市和塔尔萨市的综合办事处的各个办事处十分盛行。他说自己的管区里没有出现过小抄，他不会允许这种做法，但在达拉斯的另一位驻地保险专家治下，确实发生过此类事件。他曾告知两位驻地副总裁有关小抄的事，据他说，当他告诉两位上司自己不会成为使用小抄的同谋时，他们表示了赞同。

哈尔还告诉我，他是因为准备费用单的问题而被美林解雇的，并称其他驻地保险专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无法理解自己竟然因为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被解雇，何况他还是美林旗下的全美顶尖保险专家之一。

对于哈尔被炒之事，我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在我看来，这只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大范围保险考试作弊的内幕，并向上级投诉。所以，他不得不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走人。

琼斯告诉我，我在美林遭遇了一桩极其不公的解雇案。此刻我不仅希望看到美林认错，还觉得有必要挽救自己的职业。我无意赢回职位，但希望从这次经历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压力和失望。

我们开始为开庭做准备。随着事情的发展，琼斯清楚地意识到，我将被迫接受强制性仲裁，而不是陪审团审理。任何被证券公司雇用的理财顾问都必须签署一份 U-4 注册表。文件的小体字条款隐含着这样一个要求：理财顾问与雇主发生纠纷，首先该个人必须在所在的自治机构（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简称 SRO）登记注册，譬如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或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看上去这些规定要求我接受仲裁。

我对这一发现感到失望。直觉告诉我，SRO 挑选的三位仲裁者有可能偏袒美林。尽管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监控，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毕竟属于自治机构，受证券公司的控制。

不仅如此，证券仲裁的双方均拥有一次绝对回避权。这是一种自动的无因回避权，可用于回避被提名的 3 位仲裁者中的任何一位。我知道，仲裁者是完全自愿的，这和被挑选出来履行公民义务的陪审团不同。我本能地相信，仲裁者们知道，若是在一个敏感的案件中做出不利于证券公司的错误判决，这家公司很可能在未来的其他案件中对他们动用绝对回避权。此外，在华尔街的其他证券公司，也有可能跟风采取相同做法。换言之，鉴于仲裁行为的重要性，上述做法相当于专业自杀。而仲裁者无须担忧我的反应，因为他们不会再见到我。

我知道美林在华尔街的影响力无人能及，我也知道迄今为止美林已采取了强硬措施。我相信它已经掩盖了保险考试大范围作弊的事实，并怀疑第二次内部调查只会重蹈覆辙。仲裁的前景不容乐观，我害怕美林会在仲裁过程中不择手段以求取胜，我知道这些手段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

我对仲裁及其固有的不公正性极为反感，因此决定先尝试另一个策略。琼斯说，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赌注，然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线机会。我打算试着筹足琼斯的律师费，以便将解雇案提交给州法院，并尽可能地避免仲裁提供充分的法律论据。这需要大量的法律调查，耗资不菲。因此，当前的计划遇到了阻碍，我想方设法地筹集必要的资金。我打算立即回到自己的老本行——盲目钻探油气井，希望能够挖到金矿，以资助我对美林的法律斗争。

1 月，我无意间得到了两条有趣的信息。第一条信息是关于 1989 年在俄克拉荷马市区的一所本地私人大学举行的道德研讨会的视频，艾利斯是出席者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如下见解。

“道德并非表面文章，我们也不应当只注重表面，”艾利斯说，“它是充满生命力的。”

他宣称：“当他人从道德角度出发对你做出评价时，他们是否认为你是对的，不如他们是否认为你试图保持公正来得重要。”

他接着问道：“在这个棘手的道德难题中，你的决定能否经受彻底的检验？你是否不愿意让你的决定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或者你更倾向于掩盖事实？假如你打算掩盖这一切，那么这个决定很可能是不正确的。”

我惊奇地看到，艾利斯是以怎样一种安然的姿态，向他人坚称自己拥有强烈的道德感。

第二条信息是关于一本 1988 年出版的证券管制方面的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第 117 章的共同作者之一是海默尔曼本人。这一章名为《自治议程》(*Self-Regulatory Proceedings*)，涉及行业监管者就不正当行为指控进行调查时，证券公司的应对之道。在我看来，海默尔曼的建议完全符合美林就我的举报所进行的第一次调查。

海默尔曼的两段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次，他说道：“应避免不必要的供认。”他还说：“其做法是坚称此类案件无须任何惩罚措施。即便在已确认发生过违规事件的前提下，鉴于此案的具体情况，相关行为亦无须严厉的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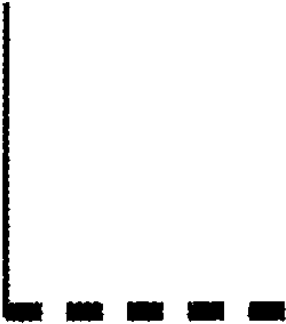
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在第一次内部调查中，麦迪茨称我的许多担忧都未得到证实，已确认的问题也不算严重。在我看来，海默尔曼的首要建议和个人做法都是在控制局势。

事实上，作为 1988 年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董事会主席，海默尔曼却在建议其他证券公司在该协会的不正当行为调查中有所隐瞒，这一点尤其令我感到奇怪。监管者即将对美林展开调查，而我已预见了这场调查的主线。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七章 监管者

战争在加剧，却无人举旗投降。

——基思·斯古利

万一我的案子要进行仲裁，琼斯和我希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美林为其行为负责。我们清点了对所有可能会对美林的行为感兴趣的监管机构，并告知他们我的发现。

琼斯先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行部总监威廉·迈克鲁卡斯(William McLucas)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也发给了所有我注册过的行业自助机构，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信中，琼斯指出我的 U-5 表格中的陈述是错误的。而且美林管理层对这些错误是心知肚明的，或者至少也是可以轻易判别出陈述失实的。在信中，琼斯还解释了我被解雇是因为，“根据美林的内部政策，斯古利先生向高管层报告了美林严重触犯国家和联邦证券法以及俄克拉荷马州保险法的行为”，以及我“举报、揭发了美林内部严重的体制性的违法行为”。

琼斯还告诉监管会，托马斯如何威胁要起诉我和我的家人。琼斯在每封信里都附上了我的 U-5 表格、我写给董事会的信以及托马斯给我的解雇书。

在信末，琼斯写道：“任何仔细阅读这三份附件的人，都会发现美林在 U-5 表格中对他肆意诬蔑、诽谤，这是十分可恶的。”

随后，信件频繁地在琼斯和众多证券监管会之间往来。其中，纽约证券交易所，尤其是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还可能作为证券监管会成员参与调查美林案件。其他监管机构包括美国证券交易所、太平洋证券交易所以及各种各样的州属监管会，其中大部分在这个案件上都听命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者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

此后，琼斯马上将相同的信发给了俄克拉荷马保险部和得克萨斯保险部。俄克拉荷马保险部决定介入调查。令人奇怪的是，得克萨斯保险部投票后最终决定不介入调查，并申明：“我们审阅了你的供词，鉴于你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美林的俄克拉荷马办事处，所以应该交由俄克拉荷马保险部处理。”

也许得克萨斯保险部是不知道如何去解读我的诉状，又或者它是根本不愿意插手这件事。我选取了我写给董事会信中恰当的部分，连同我递交给俄克拉荷马保险部的书面证词一起交给了得克萨斯保险部。这两部分都涉及了许多重要细节，证明美林在达拉斯办事处和得克萨斯其他办事处的众多雇员涉嫌参与保险考试作弊案。

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些监管机构有多无能，或者说他们对我的事情真的是毫无兴趣，又或者就是他们不愿与强大的美林为敌。最终我不得不认清，如果有人能找出这件事情的真相，那么这个人只会是我。

当我越想到美林的高管层在我的事件上如此滥用职权，并且对公众造成直接的不良影响，我就越觉得那些议会中负责监管证券行业的人员应该对这类情况有所认识。所以，3 月份，我写了一封信给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主席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议员。

我告诉约翰·丁格尔，一旦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就会发现那些高管层所谓的一系列相关调查不仅是非常不尽如人意的，甚至可以作为监管不当的失败教学案例，反映了高管缺失正直的品德。

我引用了丁格尔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花旗集团案件听证会上说的一段话，他说：“花旗案件中最让人失望的莫过于，花旗作为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面对大量他们滥用职权的证据时所采取的态度。根据参与该事件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员所述，花旗采取的态度是掩盖事实真相。花旗表面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是无关痛痒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个花旗员工在 2 年的时间里敢于表示他对上级的不满，但是他得到的不是花旗立即的正面回应。相反，高管层却是试图让他闭嘴，甚至是直接将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他踢出局。”

我告诉丁格尔，我也反映了我的上级的某些不法行为，但结果是，我被解雇了。我还告诉他，事实上花旗的行为本质上与美林的态度和行为是一样的。同时，我还把我写给董事会的信件复印件和琼斯写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一并随信寄给丁格尔。

另外，我还引用了1992年6月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中的一段话：“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少会对大公司经理级别的管理层和高级执行层，给予严厉惩罚。”

在信中，我告诉丁格尔主席，如果证实了管理者有不法行为后，仍不给予应有的和必要的制裁，那么我们的监管机制就是有问题的。最后，我表示，希望丁格尔和他的委员会能对此事进行调查。

收到我的信后，丁格尔马上亲自写信给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瑞登(Richard Breeden)，并将我的信函附寄给他。他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仔细调查该事件，并在1993年4月9日即星期五之前，将调查结果交给他。

当我看到这封信后，再想到美林如何对待我的举报，我觉得我有必要与丁格尔一起跟进这个事件。

我又写信给丁格尔，告诉他，根据我和美林打交道的经验，我怀疑美林不会积极、正面地配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所以我建议，因我对美林许多不法行为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让我知道美林的调查进展会更好一些，这样我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见。

丁格尔把这封信转发给了布瑞登。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相反，迈克鲁卡斯总监回信给丁格尔说，依照联邦证券法，对于我提供的信息，他们一定会参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实施责任仔细考虑的。

另外，迈克鲁卡斯还告诉丁格尔，他不能够提供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因为要保护受调查的个人和机构的隐私。但不管怎样，至少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介入了美林这件案子，这一点还是让我很欣慰的。

琼斯写信给俄克拉荷马州首席检察官苏珊·乐芙玲(Susan Loving)。在信中，琼斯大致罗列了一些资深证券律师对于美林的违法行为的几点意见：

- 伪证罪(在保险考试中作弊的经理人不正当地签署了宣誓书)；

- 合谋罪(保险考试舞弊和多起其他的违法行为);
- 挪用罪(虚构研讨会费用);
- 伪造记录(在新账户表中划去我的名字,而签上另一个经理人的名字);
- 违反保险法(通过造假手段维持人寿保险执业资格、允许无证经理人从事人寿保险产品的销售);
- 通过未注册的经理人,非法销售有价证券;
- 对证券(市政收益债券基金)进行虚假陈述;
- 挪用他人财产(违法使用乡村俱乐部名单)。

当我继续仔细思考这件事时,我相信美林会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施加不正当的影响。我重新查阅了其他一些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出制裁的监管失败案例。我相信,美林高管层和董事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们对违规行为的不作为,比起这些案例都要严重。所以,我第三次写信给丁格尔,鼓动他独立于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调查。

我建议对该事件举办公众听证会,因为美林作为美国最大、最知名的证券公司,竟然滥用职权并玩忽职守。

我还将美林的案件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理的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 Inc.)案件做了仔细比较。所罗门兄弟公司事件的结果是,其高管层人员没有正确处理公司内部的违法行为,因而有的被禁职,有的被停职,还有的被处以罚款。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事件中,重要的涉案人员只有一个;而在美林案件中,却是一批管理层成员和理财顾问。所以,我罗列了所有我认为涉案的美林管理人员。我认为,美林员工的罪行就算不比所罗门涉案人员的更严重,至少也算是半斤八两。

我罗列的名单很长,从董事会到首席执行官到律师再到主管人员。

最后,我告诉丁格尔,公众听证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高管层、下层管理者以及华尔街公司的总监们知道,议会对于证券行业的自我规范的认真态度,并且会严格监管证券行业。

我的这个举动把这件事推到了风口浪尖,因为我不希望美林有路可退并掩盖其违法行为。战争在加剧,却无人举旗投降。

琼斯和我都认为,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我们把所能想到的事都做了,我们向所有相关的管理机构提出了呼吁,我们也坚信自己做得很对。但是,很快我们就失望了,只有两个监管机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俄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克拉荷马州保险部——觉得有必要在调查中与我联系。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一些机构仅仅联系了美林。我对美林案件非常了解，议员丁格尔还将我的意见反映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然而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却对我的描述丝毫不感兴趣，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奇怪。

1995年6月，我看到了美林呈交给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最终报告的副本，注明日期为1993年4月16日。只有当我看见这份第一页盖有“机密文件”戳印的报告时，我才彻底明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被美林所谓的“自我规范”所误导的。在报告中，美林丝毫不为其行为感到羞愧，并且觉得解除我的职位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作为大公司，美林深知游戏规则，华尔街上没有人比它更在行了。

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首席调查员杰瑞·潘恩(Jerry Paine)，在1993年3月底联系琼斯，要求我提供所有我能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 and 一份关于保险案件指控的书面陈述。4月20日，我交给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一份14页的书面陈述，其中我详述了我认为可以作为美林雇员参与保险考试作弊丑闻的大量有力证据。大约一周后，我见到了潘恩，他告诉我，在他从业的17年里，从来没遇到过像我所说的情况那么严重的违法行为。

就在我见到潘恩的那天，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新奥尔良第五区办事处的调查员杰姆·狄克斯(Jim Dicus)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收到了琼斯写给该协会的关于我那U-5表格的信，信中附寄了我写给美林董事会的31页信，其内容涉及对于美林不法行为的指控，所以他们准备对我的指控进行调查。随后狄克斯又寄了一封信给我，要求我提供能支持我指控的材料。于是，我提供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一份书面陈述，里面详细描述了美林的违法行为和与此相关的文档资料。

狄克斯有9年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工作的经验。在他和我通完电话的9周后，他专程从新奥尔良飞到伊尼德来见我。狄克斯告诉我，接下来他整周都会待在俄克拉荷马州调查这起事件，并且大部分时间会待在美林俄克拉荷马州办事处。他还告诉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对于该事件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所以他才会来到俄克拉荷马州。

自从我于1992年9月被美林解雇后，我一直靠做油气买卖来维持我的家庭生计。但是，这种买卖的风险很大，所以我不确定是否还要继续做下去。1993年6月，我决定在我家乡俄克拉荷马州尝试应聘其他证券公

司。

我分别写信给佩因韦伯公司(Paine Webber)、保诚证券公司、添惠公司(Dean Witter)和雷曼公司(Shearson Lehman)。在信中,我介绍了我在美林参加职业培训后担任了一年的财务顾问,直到我因为举报了美林的违法行为而被开除。我知道,U-5 表格上说我是自己放弃工作的,所以我想,我需要解释一下我离职的真正原因,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求职信中。

尽管我在美林有杰出的业绩,但我还是被我心目中的未来雇主们拒绝了,除了佩因韦伯公司。佩因韦伯公司在俄克拉荷马州办事处的经理,乔克·约瑟夫(Jock Joseph),邀请我参加面试,于是我就去了。在面试中,约瑟夫告诉我,他在来佩因韦伯公司前,曾在美林工作过几年。在了解了我的故事后,约瑟夫说,他觉得不会有其他的证券公司敢雇用我,因为他们害怕发生在美林的事件同样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佩因韦伯公司并没有录取我,而我也只能继续从事朝不保夕的油气开采交易。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美林前理财顾问凯丽·麦兹(Kelli Metz)的电话。以前我们也曾通过几次电话,在得知我与公司的纠纷后,她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和美林打交道的经验。那时她怀孕了,所以艾利斯就解雇了她。随后麦兹以公民权利法里的歧视孕妇条款以及其他条款将美林告上了联邦法院。在公民权利诉讼上,麦兹胜诉了,而其他未涉及公民权利的部分需要仲裁,结果仍然悬而未决。麦兹还告诉我,她上高中那会儿,布兰特·巴顿的妻子黛比·巴顿(Debbie Barton)是她的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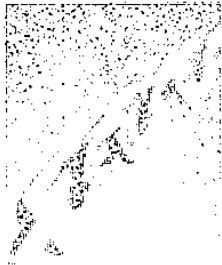
这次,麦兹说,我可能不相信最近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去参加了 15 周年聚会,你知道,布兰特·巴顿当然也来了,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她说道,“那天布兰特·巴顿差点要把我骂晕,他对着我又叫又骂,用龌龊的语言咒骂我,说‘我没想到你会和基思·斯古利谈话’,为了这件事,他简直抓狂了。那天,我们是在鹌鹑小镇俱乐部聚会的。”

我问她,发生这件事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对呀,很多人,”她回答,“他每对我说一句话,就要骂一句‘操’,他对着我大叫大嚷,用各种污秽的词语骂我。这情形就像每天你在市井街头所见的一样,我的意思是,他的声音大到很多人都听到了。你知道吗,首席检察官要传唤他。”

其实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巴顿一向就不善于处理纠纷。他的情绪一直反复无常。虽然很多人听到巴顿对我的咒骂让我有些不快,但是想到巴顿也和我一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承受着压力,我还是很欣慰的。

沃伦·巴菲特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所进行的调查还在继续。11 月份，狄克斯告诉我，他觉得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会对此事采取行动，而监管不利将是此次调查的重点。这使我备受鼓舞。

保险部的官员要求，美林就保险违法行为的指控配合调查。于是 1994 年 2 月，美林的法律总顾问助理米哈利写信给潘恩，告诉他针对我的指控，他们已经在 1992 年秋天进行了彻底调查，但并没有发现大量使用小抄进行作弊的证据。米哈利还说，我对于美林管理层掩盖事实的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而且董事会都知道这个结论。

米哈利不仅声称没有证据能证明存在小抄，并且一笔带过哈尔帮助理财顾问们逐题通过考试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这种环境下的考试是恰当还是违法的，”米哈利写道，“但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那 8 个参加了考试的人员被要求在严格监控下再次参加测试。然后，他们 8 个人都照做了。”

信中还写道，美林参加国家继续教育考试所使用的系统，因为那时受到质疑，所以自 1992 年 1 月就不再使用了。

米哈利还总结说，他怀疑我和哈尔谈话时，在谈到使用小抄的问题上，我诱导了哈尔。他强调，如果仔细阅读我和哈尔谈话的书面记录，就会发现，哈尔根本就不理睬我对美林的指控，更不要说支持了。

9 个月后，当我收到米哈利的信时，我非常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米哈利和美林会如此歪曲事实。首先，米哈利告诉保险部，只有在没有任何外界协助下带回家的考试才有效。但同时他又说，哈尔给理财顾问做了数小时的培训，而他不确定理财顾问答题的方式是恰当的还是非法的。

而在美林改变参加人寿保险资质继续教育的系统这一问题上，米哈利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他声称，美林已经在 1992 年 1 月停止使用画刊公司的《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但是，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美林的理财顾问们在 1992 年 1~8 月获得了该学分。所以，米哈利所谓的在我写第一封信之前美林就改变了其测试系统，是完全不属实的。很显然，该体系在 6 月 29 日以后还在继续使用。

我还知道，我和哈尔谈话的书面记录清楚地记录了哈尔所说的话，绝不受我的引导。“那些小抄还留在综合办事处里”。尽管哈尔否认存在任何个人违法行为，但他向我承认，他也认为有保险违法行为存在。作为美林在达拉斯的前驻地保险专家，他是应该清楚这一点的。

在 1995 年 9 月的审理过程中,哈尔和我揭露了米哈利偏袒美林一方的陈词。另外,我还指出,米哈利声称法律和合规部对于我的指控做了所谓的彻查,并没有发现大量小抄的证据这一结果是完全失实的。

这让我又想起了海默尔曼在他与别人合著的书中建议,“应避免不必要的供认”,“坚称此类案件无须任何惩罚措施。但是,即便在已确认发生过违规事件的前提下,鉴于此案的具体情况,相关行为亦无须严厉的制裁”。显然,米哈利已经得到华尔街法律宗师的真传了。

随后,我又多次为美林的举动而震惊。同月,米哈利写信给了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该保险部对正在接受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其他监管者调查的巴顿很是关注。巴顿因为轻率行为而被美林撤销俄克拉荷马州综合办事处销售经理的职位后,不一会儿又被升为美林俄克拉荷马州劳顿市的驻地经理。劳顿办事处和伊尼德办事处一样,都是协助俄克拉荷马州综合办事处的。巴顿大概以为他就快回到美林了,他时来运转了。但是没想到,却因为我,使整个事件急转直下,在他升职后 2 周,他就被美林解雇了。所以,他肯定会很震惊,很气愤,感觉自己是被出卖了。

巴顿的 U-5 表格上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他代替客户在文件上签字,尽管客户已经通过口头和传真的方式准许他这样行事。我的备忘录没有对巴顿产生任何影响,可是他却因为这件小事被解雇了,这实在是很奇怪。巴顿的 U-5 表格上的内容可信吗? 他认为他的 U-5 表格只是一个幌子,他是因为在伊尼德的事才被解雇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巴顿并没有失业很久。不久后他就去帮托马斯做事,托马斯 7 月份就辞去了美林伊尼德办事处的驻地经理一职,开始在俄克拉荷马市的另一家证券公司担任经理职务。

托马斯和巴顿作为美林伊尼德办事处的前后两任驻地经理,应该对基思·斯古利记忆深刻。也许将来这种印象还会更加深刻。但是,1994 年 1 月,他们大概都在盘算着,是否斯古利事件已经过去了。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八章 预诉讼

这是一场与华尔街证券大亨对峙的战争。很明显，双方都只战不降，不死不归。

——基思·斯古利

由于几个月前我联系的几家证券公司都拒绝聘用我，我只能继续做全职的油气生意了。从被美林解雇到 1994 年 2 月，我已经开采了 3 口油气井。第一口井的油层质量不错，但因为渗透性低而影响了边际产出率，所以我很快就停止了开采。其他两口井的前期产油都很不错，预计每口井都能为我带来 25 万美元的净收入。这样，按预算，我能拥有近 50 万美元的净收入，我想我终于可以摆脱经济窘境了。同时，我也有资金给琼斯，让他继续帮我上诉到州级法院，从而避免仲裁处理。

但是，到 4 月，原来业绩不错的那两口井中的一口突然毫无征兆地减产了，其产油量只能刚刚达到收支平衡，我最终停止了开采。而另一口井的产量也每况愈下，产油量比预期的差了一大截。我本想着脱离窘境，却不料又陷入了窘困地步。

4 月中旬，琼斯告诉我，他不再有时间代理我和美林的案子了。他说他被其他工作缠得脱不开身，既要代表客户飞去日本，还要赶着完成关于俄克拉荷马州刑法、实例和审讯过程的著作。他说，当初答应代理我的案子的时候，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可是现在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

但是,我觉得,除了琼斯告诉我的理由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当他知道我的案子有可能要经历强制仲裁时,他觉得我不太可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所以就放弃继续为我辩护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不太相信自我监管过程的有效性。琼斯很清楚我的案子的复杂性,这个案子涉及范围广,信息量又大,而且还是一场与美林的恶战。所以在综合考虑这些后,琼斯清楚地衡量出,我们仲裁的胜算和为之所要付出代价之间的比率,便决定不再冒此风险。另外,这个案子是胜诉付费,也就是说,除了我付给他上诉用的费用外,在胜诉前他一毛钱也拿不到,所以,他计算了前后成本,也就自然选择弃我而去了。

因为我和琼斯是签了合同的,所以我有理由要求他至少帮我处理完仲裁。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希望我的辩护律师斗志昂扬,而不是一个已经失去信心而想离开的人。

所以那时我既没有代理律师,自己又陷入了经济窘境。但我没想到的是,事情居然越变越糟。

就在我的油田快没希望,而琼斯又离我而去的那个月,和我一起生活了 13 年的妻子向我提出了离婚。我被美林解雇以后,接踵而来的经济窘境和不确定性,以及随后上诉的压力一直在侵蚀、折磨着她和我。我们本以为,我在美林的新工作能带来经济上的稳定,所以我们搬来了伊尼德,却万万没料到我的婚姻、家庭却因为这次搬迁全毁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和唐娜告诉我们的孩子,8 岁的泰勒和 5 岁的泰瑞,爸爸妈妈要分开了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泰勒和泰瑞都失控地放声大哭。而唐娜和我也忍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20 多分钟才平静下来。这种离别的痛苦,我永生难忘。

1994 年 4 月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的婚姻和家庭都支离破碎了,而我的事业也因为那两口油井产量的每况愈下而在一夜间化为泡影。同时,我也没有辩护律师为我处理和美林的案子。更要命的是,离最终上诉的截止日还有不到 6 个月。那时我处在情绪和经济的双重混乱中,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感觉我的世界崩塌了,而碎片正一块块地将我掩埋。

我需要好好自我反省下,想想我应该怎么做,是否还要继续和美林斗争到底。我已经花费了 2 年精力和时间在这件事上了,那一时刻,我绝望地感到是我该放弃的时候了。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但是，我对外却表现得很正常。每个在街上遇到我的人都会听到我说一切都好。但是我自己清楚，实际上我已经身心俱疲了。我虽然没有自杀的倾向，但是确实已经被击垮了，我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我那空荡荡的乡村小屋里转来转去。

这样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了我以前看的《圣经》。我是在教堂里长大的，但成人后却没有真正认真地参加过礼拜。有段时间我会压根儿不去教堂，而过段时间后，又会对去教堂充满兴致。所以我只是偶尔读读《圣经》，却未领会其真意。

在 1994 年的某天，我又重拾了《圣经》，慢慢走出了绝望境地。我记不得最后一次读《圣经》或是做祷告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哪篇经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确实从中重获勇气和信心。

很快，阅读经文和祷告成为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它是我当时迫切需要的神奇的力量源泉，它给予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我的信仰使我意识到，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

我新生的精神力量和我长期的职业道德，促使我决定继续和美林斗争。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我决定一定不能让美林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它对我所做的就这么不了了之。我知道，无论前行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即使是面对可能的仲裁，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如果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机会，我都会尽我所能，然后等待命运的审判。我知道，我与美林的案子是复杂多变的，什么都可能发生。

另外，我还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只拥有 2 年的上诉期，到 1994 年 9 月 28 日截止，所以无论是上诉州法院还是上诉仲裁院，我只剩下不到 6 个月的时间了。时间很紧迫，我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接受胜诉付费的辩护律师，因为我知道我和美林的案子不是普通的诉讼案。这是一场和华尔街证券大亨的战争，很明显，双方都只战不降，不死不归。

1994 年 4 月 19 日，发生了一件我从未料想到的事。我以前在伊尼德办事处的同事克拉克打电话给我，克拉克目前还在美林威奇塔办事处工作。他同我说：“我真想来和你握个手。我想你做到了。哦，不，我不是说这事真的是你做的。”

巴顿刚告诉克拉克，艾利斯被迫辞去俄克拉荷马州综合办事处高级驻地副总裁的职务。艾利斯向巴顿说，我让他们两个都遭了殃。“真是精彩啊。做得好，基思。”

“是的，但这并没有结束，”我回答道，“就我所知，纽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这只是第一步，要想成功，还需要很多人的配合和勇气。”克拉克自己就打过几起支付问题的官司。

“你的勇气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克拉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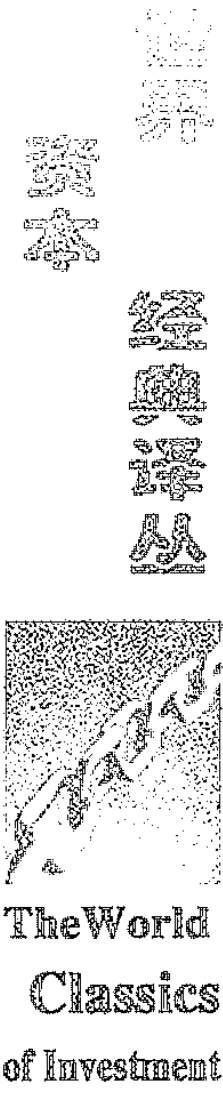
“好吧，我预测这会成为一场政变，我只是希望能来得快一些，”我回答道，“我做了我该做的。”

艾利斯在美林干了 22 年，是美林集团里共同监管 12 000 多个理财顾问的 174 个驻地副总裁之一。当艾利斯告诉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 75 名员工，公司要求他辞职时，起初只有一个人鼓掌，然后是零星的掌声，最后是潮水般的掌声不断。我觉得这种鼓掌应该不是出于感谢吧，而是他的员工真的希望他快点离开。艾利斯就是这么一个遭人怨的家伙，因为他态度傲慢，又自以为是。但是，碍于他在美林的权威，所以他的经理人都不敢与他对抗，直到我这个制造麻烦的新晋理财顾问出现。

艾利斯告诉巴顿和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员工，他是因为失去市场份额，所以公司不得不要求他辞去驻地副总裁职务。但显然艾利斯和巴顿都应该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当然我也清楚。巴顿应该知道，市场份额甚至不是美林考核驻地副总裁们的 14 个重要标准之一，而且艾利斯所说的丢失的 1%~2% 的市场份额，可以解释为是因为佩因韦伯公司在俄克拉荷马市设立了办事处。一般丢失市场份额的唯一原因，就是被另一个华尔街证券大亨抢走了。

在克拉克告诉我艾利斯被迫辞职的事情不久，我就听说，艾利斯又重新出现在美林圣地亚哥办事处，而且还是作为地区销售经理。我感觉情况似乎不妙。首先，我觉得艾利斯并不是因为丢失市场份额而被要求辞去驻地副总裁职务的。其次，圣地亚哥不是西伯利亚。我怀疑，美林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与艾利斯进行了地下交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像艾利斯这样骄傲自大的人，会说他是因为业绩糟糕而被迫辞职的呢？所以，我觉得美林显然是为了赢得这场战斗而不惜一切。

谈话中，克拉克还告诉我，作为阿科马 (Arkoma) 地区总监的诺布克，按计划要在 5 月初退休。此时我忽然灵光一闪，美林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我接触一切我有可能想到的关键人物。托马斯辞职了，巴顿被解雇了，艾利斯被迫辞职，而诺布克虽然并非直接参与，但多少有所牵连，他也要退休



了。这确实是一个高明的决策。现在美林可以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说，所有涉及此案的人员都已经不在公司了（或者对于艾利斯而言，他不再是驻地副总裁了）；而不是因为我的指控才离开公司的，因为如果这样说会对我很有利。如果美林逃过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任何处罚，那么在法庭上，它就会处在有利的位置。

时间一点一滴地在流失，我努力地寻找能够为我代理对美林上诉案的辩护律师。6周内，我接触了许多不同的律师，但给我的答复都是，他们虽然对我的案子很感兴趣，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受理。大多数都推脱说，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不受理胜诉付费的案子；或者是，推脱说这个案子太过复杂，而就剩下这么一点时间准备上诉，十分困难。

我觉得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我再次感到疲惫不堪。在我快要第二次放弃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的一个律师朋友，迪克·戈尔(Dick Gore)，他曾投资我开采的油气田。1992年末，当我被美林解雇后，我曾告诉过戈尔我的处境，他表示对我的案子很有兴趣，但是那时琼斯已经是我的代理律师了。

过去我从未考虑过请戈尔当我的辩护律师，因为我记得他的律师事务所，马哈菲—戈尔事务所(Mahaffey & Gore)是专门代理油气买卖案件的。马哈菲—戈尔事务所里有13个律师，属于俄克拉荷马市的中型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它坐落于市中心气势恢弘的双领袖广场(Two Leadership Square)。由于时间紧迫，我马上打电话给戈尔，却意外得知，他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扩展了业务。合伙人之一阿特·施密特(Art Schmidt)花费1/3的时间用在受理劳工案件上。

戈尔要我寄给他关于案件的重要文件，以便他进行评估。他说，他会先和施密特以及其他合伙人讨论一下，然后给我答复。6月3日，我给了戈尔他所要的文件，几天后戈尔告诉我，马哈菲—戈尔事务所决定代理我的案件，并且会向州立法院提交诉讼申请以避免仲裁。戈尔告诉我，在他们事务所受理过的案件中，我与美林的案件是最突出的。施密特也告诉我，他觉得我的案件是很值得一试的。我有点不相信我的好运，看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一下子绝处逢生了。

6月，我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员狄克斯有过一次有趣而深入的谈话。他告诉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已经到最后阶段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觉得这次调查会不会无功而返？”

“嗯，我想，如果你看看周围这一切，你自己就能得出结论了。”狄克斯说道，“其实你已经知道一些什么了。”

想到托马斯、巴顿、艾利斯、诺布克的离开，我说，我所知道的都是内部发生的事，我想知道外界对此的看法。

“好吧，你应该纵观全局。”狄克斯说道。

“你所指的纵观全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

“如果我是你，不管怎样，我都不觉得这一切是无用功、是没有收获的，”狄克斯回答道，“我想，不管怎样，我们总会得到一点启示，而且可能对这样的大型证券公司有了新的认识，了解他们是如何运作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所看到的是一些你不曾意识到的东西？”我问他。

“我想，它改变了我对这些大型证券公司是如何运作的看法，”狄克斯说道，“过去我曾天真地认为，这些人非常自律，工作良好，但是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所以，现在在监管分公司办事处考试时，我会更加严格。你看，这就是教育过程，现在我学会了一些美林使用的小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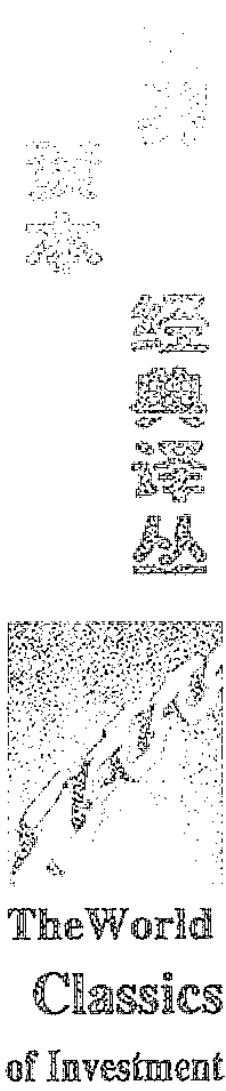
狄克斯的言论令我十分惊讶。他的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调查员，应该已熟知各种作弊伎俩，但是即使这样，美林的做法对他而言仍然是陌生的。

7月15日，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结束了对美林的调查，并根据我的指控，决定发出两封警告信函。

信函中既没有罚款也没有停职，同时也没有实质性的刑罚或是惩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信中仅仅表示了轻微的不满，运用了诸如“不要再犯”之类的言辞。这就像是，我在拿美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大做文章。对此，我感到很失望。而在以后的1995年司法诉讼审理中，美林果然大肆贬低我的论据的可信性，并用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无关痛痒的调查结果来支持它的论点。

在与狄克斯进行了多次电话谈话后，我意识到，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还没有美林的第二次内部调查来得彻底。显然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并没有接触案件的核心人物，譬如巴顿、哈尔和其他对此事颇为了解的人员。我开始认清一个事实，这就是，监管部门是不会对他们的衣食父母开刀的，尤其是美林这样的大户。

这两封警告信只涉及我所呈报的所有关于美林不法行为的其中3件。第一份信发给了美林，第二封发给了巴顿。



我并不知道发给美林的信中的内容，直到 1995 年我收到一份司法文件时才看到。但是，我却知道巴顿那封信的内容，就在它发出的几周内。而我之所以会知道信的内容，是因为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它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1994 年，巴顿被美林解雇了。同年的 8 月 4 日，他给我打来电话，并留了口信要我给他回电话。我知道，我和美林的案子充满变数，但是巴顿的来电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猜想，他要么就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要么就是找我来发泄一下他心中的愤懑。毕竟是我的备忘录和信件毁掉了他在美林的职业生涯。

我忐忑不安地给巴顿回了电话。我希望我和巴顿的谈话会有所收获，因为我知道，巴顿作为美林前驻地经理和销售经理，一定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结果证明，巴顿没有让我失望。

巴顿告诉我，他对美林解雇他一事感到非常郁闷和气愤，他决定要报复，但绝不是针对我。巴顿说，他就这样被一个他从 1987 年就开始为之服务，并打算奉献终生的公司，不管不顾地一脚踹出门外。所以他决定来找我谈谈，看看我们能不能互相帮助，一起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美林——抗争到底。那时，我的油田没开采出什么，但找到巴顿，我可算是挖到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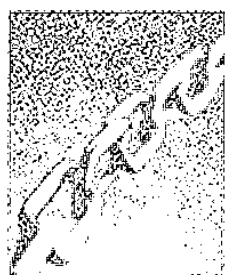
我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以与巴顿分享，他就不同了。从第一次谈话到后来的接触中，一般都是他侃侃而谈，而我只需要专心地听就可以了。我不敢相信，1993 年夏天在凯丽·麦兹的 15 周年聚会上还在谩骂我的巴顿，一年后又与美林倒戈相对。我与美林微妙的多边关系，又一次成为了焦点。

巴顿告诉我的信息很深入，直指关键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使我确信，对于美林而言，完全是利益远远高于职业操守。

巴顿给我看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给他的警告信，主要是关于虚构研讨会经费和市政收益基金的不实表述这两项。

巴顿告诉我，美林曾告诉他，他代客户签名并不足以解雇他。解雇他的真正的导火索，是当时由我的举报而引起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虽然据巴顿所说，美林的两次内部调查已经确定他是无罪的，但美林还是决定解雇他，这就像是美国大学体育总会(NCAA)的交易，这样美林可以说：“你看，我们已经把差劲的教练赶出去了。”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巴顿还告诉我，在第一次内部调查后，美林并没有对他怎么样。但因为我为董事会写的 31 页的信，美林展开了第二次调查，同时把他降为销售经理，要求他归还环法 CMA 竞赛后太浩湖旅游的费用，并且把他拒之管理层门外长达 2 年。而美林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和第一次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认为，美林在第二次调查之后，对他的处置完全是做给外人看的。

我问巴顿，把艾利斯调去圣地亚哥是否是横向调职，他说不是。我又问他，那是不是降级，他说确实是一个大降级。另外，和我一样，巴顿也觉得艾利斯因丢失市场份额而被降级完全是一个托词，因为市场份额并不是衡量管理层的 14 项指标之一。我又问巴顿，艾利斯是怎么看待他的问题的。巴顿说，艾利斯认为美林怎么说都可以，但艾利斯知道，自己是因为伊尼德的事情被降职的。

巴顿告诉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调查过程中，从来没有找过他。后来他又告诉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也没有找过艾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巴顿和艾利斯是我在备忘录和 31 页信中最关键的两个核心人物，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进行调查时却不找他们。哦，天哪，我不禁要问，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到底在调查些什么？

巴顿还说，艾利斯让他不要对外多说一个字，他确信这是上面的指示。巴顿说，自己想要去管理层，因此甘愿背下黑锅。

当巴顿又谈到保险考试的事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去了星期六早上在斯特劳德的专场，我的想法是，天哪，他们既然有小抄，那么我当时为什么还要老老实实地考试！”我想，美林解雇巴顿实在是一个大失误，因为他还是有底线的。和我想的一样：何必浪费时间遵从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呢？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赚取佣金。客户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别。

巴顿说，艾利斯认为他自己最终还是会恢复驻地副总裁职务的。这正好证实了我的猜测，美林与艾利斯达成了协议，让他先暂时避开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他是案件的关键人员。

1992 年 8 月，艾利斯和诺布克因为我的备忘录而要飞去纽约见高管层时，艾利斯没有见到谢曼。巴顿说，美林似乎把谢曼隔离了起来。

在谈到巴顿被美林解雇一事时，巴顿说“基思，你知道吗，我曾经试图想自己提出辞职。那时在沃思堡市的劳希尔公司聘请我为他们的经理，所

以我们试着让美林接收我的辞职请求，但是被美林拒绝了。他们说：“不，这不符合规定。啊哈，你是被我们解雇了。”他们就是不让我辞职，他们甚至拒绝和我的律师谈。他们甚至说，这事免谈。”

巴顿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都觉得美林还是畏惧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因为它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美林竭尽所能，使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觉得它能内部解决，并且也会自己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它将我在指控中提到的关键人物一一降职或者解雇。这样，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就轻松了，它就不用干活了。事实上，它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确实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事实证明，美林根本就不用怕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因为它所得到的唯一处罚，就是那封无关痛痒的警告信。但是，巴顿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艾利斯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毕竟，如果说美林和巴顿都收到了警告信，那么照理涉案人员都会收到类似的信件。这个谜底也许很快就会揭晓了。

巴顿觉得他成了美林的替罪羊。他就这样被晾在外面，所以他决定反击。而与我合作，作为报复的一部分，对他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显然美林谙熟如何打硬仗，但我也绝不是等闲之辈。1994年8月7日，我的辩护律师在2天后就要为美林无故开除我的案子提交上诉申请。我想，也许应该让美林早点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联系了一位俄克拉荷马州规模最大的报纸——《俄克拉荷马日报》(The Daily Oklahoman)——的记者。我和记者约在第二天见面，这样他就能看到将要上诉的案子了。那个记者对我的案子很感兴趣，并且表示，他的主编一定会采纳这则新闻素材的。

8月9日下午，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一起去了加菲尔德县，提交了起诉美林无故解雇我的诉状。第二天，《在俄克拉荷马日报》的财经版上刊登了一则名为“吹响美林诉讼案号角”的文章。现在，美林的理财顾问们才终于知道，我并不是像艾利斯先前告诉他们的那样，是因为擅离职守才被解雇的。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前雇员控告前雇主将其无故解雇”，文章报道了我控告美林零售部的整个案子。文中罗列了我所指出的美林各级管理层的不法行为。文章还指出，根据我与美林的劳工合同，我首先认真阅读了公司的《商业行为准则》，上面有一条规定，“雇员应当勤于质疑那些在自己看来违背重要美林道德标准的情况。”

另外，文章还提到了我最初的备忘录，以及随后引起的一次美林内部调查，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既没有人被起诉，也没有人被开除。它还写道，我接着写了 31 页的信分别寄给美林的 13 个董事，然后我被要求去纽约参加商讨会，回来后就马上被解雇了。

美林的高管层甚至都不需要通过通常的传唤程序，就得知了我的上诉，因为这篇报道已经昭示天下。美林的代表律师布鲁斯·戴 (Bruce Day) 马上派人到马哈菲—戈尔事务所复印了一份我的诉讼书。布鲁斯·戴是美林雇用的律师事务所——戴—爱德华兹—费德曼—普劳普斯特—克里斯坦森事务所 (Day, Edwards, Federman, Propester & Christensen)——的杰出法律代表。

多年来，戴一直负责处理美林俄克拉荷马州大部分的法律案件。1975~1978 年间，他曾是俄克拉荷马州证券监管会的成员，这使他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年轻的证券监管员。戴被认为是该州最好的证券代理律师之一，他的客户涵盖了大多数的大型证券公司，包括华尔街大亨佩因韦伯公司、保诚证券公司、美邦公司，当然还有美林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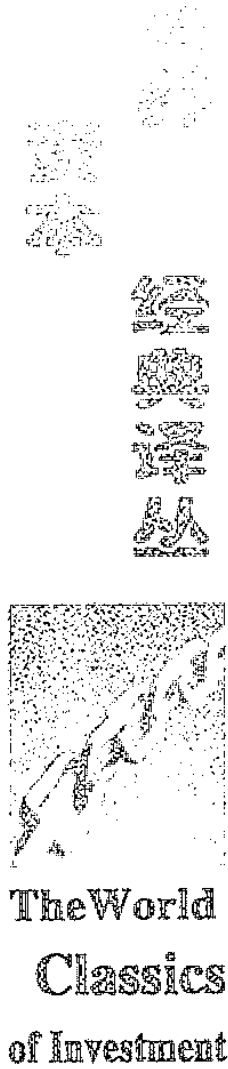
戴同时还是一个强硬的民主人士，并享有很好的人际网络。马上他就要被选为俄克拉荷马州领袖协会 (Leadership Oklahoma Inc.) 的主席。这是一个由州内成功人士和上流人士组成的协会，每年都会选出 50 名候选人参加为期 12 个月的培训活动，通过组建优秀领导人才，来推动俄克拉荷马州的积极改革进程。戴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戴十分老道，深知游戏规则，因其在法庭上的执著和震慑力而扬名。我记得，在 80 年代中期，我在 H. E. 吉恩·雷恩博尔特 (H. E. “Gene” Rainbolt) 银行所属的油气公司工作时曾经遇见过他。H. E. 吉恩·雷恩博尔特银行是俄克拉荷马州最成功的银行。我在戴的办事处同他会面，因为那时他正在为油气公司处理一件和证券相关的案件。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感觉是很狂妄，他说话底气十足，看不出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村。

《俄克拉荷马日报》登出新闻 2 天后，巴顿又打电话给我。“嘿，伙计，你真是惊艳了一把呀！”他说，“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它登在《华尔街日报》上！”

他又告诉我，戴是艾利斯的铁哥们，对此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

我问巴顿，2 年前托马斯把我赶出美林并威胁要起诉我，那时有没有在纽约引起骚动。巴顿回答说没有。我觉得这其中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



像曼德尔告诉琼斯的那样，解雇我纯粹只是托马斯的个人行为，那么美林一定会为托马斯在这一敏感时期做出这么鲁莽、草率的行为而找他算账的。

巴顿说，他是美林这场交易的替罪羊。所以，一想到美林对他所做的一切，他就觉得，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让他感到万分舒心。

我问巴顿，既然美林在第一次内部调查中已经证实他是清白的，他为什么还会被迫降职为销售经理呢？巴顿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写信给董事会，从而对美林施加了外部的压力。“他们这么做完全是权宜之计，基思。”他说。

巴顿说，某个比艾利斯职位高的人告诫他，对此不要多抱怨，要守口如瓶，要像没事一样继续工作，然后一切就都会平息的。

巴顿抱怨说，艾利斯只会给他无用的空口承诺，而忽视他手下的经纪人。他说，在调查中对于谢曼参与某些事件的情况，他和艾利斯都只字不提。

巴顿继续滔滔不绝，而我就静静地听着。“我被迫背黑锅。他们告诉我，我的这种处境，即使拖其他高层下水也是毫无意义的，我所做的牺牲会被记住，现在如同在刀尖上，是辛苦了一点，等不久后平息了，他们会补偿我的。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问他，是谁这么告诉他的。

“纽约那边并没有说得很直白，”巴顿说，“每个人都对我旁敲侧击，说什么让我们一起度过这场风暴，我们会再回到公司的，不会太久的，而且这绝对不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相反你为公司所做的牺牲都会被看到和记住的。”

巴顿告诉我备忘录事件以及我把 31 页信寄给董事会后的情形。“你可以想象，昆特多么希望你自食其果。我想，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这样想——他会有报应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有人认为，需要对这件事情投入那么多的关注。”

我对巴顿告诉我的事并不感到惊奇。他所说的都和我在美林所经历的一样。美林直到目前为止，在处理危机的问题上做得很不错，但是我希望当它在法庭上看到麦蒂兹和曼德尔作证时，还能继续这么自信。我想，美林应该会让负责那两次内部调查的两个调查组上庭宣誓作证，让所有人都知道，美林的那两次内部调查是非常彻底的，尤其是针对有关保险舞弊

丑闻的指控。如果这是它的策略的话，那么我想，它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在我提交上诉文件不久后，戴就来到了马哈菲—戈尔办事处，并与戈尔和施密特见了面，表达了美林愿意支付 10 万美元庭外和解。戈尔立即就拒绝了。这笔和解金实在是微不足道，缺乏诚意，所以戈尔认为我是不会接受的。

不久，克拉克告诉我，巴顿要写信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要求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收回给他的警告信。克拉克念给我听，巴顿发给克拉克的他写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信的草稿。其中有一段让我很感兴趣：“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调查针对美林伊尼德办事处的指控时，从来没有来找过我……斯古利先生于 1994 年 8 月 9 日在俄克拉荷马州立法院提起的对美林的诉讼案，其实是美林预料中的事。美林一直都在控制和歪曲事实，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我很吃惊，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竟然不给证券公司注册代表任何陈述的机会，就直接采取行动。另外，我很乐意看到这一点——巴顿，这位曾经的美林驻地经理和销售经理，一直都是美林的内部人员，他能够正式地写信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说出事情的真相，说美林的意图是“控制和歪曲”事实。

我和克拉克继续我们的谈话，讨论接下来一步步的行动和可能的听证会日期，克拉克对我说，“伙计，你要做好准备，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放心，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回答道，“我不在乎要打多久。”我想，我会用事实证明的。

在 1994 年 9 月初，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订了该年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手册》(NASD Manual)。但是我被告之，仓库没货了，作为补偿，我可以免费得到 1993 年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手册》。几天后我收到手册，便开始翻阅起来。手册的第 255 页罗列了所有第五区办事人员——包括 10 个地区商业执行委员会(DBCC)成员和 5 个提名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商业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决定，对证券公司和他的注册代表采取哪些惩戒措施，而提名委员则会负责选出 DBCC 成员。

当我看着地区商业执行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提名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可不就是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的小昆特·H. 艾利斯嘛！我不敢相信这些，但我仍然感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觉到了其中的问题。

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第五区是负责调查艾利斯的专员组，艾利斯是在我的备忘录和给董事会的 31 页信中提到的关键人物。调查开始于 1993 年 4 月，那时艾利斯是地区提名委员会的成员。现在很显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艾利斯能躲过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而置身事外了。

我也马上想到了，为什么戴是美林最适合的代理律师人选，因为他玩的是同样的把戏——不让规则影响目标。而对于戴和艾利斯的交情，我也无须惊讶。

我在 8 月 9 日向加菲尔德县法院上诉，马上又被美林移送给了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地区法院，因为美林不是俄克拉荷马州的被告。韦恩·埃里 (Wayne Alley) 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我仍然抱着我的案子能够避开仲裁而在法庭上解决希望。而施密特的法律调研结果表明，这场官司的前景还是乐观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接着，我又打电话到埃里的办事处，询问他，什么时候有民事案件要审理。因为我想亲自见一见他，从而感受一下他的庭审风格，然后考虑我是否需要当面向他提交诉讼。我了解到，埃里的下一个案子是在 9 月 6 日开庭，所以我重新安排了我的日程表，这样在那天我就能飞去俄克拉荷马市。

在去埃里的办事处之前，我决定先去法院的办事处，把有关我案子的资料从电脑里调出来。我想知道，美林有没有提交将这个案子移到仲裁的动议，因为我和我的辩护律师认为这随时可能发生。我看了待审理案件记事本的最后几项，没有发现这样的备案，正当我准备退出程序时，我又扫了一眼其余的记录，在屏幕的中间赫然写着两个字——“仲裁”。

我有点懵了，但马上反应过来，显然这表明美林提交了动议给法院，申请 8 月 19 日的仲裁。接着我要求查看对应的动议文件，以确保电脑查询结果是正确的，结果确实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想知道我的辩护律师怎么会如此大意，没有告诉我美林的动议。我很担心，现在做出反应已经太迟了，有可能已经过了提案的最后期限。我立刻复印了美林的动议，然后马上赶去马哈菲—戈尔办事处，马哈菲—戈尔距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

到了那里，发现戈尔不在办事处，但施密特在。施密特看了我带来的动议复印件后说，他的律师事务所从来没有收到戴的事务所代表美林呈交给法院动议的复印件。我指给施密特看，在动议的最后一页上，戴写道，他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已经通过挂号信将动议的复印件发给了马哈菲—戈尔律师事务所，并得到了寄件回执。

万幸的是，我有 15 天时间回复美林的动议，这比一般的截止日期晚了一些。由于第 15 天是周日而周一又是劳动节，所以实际的截止日期是 9 月 6 日星期四，也就是今天。这就意味着，我只有几小时的时间去回复。

施密特马上起草了一份申请延长 7 天的请求，并在截止前一天发给了埃里法官。而我又返回联邦法院，按照计划，旁听埃里法官审理案件。谢天谢地，埃里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下午戈尔回到律师事务所，施密特告诉了他有关我的案子的新情况。接着戈尔三次打电话给戴，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前两次，接线员说戴不在办事处，但是后来戴也没给戈尔回电话。第三次，戈尔对接线员说，这个电话很紧急，是关于诉讼案的事情，接线员改口说戴在办事处，但是现在不能接听戈尔的电话。第二天，戈尔和施密特告诉我，他们怀疑，我们没有收到美林请求仲裁的动议可能并不是一个意外。

2 天后，施密特告诉我，美林可能是因为有点害怕了，所以要求戴将案子移交给仲裁，希望尽快平息此事。施密特还告诉我，他将要求戴向他提供挂号信的绿卡复印件，因为戴在动议里写明了，他已经将动议复印件通过挂号方式寄给了马哈菲—戈尔事务所。

同一天，我和巴顿又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谈话。“传闻说，你的案子转到仲裁去了。”巴顿说道。

那时，我正好还在等埃里法官批准我们的延期请求。我回答说，“我并不肯定。”

“哦，真的吗？”巴顿说。
“他们写了一份文件申请仲裁，但我们已经做出回应了。”我答道。
“哦，真的吗？”巴顿又说道，“我听说，案子已经被移交仲裁了，看来我的消息来源不可靠呀。”

现在我知道戴的如意算盘了。我想，戴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的案子移交仲裁，从而免去庭审的麻烦，并且认为仲裁是板上钉钉的事而进行大肆宣扬。因为留给我回应的的时间相当紧，所以我想，他一定以为自己这样就能够瞒天过海了。

施密特写信给戴，要求他提供寄信的绿卡，以证明他确实将动议书的复印件寄给了我的代表律师。

戴让他的助手打电话给施密特作为回复。电话里，戴的助手解释说，这其中出了一些小差错，信件不是通过挂号方式寄的。但我很肯定，动议复印件不是没有通过挂号方式寄，而是根本就没有寄出过，所以，马哈菲—戈尔也就自然不会收到了。

当我了解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对美林的调查并不彻底，以及几天前我发现当艾利斯和美林在接受证券交易商协会调查时，艾利斯仍然是该协会第五区提名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后，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我所发现的都告诉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了，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狄克斯。

在信中，我告诉狄克斯，我很难想象，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对于美林的违法者竟然没有给予适当的惩处。我还从众多缺乏信誉的不道德行为中，特别选了环法 CMA 比赛欺诈事件这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例子。我甚至还列举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哪条法规明确规定，参与这些不法行为的人员将要为其不法行为负责。

我直接指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没有接触巴顿、艾利斯以及其他关键的涉案人员，并告诉狄克斯，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仅听信美林的一面之词是完全错误的。

我写道：“我知道，我对证券业的评价会让人不舒服，但是我认为，我所说的是有道理的。像美林这样在华尔街享有清誉的经纪公司如果不能自我监管，那么作为‘自我监管’体系的第一层，也就是证券公司内部的合规部，不仅是毫无用处的，甚至说得直白点，它就是一个大笑话。”

我还建议说，如果这样严重的违法行为得到的只是一封警告信，那么作为“自我监管”体系第二层的自治机构，同样也是有问题的，其自身就需要更高层的监管。

为了证明我不是唯一 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激进分子，我引用了在我写信当天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名为“投资者抱怨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保诚案件中无视他们的利益”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无视证据，并且不去询问那些潜在的证人”，以及“自我监管组织在规范证券业时，似乎偏向华尔街大公司”。

在信的最后，我质问狄克斯，为什么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调查中，没有对艾利斯进行正式询问，是不是因为那时艾利斯是第五区提名委员会成员之一（俄克拉荷马州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而提名委员会负责选举出负责规范行业行为的地区商业执行委员会。

世界
资本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但是，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从来没有给过我回应。后来我得知，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给美林的警告信是关于环法 CMA 比赛作弊事件的。但是，那些涉及该案的人员，包括艾利斯，却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信。

接着我又写信给丁格尔主席。在信中，我附上了我写给狄克斯的复印件，并告诉丁格尔，“我希望你同你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成员能够站出来主持公道。除非你们认为，可以接受我们国家最大证券公司的高管层在接受调查时隐瞒、歪曲、掩盖他们的违法行为，而自治机构的调查却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丁格尔回复了我写给他的信，说他已经把我的信转给证券交易委员会了。显然，丁格尔再次把皮球踢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于是乎我意识到，华盛顿的官僚是多么平庸、无所作为，或者说，“权势”是如何深深地操控着他们。

我剩下的最后一个希望，就是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但是，结果却让我再次失望，我再次领教了这帮公众监管者是多么无能。

9 月，我写信给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首席调查员潘恩，询问保险部调查进行的情况。

我并不知道潘恩在一天前已经给我回复了，于是 9 月 16 日，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在电话里，潘恩告诉我：“我们考虑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在这件事上，有一个问题导致我们无权干涉该案，即继续教育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通过考试不可。考试只是教育机构自己的要求。现在 we 和画刊公司谈过了，他们已经修改了测试过程中的测试和课程结构。”

“实话跟你说，我们没有权力进行事实查问，我们真的是到处遇到阻碍。”

我向潘恩指出，理财顾问在星期六早会上的作假行为，应该属于俄克拉荷马州保险法令上提到的不诚实的作假行为。

“我们知道，可能存在一些违反法令的行为，但是现在并没有法律规定，再教育必须设有资格考试，所以我们的律师认为，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潘恩回答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我又问：“即使他们作伪证，也无能为力吗？”

但是，潘恩并不认为那些经纪人向他的部门作了伪证，如果他们真的撒了谎，那么也是向画刊公司撒的。1992 年 11 月，我曾和俄克拉荷马州

保险部以及画刊公司进行过谈话。他们都告诉我不是画刊公司，而是俄克拉荷马州，要求参加继续教育考试的人员签署宣誓书。

谈话中，我和潘恩就这样来回辩论着。潘恩一直强调说，因为理财顾问可以不参加考试而通过参加课程来达到获证要求，所以他的部门对此无能为力。潘恩和他的同事完全忘了，这无关乎有多少种获得证书的途径；如果考试作为获得资质证书的一种途径，那么它必须严格按照规章进行。

“作弊是违规的。”我对潘恩说。

“但是，这也正是你要上庭诉讼的对象。”潘恩回击道。

我说，对此他的部门肯定有很多证据。但他说，他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这些证据。

看来，我还得给他详细地再说一遍。“星期六早上，比尔·哈尔在考试前给了参加考试的理财顾问每个问题的答案，而到最后，参考者每人都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表示他们是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考试的。这显然就是作弊，而你只要把这些宣誓书找出来，就得到你要的证据了。”

潘恩并没有立即表示不同意，而是说，部门的3个律师已经重新查阅了这些事实，但不认为就是我说的那样。于是我就反问潘恩，那怎么可能？

“因为这仅仅是假设，说明不了什么。”潘恩回答道。

“如果这假设是不容争辩的呢？”我又问。

“现在它们并不是不容争辩的。”潘恩说。

“你的意思是，美林不肯承认那些理财顾问在星期六早上从比尔·哈尔那里得到了每道题的大致参考答案，并在之后签署了宣誓书？”我问。

潘恩回避地答道：“我认为，他们签是肯定签了。”

后来，当我看到潘恩回给我的信时，我简直无法理解。信中说，保险部已经将美林的案子归档了，不再受理了。如果我的诉讼案最后裁定美林违反行政法规，那么我可以再联系保险部。

我简直不能相信，潘恩居然认为，哈尔在周六早上的考试之前给美林的理财顾问开小灶这一事实是有争议的。而令我感到特别困惑的是，潘恩还将米哈利于1994年2月6日写给保险部的信附寄给了我。米哈利在信中承认，是他自己理解错了明文规定的考试方式。

我又写信给潘恩，想要帮助保险部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并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他，美林自己都承认了这个事实。

在信中，我告诉潘恩我咨询了一些律师，律师都认为，像理财顾问这

样,在考试前参加了哈尔的有关考试内容的培训,而后又签署宣誓书,承诺他们是在无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考试的行为,是属于作弊的违法行为。我还告诉潘恩,“如果要将这种行为归类,这是欺诈、不诚实、不道德的违法行为。根据法规 1428A. 1,如有此类行为,‘……主管委员会应该暂停、收回,或者拒绝签发、续签、重签任何许可证……’”

很快潘恩又给我回了信,表示我给他的信已经转给保险部的一位律师了,他看过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和原先一样。

潘恩在信里说,“你给我们的举报信里,主要是针对美林一些职员的指控。你没有提供给保险部不容辩驳的证据,所以韦利先生建议我先结束这个案子的处理,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法律部的艾迪·C. 韦利(Eddie C. Wiley)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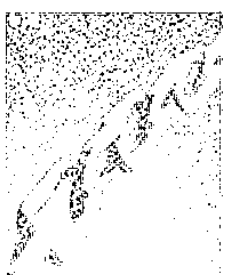
我确实有些问题要问韦利,所以我写信给他,我在信里写道:“我觉得潘恩先生对于我最近写给他的信中某些问题的回答很不负责任,所以我希望能得到你的直接回答。”

我问韦利:“请负责地、直接明了地回答我,要证明这些行为是违法的作弊行为,还差多少必要的证据。”米哈利也承认了该事件的某些部分,所以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胡诌美林的一些职员的行为。我就不明白,保险部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韦利仍然坚持他们原先的结论,他尽可能地回避这个问题。我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应。我感到很惊讶,原来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尽职保护俄克拉荷马州居民不受保险代理公司的欺诈、欺骗、作假等不诚实行为侵害的监管机构。

我想还是算了吧,别指望监管机构能有所作为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不想劳师动众地去向艾利斯、巴顿、哈尔等关键人物调查取证。它只是针对环法 CMA 比赛作弊事件发了一封警告信,却没有单独发给该案的涉案人员。而俄克拉荷马州保险部却借口说,星期天早上的保险考试作弊案缺乏确凿的证据而拒绝审理。得克萨斯保险部门甚至拒绝阅读保险舞弊丑闻的指控文件,即使这在得克萨斯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很快我又得知,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他们的调查过程中,似乎仅仅依赖于美林不实的单方之词。显然美林已经笼络了所有的监管机构,所以我最后和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才能把美林绳之以法。此时,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坚定,我发誓要将案子进行到底。

我继续定期和巴顿保持通话。有一次,他告诉我:“你要知道,美林是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形象的。在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认为能保全形象，他们可以做任何事、牺牲任何人。但是，我觉得那些狗娘养的同样也会软禁一些人以避免外界调查，也许谢曼就是被他们软禁了。”

还有一次，我问巴顿：“既然纽约那帮家伙把每件事情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他们还会他妈的那么紧张呢？你因为此事被解雇了，昆特也告诉你，他认为他是因为伊尼德事件被解雇的，然后他们又隔离了谢曼，接着又掩盖了一切。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琐碎的小事，为什么他们还会如此紧张呢？”

“基思，问得不错。”巴顿回答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这就像是曾经的水门事件，完全是三流的盗窃和一流的掩盖。问题的关键不是盗窃，而是之后的掩盖罪行，将每个人都拖下了水。就像是你先撒了一个谎，你为了圆这个谎又不得不撒了一个更大的谎；如此下去，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了。如果他们第一次就能说实话，那么后面的事就简单多了。”

巴顿的言论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他犯了一个很关键的错误，这就是，“一流的掩盖”首先是因为有“一流的盗窃”。

我和巴顿又谈到他的解雇问题，表面上他遭到解雇的原因是，他替客户在文件上签名。“我觉得美林完全是在骗你，”我说，“因为这个原因而开除你是十分荒唐的。”

“基思，我敢肯定他们是为了对付你，”巴顿接了我的话说道，“他们为了迎战做准备。他们会说，‘你看，我们已经把害群之马踢出去了。杰克·托马斯离开了，布兰特·巴顿被解雇了，昆特被调职了，而里奥也快要退休了。’现在只有鲍勃·谢曼还留在那儿，他们正在慢慢地把自己隔离起来。没错，他们也正在试图隔离谢曼。”

然后，巴顿又谈到了环法 CMA 比赛作弊事件。“他们说，我在销售比赛中所做的是违法的，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经过公司认可的，”他说，“我是照着昆特的指示做的；而反过来，昆特却把我所做的记下来交给谢曼。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我想，如果你回去看看，就会发现这是普遍使用的操作方法，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你可能是唯一一个对此有意见的人。”

1994 年 9 月，巴顿提交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仲裁部一份指控美林的声明。他要告诉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他并不是美林的叛徒，那时候，艾利斯和谢曼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事。巴顿认为他自己成了替罪羊。他

要澄清事情真相,为自己平反,所以他要为此而战。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和巴顿并肩作战。无论从哪一点来说,我们也不像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但是,我并不介意暂时放下我对他的成见,来听取他有用的意见和见解。他虽说不是我最好的私人顾问,却是我同舟共济的难友,是美林让我们共同落难了。

1994年9月28日,埃里法官批准了美林申请仲裁的动议。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仲裁意味着在仲裁决定做出前,我不可能对埃里的裁决进行上诉。即使我可以推翻埃里的裁决,我敢肯定我还是首先要经历一场激烈且不公正的仲裁过程。

第九章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仲裁

深入虎穴，你准备好了吗？

——迪克·戈尔

1995年2月10日，我的律师将我对美林的索赔清单上交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仲裁部门。我要求的实际损失赔偿额是230万美元，而惩罚性损害赔偿额至少也是230万美元。仲裁还在继续，而我只是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聆讯。

2月28日，巴顿和我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巴顿最近忙于两个月内即将在俄克拉荷马市举行的案件仲裁听证。巴顿向我诉苦道：“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身心俱疲。孤军奋战的结果不容乐观。没有经济支持，这场战斗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样下去，我早晚得破产。”我十分清楚，巴顿的话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仍然决定继续战斗下去，无怨无悔。

“从整件事情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就告诉我放心做吧，不会出什么岔子的；但之后又告诉我大事不妙了，再继续下去会出纰漏，我们现在不得不那样做。”巴顿继续说，“对于我的指控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人出来做替罪羊。”巴顿认为，艾利斯、谢曼还有美林都出卖了他。

我知道，巴顿的仲裁听证会可能会提供一些重要的证据，能够支持我对美林的指控。我问巴顿，是否能弄一个听证会的记录。他说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弄到听证会的记录。

4月，我和麦兹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我得知麦兹还有朋友在美林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工作，而 she 自己是巴顿妻子最好的朋友，我问她，“昆特离开的背后还有什么隐情，你之前听到一些什么？”

“关于伊尼德的事，”麦兹回答，“我真的没有听到其他细节，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和布兰特交谈过。”

“但是 you 从某些人那儿知道，这件事与伊尼德有关，对吗？”我进一步问她。

“哦，是的，”麦兹回答，“可能是从黛比那里听说的，因为黛比实际上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她跟我说，‘你知道吗，昆特被开除了。’”

“我只知道里奥提前退休了，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麦兹问我。我说，这里面是有隐情的，然后问麦兹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这件事太让我震惊了，”她说，“里奥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不瞒你说，他是我的上司，正是他雇用了我，我是打心眼里尊敬他。而且他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当大家都指责昆特错误的时候，他却出来帮昆特辩护……”诺布克在担任小石城区域副总裁以及升任地区总裁之前，曾在艾利斯之前，任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区域副总裁。

接下来，我向麦兹咨询了她的仲裁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我问她，美林是否会配合地向她提供她所需要的相关文件。询问之后，我大致知道了，在我自己的听证会上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麦兹告诉我：“我们想要某份文件，我也知道它具体在美林的哪个部门。于是我们要求得到那份文件，你也猜得到，他们说那份文件不在美林那儿。另外，你也得做好准备，他们呈交的文件里，有一些他们自称已给过我复印件，实际上我压根儿没有见过。而小昆特·艾利斯在宣誓之后，立场坚定、饱含感情地编造出一些我和他之间的根本不存在的对话。他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你要准备好应付这一切。”

然后，麦兹告诉我，她有两个朋友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这两人刚好是夫妻。“辛西娅和她的丈夫离开美林，他们充当了昆特的替罪羊。不过，他们很喜欢现在的上司贝奇，所以，对于离开美林，他们还是很开心的。辛西娅觉得，她现在在一个不同的工作环境，与当初替小昆特·艾利斯工作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她现在觉得工作是一种乐趣。”

我从巴顿那边听说，有很多理财顾问在这几个月陆续离开美林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我问麦兹，“你认为这些人的离开是因为小昆特·艾利斯吗？”

“嗯，是的，”麦兹回答，“他的离开导致那些麻烦事接踵而来。”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此时，克拉克还待在美林威奇塔的办事处，继续为艾利斯没有兑现给他 500 万~1 000 万美元的客户资产这件事斗争。克拉克找了律师，而他的律师把整个纽约总部也扯进来。虽然最后达成了个解决方案，结果却是，克拉克觉得他现在已经是最不受欢迎的人。1995 年 5 月，克拉克由于未达到销售标准而被立刻解雇。事到如今，克拉克才意识到，自己对抗美林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

1995 年 4 月 26 日，美林对我的索赔清单进行了回复。回复直接寄到我的律师那边，戈尔打电话通知我说，回复已经收到了。

戈尔很失望地对我说，美林在回复中披露了很多关于我的事，其中有很多我都没有告诉过他和施密特，例如，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理财顾问。我说这不是真的，这是美林对我的污蔑。我让他把回复传真给我，我说看完之后我会给他们一个答复。我怀疑美林和戴只是在延续他们一贯的做法——如果有简单的权宜手段，它又何必承认真相？

当我看完美林的回复之后，我感到很愤怒，因为回复中披露的很多事都是歪曲事实、扭曲真相的。美林宣称，除了个别案例外，我所认为的违规操作都是毫无价值的；我的销售业绩在业内排名前 5 位，但美林的记录显示并非如此；高层并没有给予伊尼德理财顾问 2 000 万美元客户资产的允诺；伊尼德办事处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敌对的环境；而我也没有试着应聘其他证券公司。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真相，而且我也不会被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所吓倒。

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我会在自己的仲裁听证会上证明这一切。

5 月 9 日，巴顿对阵美林的仲裁听证开始了。我迫切地想得到这次听证会的纪要，因为这次听证会的内容将对我自己的仲裁提供很大的帮助。然而，巴顿不想在法庭书记员和会议纪要上花钱。但在与美林斗争的过程中，巴顿和我已经是好朋友了，所以戈尔能够在听证会开始的前几天预约到巴顿的律师，询问是否能安排书记员出庭，相关费用由我来支付。巴顿的律师同意了。

之后不久，巴顿律师打电话告诉戈尔，他们改变主意了。他们觉得，安排法庭书记员出庭可能会影响裁定结果。戈尔问巴顿，是否同意我的辩护律师和法庭书记员出现在他的听证会上。巴顿的律师说，巴顿本人是同意的。但是，作为巴顿的律师，他不得不表示反对，因为巴顿得和我保持距

离。所以，这看起来像是巴顿的部分庭审策略，即把它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都归咎到我身上。

听证会开始时，施密特请求三位仲裁员，允许法庭书记员全程出席这次听证会。仲裁员拒绝了施密特的请求，并告知如果想获得听证会的纪要，可以尝试向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申请仲裁听证会的传票。施密特反对，他说他可以支付法庭书记员和仲裁纪要的费用，前提是批准他的请求。仲裁员召开仲裁庭外会议，对施密特的请求进行商议，但最后还是拒绝了施密特的请求。

在出席巴顿听证会时，施密特见到了艾利斯、诺布克和艾伦·罗克勒(Alan Rockler)，艾伦·罗克勒是来自美林洛杉矶办事处的专家证人。施密特告诉我，艾利斯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处事老道的销售商。

巴顿的仲裁听证会持续三天，而我最期待的就是最后一天的仲裁结果。但令人惊讶的是，美林和巴顿在第二天听证会开始的时候就达成了和解。因为在之前几个月，美林随时有机会与巴顿进行庭外和解，但是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原本是想在这次听证会上，观察巴顿和其他证人是否会受到纽约那边指使而在庭上作伪证，但事与愿违。

考虑到最近发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我猜测，美林应该已经知道我的意图了。接下来，我必须竭尽全力来应付这场战斗。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四天，我和巴顿聊了聊。对于他的仲裁结果，我很好奇。他提醒我说：“对方阵容强大，气势汹汹。布鲁斯·戴、罗德·海格、昆特、布鲁斯的秘书、布雷特·伯纳德经理、里奥和艾伦·罗克勒，都全程出现在美林的听众席上。而坐在我这边的只有我和两个律师。并且据布鲁斯·戴宣称，纽约总部的法律部门最近聘用了很多律师，人数甚至超过了迈克菲—塔夫脱律师事务所。美林大概聘用了 100 150 200 名律师。”

“如果第一天你能有足够多的证据，案情的发展会更偏向于你吗？”我问。

“嗯，是的，”巴顿回答，“我当时一整天都坐立不安。我告诉你，你不能太乐观，因为不管你想什么，不管你认为事情的发展会有多糟糕，结果可能会更糟糕。你认为你知道事情将会往多坏的方向发展，但其实你不知道。”

“那么，他们在第一天有没有对你进行交叉盘问？”我继续深入询问。

“嗯，是的，”巴顿回答，“是的。”

聊完之后，巴顿祝我好运。此时，我万万没有想到，4个月后在我的听证会上，巴顿竟然会倒戈相向，他的证词对我来说竟是一剂致命的毒药。

6月16日，戴给戈尔寄了一封信，信上说，美林会再寄一份经过修订的答复。收到这份答复后，我发现同上一份答复相比，这一份里面有很多改动。

经过修订后的回复在很多表述上比原来的要准确。我总觉得这样的反差非常奇怪。然而，美林仍声称，不管怎么样，我有责任说出事实的真相，伊尼德办事处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敌对的工作环境。

美林在回复中还增加了其他一些证据——证物B是美林在1993年4月16日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讨论了对于我揭发的违规行为所进行的内部调查。我推断美林决定披露这封信，很显然是因为美林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知道了：依照《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两个星期前我对于获得4月16日的那封信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请求会被批准，尽管之前美林请求将这些文件进行保密。

美林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中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其中甚至充斥了大量歪曲的事实。然而，这封信似乎已经成为那些调查机构的重要信息来源，因为它“仔细考虑”了所有被指控的违规行为。

6月，戴给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资深大律师大卫·凯里(David Carey)写了一封信，附件里面是美林那份修改后的回复。戴告诉凯里，原来的那份回复是在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之后不久起草的。他写道，“由于疏忽，那份回复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查就寄出了，因此，需要再做一些说明……”

对我来说，鉴于这件事的敏感性，说美林的相关部门没有审核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对纽约那边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如果爆炸案对戴的法律公司产生了影响，他本可以为美林申请回复延期，但他没有这么做。

后来，我怀疑美林之所以提交第一份谎话连篇的回复，可能想试图阻止《华尔街日报》刊登那篇报道。1994年8月9日，在我向加菲尔德县提出诉讼请求之后，我与《华尔街日报》的两名记者迈克·西科诺尔菲(Mike Sicconolfi)和阿妮塔·拉加万(Anita Raghavan)聊过几次。西科诺尔菲告诉我，要想打赢这场官司，需要足够的胆量，但是在写这篇报道之前，他会采访美林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相关人员。然而不久前，西科诺尔菲把这篇报道交给拉加万负责，因为他要写其他的报道。

1994年9月23日，拉加万告诉我，文章会在下个星期刊登。拉加万还说，美林已经千方百计阻止这篇文章的刊登。我说，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尤其是我已经意识到了，美林董事会一直包庇掩盖高管人员的舞弊操作。

之后，我和拉加万聊了几次，最后一次是在11月8日，当时她告诉我，她正在忙于其他报道。《华尔街日报》至今都没有刊登我的那篇报道。

我怀疑不是西科诺尔菲就是拉加万和美林联系过，而美林则告诉他们，我的索赔是无理的、不能够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刊登这篇报道对美林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美林在8月19日就采取行动使案情转向仲裁，我猜测公司会说，它要提交一份回复，如果仲裁要求被拒绝就向法庭提交，如果被准许就向仲裁庭提交。美林的仲裁请求在9月28日被准予，事情转向了仲裁。1995年2月10日，我把诉讼请求提交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美林在收到延期通知后，在4月26日提交了它的回复。在回复中，美林否定了真相。我推测，正是由于美林的回复，使《华尔街日报》决定不刊登那篇报道。

同月，美林修改了那封回复，克拉克和我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克拉克告诉我，他的律师正和美林协商关于他被美林不当解雇而要求索赔的事，但是如果不能达成令他满意的结果，他也准备接受仲裁。

克拉克和我讨论，巴顿那场未完成的仲裁听证会。克拉克将巴顿的案子和我的进行对比，说：“你知道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基思？区别就在于，你的材料都是真实的。我不相信他们能在三个独立的仲裁员面前狡辩！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基思·斯古利，他们不清楚自己轻视了他，可能他们现在脑子里还有这种想法，‘嗨，让我们瞧瞧这个家伙是怎么被轻易撂倒的。’”

7月1日，我听到克拉克和美林之间已经和解了，这令我很吃惊。克拉克跟我说，他的律师简直目瞪口呆，他不相信美林会付高价和解。美林还价后所建议的损失赔偿额，是远大于他律师所预期的。克拉克跟我说，他认为美林只是想扫除他与巴顿这些障碍，以便能全力准备来对付我。

我回想起麦兹跟我说过，在她赢了美林的那场联邦怀孕歧视诉讼中，艾利斯在宣誓后，还是作了伪证。我还记得麦兹说过，联邦法官罗宾·考斯罗恩(Robin Cauthron)在俄克拉荷马市西部的案子中说过，她觉得艾利斯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人。

我决定验证一下考斯罗恩法官对艾利斯的看法，来以此判断她对于艾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利斯可信度的论断是否准确。考斯罗恩法官写道，“艾利斯先生作证说，在规定业务之外不存在咨询。这个结论和其他证人以及周边那些被解雇的、可怜的执业者的证词是矛盾的。”

随后，她写道，“艾利斯的证词绝大多数是不可信的。”虽然从这个法官的评论中，我没有查到任何新的东西，但我已经知道艾利斯确实实作了伪证。

7月25日，为了那些文件，我向纽约证券交易所仲裁部门提出了我的第一个请求。这个案情先悉要求将在之后发挥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我还要求1992年9月22日那次会议的所有相关文件的细节，关于托马斯、艾利斯和一个被称为保罗的人——此人据说受雇于美林，毕业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关于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我需要美林提供详细信息。美林对于我的案情先悉要求的回复是“不行”。它宣称，没有一个叫保罗的人，因此，这个人更不可能参加过那次会议。

我仍然认为，这个保罗是负责评估郊区办事处的。我怀疑他是一个中层职员——这个职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能胜任的。

8月1日，克拉克告诉我，他获悉，艾利斯最近刚被提升为美林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办事处的副总裁。现在违规调查已经结束了，可能纽约那边觉得是时候奖励艾利斯了，因为他为了整个团队的利益而独自承受外来的压力。克拉克还告诉我，他近来还与巴顿谈过话，似乎在他和美林的案子解决之后，大家都在关注我那即将到来的仲裁听证会。

在8月31日和9月8日之间，按照控辩双方的案情先悉要求，美林和我都为彼此提供了相应的文件。我们还交换了证物和证人的出席清单。仲裁听证会从9月18日开始。美林、我，以及我们的律师都为了这个案子忙得晕头转向，因为我们都清楚这将是一场恶战。

在听证会开始后的前几天，我接到哈尔的电话，我感到很意外。上一次和他交谈还是在1992年11月，当时他告诉我，他意识到特克索马地区的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

在9月8日我提供给美林的证人清单里包括了哈尔。然而，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让他出庭，因为戈尔觉得他的证词不是很必要。他们都觉得我的案子是无懈可击的，考虑到我所处的极端敌对的工作环境：当时托马斯威胁说，要对我提起诉讼并让我离开伊尼德办事处。然而，到最后，律师们还是希望哈尔出现在证人名单上，并且在最后一刻，他们决定打电

话给哈尔让他出庭作证。

戴认为哈尔是一个有利的证人，所以他打算打电话给哈尔，并套取哈尔的证词。哈尔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我们简短地聊了聊，主要是关于美林可能会对他所说的哪些内容感兴趣，之后我问：“还有其他的吗？”

“他们有很多想说的，”他回答，“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的律师通话，而他们觉得，在你所知道的那些事情里，他们最想花费时间来防备的就是涉及我的那些事。”

“好了，不管怎么说，”哈尔继续说，“如果你需要我帮忙，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我回答，“对了，我还想知道你刚才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你愿意出庭指控美林的舞弊行为吗？”

“嗯，”哈尔说，“我认为还有很多信息是跟案情有关的，但是都还没有被挖掘出来，而且那些应该都是基本信息，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重要……你的律师最近忙吗？”

我回答说是的，然后问：“你说还有更多的信息，你是指除了那天给我的消息以外，还有更多的信息吗？”

“嗯，”哈尔说，“这样说吧，基思，你没有问到点上。”

我跟哈尔说，我先跟律师谈谈，看他们是否想安排他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到俄克拉荷马市，来出席我的仲裁听证会。我的想法变了。如果还存在更多的舞弊行为，而不仅是简单的保险作弊和周六上午关于考试答案概述的会议，那么我想知道，到底还有哪些舞弊行为？

跟律师谈完之后，我在9月15日给哈尔回了电话。哈尔不再像之前那样守口如瓶了，他告诉我，盖瑞——另一个居住在达拉斯的保险专家——正是保险作弊的带头人。“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保险作弊行为才会如此猖獗，”哈尔说，“他的保险销售小姐替经纪人填写答题册。另外，小抄，如果这么叫它的话，在他的那个区很是猖獗。但那是在达拉斯，这种事在俄克拉荷马州是不会发生的。为此我曾与一位来自达拉斯的重要经纪人发生过矛盾，因为我的保险销售小姐和我不愿意替他填写答题册，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接受保险教育。”

“你需要做的就是得到盖瑞的证词，你必须得到他旗下那位销售小姐的证词，她是他的左右手，是公司的实际管理者。盖瑞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老板，公司里另一个女孩负责公司的一些琐事，所以实际上这两个女孩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才是公司手握实权的人。”

“关于这件事，达拉斯的管理层知道多少呢？”我问。

“直到我揭露了以后，我也不确定高管人员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不会继续做这些违规的工作，因为这样每个人都会面临被吊销执照的风险，而且我也将这件事告诉了昆特，”哈尔回答，“我想要披露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会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口头上都说支持我，但事实上，我认为只有昆特真的支持我，因为他也参与了‘汽车旅馆’事件。”“汽车旅馆”事件是指，哈尔在周六早上的会议中帮助 8 名理财顾问逐题通过考试。

“哦，但是如果昆特不支持你，或者俄克拉荷马的管理层根本和这事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还觉得有必要为了这事去拜访昆特？”我问。

“因为考前协议，”哈尔回答，“我在办公室里将这件事报告给昆特。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可能会引发很多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不想把它归为如果你想就可以的日常事务。我甚至不想知道，这种事会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办事处。这件事已经在达拉斯办事处发生了，而我不允许同样的事发生在我的办公室。”

“你到底想引起达拉斯哪位管理人员的注意？”我问。哈尔把他所提到的那个管理者的名字给了我。

最后，我说，“提到那些管理人员，有趣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同一时间从房地产规划培训课程中获得学分的，而且是在同一时间段里。我怀疑那两个女孩为其中一些管理人员提供了相同的帮助。”

“的确。”哈尔回答。

“确定？”

“确定。”哈尔再回答了一遍。

“你没有其他疑问？”

“哎，那些可恶的包庇行为是不会停止的，那些管理人员关注的是如何管理，他们才不会花时间去通过房地产规划之类的考试，”哈尔强调说，“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考试的事。”我在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中，列过 14 名来自特克索马地区的管理人员的名字，他们在保险考试中取得了学分。看起来我认为其中一些人可能参与了作弊，这推测没错。

我想让哈尔出庭作证，即使他的证词对于我的案件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哈尔的证词证明，纽约总部从未寻找过真相，可是我仍然决定去挖

掘这个真相。哈尔的证词是可信的，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感激我而帮我。事实上，我已经暗示过他，在写给董事会的信中有提到，在周六上午的会议上是他帮助理财顾问通过考试。如果说接下来出现了什么意外，那就是哈尔出于一些个人动机而不愿意出庭帮我作证。

听证会拉开序幕：表演时刻

基思·斯古利对阵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的仲裁听证会，被安排在 1995 年 9 月 18 日，地点是俄克拉荷马市区的梅达里恩酒店。双方都回顾了案情先悉阶段互换的信息。面对如此繁琐的案件，戴在几个星期前就对施密特抱怨说，他很多年来都没有为一个案子花费这么多心思了。

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准备着，但是没有一方提出庭外和解。这个斗争将持续到最后，我对我的案子几乎事必躬亲。由于我对于这个案子的各项事实了如指掌，施密特已经将我称为“活的百科全书”。为了这个案子，我已经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现在是时候开始出击了。

我的律师和我都确信这个案子我们会赢，唯一存在疑问的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考虑到我所披露的美林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美林如何不恰当地处理那些违规操作，我方有一位国内专家将帮我计算出具体的损失赔偿，并出庭为我作证。我相信，被告会为他所做出的一切受到惩罚的。

听证会开始了。这宛如一场盛世豪赌，每个人都全神贯注。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证券听证会。游戏越来越刺激，赌注越下越大。美林把主要精力放在我对“公司高管人员包庇大量理财顾问、经理的保险作弊行为”的指控上，它聘用了很多法律界的权威顾问。我的仲裁是这次豪赌的压轴大戏，美林不能承受任何失误的代价。基于过去 3 年中我的表现，它知道我并不像其他对手那么好对付。

很快，我就发现，美林在仲裁会上采取的部分策略跟它以前对付对手的策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会先承认我的所有指控，但是通过转换话题、偷换概念，使它看起来并不是原则问题，而只是公司管理层的失误而已。更关键的是，它将全盘否定那个已众所周知的保险作弊丑闻。美林似乎知道，除了保险作弊丑闻，其他的“摊子”是可以轻易收拾的，他们想证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明，我的指控纯粹是恶意中伤，因为那两次内部调查都证明，这些只不过是公司内部的一些细节琐事而已。

美林的另一项策略是，嘲讽我对于违规操作的举报行为，尽管公司的政策不仅鼓励举报违规行为，而且要求雇员勤于质疑和上报。美林打算把我描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

当戈尔、施密特和我正打算从走廊走到梅达里恩会议室时，我们碰到了戴和罗德·海格——他和戴是合伙律师。他们正站在会议室外面，迎接那些将要出庭作证的证人。所有人都望向我——那个美林曾经的新晋理财顾问，如今已经与美林斗争了3年。戴和罗德·海格最终亲眼看到了我这个美林传说中的敌人。

我知道戴在看什么，我走到他身边说，“嘿，布鲁斯。最近怎么样？我是基思·斯古利。”

戴看了我一下，诚挚地点了点头并和我握手。戴似乎并不记得，我们在10年前曾经见过面。

然后我走到巴顿那边，他正在跟海格打招呼。尽管巴顿和我在过去的14个月里打过很多次电话，但是自从1992年我被解雇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我们互相问候并握手。

我的律师和我走进会议室，等待听证会的开始。虽然我有一点紧张，但是我对这个案件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我也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是时候把所有的准备和努力付诸实践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了。

不久，戴和艾利斯进入了会议室。我在1992年被解雇之后，就再没有见过艾利斯。我打破僵局，伸出手说：“你好，艾利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在所有人面前，艾利斯没有选择，只能假装绅士跟我握手，很勉强地给出了礼貌的回应。两天后，战斗依旧在激烈地进行，厮杀还在继续，而艾利斯已经伤痕累累了。有一次中场休息的时候，艾利斯和我在走廊上又一次相遇，此时没有其他人在场。艾利斯那时的反应，与第一天这一礼貌的回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仲裁听证会开始了。主席小莱斯利·康纳(Leslie Conner Jr.)作为一名律师和非证券仲裁小组成员，宣布这次听证会开始。他介绍了自己和其他两位仲裁员：乔治·巴恩斯四世(George Barnes IV)——证券仲裁小组成员，和约翰·普雷斯顿(John Preston)——也是一名律师和非证券仲裁

小组成员。

然后，康纳主席让所有当事人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之后，仲裁员先进行了案情陈述。康纳首先介绍，除了上述简单陈述之外，他在 1980 年曾担任俄克拉荷马律师公会主席，期间和戴共事过，当时戴正受雇于联合会，并从事俄克拉荷马律师联合会和责任保险公司的合并事宜。主席还说，他曾和戴所在公司的几位员工一起参加过几个研讨会。康纳还说，他不记得与戈尔所在公司有什么特别的接触。

随着介绍的继续，我得知普雷斯顿在美国仲裁协会仲裁委员会替康纳工作，而且康纳聘用普雷斯顿作为他的律师来解决以前的一些法律相关事务。普雷斯顿也披露，除此之外，他先前还和巴恩斯在仲裁委员会共事过。

普雷斯顿说，他听说过马哈菲—戈尔律师事务所，但是不认识里面的律师。然而，他不认识戴。他两年前曾答应戴的一个合伙人的要求，担任仲裁员。

巴恩斯披露，“我已经当了近 20 年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仲裁员。我认为我有必要说明，我过去曾以专家的身份为美林工作。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反对美林的所作所为。我听过一些关于美林的案子。在这一两年里，我在其他一些地方见过布鲁斯·戴。”

我很担心自己的“仲裁日”。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的仲裁是由纽约证券交易所仲裁理事选出来的三位仲裁员负责的，因为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事件，不仅涉及高管人员，还牵涉到整个美林的董事会。所以案件很棘手。

此外，这三个仲裁员工作都很积极负责，尤其是康纳。仲裁过后，他们都将获得一定的报酬。他们也非常清楚，在一个涉及证券的仲裁案件里，存在强制性回避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阻碍他们未来的发展。

而相对于其他人，我更关心的是仲裁员，尤其是康纳和普雷斯顿，他们和戴所在公司的律师有交情，但是和马哈菲—戈尔的律师没有往来。我知道，理论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这么确定。我知道仲裁之后，仲裁员们跟我不会再有瓜葛，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他们希望继续和戴的公司合作——戴的公司是业绩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俄克拉荷马市最优秀的证券律师事务所。当然，他们也希望再见到美林，不论是作为仲裁员，还是为巴恩斯担任鉴定人。

我担心这些，不仅是因为我察觉到在证券仲裁里的强制回避会导致内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在的利益冲突,而且由于“老朋友人际网络”的存在也会影响案件的裁定结果。不过我还是乐观的,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而我也有证人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我只希望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事实可以证明我对于仲裁过程,尤其是对于自己仲裁小组成员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在康纳主席和律师讨论了一些程序上的问题之后,开场案情陈述开始了。

开案陈词:布鲁斯·戴谎话连篇

戈尔不紧不慢地开始他的开案陈词。他说,我之所以加入美林,部分原因是因为美林对于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他告诉仲裁小组,我在美林的培训和工作表现都是出色的,而且我并不是一个惹人厌烦的员工。相反,我在公司的各方面表现是极其优秀的。

戈尔解释说,我身处的工作环境一直与我本人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他提到了那些我们想要揭露的特殊违法行为。戈尔还指出,我如何利用美林的内部审查系统,举报那些亲身经历的违规操作。当举报失败之后,我又尝试拨打秘密热线电话,然而所谓的秘密热线原来也只是一个幌子,最终我决定写下这份备忘并把它上交到董事会。

戈尔告诉仲裁小组,由于我寄给董事会的那封信,美林进行了第二次内部调查。尽管那些指控和我最初举报的没什么区别,但美林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

戈尔继续转述,美林的调查员是如何对待我的。调查时,那些调查员明确表示,他们不喜欢告密者。对此,我完全不能释怀,我按照公司手册履行了自己义务,到头来却成为了公司的公敌。

戈尔还向仲裁小组说明:托马斯说我是一个毒瘤,还声称一定要除掉这个毒瘤,并威胁我说,如果不撤销举报,他就会起诉我。

对于我的解雇情形,戈尔说明了双方存在不同意见,包括美林是如何让步说,它想要我回来工作,但是我方认为,任何人要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工作都是不现实的。他解释,美林是如何错误地在我的 U-5 表格上填写“擅离职守”这一项,结果导致我被列入证券行业的雇员黑名单。

戈尔为了证明我所经历的一切不幸，说：“后来，斯古利自然失去了工作。而且由于在美林的失败经历，导致他很难找到新工作。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选择离开他，因此他也失去了家庭。这个期间，他遭受了身体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理所当然，他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公平的。”

戈尔继续说：“我知道美林可能认为，某种程度上，斯古利先生是极端的狂热者，又或者是天性使然，因为他的举报行为并没有引起其他理财顾问的共鸣。但是坦白说，你们将发现，斯古利先生是一个诚实而且谨慎的人，他有明确的原则，他以惊人的毅力去坚持这些原则，即使这要以他的事业、家庭为代价，他也在所不惜。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举报这些事，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为一个举报者，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帮助他，帮他讨回公道的原因。”

接下来，轮到戴开始美林的开案陈词。基于我和他之间为数不多的但又不愉快的碰面，我怀疑戴不会实话实说，他这么做我不会感到惊讶。

戴以他自命不凡的、戏剧化的陈述方式介绍着案情：“3年前，基思·斯古利在美林担任过11个月的股票经纪人，我们今天是来解决这个纠缠了3年之久的问题。”

戴告诉仲裁组，对于我的举报，美林方面积极地做出了反应，连续进行了两次内部调查，而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证券交易所、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俄克拉荷马证券部门、得克萨斯州证券部门、阿拉巴马州证券部门、亚利桑那州证券部门也“积极地参与调查”。他说调查的结果是，上述机构没有对美林采取任何规范性措施，而这个仲裁将是最后的终结。

戴继续讲述案情，他认为我陈述的关于“由于善意的举报而被开除”是不符合事实的。戴说，关于我的举报，美林进行了一次内部审查，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然而我又给董事会寄了一封31页的长信，这是很让人气愤的。信中毫无根据地说，全美50个州的美林分公司合谋违反州立保险法规，并声称我的经理也参与此事。

他说的这些，我感到相当惊讶，戴混淆是非的能力真是相当高明。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戴作为一名法庭官员，却掩盖真相，谎称上述机构没有采取任何规范性措施，而事实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向美林发了两封警告信。他说我的举报覆盖了50个州，可事实上我的指控仅限于发生在特克索马地区的丑闻，仅仅覆盖了俄克拉荷马州和大部分得克萨斯州。戴还指出，我在保险包庇丑闻中曝光了包括我的经理在内的50个人，而实际上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我只是提及了不到那个数字一半的人。

戴继续诽谤我，说我曾经试图拉迪兰下水，因为在我被解雇后的第三天，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说显然在那次通话中，我认为我没有被解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谎言还在继续。

戴说，我在被解雇之后的那天出现在办公室，这就说明那是正常的一天，公司的一切还在正常运转。他说明了构成实质性解雇内部检举人员的要素。他说，首先，揭发的问题必须是违反法律、法规和宪法，而且造成公共影响的行为，他宣称我的指控中只有一项可能是涉及公共政策的。其次，雇主以报复的方式迫使一个合格雇员辞职。

戴继续说：“最后，揭发人必须出于善意。这意味着，他的表现不能是为了泄愤或怨恨，同样不能为了个人得失。以上的三个因素在本案中都不成立。”

戴尽其所能地列举我的过失。然而，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自己。我只是在坚持我的处事原则，我只是想替那些曾经被美林不公正对待的理财顾问讨回公道；我只是想帮助那些曾经信任美林的客户。他们把财产委托给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机构，最后却损失惨重。

接下来，戴对我的每项指控进行了简短的说明。他最先提到我所提供的那些证据，包括3年来的所有相关文件和111份谈话录音。戴说，并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将对话录音了，他责问我为什么要“诱导”我的谈话对象。的确，谈话时我并没有让对方知道我录音了，但是，难道是我“诱导”他们说这些话的？我所关心的不过是这些文件上的真相而已。

对于环法CMA竞赛作弊之事，戴觉得这只是小事一桩，因为期间没有客户投诉，职员也没有任何异议。戴谈到滥用乡村俱乐部名单，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问题是：乡村俱乐部在乎这件事吗？他们对此感到生气吗？他们抱怨了吗？答案是没有。”显然，戴忘记了我是怎样发现这件事的，我当时亲耳听见巴顿告诉艾利斯和谢曼，乡村俱乐部经理曾和他通电话，投诉他向名单上的人员群发邮件。

戴谈到“伪造研讨会费用”的指控时，宣称美林并不存在逃税或者资金挪用；因此，这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他还说，客户资产没有兑现并不是公众所在意的，市政收益基金也没有误导公众。因为当时购买基金产品的6个客户本有权解除合同，但是没有人选择执行这项权利。

对于戴下面所说的话，我觉得很可笑，他说：“布兰特·巴顿的行为完

全是合理的、诚信的，因为当时没有人对此有疑义。他相信，这些少量的共同基金是可以预先偿付的。”当时，巴顿已经向纽约证券交易所否认了他将市政收益基金作为预先偿付的产品来出售，但是，他承认他把这项产品作为具有有条件赎回限制的债券出售。这里，戴还犯了一个错误：巴顿不是把基金卖给了 6 个人，而是卖给了很多人。

此时，戴已经开始不顾事实真相了。他又有什么好顾虑的？这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接下来他还有更精彩的“演出”。不久，我意识到，戴的谎言有其特定模式。当然，其中每一项都是以美林的利益为出发点，毕竟那是他的本职工作。

戴继续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支持“州外开设账户”这项指控，因为没有相关业务发生，虽然资产被转移了，但是没有发生证券标的的买卖。这又是一个谎言。因为在适当的登记之前，州外账户上确实发生了一些业务。

谈到保险作弊丑闻，戴越来越过火。他说，我所谓的小抄仅仅是我的片面之词。我想，戴一定忘记了他几天前刚刚约谈过的哈尔，作为美林驻地保险专家，哈尔将提供强有力的证词，不仅涉及小抄，还涉及其他作弊方式。

戴告诉仲裁组，我在美林的股票经纪生涯只持续了 200 天。然而事实上我待了 330 天。虽然这无关紧要，但它显示了戴是如何扭曲真相的，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从案情开始到现在，戴一直试图诋毁我的人格，他想塑造我的反面形象，想让大家相信，我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才提起诉讼的。

“第一个月他与他的经理争辩关于……他的群发邮件，”戴说，“他是一个 40 岁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一行工作。之前，他一直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工作，顺便说一下，干得并不是很成功。为了谋生，他进入这个行业，有一次他晚上来公司群发邮件，不知怎么地，就和他的上司发生了冲突。”

戴不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不该在一个严肃的法律程序上随意猜测，他也没留意过以下这些真相：我 27 岁时就已经是石油行业的百万富翁了，后来我替俄克拉荷马州最成功的一个商人管理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此外，戴还在群发事件上误导仲裁小组。巴顿已经批准我以个人名义发出那封卡片邮件，他也清楚邮件会发给很多人。巴顿还告诉我他和艾利斯做了一笔特殊交易，这将使伊尼德的理财顾问不需要自掏腰包就能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发送这些邮件。

戴还在继续混淆视听。他告诉仲裁组，在过去3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我的案件。在这里，他继续无视真相，无视这3年期间我在化工行业的出色表现：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我积极投入到石油和天然气业务中，并整合了一些业务，开发了钻井业务。

最后，戴说：“希望这次仲裁能够彻底了结此事，那么我们花费的法律费用和相关成本就不会打水漂。”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居然能够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仲裁小组面前撒了整整15分钟的谎！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知道我接下来提供的证据才是事情的真相，才是真正跟这个案件相关的。

基思·斯古利：大地也会为之颤抖

轮到戈尔传召他的第一个证人，也就是我。康纳主席提醒我，仍然要先进行宣誓，虽然我在此前的开庭陈述中已经宣过誓了。

我简短回顾了加入美林前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我解释在1990年，当时石油业的状况已经持续恶化，我通过岳母得知，美林将在伊尼德开设新的办事处。那时候我开始考虑美林，因为当时我的家庭已经陷入财务困境，迫切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告诉仲裁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机会，而且我主要的姻亲们都在伊尼德。如果能在这家华尔街上最负盛名的、德高望重的公司工作，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能让我在经济上翻身并且拥有成功职业生涯的机会。

然后我提到美林的《商业行为准则》，每个理财顾问都必须熟读这个准则，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引用准则里面的原话：雇员应当勤于质疑那些在自己看来违背重要美林道德标准的情况。

接下来，我作证说，当初在美林为了获得职业成功，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在系列7考试中我得了93分。在业绩方面，我在西区销售部所有新手中排名前10名。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意识到或者亲身经历那些你认为与美林所谓的高道德标准不一致的情况？”戈尔问我。

“嗯，第一次是在 1991 年 11 月，当时为了取得寿险执照，我必须参加人寿保险继续教育，”我回答，“为了获得寿险执照，我接触了一些在美林达拉斯寿险部门工作的职员，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如相关业务的基本流程，我需要学习哪些课程或参加哪些考试之类的。所以，我和美林达拉斯地区寿险部门的莎拉·格拉汉姆通了一次电话。她说，‘好吧，我会给你发送一份小抄，让你顺利通过考试。使用小抄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随意查看资料，不用为考试费神。’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提醒我：考试使用小抄，这件事已经相当普遍了，而且已经成为理财顾问们沿用至今的惯例。”

然后我陆续解释了和巴顿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但是不久案情又回到考试小抄上。“你能为我们解释一下 11 号证据吗？”戈尔问我。

“11 号证据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小抄，也就是莎拉·格拉汉姆给我的那份小抄。”我回答。

“你是在电话中跟她交流的，对吗？”戈尔问。

“是的。”

“这份文件是她所指的小抄，对吗？”

“她是这么说的。”

“那些都是她的原话，不是你自己的吧？”

“对的。”

“那么第二页是什么？”

“第二页是她手写的一些东西——‘基思，依照我们 11 月 15 日星期五的谈话。谢谢。莎拉·格拉汉姆。’”

“那么第三页是什么呢？”

“她发给我的抄。”

“那么结果呢？”

“结果证明，这是模拟测试的答案。”我原先并不知道，直到我拿到格拉汉姆所谓的小抄后才意识到的。

“他们把试卷提前发给你了？”

“不，我在模拟测试时才看到卷子。”

“那么这份答案是否还涉及其他试卷？”

“不，没有。”

虽然我从格拉汉姆那里拿到的小抄只是模拟测试的答案，而不是真正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考试的答案，但是根据格拉汉姆的原话，我还是认为特克索马地区的理财顾问们在真正考试时也使用了小抄。我清楚，我和格拉汉姆的对话是关于真正的考试——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这是她提到的考试。我怀疑，格拉汉姆在发送真正考试的小抄时，跟她的主管哈尔报告这件事，就像当初她向前任老板薛皮恩报告一样。然而，当时哈尔刚刚告知他的主管有关保险考试中的不当行为。他觉得，格拉汉姆不该把真正考试的小抄发给我。

然后我说道，巴顿在我的办公室里跟艾利斯和谢曼吹嘘自己利用乡村俱乐部名单群发邮件。虽然他并没有这么做的权利。而当时，艾利斯却告诉巴顿他很勇敢，并让他继续做下去。我继续告诉仲裁小组，当时艾利斯逼视着我说，“不要担心产品好坏，卖出去就行。”

我谈到巴顿错误地陈述市政收益基金，并且将它作为预先偿付的产品出售。我也提到了我是如何得知，巴顿伪造了大量的研讨会费用账单。

“你们现在知道了，我是如何了解这一桩又一桩事件的，”我说，“我当时有一份小抄，再加上巴顿、小昆特·艾利斯和鲍勃·谢曼吹嘘关于使用乡村俱乐部名单的事，还有昆特告诉我，‘不要担心产品好坏，卖出去就行’之后，出现了市政收益基金事件，在我销售产品的第5周，我又知道了伪造研讨会费用一事。”

接下来，我告诉仲裁员关于客户资产没有兑现之事：根据每个理财顾问在环法 CMA 竞赛中的表现，艾利斯口头承诺，将分发2 000万美元的客户资产给伊尼德的理财顾问。

“那么 1991 年 12 月 16 日发生了什么事？”戈尔问我。

“那天，我去找巴顿，并告诉他，‘布兰特，这次的保险考试比我想象的要难很多。’然后我说，为了这次考试，我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学习。然后他开始嘲笑我。他说，‘好吧，我和其他五六名理财顾问所做的不过是在某个周六上午聚在一块，让来自达拉斯的驻地保险专家比尔·哈尔帮我们通过这场持续 25 个小时的考试。’而且布兰特还告诉我，这一做法得到了艾利斯先生的允许。”

“我告诉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他说，‘好吧，我们卖的其实不是人寿保险，我们只是需要通过人寿保险执照获得佣金。’”

然后我解释，15 号证物是参加房地产规划培训课程考试的必备书。它共有 201 页，包含了很多房地产方面的信息。证物里还包括一份个人责任宣誓书，是考生在考前必须签名的，以此来保证他们完成了全部的课程，

并且在没有借助任何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次考试。

接下来,我继续讨论我所关心的关于管理层在环法 CMA 竞赛作弊一事。我解释说,艾利斯操控了伊尼德办事处的职员人数,所以他能够在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我谈到,艾利斯的作弊行为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导致我不能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服务。

我告诉仲裁小组,为了成为出色的理财顾问,对于伊尼德办事处在橡树俱乐部举办的专业理财项目上,我竭尽全力带来了 70 名与会者(总人数是 95 名)。这个成绩超过了当晚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参加同样项目的其他理财顾问的成绩。

接下来,我谈到在 1992 年 1 月 20 日,我写信给巴顿,要求未来的薪资调整。我知道巴顿会把这个要求上报给艾利斯,所以在信的倒数第二页,附上了我从美林达拉斯寿险部门得到的小抄。然而不管是巴顿或艾利斯,还是即将接替巴顿成为伊尼德办事处驻地经理的托马斯,他们对此不是视若无睹,便是袖手旁观,都希望将问题消弭于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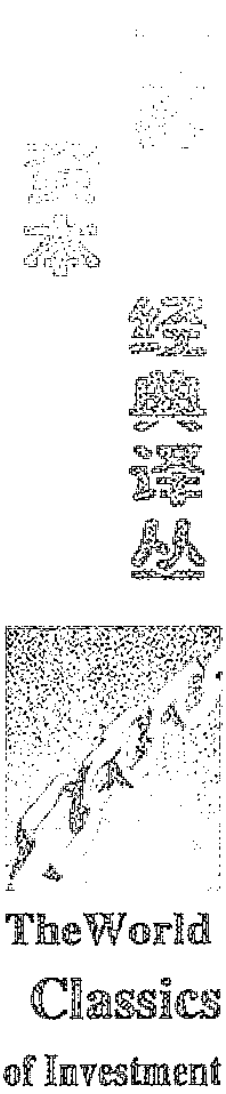
然后,我告诉仲裁小组,在 1992 年 1 月 29 日,托马斯成为伊尼德驻地经理的两天之后,强迫我签署一份确认书,上面注明,假如我再向客户退还佣金,公司将会立即与我解除雇佣合同。我解释说,由于电脑系统出错,我必须退 15 美元给客户,而我查阅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以及美林的规章手册,都没有发现我违反了哪条规定或者政策。

“我建议……让我再说一下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我说,“请牢记,在 1992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环法 CMA 竞赛中,我并未协助管理人员作弊,因为在我所有的新账目表中,签的都是自己的名字。这样他们不得不在那些账户表上将我的名字覆盖,签上其他人的名字。”

“我用我的名字开了一些账户。之后,他们不得不将我的名字覆盖或替换掉。还有,我意识到签订这个有关退款的协议,其实就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因为我没有选择与他们同流合污,没有帮助他们在竞赛中作弊。”

“我还记得,就在几天前,我向主管上报我收到小抄一事。我相信俄克拉荷马市管理层想通过这件事给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伊尼德理财顾问一个下马威。为此,公司不惜在 15 美元的退款问题上,用‘炒鱿鱼’来威胁我。顺便说一句,他们称之为折扣,这一措辞与回扣无异。”

接下来,我谈到了以托马斯的名义和生产编号开立非法州外账户一



事。托马斯只是告诉我，放心去做，不要管其他的。

“在1992年3月5日，发生了什么？”戈尔问我。

“1992年3月5日，我第一次给纽约打热线电话。”我回答。

“那次电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举报艾利斯先生和巴顿先生在竞赛中作弊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和客户的侮辱。我认为，艾利斯在竞赛中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且我觉得我有义务这么做。”

我解释说，我通过热线向全球证券主席帕特里克·墨菲举报了这件事。为帮助墨菲了解作弊手段，我和他又通了数次电话。

我对仲裁小组说：“1992年3月11日，我又给墨菲先生打了一个热线电话，主要讨论如何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使他能够揭发艾利斯的舞弊行为而不危害到告密者。在讨论如何才能在不伤害我的前提下解决这件事时，他想到一些办法，但是都被我否定了，因为我告诉墨菲先生，如果采取这些方法，艾利斯先生会对我产生怀疑。”

“我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会使艾利斯推断出是谁告的密，可能我会因此惹祸上身。例如，我曾经表示不同意使用小抄。以上我所说的就是我跟墨菲先生的通话内容，我还给他寄了一份小抄的复印件，然而小抄寄过去之后，墨菲先生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午饭时间到了，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证人席上。接下来，我谈论到在1992年3月发生的两件涉及巴顿的事。当时，巴顿手头上一个客户的民间财产代理人(CPA)和另一个客户的妻子请求我帮助他们。我答应了，而巴顿知道后却勃然大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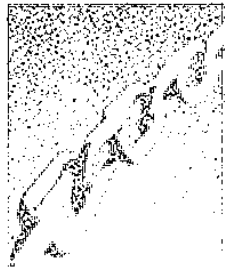
我简要介绍了托马斯是如何销售新加坡航空公司股份的。然后戈尔问我，4月9日发生了什么。我说正是在那一天，我得知秘密热线举报被曝光了，因为托马斯当着迪兰和我的面说，某些员工开始抱怨待遇不公。

“不管怎么说，”我继续说道，“我所确信的是，我并未允许帕特里克·墨菲透露我秘密举报的事，我也确信杰克·托马斯确实跟我对质过这件事。”

戈尔继续询问关于秘密热线举报被公开的事。“你那天有没有再拨打热线电话？”

“有，”我回答，“我马上给墨菲打了电话，并在同一天和他通了两次热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线电话,以讨论发生的一切,并转述了杰克·托马斯在我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最终墨菲先生告诉我,他把整件事都告诉了西区销售部的全国销售经理鲍勃·迪恩。他还告诉我,迪恩向谢曼透露了部分内情,后者告诉了艾利斯,而艾利斯也和托马斯谈过。”

然后我解释,接下来的一天里,巴顿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行政助手打电话来斥责我,原因是两天前我发的那份传真。她训斥我不够专业,而且所作所为存在很多不当之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我为了帮助某对夫妇保留在伊尼德的账户,请求巴顿给我发一份他的控股页,他当时刚好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之后,我找伊尼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询问过,进一步肯定了我的请求是符合公司规定的,所以我给巴顿助手发了一份传真,请求把控股页发给我,并且表示这个请求是符合规定的。之后,我还写信告诉她,希望她在开口争论之前,自己先确认一下。

我告诉仲裁小组,由于热线举报电话被公开,导致托马斯对我的质疑,再加上我对巴顿控股页的请求被拒绝,以上种种都让我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我。我是一名新晋的理财顾问,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一切都是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回报我的却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高管人员的不信任和欺骗;我不认同作弊行为,我不同意在竞赛中作弊,之后为了揭露这些违规行为,我拨打了热线电话,到最后我却成了自作自受。

“那么在 6 月 16 日发生了什么?”戈尔问。

我告诉仲裁小组,正是在那天,我发现美林的登记部门要求艾利斯对我进行背景调查。

“当我知道这些时,我认为这可能跟热线举报的曝光有关系,”我解释道,“我知道,如果他们在我的求职申请中挑出毛病,不管这些毛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他们都会以此作为解雇我的借口。虽然我不确定他们调查我的目的,但是我肯定,跟热线举报有关。”

接下来,我讲述了最终导致我写下那份备忘录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 6 月 29 日。我描述了托马斯是如何质问我有关开设新账户的事,而我又是如何向他解释这件事的。然而,托马斯并没有接受我的解释,还要打电话给客户来证实这件事,但是结果证明我所言非虚。我向仲裁小组描述了我当时的反应。

“然而,他就这样将我定位成一个办事不力的员工,并且采取各种方式

来排挤我。我察觉到他不相信我说的每句话。所以希望你们理解，当时我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否则我只能任由他们欺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调查那些舞弊行为的原因。”

“6月18日那天，与托马斯先生发生争执之后，你有察觉到什么吗？”戈尔问我。

“有，”我说，“那个时候，我真正意识到，我必须采取某些行动来为自己进行辩护，我不能坐以待毙。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事。这些事我亲身经历过，千真万确。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不对的。”

“我从管理层的口中还听到一些其他的话，比如对于我的15美元‘折扣’的过度反应——‘这件事非常严重。假如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你就等着被解雇吧。’”

“乔·巴采尔——今天上午还没讨论到他，他因为试图帮助VMS事件中的客户而被解雇。”

“我想提前援引本案的受害人之一拜瑞·克拉克的遭遇，他也是伊尼德的一名理财顾问，艾利斯先生曾以客户资产引诱他跳槽到美林来做理财顾问，然而他并未兑现这一承诺。从这些事上，我看到了双重标准。我终于明白了，雇员随时面临毫无缘故的辞退，还会时不时地被上级威胁解雇。而且，我知道管理人员做出的承诺是永远不可能兑现的。”

“以上种种都促使我在1992年6月29日给杰克·托马斯写下这份备忘录，从此拉开了我和美林斗争的序幕。美林把这称为‘斯古利宣战了’。”

我继续作证。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我还提到了一些特定的证物，而且讲述了在TGIF竞赛上，麦迪茨和科德尔曾试图说服我，说我收到的小抄很可能是用于模拟测试而不是真正的考试；然而在我提交备忘录后，艾利斯就召开了销售会议，会上他对我表示出了轻视、愤怒的态度。

戈尔的下一个问题是，“然后，在7月28日发生了什么？”

“1992年7月28日，小昆特·艾利斯给俄克拉荷马市、劳顿和伊尼德办事处的所有理财顾问发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任命布兰特·巴顿为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销售经理。”

“现在的重点是，我根据公司的行为准则，向上级报告不道德行为和违规操作，我履行了我的职责。美林采取的即时措施是内部审查经理海尔姆特·麦迪茨的直接干预。然而，布兰特·巴顿是两个主要调查目标之一，调查还在进行，巴顿却已是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二把手。”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当我看见这个备忘录的时候，我感到吃惊；这件事让我措手不及，一个正在接受调查的职员，居然能公开被提升为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销售经理。我终于有理由相信，高层人员的包庇行动从未停止过。正在接受调查的人也能升职，这更让我相信，纽约总部从没想过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我继续述说，我在俄克拉荷马市的沃特福德（Waterford）酒店见到了麦迪茨和诺布克，我很快就知道，这次见面是为了通知我调查已经结束。

“那些天来，我一直备受煎熬，痛苦地等待审查结果。我只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按照公司的准则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然而纽约那边却不想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后来我终于明白，是我自己太天真了，纽约那边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美林的利益。如果在美林的发展道路上存在绊脚石，他们会毫不留情地铲除，而且他们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自从明白了这一点，我再也不期待审查的结果，因为结果肯定不是我所期盼的。”

我告诉仲裁小组，在那次不愉快的会面之后，我感到强烈的失望和受伤，当时我冒出了一个主意——直接向美林董事会举报。

“那时候你已经在美林工作了一年左右，大约是 13 个月，对吗？”戈尔问。我回答，“是的。”

“等等，”戴突然插话道，“你那时候已经当了多久的经纪人？”

“我是从 1991 年 7 月 1 日开始从事经纪人这个职业的。”我回答。

“你到底当了多久的经纪人？你确定你没有在误导仲裁小组？”

“我认为，你在交叉盘问的时候才有机会提问，”戈尔说，“如果你对此有疑问——”

康纳主席打断了戈尔，问戴，“你的意图是什么？”

“我认为，他在撒谎。”

戈尔反驳戴：“我问的是，‘你被雇用了多久，大约 13 个月左右对吗？’而你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有本质的区别。”

戈尔继续问我：“你是从 1991 年 7 月 1 日开始美林的职业生涯吗？”我回答，是的。

虽然我知道刚才只是戴的小把戏，但是当我听到他暗示说，我在误导仲裁小组时，我仍然感到愤怒。

我们继续讨论关于我决定向董事会写信举报的事。“你知道这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吗？”戈尔问。

“是的，我很清楚，”我回答，“我知道这存在很大风险。”

然后，我陆陆续续提到了很多发生过的事，这些事都是我指控美林舞弊行为的证据。

至此，基思·斯古利对阵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仲裁听证会的第一天结束了。康纳主席宣布，听证会于明天上午 9:00 继续。

第二天，戈尔继续他的直接盘问。

戈尔提醒我说，昨天我已经给出，为什么我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会进行包庇的回答了。接下来，我们简要讨论了我写信给董事会的原因和具体寄出时间。之后，我们也谈到我寄给艾利斯的那封信，信是在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实行开放政策之后寄出的。

接下来，我们谈了保罗的问题，就在我写给董事会的信抵达纽约的同一天，他从普林斯顿来到了伊尼德办事处。我告诉仲裁小组，费特纳告诉我的前妻，说有关保罗跟托马斯的谈话，我肯定不乐意听到。我解释说，我从未确切地知道，费特纳所谓的我不愿听到的谈话内容是什么，但是我希望她能公正地披露她知道的一切。不幸的是，她没有。费特纳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听证会上。

然后，我谈到我的前妻从布琳娜德那里听到的话，巴顿说我是世界上最虚伪的说谎者，而且思想扭曲。我还附加了克拉克告诉我的评论，即托马斯把我当成一个毒瘤，他不会让我继续待在办事处，以免对伊尼德的另外两个理财顾问——迪兰和斯通——产生不良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我写给董事会的那封信，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主管们都相当愤怒，这一点从巴顿和托马斯对我的评论就可以证明。毋庸置疑，最愤怒的人应该是艾利斯，因为我写的这封信将他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众。

然后，我们谈到了事情的核心。我开始讲述一些细节，托马斯将他提前准备好的声明念给我听，声明中他污蔑我是一个说谎者，并威胁说要起诉我，而且让我离开他的办公室。

“那时候有多少人在伊尼德办事处？”戈尔问我。

“我确信有四个：杰克·托马斯、迈克尔·迪兰、格雷格·斯通、金·费特纳和我，”我回答，“也可能是五个？四个或者五个。”

“你清楚当时办公室的面积吗？”戈尔继续问。

“你是说平方英尺吗？”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是的，先生。”

“嗯，不是很清楚。我想一下，大约1 000左右吧。可能是1 200。”

“你觉得这个面积是大还是小，或者是中等大小？”

“相当小吧。”

“在一个老板威胁说要起诉你的办公室里，你还能工作吗？”

“我个人认为那是很困难的。我不能。”

然后戈尔问我，对于托马斯的声明有什么反应。

“嗯，首先，坦白地说，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并没有明确地说，‘你因此被解雇了’，所以这里表达的有一些含糊不清。但是我也知道，几天前他告诉拜瑞·克拉克，说我是一个毒瘤，而且不想让我继续待在办事处里，以免祸害迈克尔和格雷格。”

“我很清楚，布兰特·巴顿四处散播关于我的谣言，告诉丽莎·布琳娜德，说我是世界上最虚伪的说谎者，是一个思想扭曲的人。我知道金·费特纳——这个来自普林斯顿的家伙，已经和小昆特·艾利斯、杰克·托马斯见过面了，她将听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前妻：基思可不会喜欢听到这个。所以当我把这些事联系起来，我推测出杰克可能想在此时解雇我。”

预料到托马斯可能会起诉我，我第二天就回办公室收集一些文件，因为我知道，过了 24 小时的最后期限，我可能就拿不回这些文件。我也知道，我可能会为了这次不当的解雇而起诉他们，收集这些文件可能会在将来派上用场。

戈尔继续问我，托马斯的声明文件是不是写在有美林抬头的信笺上。我回答，是的。戈尔问，“美林的内部信笺是不能用于个人目的的，是吗？”

“对。”我回答。

“是否有明文规定，或者具体规定是什么呢？”

“我相信，在主管们的手册上有这条规定。”

“手册上有这条规定吗？”

“是的，这是一条非常明确的规定。”

“所以你对的理解是，这是美林公司的举动，因为那上面有美林的抬头，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议。他打电话叫我去，同时也让迈克尔·迪兰在场，让他充当证人，而且他明确地说，‘这是为了记录。’他强调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表明了，我的经理是真的想解雇我。”

“我相信他当时让你离开办公室，可能是指他的办公室，也可能是指美林办事处，是吗？”

“是的。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含糊不清的。美林争辩说，他所指的是他个人的办公室。我没什么好多说的，但我知道这是他的办事处。对他的评估是以伊尼德办事处的业绩为依据的，正如对小昆特·艾利斯的评估是以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为依据，也正如对其他经理的评估是以他们自己的办事处为依据的。所以，当他告诉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的直觉反应就是离开伊尼德办事处。”

然后我告诉仲裁小组，那时候我的律师琼斯打电话给托马斯，告诉他我没有任何要撤销的，两天里，琼斯和曼德尔用电话和传真讨论当时的形势。曼德尔坚持认为，我没有被解雇，想要我回到办公室。琼斯坚持说，我实质上已经被解雇了，想要我追求自己的合法索赔。结果，美林按照它的观点解雇了我，理由是我擅离职守。

“你在你们的工作手册中，有看到关于擅离职守这一条吗？”戈尔问。

“是的，我看到过。”我回答。

“什么叫做擅离职守？”

“美林对于擅离职守的定义是：连续三天未能到岗而且没有请假说明。我对此的理解是，如果你没有出勤，而且公司不知道你的去向或出勤原因，那才算是擅离职守。公司手册的这一章把它称为严重不端行为。”

“好的，”戈尔说，“你是否有过严重不端的行为？”

“嗯，”我回答，“我觉得这里所谓的‘严重不端行为’，是指你没有任何征兆就缺席，我的意思是，这意味着你玩忽职守，你不事先通知而随意旷工。”

“9月29日之后，美林是否连续三天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出勤？”

“不是。至少，斯蒂芬·琼斯在10月1日与拜瑞·曼德尔联系过。”

然后，我讨论到艾利斯如何告诉俄克拉荷马市的理财顾问关于我缺勤和旷工的事。他没有解释周遭的境况，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这让我觉得自己被摆到了一个不利的位置。

我们再一次回到了保险舞弊丑闻的话题上。我告诉仲裁员，被解雇之后我和哈尔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保险考试的小抄在各个办事处都十分盛行。

关于我和哈尔的对话，戈尔问：“你录下了那次对话？”

我承认。然后戈尔问，是否解雇之前就开始录下每次谈话。我回答说，之前从来没有录过，直到琼斯建议，我才开始录下与知情人之间的谈话。

然后，戈尔和我回顾了我在琼斯帮助下所做的那些努力：向不同的监管者上诉，向他们证明关于我的 U-5 表上‘擅离职守’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简要讨论了之后我失败的求职经历。然后我们谈到巴顿被解雇了，艾利斯驻地副总裁的职务也丢了，而诺布克退休了。

“布兰特·巴顿、小昆特·艾利斯和里奥·诺布克之间有联系吗？”戈尔问。

“有，”我回答，“小昆特·艾利斯是布兰特·巴顿的上司，而里奥·诺布克是小昆特·艾利斯的上司。我认为，大约在 1994 年 6 月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调查接近尾声时，美林就发出了三份解雇合同，也有可能是他们三个人自行辞职的，美林想以此来安抚监管者，让监管者对美林手下留情。”

我解释说，美林对巴顿和艾利斯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很可疑，因为解雇他们的理由似乎并不那么严重，这与解雇这一严重后果相比是不匹配的。

我跟仲裁员分享了我与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调查员狄克斯谈话时获得的信息。包括他觉得这次调查让他大开眼界，考虑到暗箱操作猖獗，他不再那么坚信原有的想法——这些证券公司都采取相当严谨、公正的政策。

我还谈到在与巴顿多次的通话中，得到的一些信息，在这之前，我稍微提到一些其他的事：包括那时琼斯已经不是我的代理律师，还有我已经离婚了。

我说，巴顿告诉过我，艾利斯说他被解雇是为了保全伊尼德办事处，而巴顿觉得美林正在尽力隔离谢曼。巴顿还告诉我：艾利斯让他不要说任何会牵连其他人的话。

我告诉仲裁小组，根据巴顿的话，谢曼命令他操控环法 CMA 竞赛的人数。艾利斯承诺给克拉克和巴采尔相应的资产，但是这些承诺从没有兑现过。

我说，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从未盘问过艾利斯和巴顿，而巴顿告诉我，纽约那边告诉他不要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永不言败，他所做的一切，美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林一定会记在心底。然而，巴顿的结局是，当了替罪羊。

我谈到巴顿写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那封信，他试图让他们收回警告信，在信中他说道，“为了应付基思·斯古利可能的起诉，美林已经试图控制事件的发展并歪曲事实。”

我继续说：“然后在 1994 年 9 月 8 日，我和布兰特·巴顿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美林牺牲了他，把他当作诱饵——鲨鱼口中的诱饵。当事情明朗化了，却把他无情地抛弃了。巴顿说，拜瑞·曼德尔和里奥·诺布克说，基思·斯古利即将提起诉讼，需要他为公司解燃眉之急。”

我告诉仲裁员，当艾利斯和诺布克带他到一个宾馆的房间里，宣布他降职为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的销售经理时，巴顿已经有点怀疑。按照巴顿的话，艾利斯还告诉他，他被解雇的真正原因是当时伊尼德严峻的形势。形式看上去很难好转，办公室里人人自危。

接下来，戈尔和我继续谈论，关于曼德尔在 1993 年 4 月 16 日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和信中不详实的地方。这包括他对星期六上午哈尔帮助理财顾问们通过保险考试的会议所进行的不实描述；以及信中没有如实叙述，美林什么时候不再用画刊公司作为考试出题方。我也出示证据证明以下这些事：曼德尔谎称滥用乡村俱乐部名单的情况并不存在；巴顿对乡村俱乐部经理撒谎；谢曼和艾利斯告诉巴顿如何伪造研究会的费用，等等。

然后，我简要地陈述了美林西区销售部副总裁汤姆·穆勒三世给艾利斯和巴顿的两封警告信，以及美林从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收到的警告信。

接下来，我谈到米哈利写给俄克拉荷马保险部门的那封信。米哈利同曼德尔一样，坚持声称，没有证据表明周六上午的会议属于舞弊行为。尽管他看过我和哈尔的对话记录，仍说我对于小抄事件的指控证据不足。我告诉仲裁小组，米哈利污蔑我，硬说我在那次谈话中误导哈尔说出这些话，但是我相信，当他们看过那个记录后，会明白他是错误的。

然后我说，自从被解雇后，我努力赚钱。希望仲裁小组能理解，我要求美林索赔是为了减轻美林给我带来的损失。我描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和泡沫，以及我在俄克拉荷马市其他证券公司付出的努力和其他一些努力。

我还述说了在 1994 年的下半年，我如何艰难地同即将与我离婚的妻子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她想要独立监护权，而我想要共同监护权。我还解

释,我们两个都咨询了心理医生,并且和我们的心理医生以及各自的律师进行了很多次会面。值得庆幸的是,事情终于在 1994 年 12 月解决了,最终我获得了共同监护权。

然后,我告诉仲裁小组,我被美林不当解雇之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谈到我作为公司新晋理财顾问时的工作记录。按照美林前 10 名经纪人的业绩——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名,我计算如果继续在公司工作,那么我会赚多少钱。作为一位排名前 10 位的经纪人,自我被解雇以来的 3 年,再加上未来可预见的 5 年内,我很有可能每年至少平均赚到240 000美元。

“举报那些违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报仇、泄愤等目的吗?”戈尔问我。

“都不是,”我回答,“我知道,大家可能认为我是出于以上原因才这样做的。我想说,在感情上,我是觉得很失败、很失望。因为我怀着期待来到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希望这里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能让我大展拳脚。但我发现,一切都不是我想的那样。”

“所以,当我在 1992 年 6 月 29 日给杰克·托马斯写备忘录的时候,我想得到一些解释。因为我当时很困惑,我看到了伊尼德和俄克拉荷马市的管理层的某些做法,但他们自己会因为一些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理由解雇员工。我只是想从杰克·托马斯那里得到一些解释,却因此惹祸上身。”

“在你打热线电话之前,你有向斯蒂芬·琼斯咨询过吗?”戈尔问我。

我说,有。“我咨询过斯蒂芬·琼斯,我记得那是在 1991 年 11 月 30 日。我知道美林想让你们相信,我写给杰克·托马斯的备忘录可能只是出于我与布兰特·巴顿、小昆特·艾里斯的个人冲突,但是我想在这里澄清的是,在这些所谓的‘个人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见过斯蒂芬·琼斯了。”

“在和斯蒂芬·琼斯谈过之后,你还在美林工作吗?”戈尔问。

我回答,是。所以戈尔继续问:“你看过那些规章手册吗,或者你遵守他们制定的那些公司章程吗?”我再一次给出了肯定答案。

“所以你遵守了他们制定的所有的公司章程,对吗?”

“在我看来,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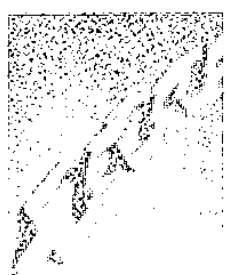
“你所报告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吗?”

“是的。”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这件事的热度没有退却呢?”

“嗯,在第一次调查之后,我在 1992 年 6 月给杰克·托马斯写了那份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备忘录，然而结果正如我向仲裁小组所解释的那样，它很清楚地表明了管理层之间官官相护的包庇行为。事实很明显，纽约那边不想也不愿进行一次有效的调查或者找出真相。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然而在6月29日，我决定孤注一掷地把备忘录给杰克·托马斯之前，我还想试试看事情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因为我对美林所推崇的企业文化仍然抱有幻想。而在美林所谓的企业文化中，明确指出不能容忍任何的违规行为。所以，我向我的经理举报了那些在我看来应该是很重要的不恰当舞弊行为或者违规操作。然而，当我明白包庇行动随之发生时，我决定直接写信给董事会。”

“为什么你被解雇之后才开始录下谈话？”戈尔询问。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要对每段谈话进行录音，”我回答，“我的意思是，基本上我还是希望美林能够给我一个正确的回复。直到斯蒂芬·琼斯跟我说，‘如果你想要得到索赔，你最好记录和知情人之间的每次谈话’之后，我才开始录音的。”

然后，戈尔又回到托马斯与我对质的问题上。“你觉得你被威胁的那一天，托马斯……他的态度如何？”

“他很冷漠，而且充满敌意，”我回答，“当他宣读解雇信时，他的口气是强硬的、挑衅的、恐吓的，并不时抬头看我。”

戈尔进一步问我：“如何证明呢？”

我回答，迪兰曾告诉我那时候他的想法，“哦！”——他都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

“你沉迷于这个案子吗？”戈尔问。

“不，我没有，”我回答，“我没有沉迷其中，然而我一直关注这件事。当我决定把我的备忘录交给托马斯时，我相信公司对我已颇有微词……我清楚这件事有多么严重，但我那时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也担心它可能不会被正确地处理。是的，我想重申一遍：当我在1992年6月29日给托马斯备忘录时，我有点担心他们不会适当地处理这件事。

“但是，我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这件事没有被适当地处理，作为一个坚守原则的人，我还是会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任何我觉得正确的事。所以，才有了那封给董事会的信，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

“你所看见的那些事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对公众有影响吗？”戈尔问，“我是指这些不仅仅影响你，还影响公众吗？”

“是的。”我回答。

戈尔让我解释。“好吧，竞赛舞弊影响了理财顾问服务客户的能力。至于保险作弊，理财顾问在公众面前扮演着博学多才的寿险专家角色，这些是基于他们完成了法律所要求的继续教育，而这种情况下，它牵涉到了一个 25 小时的画刊公司房地产规划培训课程，如果你认真看这个教材，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

“我感觉公众正在被欺骗、被蒙蔽，所有经纪人都宣传自己是专业的，然而他们实际上并不那么专业，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以使他们如期持有寿险执照。所以，我把这当成是对公众的一种伤害。”

戈尔为了“响应”戴在开案陈词上所做的评论，问我：“你是否说过‘如果在听证会后我没有变成富人，大地也会为之颤抖’？”

“是的。”我回答。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的？”戈尔问。

“我没看记录，至少最近没看，”我回答，“我知道自己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单看可能会有些断章取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在 1994 年 8 月我们向加菲尔德县提交请愿书之前不久向拜瑞·克拉克说的这句话。”

“我当时正要提出诉讼，因此肾上腺素飙升，十分兴奋，于是对拜瑞说，‘只要拿到索赔，我就会变得富有。’然而，我的意思是，我们终于要解决这件事了——因为我知道和美林之间的纠纷如果能达成和解，那么索赔的金额肯定不是二三美元这样的小数目，因为我感觉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还有之后的很多流言蜚语对我都很不利，我觉得我的人格受到了攻击。”

“我知道索赔金额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要么我会得到很多赔偿，要么‘大地也会为之颤抖’，显然这都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而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清楚我上诉的内容，里面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这些事都是重大的。其中包括对高管人员包庇违规行为的指控。至于‘大地也会为之颤抖’，我只是为了打比喻才说的，只是为了说明‘我上诉的问题是有些分量的’。”

接下来，戈尔问我：“你是否曾经要求对你的举报进行国会听证？”

“是的，”我回答，“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相信真理。之前我已经说过了，毫无疑问，高管人员包庇了很多违规操作行为，而且我认为其中涉及滥用职权的问题。”

“我认为，虽然他们在员工手册上制定种种政策来吸引人们举报违规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行为,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举报,他们表面上会表现出不能容忍违规行为,但是事后实际上会把问题掩盖起来。坦白地说,我认为这是高管人员严重滥用职权。”

“至于给丁格尔的那封信,戴先生也提到过,我的确对董事会的所作所为做了评价。据我所知,在我给董事会成员寄出的那封信的第一页或第二页中,我提到了第一次内部调查是无效的,不管这是有意的还是因为调查人员能力不够。所以,我期待此时董事会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我认为一个负责的董事会肯定会想到,‘嗯,由于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次我们不能再让同样的高管人员来进行第二次调查。’”

“常识告诉我,如果你让同样的人再进行一次调查,他们是不会自己打自己嘴巴,说自己的第一次调查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只会让自己引火上身。我是指,这样做是违背逻辑的。所以,我觉得董事会应该指派独立的外部人员调查这件事。”

“然而董事会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对于董事会,我感到很失望。我认为这是董事会的失职,因此,我与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交流,鼓励他和他的委员会调查上述我提到的职权滥用问题。”

在直接盘问的最后,戈尔问我:“所以,你觉得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是的。”我回答。

戈尔没有其他问题了。午饭时间,康纳主席宣布听证会暂停,并要求所有人在下午 1:00 回来。

午饭后,戈尔和我回到宾馆,当他问我:“好了,你准备好‘深入虎穴’了吗?”

我知道戈尔是半开玩笑地说这句话的,所以没有回答。我清楚,接下来的交叉盘问将会很激烈,所以我要让自己坚强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深入虎穴”对我来说还不够,我还想要在交叉盘问中获得胜利,“取得虎子”。

看我没有回应,戈尔说:“嗯?”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回答。

正如施密特早前预料的,在交叉盘问环节,戴有点骑虎难下。巴顿跟我说过,戴是出了名的顽强和激进。然而,我也是这样的,我不会由于戴的胁迫策略就退缩。事实上,我相信,我会让戴在下午的盘问中阵脚大乱,我

会让他措手不及的。

戴常常对于自己在玩文字游戏上的天赋感到自豪，但是在我面前，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

我们争论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我在美林的工作时间，这件事之前已经被提及了。

戴继续盘问我与麦迪茨、诺布克见面的事。他问我：“关于 1992 年 8 月 13 日的调查，里奥·诺布克和海尔姆特·麦迪茨给过你建议吗？”

我说，是的。戴继续问：“你是在见面的时候得到建议，并且他们表示会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对吗？”

我再次回答，是的。然后，戴问：“现在，他们实现他们所说的补救措施了吗？”

“没有。”我回答。

“你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有没有事先设想他们可能对你说什么？”戴询问。

“见面前我没有料到，他们会跟我说调查结果的事。”我回答。

戴正在给我制造麻烦。我感觉他正试图引导人们相信，第一次调查是一次有效的内部调查，并且在那时调查还在进行，并没有结束。当然，我给董事会写信举报，是因为我知道，第一次的调查结果是不可靠的。

戴在他的开案陈词中，又一次混淆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美林的文件支持了我的立场，即管理层已经处理了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戴开始对我所做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普遍存在的保险作弊事件——进行提问。谈到我写给董事会的信，戴问：“斯古利先生，你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写这封信的，对吗？”

“对的。”

“而且你写这封信并不是出于你的敌意，对吗？”

“是的。”

“而且你在这里的指控也不是怀有敌意的，对吗？”

“是的，我相信我并未怀有敌意。”

然后，戴谈到格拉汉姆如何把小抄发给我，事实上，那个小抄并不是针对真正的考试，而只是针对模拟测试。他说，当我把信寄给董事会时，我已经知道这些。

我向戴和仲裁小组解释道，我写给董事会的那封信中的指控是这么写

投资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的：“在自治式人寿保险考试中，公司普遍存在明目张胆地使用类似于小抄的东西或其他不正当手段。”

“但是，你在 1992 年 9 月 17 日写信给董事会时，十分确定地告诉他们，‘我有小抄’？”

“完全正确。”我回答。

“信中，你重复提到格拉汉姆女士的话，对吗？”戴说。

“对的，”我回答，“对于她所说的那些话我还有印象，她说，使用小抄是惯例。”

“然而你现在却说，她没有把小抄发给你？”

“不，我说的是，她给我的并不是她所谓的小抄。”

戴继续盘问，他问我关于 1993 年 4 月 20 日给俄克拉荷马保险部门的书面陈述。戴要求我翻到第二页，并且读第二段。这一部分基本上是说：如果美林的高管人员没有判断出理财顾问们使用小抄来应付考试，以通过州立法律要求的寿险继续教育，这种过失应该归结于一个有缺陷的内部调查，或者可以理解为，美林为了避免处罚而不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

“而且你在签署这份书面陈述时，宣誓所言属实，对吗？”戴问。

“嗯，是的。”我回答。

“签署这份书面陈述时进行宣誓，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吗，斯古利先生？”戴问。

“是的。”

“你指控的时候，见过小抄吗？”

“我见过莎拉·格拉汉姆所说的小抄，那才是我真正见过的。”

戴被惹恼了，他问：“斯古利先生，请正面回答问题，你把书面陈述送到保险部门时，你看过小抄了吗？”

戈尔反对：“如果你提到的是其他的东西，而不是我当事人口中所说的小抄，我想问你如何定义这个小抄？”

戴直接把问题转向我，问：“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定义这个小抄的？”

“请允许我想一下。”我请求。

“你说它不是一份正规的文件。你不知道它是否是违法的，但是它被用于某些考试作弊，被用于某些不恰当的场所。”戴说。

“是的，是这么定义的。”我回答。

“好的，”戴回答，“斯古利先生，你现在想改变这个定义吗？”

“不，先生。那是我的定义，但是莎拉·格拉汉姆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不能替她发言。”

“但是，你从没问过她？”戴说。

“是的。”

戴似乎对我的不合作态度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他说：“我直接问你，当你提交这份书面陈述时，宣称存在一个庞大的涉及全美 50 个州的保险作弊阴谋，9 个月后你却承认你没有小抄，你到底有小抄吗？”

戈尔打断他，并提出反对，说戴正在错误地引用我的话。

“那我们就采用你的术语，”戴说，“我并不想错误地转述你的话。”康纳主席问戴，是否要换一种措辞。他说，是的。

戴转向我，问：“你在写给保险部门的书面陈述的这一段里暗示，美林内部可能存在于全国范围内使用小抄的问题？”

“不。”我坦率地回答。

“好的。请你再读一遍好吗？”

“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了什么。”

“我更希望你读出来。”

我再次读了那一段。这次当我读到“这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违反《州立保险法案》的阴谋，可能导致特克索马地区里那些靠不法手段维持寿险执照的理财顾问，将各种各样的养老金保险和寿险产品销售到全国 50 州的各个角落”的时候，我着重强调了“在特克索马地区的理财顾问”。

“你是在指控，至少在特克索马范围内普遍共谋使用违反保险法律的小抄，对吗？”戴问。

“我是在指控，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策划和共谋。”我回答。

戴跟着问：“所以，这就是你的立场吗，斯古利先生？只要你说的是‘似乎’，那么你说什么就不重要，对吧？”

“不，我没有这么说。”我回答。

戴似乎认为我已经掉入他的陷阱，问：“斯古利先生，当你写这份备忘录时，当你把这份宣誓过的书面陈述上交到保险部门时，你是否看见过州立保险考试的小抄？”

“我告诉过比尔·哈尔。”我回答。

这不是戴想要的答案。戴问康纳主席，是否他能得到一个直接的回答。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在交叉询问中，我们可以要求证人回答被提问的问题，”康纳主席说，“戴先生，请你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斯古利先生，你把这份书面陈述上交并且做出你刚才所读的第二页里的指控，那时候你是否见过小抄，就是那份你认为如果使用它就是违反州立保险法规的小抄？”

我回答，没有。

“事实上，斯古利先生，在之后 60 天内的一次与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电话录音中，你承认你不仅从未见过那份小抄，而且你不知道有谁收到过这份小抄，对吗？”

“我必须看一下那份记录抄本，但是你说的似乎是对的。”我回答。

戴把与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对话的记录抄本拿给我。他让我确定那份文件，并且直接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一个特定的段落。

在戴的请求下，我读了抄本里面记载的狄克斯问题的其中之一：“你知道有谁可能拿到过小抄，或者哪些人知道谁曾经拿到过小抄吗？”

然后，读到我对狄克斯的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但这就是我为什么寄希望于比尔·哈尔和盖瑞·薛皮恩的秘书，如果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能那些隐藏在幕后的人会自动显现。”

戴问我：“截止到今天，并且截止到你给州立保险部门写书面陈述，要求他们开始调查的当天，所有你拿来支持你那些异想天开的指控的证据，就只有那份你没有见过的小抄和一份与比尔·哈尔谈话的录音记录，对吗？”

“我不同意你把我的指控归类为异想天开，”我回答，“但是如果你问我，是否只有莎拉给过我的那份小抄和我与比尔·哈尔之间的对话这些证据，我的答案是对的，我只有这些证据。”

关于小抄的使用，我只有这两份直接证据，但是我也证明了或者说上交了四个间接证据：(1)格拉汉姆说小抄的使用是惯例，所以理财顾问们能够顺利通过考试；(2)艾利斯、巴顿和托马斯忽视我在 1992 年 1 月的信件中提到小抄的事；(3)墨菲忽视我在秘密热线电话中提到小抄的事；以及(4)画刊公司执行副总裁告诉我，他发现美林理财顾问和管理人员的保险考试得分很可疑，因为在同样的考试中会有很多相同的得分。

“你的立场是，与哈尔先生的谈话录音带能够支持你对美林违反州立保险法规的指控吗？”戴问我。

“我的立场是，它能够支持小抄被普遍使用的指控。”我回答。

然后，戴让我读在 1992 年 11 月 20 日我和哈尔的一段对话记录抄本。

我把哈尔的话重复了一遍，“嗯，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大概是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前，我听到保险部门的抱怨……而且传言说，之前参加房地产规划研讨会的人员必须重新参加考试，因为这个研讨会已经被判定为无效。然而，当时我已经离开了公司，所以并没有被牵涉到这件事里。如果他们盘问我，我会说这是一个有效的会议，因为之前的所有人都是遵照这个模式获得执照的。小抄在综合办事处早就传遍了。我不清楚他们到底起源于哪里，但是我知道小抄最早曾在塔尔萨被使用。”

“你觉得哈尔先生的这些陈述，就能说明美林管理层违反州立保险法或者知晓违法的事吗？”戴问。

“管理层吗？”我问。

戴说，对。然后，我回答：“可能吧。”

“怎么个可能法呢？”

“因为在写给董事会的信中，我列举了一些在特克索马地区可能经常使用小抄的管理人员的名字。”

“事实上，”戴断言，“你把特克索马地区所有管理人员的名字都列上了，包括保险部门，甚至是保险官员，对吗？”

“我并没有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我回答。

“所有你能想得起来的名字，对吧？”戴说。

“所有我在画刊公司提供的打印文档上可以认出的名字。这个文档可能有 80 页，大概有一英寸厚，罗列了 1990～1992 年间参加过房地产规划培训课程的美林雇员，”我回答，“我列举一些我所认识的管理人员，我认为董事会可能想与他们交谈，以彻底了解小抄的普遍使用。”

戴的交叉询问还在继续，突然，他说：“主席先生，我觉得这两个星期以来，我都快被斯古利先生的文件埋掉了。”

戴在我的文件里埋头苦干了两个星期，不惜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只为替美林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戴是美林的高级幕僚，现在公司正在寻找最快捷的解决方案，因为斯古利的事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暂时，戴结束了对于这个敏感问题的交叉盘问，因为如果这些事被大肆宣传，那么美林的形象是会受到损害的。我并没有像戴所希望的那样合作。事实上，在我的直接作证和我的交叉盘问中，我相信我已经描绘出一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幅相当清晰易懂的画面，这就是，小抄帮助美林雇员们通过持续 25 小时的房地产规划培训课程考试。

戴继续对我进行交叉盘问，他对其他一些相对不重要的管理人员违规行为提出了问题，如环法 CMA 竞赛作弊、滥用乡村俱乐部名单、错误描述市政收益基金、伪造研讨会费用、没有兑现口头的承诺和开立州外非法账户。每一次，戴都试图将这些违规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通过我和后面其他证人的证词，我证明每一项指控都是正确的。

然后，戴告诉仲裁员，美林的调查员是如何认真地对待我举报的那些违规行为的。但是我更清楚，美林在必要的时候很会做表面功夫，对于我，那些高管人员还是很畏惧的，所以，“缓和”就成为了这场游戏的主题。

“当海尔姆特·麦迪茨和里奥·诺布克在 8 月 13 日约见你，并且将调查的详细经过告诉你时，他们对你的举报表示很重视，也很感激，对吗，斯古利先生？”戴问我。

我回答，是的。

“而且他们评价说，你做了一件好事，而且遵守了你应该遵守的规则。”戴继续说，“你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不是真诚的吗，斯古利先生？除了你不同意他们没有解雇艾利斯先生、谢曼先生和巴顿先生？”

“是的，”我回答，“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是不真诚的，是假装的。”

“因为你觉得他们是想要掩盖事实，对吗？”戴问。

“是的。而且事情远非如此。”

“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戴迟疑地说，“到底还有什么事，斯古利先生？”

当我向他确定，我们还是在讨论 1992 年 8 月 13 日那天发生的事时，我继续说：“是的。麦迪茨先生当时两次强调我的 15 美元‘折扣’事件是多么严重。他还说，‘为什么要用备忘录呢？你应该明白，它最终会到达高管层。’正如，‘哥们，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我的意思是，他对于这件事很不满。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那些他们很感谢我之类的话，只是他们在做表面功夫，我觉得是装出来的。”

戴试图“收复失地”，他问道：“你之前证明，由于你自掏腰包退 15 美元佣金给客户而被上级警告一事，是美林解雇你的伏笔，对吗，斯古利先生？我不希望错误地表述你的话。”我回答，是的。

戴再一次尝试，说：“好的。回到 1992 年 2 月，那次事件也是美林管理

全球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层为了解雇你而策划的吗，斯古利先生？”

惊讶于戴歪曲事实的能力，我回答：“抱歉，我认为那次事件是上级对我的威胁，因为我不想帮助管理层在环法 CMA 竞赛中作弊。”

戴厚颜无耻地回答，“但是你确实帮助他们了，斯古利先生。”

“没有。”我回答。即使艾利斯为了在竞赛中作弊，把我的生产编号拿走了，我还是没有遵照管理层的要求，我依然签了很多新账目表。我没有帮助管理层进行作弊。相反，我增加了那次作弊的难度，使得作弊行为更加明显。

然后戴问：“你把 31 页的长信上交到董事会之后，在 9 月 24 日那天，你在纽约和奥雷斯特斯·米哈利、罗伯特·迪恩、拜瑞·曼德尔会面了，对吗？”

“是的。”

“而且他们在会面之后也表示说，很感激你提出这些问题，对吗，斯古利先生？”

“是的。”

“你相信他们吗，斯古利先生？”

“不，我不相信。”

“罗伯特·迪恩是否在星期一上午给你打过电话，想要了解你的下一步行动，那天是 9 月 28 日？”

“是的。或者至少是想试探一下我的底线。”

那次星期四我们在纽约会面后，迪恩在星期一上午就给我打电话，我相信他打电话的目的是想要知道：如果我认为美林想继续包庇这件事，那么我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戴试图让仲裁员相信，迪恩是我的保护神，但事实并非如此。

此时，康纳主席宣布听证会下午休息 20 分钟。当听证会重新开始时，克拉克将打断我出庭作证。戈尔不得不尽快安排克拉克出庭，因为他不久要出差去国外。

拜瑞·克拉克：托马斯说斯古利是一个毒瘤

拜瑞·克拉克很清楚我所举报的那些违规行为，而且也很了解艾利斯。在一些基本盘问之后，戈尔问克拉克关于巴采尔的近况。克拉克告诉

仲裁小组，他不认为巴采尔会对巴顿隐瞒那些他给保诚保险公司的老客户寄出的信。因为事实证明，包含那些信件的 UPS 信箱就在巴顿办公室的外面，相当醒目。

克拉克解释，他对于巴采尔被解雇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很是不满，因为巴采尔这么做都是为了帮助客户谋取最好的利益，而等待他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克拉克的证词证实了我对于美林的指控。他证明，巴顿曾向他和我说过，正在代理一只名为“市政收益”的基金，并宣称这是一只可以预先偿付的基金。克拉克告诉仲裁员，艾利斯承诺给他 50 万～100 万美元的客户资产也没有兑现。

克拉克作证关于环法 CMA 竞赛作弊事件，说他清楚，艾利斯和巴顿让他把他的名字签在由另外一个理财顾问设立的州外账户上是不对的。

克拉克解释说，在环法 CMA 竞赛中，上司让他在环法 CMA 竞赛中作为在册理财顾问，签署由我和迪兰开设的那些新账户，并从生产信贷中赚取了 2 万美元，但是这个业绩在之后被剥夺了。结果，克拉克不得不去俄克拉荷马市，要求他们兑现自己应得的客户资产。艾利斯说，他原本以为克拉克无权进行生产信贷，但是在克拉克说他有这个权利之后，艾利斯口头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见完艾利斯之后，我回到伊尼德的第二天，布兰特·巴顿告诉我，昆特只是要试探我，是否会为了拿到这些资产而斗争。”克拉克证实道。

克拉克的证词支持了我关于“伊尼德理财顾问本应该从环法 CMA 竞赛中获得报酬，却没有兑现”的指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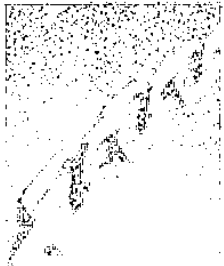
克拉克还说，他听到艾利斯在俄克拉荷马市理财顾问和员工会议上诋毁我的声誉，导致麦迪茨拜访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

戈尔告诉克拉克，“你能回想一下杰克·托马斯对于基思的评论吗，大概是 1992 年 9 月 24 日他在纽约的时候？”

“我能确定的是，杰克说过，他很讨厌基思这个家伙，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不想让基思祸害办事处的其他人，而且他还提到格雷格·斯通和迈克尔·迪兰。”克拉克回答。

之后，戈尔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问克拉克，“当你和杰克·托马斯讨论之后，你在 1992 年 10 月 2 日和斯古利先生通过电话——我将从抄本上重现这次谈话。上面写着：基思说，‘杰克是怎么说的？’而你说，‘你知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道,他是一个毒瘤,而且我不想让他在这个办公室继续待下去。’斯古利先生说,‘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他是指私人的办公室还是整个公司呢?’你说,‘哦,不,他是指整个伊尼德办事处。’”

“当托马斯先生对你说这些时,你有印象吗? 换句话说,他是打算把斯古利先生赶出伊尼德办事处吗?”

“还有一些事——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具体是什么,”克拉克回答,“就是指基思之前写的那些信。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给董事会的信,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但是杰克确实是这么说的,而且他对这件事很生气,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但是既然我知道了这件事,我就不想让他继续影响迈克尔和格雷格。’”

随着克拉克证词的继续陈述,戈尔问:“你知道当斯古利先生被开除或者因其他原因离开办事处时,小昆特·艾利斯在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是怎么宣布的吗?”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克拉克回答,“我是听两三个不同的人说的,他们说他是擅离职守,主动放弃这份工作的。”

“你是否和布兰特·巴顿有过一次对话,期间他告诉你,小昆特·艾利斯没有当上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驻地副总裁,这件事预示着斯古利先生已经抓住了布兰特先生和艾利斯先生的把柄?”戈尔问。

“是的,他说过。”克拉克回答。

“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戈尔继续问。

“他只是打电话说,昆特被解雇了或者可能调离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克拉克回答,“而当布兰特打电话给他,他说昆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哎,他终于抓到咱俩的把柄了。’”

“你知道俄克拉荷马市雇员对于艾利斯先生宣布辞职的反应吗?”戈尔问。

“具体反应不清楚,”克拉克回答,“我也只是道听途说。有两个人说艾利斯的辞职简直是大快人心。但是,我自己没有亲眼见到。”

“有人说,大家甚至鼓掌欢迎——”戈尔询问。

“嗯。”克拉克打断他。

“是当艾利斯先生说他将不再在那里工作时?”戈尔继续问。

“是的。”克拉克说。

戈尔问克拉克对于我的看法,“基思专业吗?”

“很专业。”

“他工作努力吗？”

“我认为他相当努力。”

“他的人品呢？”

“嗯，不错。但是我们并不是很熟的朋友。有一次我妻子和我去看他儿子的一场球类比赛，我们和他只是在这次社交活动上有过交谈。后来还一起吃过几次饭。”

“他工作时很好相处吧？”

“当然了。”

“你觉得他在伊尼德办事处有发展前途吗？”

“很有前途。”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呢？”

“他跟同事相处得很好，而且我认为他很直率。我觉得同事们都很喜欢他的处事方式。”

戈尔又问了克拉克几个问题。“你觉得斯古利先生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理财顾问吗？”他问。

“在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克拉克回答。

“他给过你这种印象吗——毫无缘由地给美林制造麻烦？”

“没有。”

“他只是想要在一个好的环境中工作吗？”

“对于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我认为这是我们职员都想要的。”

“你觉得他对于管理层舞弊行为的举报，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只是想要整顿公司的不良风气，保证大家能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吗？”

“对的，而且我认为他的做法是合理的。”

在这些问题之后，戈尔结束了对于克拉克的直接盘问。康纳主席告诉戴，他可以开始交叉盘问了。

戴很快指出了，托马斯在环法 CMA 竞赛期间担任伊尼德办事处的驻地经理，这样就可以使托马斯推卸了关于管理职员人数造假事件的责任。戴还指出，托马斯并没有涉及我的其他一些指控。

戴对克拉克说：“所以，你意识到托马斯先生与斯古利先生之间唯一可能的冲突是……我想让你注意一下这边的显示屏，我们已经谈过其中六点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了。托马斯先生可能面临的唯一冲突就是关于使用小抄的指控,对吗?”在显示屏上所显示的是我大多数指控的概要。克拉克还没来得及回答,戴就继续辩护了。

戴没有提到在我写给董事会的信中,我指出托马斯在其他区域进行违规操作,包括违规开立州外账户、威胁说如果 15 美元“折扣”的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要解雇我,以及他包庇环法 CMA 竞赛作弊的事。据戴所说,对托马斯的一切指控都是我污蔑的,我还污蔑他跟小抄事件有关。

然后,戴问克拉克一连串问题,来支持他所宣称的伊尼德办事处对我并没有敌意。然而,克拉克在 9 月 28 日——也就是托马斯与我对质的两个星期前,就已经被调到美林威奇塔办事处了。他不能为这段关键时间作证,除了在 9 月 24 日他拜访伊尼德办事处时,知道托马斯很生气,并且听到托马斯说我是一个毒瘤的评论。

戴问了克拉克最后一个问题。“重申一下,我并不想搅浑这件事,我只想要一份清楚的记录。对于你来说,在托马斯先生的评论中——‘我们不想斯古利先生对斯通先生和迪兰先生产生不良影响’,考虑这句话,可能只是他简单地不想让斯古利指控他参与保险考试舞弊这件事影响到他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是的,先生,也可以这么理解。”克拉克回答。

克拉克不知道托马斯宣誓的证词,也没有见过我在 9 月 28 日写给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我不明白克拉克为什么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根据托马斯的证词,他不可能在 9 月 24 日(当他对克拉克说毒瘤评论时)就知道对于他是‘作弊事件策划者之一’的指控。此外,当克拉克说托马斯在 9 月 24 日很生气,之后托马斯作证说,他是直到 9 月 28 日看到我的信时才勃然大怒的。然而,在我看来,戴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清楚托马斯在 9 月 24 日就知道到我给董事会写信举报的事。

当戴结束了对克拉克的盘问,戈尔希望能够重新主导盘问。“除了托马斯先生,是否其他人也对斯古利先生表示不满?”戈尔问克拉克。

“嗯,我从未见过他和小昆特·艾利斯说话,”克拉克回答,“当布兰特回来的时候,气氛也是挺冷淡的。因为布兰特虽然去了俄克拉荷马市,但仍保留了他手头的客户。所以,平常他几乎一个星期就会回来一次,甚至是一两天,就跟从未离开过一样。基思和布兰特·巴顿之间的关系确实不那么融洽。”

“所以，有可能是布兰特·巴顿给斯古利先生制造了这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戈尔问。

“是的。”克拉克回答。

“1992年9月24日那天，当托马斯先生向你描述对于斯古利先生的感觉时，是不是已经对斯古利先生不满了？”戈尔问。

“是的，他当时很生气。”克拉克回答。

“根据他同你说的那些话，是否能推测出杰克·托马斯想要解雇基思·斯古利先生？”戈尔问。

“有可能。”克拉克回答。

戈尔又一次从对话的抄本中宣读了我和克拉克在1992年10月2日的对话：“斯古利先生问，杰克是怎么说的？而你说，他只是说，‘嗯，你知道，他是一个毒瘤，而且我不想让他在这个办公室继续待下去。’斯古利先生说，‘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他指的是自己的办公室还是整个公司呢？’你说，‘哦，不，他指的是整个伊尼德办事处。’”

戈尔继续问：“这是你与杰克·托马斯的谈话内容吗？”

“是的。”克拉克回答。

戈尔对克拉克盘问完了，但是他还没有辩解。戴想要重新对克拉克进行交叉盘问。

在盘问了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问题之后，戴问克拉克关于托马斯在9月24日对他叙述的那些评论。“有没有可能他只是想表达其他的想法，可能你只是对他打电话向你诉说关于保险考试小抄……小抄……不好意思……是使用小抄的保险考试作弊一事感到厌烦呢？你觉得是否有可能，他只是不希望斯古利先生影响斯通先生和迪兰先生，让他们也觉得他违反了州立保险法，管理失职了？”

“我想要澄清一下，”克拉克回答，“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杰克·托马斯会心烦。我只是知道他说过什么，他说他很生气、很烦躁，另外他不想让斯古利对这个办公室产生不良影响。”

之后，戈尔想要再一次转换话题。

“克拉克先生，不管你清不清楚，你的对话已经被录音了，不管你是或不是，当你跟任何人讲述这件事时，你确定是在讲述真相吗？”戈尔问。

“是的，先生。”克拉克回答。

“谢谢你，”戈尔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仲裁员巴恩斯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克拉克：“克拉克先生，基思是否曾经找你商议过，或者向你征求过意见？或者总的来说，你们之间的谈话都是围绕这件事，包括事态的严重性等？”

“是的，先生，我们确实在一些场合聊过。”克拉克回答。

“请陈述一下。”巴恩斯请求。

“好的，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是一起违规操作案件，”克拉克回答，“我不想自己被牵涉进去，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我也不想对现存的制度提出任何质疑。”

“这个制度是你们工作的那个制度吗？”巴恩斯问。

“是的，所以我不想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来做这件事。”克拉克回答。

克拉克的出庭相当重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克拉克证明了托马斯在9月24日那天对我的态度——那天他确实很烦躁、很生气。而且事发的前两天，一个叫保罗的人在伊尼德和艾利斯、托马斯会过面。事发的前四天，托马斯可能就已经知道我在9月17日写信给董事会的事。第二，戴向克拉克暗示，托马斯在知道了9月24日被控告参与保险作弊丑闻之后的反应；而根据托马斯之后的证词，他是在9月28日才知道这些指控的。

斯古利继续战斗：不会有暴力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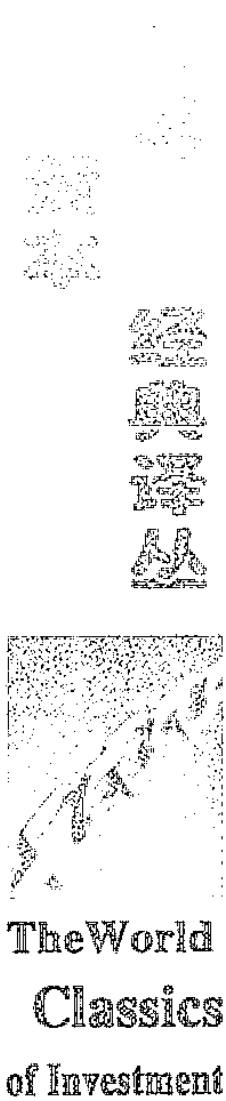
克拉克作证结束之后，戴重新开始对我进行盘问。康纳主席提醒我还是得宣誓，然后戴开始盘问。

他问了那封我写给董事会的信。“现在，斯古利先生，你在寄给董事会的信中指出托马斯先生的名字，连同其他人——让我们持续关注托马斯先生的问题。基于你手头现有的证据，即你所提供的那些证词，当你向托马斯先生的老板指控托马斯时，你认为他会由于你的指控做出一些敌对的反应吗？”

“我认为托马斯先生可能会对这个指控产生敌对的反应，对吗？”我回答，“但是，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

“你不关心这些，对吗？”戴问。

“不，我只是关心真相。”我回答。



“真相是——”

“我想问一个问题，斯古利先生，”戴打断我，没让我回答，“事实是托马斯先生知道或者说参与策划小抄事件，对吗，斯古利先生？”

“对的。”

之后，戴问：“现在，斯古利先生，你会写下9月17日那封信，不仅仅是因为你觉得被迫要写这封信，而且你也想要为自己被不当解雇讨回一个公道，对吗？”

“当然不是。”我回答。

“你不计后果地提出这些前所未有的指控，并且你在写给董事会的那封信中举报托马斯先生，都是为了激怒他，想逼他在此做出反应，对吗？”

“不是的。”

“那么你在意托马斯先生的反应吗，关于你指控他在你所谓的小抄共谋事件中的反应？”

“我没有说过我是为了激怒托马斯。我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只是想把事实讲出来，而且即使现在在法庭上，我仍然坚持我写给董事会的那封信中所说的都是事实。”

“你就不在意你在9月17日信中提到的那些人的反应？”

“抱歉，戴先生，我在乎的是真相，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我相信我在信中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之前的说法。而且我也没忘记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很乐意跟你回顾、剖析我说过的那些话。”戴没有接受我的提议。

“你仅仅根据一份你从未见过的小抄，就向美林董事会指控托马斯，说他知晓或者参与了这个全国范围内违反州立保险法律的阴谋，你考虑过这将会对他带来什么影响吗？”戴问。

“我再重申一次，我不能说我不在意这些，但是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回答，“我只是想讲出真相。”

法院出示了我记载的与克拉克在1994年6月的通话记录，戴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提问中，将表演一出令人震撼的戏剧。

戴让我读其中特定的一段摘录。我读道，“我在7月告诉拜瑞·克拉克，我要么变成一个比较有钱的人，要么‘大地也会为之震撼’。”

“如果这次审判之后你没有成为富人，难道意味着你会做出一些暴力行为吗，斯古利先生？”戴问。

“暴力？”我问。

“是的。”

“我不理解你的问题。”

“嗯，在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大家会想到一些什么。”

“我明白，”我回答，“不会有暴力行为。”

即使戴已经听过我的解释，但他还是再一次提起了这件事。我已经说过，这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只是为了暗示我将要对美林提起的诉讼是有根有据的。戴却试图将我的一句话跟 5 个月前艾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大厦的爆炸案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话我早在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发生的一年前就说了——但这跟戴的意图是无关的。

下午的休庭时间快到了，即使戴对我的交叉盘问差不多快结束了，但是他仍多此一举地表示他累了，希望今天的听证会能够到此为止。康纳主席同意了并且宣布休庭，明天早上 9:00 继续开庭。

对于美林的律师来说，今天似乎是漫长的一天。尽管戴想方设法地绕过那些重要的事实，但他还是不能如愿地把我击垮。因为，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证人。

当大家正要离开会议室时，戴走到我面前，我们在门口碰面了。他用一种真诚的、称赞的口吻对我说：“你今天表现得很好。”

“谢谢，”我回答，“我认为你是不会放弃这场战斗的。”我们握手。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这场战斗中不死不归的战士。

第二天早上，康纳主席在听证会开始时，就让戴把一个新证人介绍给诉讼双方。他是艾伦·罗克勒，美林的专家证人。然后戴回到对我的交叉盘问上。他只剩下几个问题了。当他问完时，戈尔希望能重新主导盘问权。

“莎拉·格拉汉姆怎么称呼她给你的那份文件？”戈尔问我。

“她定义为小抄。”我回答。

“所以你也这么定义它？”

“你是问我，为什么这么定义它？”

“是的。”

“我是因为她这么定义，我才称它为小抄。”

“你后来是否在别处确定过小抄的使用或者存在？”

“是的。”

“哪里？”

世界
资本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在 1992 年 11 月 20 日和比尔·哈尔的通话中。”

“据你所知，美林要求参加保险考试吗？”

“是的，要求的。”

“据你所知，要获得销售保险的资格就必须参加保险考试吗？”

“是的，必须的。”

“美林向你展示过吗？”

“展示过。”

“有些理财顾问被要求重新参加保险考试，对吗？”

“是的。”

“那是由于你举报小抄事件所导致的吗？”

“是的，这是由于在考试时，对小抄或者其他不当手段的使用。”

“有人在画刊公司说过任何关于之前美林要求重考的话吗？”

“有，有人说过。”

“谁？”

“唐·菲舍尔先生。”

“他说什么？”

“他就是那个提供 77 页电脑打印文件的人，名单上列出了 1990 年到 1992 年 8 月 26 日参加考试的全部美林理财顾问。而且他一得到这份名单，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我分数看起来非常可疑。”

“这件事进一步证实了你的想法，关于可能使用小抄或者其他不当的方法参加考试，对吗？”

“是的。”

戈尔继续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关于环法 CMA 竞赛作弊、不当地使用乡村俱乐部名单、伪造研讨会费用，以及不当地开立州外账户。

回到和托马斯之间的事上，戈尔问：“杰克·托马斯有以任何方式收回那封信吗？”

“是他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写的那封信吗？”

“是的，先生。”

“不，他没有。”

“他是否向你表示过，他不会起诉你？”

“没有。”

“美林向你提供过任何可以让你免于他的诉讼的保护措施或者调任指

令吗？”

“什么都没有。”

“当他们想要再次雇用你时，没有向你提供任何保护措施吗？”

“没有。”

“如果你回去的话，美林是否会为你安排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

“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从现实考虑，美林是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的。”

戈尔问完了；然而，我还没有完全解脱。戴想要再次对我进行盘问。

“你还没有证明，在你离开之后，你没被多次请求回去工作，对吧？”他问我。

“曼德尔先生确实跟我说过几次，想让我回去工作，我认为，如果你问的是这件事，那么确实是这样的。”我回答。

戴没有问题了；然而，现在戈尔又有新问题。

“曼德尔先生没有说，如果你真的回去工作，托马斯先生不会再起诉你吗？”他问。

“他没有。”我回答。

“他也没有说过，托马斯不会再是你的直接主管、经理、老板，或者是其他的吗？”戈尔问。

“对，他没有。”我回答。

最后，我作证结束。我很开心终于结束了。我知道戴已经竭尽全力想要击垮我，想在强压之下瓦解我，摧毁我的个人信誉。面对戴，我一点都不轻松。事实上，正因为是他负责这个案子，我才感到了空前的困难。

盖瑞·薛皮恩：我可以向你保证……

接下来出庭作证的是盖瑞·薛皮恩——美林驻达拉斯的前任保险专家。哈尔五天前告诉我，在薛皮恩的任期内，保险作弊愈加猖獗。我的律师就曾传唤过薛皮恩出庭作证。但是在见过他之后，发现他可能并不想替我作证，就决定不让他出庭了。然而，戴想要薛皮恩出庭作证，所以他现在是美林的证人。

可以确定的是，薛皮恩现在替潘恩·韦伯工作，但是之前在 1982～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1993 年这段期间，他是在美林工作。当我听到薛皮恩在 1993 年离开美林时，我很好奇地想知道，他的离开是否跟我举报违规操作那件事有关。

薛皮恩告诉仲裁小组他和哈尔曾经是同事，一起在美林的达拉斯地区工作，不过在不同的办事处。当时，他们对换了办公室，哈尔去了圣哈辛托——正是薛皮恩当时的工作地点。关于圣哈辛托，当初哈尔告诉我，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知道一个有名的经纪人会采用不当的手法参加保险考试。而在 1991 年 11 月，当格拉汉姆给我她所谓的小抄时，她刚好就在那里工作。

“你是否提供过小抄、允许过作弊行为或者参与过小抄的使用，以便美林证券、保险代理商能够顺利通过得克萨斯州保险法律所要求的考试？”戴问薛皮恩，“你理解我的问题吗？”

“我理解，而我的答案是，绝对没有，”薛皮恩回答，“我能够在这里详细解释一下吗？”

“好的。”

“‘小抄’一词是一位年轻女士针对得克萨斯州保险执照模拟测试使用的一个术语。那位女士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她并不清楚她在说什么。虽然那是一位漂亮的女士，但是其工作业绩相当糟糕。”

“比尔·哈尔认为，当你受雇于美林时，你违反了得克萨斯州的保险法，对于这项指控你否认吗？”

“我否认，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这样指控我。我不相信哈尔先生会说这些话。而且这些事从来没有在得克萨斯州发生过，也从没在其他办事处发生过。”

“而且就你所理解的，你手下的秘书或者其他书记员从来没有违反过州立保险法，她们从未帮助或者默许过任何违反州立保险法的人，对吗？”戴问。

“对的。对于我的行政助理和我的秘书，他们没有任何途径去做这些事。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些。”

我相信，薛皮恩说他的行政助理和秘书没有途径或者没时间协助作弊，那是在掩盖真相。因为按照哈尔向我描述的作弊方式，做起来并不是很困难，而且也不是很耗时间。所以，我认为薛皮恩在撒谎。

“薛皮恩先生，请你回顾一下斯古利先生的指控，在你受雇于美林的这段时间，在美林的州立保险考试中，是否真的存在公开的、厚颜无耻的作弊

行为？”戴继续问。

“根本没有。”

“有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据我所知，没有。我所做的就是监管和检查并且确定考试顺利进行。这是开卷考试。每个人都能考 100 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作弊？而我所知道的就是根本不存在作弊。现在，如果发生了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见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作弊。”

薛皮恩又错了。房地产策划培训课程考试不是开卷考。薛皮恩混淆了真正的考试和模拟测试，模拟测试的答案都在课本上，只要在红色答题纸上把答案选上就行了。

戴结束了对薛皮恩的盘问。轮到戈尔进行交叉盘问。

“薛皮恩先生，你提到过的那位在达拉斯的漂亮女士——有没有可能是莎拉·格拉汉姆？”戈尔问。

“是的，就是莎拉·格拉汉姆。”

“莎拉·格拉汉姆是谁？”

“莎拉·格拉汉姆是一个在美林工作了 20 年的职员，很漂亮。她从一个部门升迁到另外一个部门，而不是被解雇。虽然她很漂亮，但是不从事任何实务性的工作，因为她对寿险一无所知。”

然后，戈尔问薛皮恩，是否有可能是莎拉·格拉汉姆在考试前给我发了那份被认定为小抄的答案。

“是的，先生。她经常这么做。我可以想象这件事应该发生过。”

关于哈尔在考试会议上帮助那 8 名理财顾问概述每道考题答案这件事，戈尔说，“那些参加考试的人员都在宣誓书上宣誓，考试时不借助任何外来辅助手段；你清楚这件事吗？”

“不清楚。”

“如果要求他们签订这份宣誓书，那么他们就必须靠自己来完成这次考试，对吗？”

“是的。”

“那么如果你事后发现有些人提前看过卷子，然后把答案给考生看，之后考生又签订了宣誓书，说他们考试时不会采用任何方式作弊。你认为是否应该告诫他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或者提醒他们应该注意一下？”

“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比尔·哈尔开了一堂课并且通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过上课把答案给那些经纪人，那么他们肯定是在他把答案给他们之前，都已经知晓答案了。”薛皮恩回答。

我对于我现在所听到的一切感到十分怀疑。如果那些理财顾问——5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市、3个来自塔尔萨——在哈尔给他们答案之前就知道答案了，为什么之后他们以及艾利斯和哈尔还要在周六上午选择在俄克拉荷马市与塔尔萨之间的小城镇见面呢？

“我从你的证词中感觉到，你跟比尔·哈尔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戈尔问薛皮恩。

“比尔·哈尔……我跟他的关系并不差。就工作关系来看，我们之间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没有一起参加过社交活动。”

“我知道。所以比尔并不差，对吗？”

“比尔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太聪明了，而且他的聪明往往用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对我没那么好言好语而已。”

这些过后，戈尔没有其他问题，而戴也不想重新行使盘问权，所以薛皮恩可以离庭了。

在听证会结束的三年后，我才知道薛皮恩已经被潘恩·韦伯解雇了，据内部调查显示，是由于他违反了公司的政策：差旅费报销问题、收受礼品、出席一些未经允许的外部活动。根据我所了解的，我知道薛皮恩不够诚实，而且我也清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丽莎·布琳娜德：被误认的身份

戈尔传唤的下一个证人是丽莎·布琳娜德。布琳娜德在1991年的后几个月，在美林伊尼德办事处替巴顿工作。

布琳娜德证明，巴顿本应该只能使用一次乡村俱乐部名单，但是他没有兑现诺言。然而，他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他尽量减少名单的滥用。

布琳娜德还证明，她在伊尼德办事处曾听到巴顿、艾利斯还有谢曼的一次谈话，当时巴顿告诉他们，他已经从乡村俱乐部经理那边弄到名单。布琳娜德说，巴顿还向艾利斯和谢曼吹嘘他是如何使用那份名单的。

戈尔问布琳娜德，她是怎么看待我的，她是否认为我是一个专业并且

容易相处的同事。她回答说,是的。

然后,戈尔宣读了我和布琳娜德在 1992 年 10 月 1 日的一次对话记录,当时她告诉我,巴顿告诉她,我是世界上最虚伪的说谎者,而且思想扭曲。不幸的是,3 年后,她已经不记得她当初曾告诉过我,巴顿当时对她说的这些话。

戴只问了布琳娜德一个问题。他问她几个月前是否见过他公司的某个人。她说,没有。戴说,那可能是把她跟其他人混淆了,之后戴就没有再问其他问题。

我怀疑戴口中的那个人是费特纳,戴公司的某些人可能去见过她。费特纳是一名行政助理,她的办公桌正好在托马斯的办公室外面,那天托马斯会见艾利斯和保罗时,她刚好坐在自己办公桌边上。费特纳没有回应传唤,所以并没有出席我的仲裁听证会;而我想知道,是否在几个月前,美林的律师已经提前拜访过她,并威胁恐吓她,从而阻碍她的出庭作证。美林绝对有这个动机来阻止费特纳出庭作证,因为她的部分证词会推翻美林所谓的在董事会收到举报信前后,俄克拉荷马市伊尼德办事处没有出现过保罗这个人这一说辞。

比尔·哈尔:小抄绝对存在

我方的下一个证人是比尔·哈尔,他是美林达拉斯区的前驻地保险专家。哈尔有很多直接证据能够指控薛皮恩,他是哈尔以前的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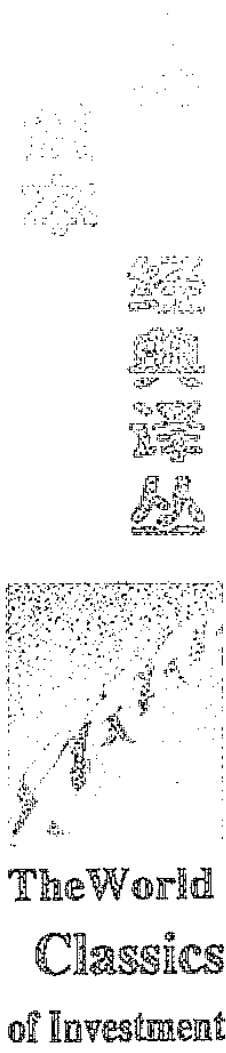
哈尔简要介绍了他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然后告诉仲裁小组,在 1990 年 8 月~1992 年 6 月期间,他作为一名房地产策划专家(EPS)替美林工作。

戈尔要求哈尔描述一下在他离开美林期间,美林的工作环境。

“我替美林工作了 2 年时间,我在 6 月份被解雇,”哈尔回答,“我认为我的工作成绩是优秀的。我在公司过去一年的业绩排名第一,没有人达到过。所以我的工作成绩是卓越的,但是我却被解雇了。我真的不能理解。”

“好的,”戈尔说,“你在美林工作期间,是否参与过继续教育保险考试的相关事宜?”

“是的,”哈尔回答,“EPS 们就是负责继续教育的最新动态追踪、培训、授课,确保所有理财顾问经纪人能够拿到保险执照,以便他们能够开始销



售那些理财产品。然后在此基础上，确保美林的保险产品及其衍生品能够遍布整个保险领域。”

“证券业务和寿险业务，哪个更受重视？”戈尔问。

“嗯，显而易见是证券业，”哈尔回答，“我们被多次告知，在公司总收入中，证券业务平均占 97%，而保险业务仅占 3%。自然而然地，对于保险业务，管理层不会给予我们太多的支持或者项目。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发展、培养我们的经纪人，让管理层多吸收他们，邀请我们加入他们与客户的谈判。”

戈尔接着问道：“那么你是如何帮助他们继续持有资格证的？是给他们提供学习资料还是用什么其他方式？”

“我的每位员工都有一份记录，上面记载着持有和未持有资格证的人员，”哈尔回答道，“我们不断地寻找有资格证的和没有资格证的人，以及那些来重新注册的人，找出其中满足学分要求的人，以及不合法的、需要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学分的人。然后我们联系这些人，告诉他们，必须在某个截止日期前获得多少多少学分，设法为他们安排函授课程，或者说服他们参加其他形式的课程，从而获取这些学分。然后，我们就可以记录每个人的学分，并不断更新，因为我们有一个追踪系统。”

“那么你们接触的这些经纪人，他们是不是总忙着卖证券呢？”戈尔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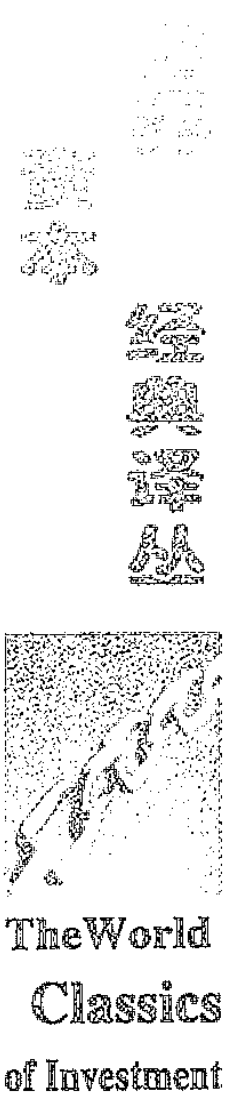
“是的，”哈尔说，“要做出业绩来，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所以，除非你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你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和他们接触。他们太忙了。”

“那么保险经纪人的继续教育被放在了次要地位，可以这么说吗？”

“对。”

“除了获取学习资料，他们找你还会有其他目的吗？”

“我当初进入美林时，受雇于快捷中心(Central Expressway Office)的一个经理，”哈尔说，“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被调到圣哈辛托的办事处，它位于达拉斯市中心，是最大的办事处。我们的做事方式是这样的，找大经纪人谈话，和他们一起工作，然后找出解决方案。按照这种方式，我们拉到了圣哈辛托一个最大的经纪人。有一次，我去找他——因为他没有回复办事处发出的提醒通知，他向我暗示以前的员工会帮他处理好一切。我就问他，‘你的意思是？’他说，‘嗯，他们会处理好这一切。我猜他们会为我们代填答题册，或是采用其他什么方法。’我那时的处境很尴尬，因为我必须和



大经纪人搞好关系，不能触怒他们，否则就没有生意，而我完全是依靠佣金生活的，但是他说的情况显然违背了法律。我相信他觉得这很正常，并不违法，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经纪人，非常有道德素养。我跟他解释说，这不是正常情况，我们不允许这么做，这是违法的，会让我们都丢掉执业资格。他必须参加课程，但我会根据他的商业计划和我们在资产规划领域的目标，帮他选课。就是那时候，我意识到除了正规途径，还有其他路子可以获得继续教育培训的学分。”

“你有没有继续调查此事？” 戈尔问。

“嗯，没有。因为说实话，如果行业文化是那样，我还是有责任做对的事。所以我找经理谈话，我说，‘这件事我没有完成。那位经纪人给我施压了，但我不能那样做。’我跟他解释，这会危害到每个人，而事实上我们将通过合法途径做事，他表示支持。那时，俄克拉荷马市的业务也归我管，我去找昆特，和他坐下来谈，那一幕就像发生在昨天。我清晰地记得，他表示100%支持我，他说，‘我们不想有任何麻烦，我们不会那样违法操作的。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会100%支持你。’我必须获得这些经理的正式支持，什么事都是围着他们转的，他们是公司里的上帝。所以，我不希望他们因为不知情而蒙受损失。因为信心满满，所以我去找那个经纪人说，‘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但是我们以后会这样做事。’”

“你后来懂那位经纪人的意思了吗？就是那位让你们的员工帮他做测验的经纪人。”戈尔问。

“嗯，他只告诉我，销售小姐帮他们做完了测试，他就告诉我这些。”哈尔回答道。

“你知道以前这种情况普遍吗？”

“你是说，在这个经纪人告诉我之前吗？这是我唯一一次——说是我的启蒙也可以——发现需要更正的问题。我认为，或许只是每个人的方法不同。所以，我只是往前走，不回头看。”

“你有没有发现有人使用小抄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工具？” 戈尔问。

“嗯，我从来没有提供过类似的东西，” 哈尔回答道，“经纪人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风吹草动，而我会告诉他们，这种事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没有整理过，也没有经手或是传递过什么小抄。”

“好的，” 戈尔说，“你相信在你上任前小抄就存在吗？”

“当然。”

“为什么你会那样认为？”

“嗯，经纪人们在一起工作，在这个办事处培训的人认识其他办事处培训的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一起开会，互通电话，分享营销创意和各种各样其他的点子，这是一个稳定的社交圈。显然，如果情况紧急，你必须在一星期内得到继续教育的 35 个学分，你就会打电话问同事，‘你有资料吗？’就这样，资料传真一下还是很容易的。”

“除了达拉斯办事处，你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发生？”

“在突沙(Tulsa)办事处，一个经纪人找过我，我告诉他我不想听这样的事，而他说他会搞定的。”

“你说他找过你，他找你做什么呢？”

“嗯，为了获取……同样的东西。等到第 9 局结束，他们就必须完成继续教育的学时分，他想知道怎样才能最快地达到这个目标。”

戈尔继续刨根问底：“你说‘等到第 9 局’，是什么意思？”

“嗯，那个继续教育的学分，打个比方，在某个限期之前必须积累 30 分，但他们没有好好学，或是没有攒够学分；而这个学分必须完成，否则他们就会丢掉执业证。所以他们就有压力了，一眨眼的工夫，它的优先度从三级提高到了一级，也就是紧迫一级。如果你问的是突沙办事处的这件事，是这样的，那位经纪人找到我，问我如何最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向他解释道，我一遍遍地告诫过他，他也收到过很多提示信件，告诉他这事必须完成。然后他说，‘嗯，我们以前可不是这么做的。’我就说，‘我不想听以前你们怎么做。’”

“你所说的之前为他们代考的员工，是不是在盖瑞·薛皮恩手下？”戈尔问。

“在得克萨斯地区，”哈尔回答，“盖瑞没有离开过得克萨斯，他只在达拉斯活动——嗯，在我从业期间，他都在达拉斯。”

“你知不知道，哪些员工参与其中？”戈尔继续问道。

“在得克萨斯吗？”

“是的。”

“那就是盖瑞和他的员工了。我曾有一个销售小姐在盖瑞那儿做过事，好像叫莎拉什么的，我不记得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莎拉·格拉汉姆吗？”

“对，莎拉·格拉汉姆。她曾经是我的员工。”

“好的。那你知道其他人为盖瑞做些什么吗?”

“嗯,是的。她才是那个出谋划策、最后拍板的人,是整个运作的核心。盖瑞只是挂名领导。还有一个人相当于秘书。一个更大的经纪人向我暗示过,她就是那个代填答题册的人。”

“你说‘代填答题册’,是什么意思?”

“当继续教育的学分到期时,她代填那些答题册。”

“她代做那些计入学分的考试题目吗?”

“对。”

“这种做法很普遍吗?”

“嗯,除了在达拉斯的那次经历,我知之甚少。每次想起这件事,我就会立即打住。”

“你知不知道,管理层内是否有人参与其中?”

“不,这我不清楚。”

“那么你的意思是在你上任前,注册考试中就存在不当操作,对不对?”

“完全正确。”

“那么你知道大概有多少人从中受益呢?”

“我不知道。但我能想象,如果你身处高压的工作环境,每天必须阅读成堆的信息,没有空闲时间,而这事跟你又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做起来要浪费你 30 个小时的时间。我怀疑常人都会选择捷径的。”

“那么如果你在得克萨斯注册了,但你自己没有考试,而是,打个比方,由秘书代考的,你能在其他州注册吗?”

“只要你在得克萨斯拥有驻地执业证,你就能在其他州注册。非驻地执业证,你指的是这个吗?”

“对的。也就是说,利用那场考试结果,你就能在全美 50 个州都拿到执业证?”

“对的。”

“那你就可以在 50 个州推销人寿保险了。对吗?”

“是的。”事实上,1995 年得克萨斯的 49 名美林员工都拥有俄克拉荷马州的非驻地人寿保险执业证。

“你认为,盖瑞·薛皮恩是否知道秘书们给经纪人代考这一情况?”

“哦,当然。他肯定知道。”

“那是他的团队,是吗?”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当然。”

戈尔接着问哈尔，是不是和布鲁斯·戴讨论过证词，哈尔承认他们大概谈了两三个小时。戈尔询问他们是不是谈到了报酬问题。哈尔解释说，他向戴要求15 000美元的补偿金，他被解雇了，他觉得这是美林欠他的，而戴说，他们不能付钱给证人。

戈尔还有问题要问：“你知不知道莎拉·格拉汉姆曾经提供过考试答案，还称它们为小抄？或者说，你对这一情况了解吗？”

“我认识莎拉·格拉汉姆，她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哈尔回答道，“据我所知，我手下的销售小姐都知道我对不合规操作的态度，我也提醒过她们不要走捷径。经纪人不想参加保险考试，但他们还想卖保险，所以想蒙混过去，让我的销售小姐做些不合规的事。但是我立场坚定，坚决不可以。这个立场也贯彻到继续教育中，我们不走捷径。”

戈尔继续问道：“美林有没有调查员曾经问过你关于小抄的事？”哈尔回答说，没有。

“也许我该问，1992 年以来有没有？”戈尔澄清道。回答仍然是，没有。

哈尔补充道：“布鲁斯说他们没有我的地址，而他们一直都有我的永久地址。”

“你觉得，斯古利先生说注册考试中有不当操作，有依据吗？”

“是的，当然。对此已有很多指责声。”

“据你所知，管理层是否知晓保险考试中存在秘书代考等不当操作？”

“嗯，我找的那些经理，也就是我的直接上级，他们是知道的，如果之前不知道，那么我找过他们之后也应该知道了。我还明确了我用来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

“那么你把问题报告给哪些经理了？”

哈尔回答说，他向另一个地区副总裁艾利斯报告了，他是另一个渠道的负责人。

戈尔问完了。轮到戴交叉盘问了。

“那么，你今天的证词是不是说，在你的任期内，在斯古利先生的任期内，你们从未亲眼见过，也没有听过小抄，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有人因为利用小抄或其他方式违反哪个州的法律？是这样吗？”戴把回答的范围限制在俄克拉荷马州范围内。

“对的，”哈尔回答，“除了突沙市的那次经历。”

“在突沙市，有人向你要小抄了？”戴问道。

“是的。”

“那你提供小抄了吗？”

“没有。”

“在斯古利先生任期内，有人在俄克拉荷马州向你要过小抄吗？”

“没有。”

“那么，只是理财顾问向你要小抄，就能够说明在此之前俄克拉荷马州盛行小抄吗？”

“我认为，提出这样的要求就说明，小抄的确被使用过，但是我没有亲眼见过。我觉得很多人都了解我的原则，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敢跟我提这事。”

戴接着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康纳主席打断了他，问他问这些问题想要说明什么。戴回答说：“我只是想澄清一点，就是俄克拉荷马州什么都没发生过。”戴看了看哈尔，问道：“这是你的证词，对吗，哈尔先生？”

“你说什么都没发生过，然而我们刚才说的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呀。”哈尔回答道。

“只有一个理财顾问向你要小抄，对吗？”戴问道。

“是的，是的。”

“很好。那么莎拉·格拉汉姆，你的员工，你认为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供过小抄，包括斯古利先生，对吗？”

“是的。”

“那么你今天所有的指控都是针对盖瑞·薛皮恩的，是这样吗？”

“我反对，”戈尔打断他，“他今天没有做出任何指控，他在作证。”主席问戴，是否要重新组织一下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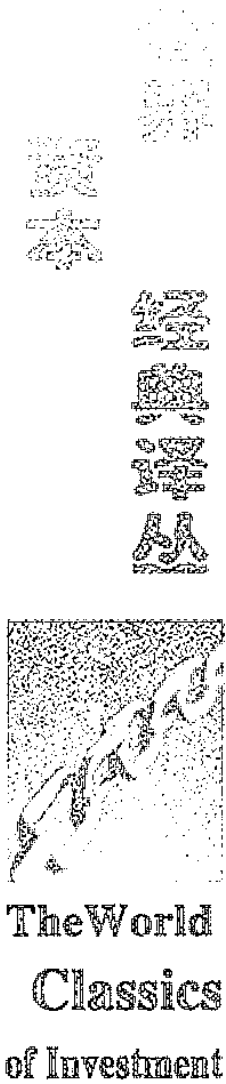
“你所指的在得克萨斯违反法律的不当行为，都是盖瑞·薛皮恩和他的员工所为，对吗？”戴问道。

“是的，在得克萨斯。”哈尔回答。

戴问完了。

戴对哈尔的交叉盘问没有持续多久，也没有实质进展，只是重复了部分在戈尔的问话中已经说过的证词。

戈尔想要继续主询问，于是就问哈尔：“对于小抄是从盖瑞·薛皮恩的办事处传出来的这一点，你有任何怀疑吗？”



“没有，我相信那些不当行为是盖瑞·薛皮恩的办事处做的。”哈尔回答道。

“你指的是哪些不当行为？”

“我已经说过，他的员工替大经纪人代考。”

“如果有人在得克萨斯获得了继续教育的学分，在俄克拉荷马州也算数吗？”

“据我所知，如果是得克萨斯的驻地经纪人而且名声又不错，在俄克拉荷马州就不需要继续教育的学分。但是你要问的话，是有一个间接的转接程序。”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得克萨斯注册了，就不需要通过俄克拉荷马州的考试？”

“正确。”

“你告诉基思·斯古利关于得克萨斯小抄的事或者其他不当行为了吗？”

“是的。我觉得我给布鲁斯的所有信息，他应该都有。”

“那么你在几年前和基思·斯古利通电话时，是否告诉过他有关不当行为呢？”

“我不确定我今天所说的是不是都向他提及过。”

“好的。不过我现在不是问你是否提及过所有的事，我问你，是否跟他说过小抄现象泛滥？”

“是的。”

这时，戈尔和戴都没有问题要问了。

我觉得，曾是达拉斯驻地保险专家的哈尔完全摧毁了戴一遍遍的所谓声明——说我对于这场大范围保险舞弊丑闻的指控没有根据，心怀恶意。画刊公司 77 页打印文件的合理数据分析，以及哈尔这位曾经的内幕人员的证词，都有力地支持我的指控。

布兰特·巴顿：这越来越像水门事件了

在听证会第三天，戈尔传召了我的最后一位证人，即布兰特·巴顿，他向仲裁组介绍了他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包括他受雇于美林直到 1994 年 1

月,以及之后在另一家证券公司担任理财顾问。

很快,我就清楚了巴顿准备如何陈述他的证词。戈尔询问他关于市政收益基金一事,他立即否认自己曾以预先偿付的方式出售这些基金,虽然美林告知监管人员,他的确这样操作过,并且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为此觉得有必要向他发一封警告信。巴顿也宣称,在第一次调查之后,他口头上给予购买基金的客户解除合同的权力。然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狄克斯告诉我,他联系过一些巴顿的客户,没有人记得巴顿授予过这样的权利。

在乡村俱乐部名单问题上,巴顿作证说,他已从电脑上删除了这一名单。接着他说他上交过伪造的研讨会费用,承认艾利斯不仅知道这一情况,而且还收买了乡村俱乐部经理,为他掩饰——因为虚构的研讨会的举办场所是乡村俱乐部。他还承认,艾利斯没有兑现承诺,在环法 CMA 竞赛之后把客户资产分给伊尼德办事处;至于艾利斯承诺给克拉克的资产,在律师介入后才得到兑现。

讨论到保险舞弊问题,戈尔问:“你是否参加过周六早上涉及保险考试的会议?”

“是的。”巴顿回答。

“你参加考试是否得到了全程协助?”戈尔问。

“我认为可以说是‘得到了全程协助’,我认为是这样。”然后,巴顿简单地解释了会议上他们如何针对各种问题展开讨论。

“那么在讨论中,问题的答案并没有给你们,对吗?”戈尔问。

“我觉得讨论之后,每个人都能得出答案。”巴顿回答。

“那么过程是这样的:你们把问题一个个讨论过来。问题的答案会在讨论中得出。一个问题讨论完了以后,你们接着讨论下一个,对吗?”

“我记得是这样的。”

“谁主持的这个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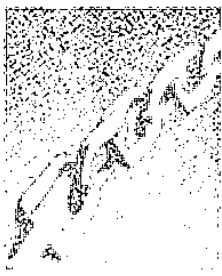
“我想是比尔·哈尔吧。”

戈尔问巴顿,他是否记得还有谁参加了会议,巴顿提到了一些理财顾问,也包括艾利斯。戈尔就问他,艾利斯是否知道会议的流程。巴顿回答:“我猜是的。”

“据你所知,与会人员之后是不是签署了一份宣誓书,以保证他们不借助外部帮助完成考试?”戈尔问。

“我不记得签了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没签,”巴顿回答,“你想怎么说随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你。”

“考试是画刊公司设计提供的吗？”戈尔问。

“是啊。”

“那么应该有监管，公司的员工应该都签过宣誓书，对吗？”

“我确定是这样的。”

讨论到环法 CMA 竞赛作弊问题，戈尔问：“你有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环法 CMA 竞赛作弊一事？”

“如果取消一些理财顾问的生产编号也算作弊的话，我想，这就是我作弊的方式吧。”巴顿回答。

“你知不知道其他办事处是否有这种情况？”戈尔问。

“每个办事处都以不同方法来操控人员数量，这是广为人知的。”巴顿回答。

巴顿接着解释说，操控人员数量就是通过取走生产编号，使一些人归入助理顾问的行列，与其他经纪人构成合作关系；或者干脆解雇他们，从而重新编排理财顾问。

戈尔问及谢曼的情况，向巴顿确认了谢曼在公司担当一个高层职位，正是他指导巴顿如何操控人员数量的。巴顿还承认，在他看来，这种情况在美林很普遍，他说，艾利斯、谢曼以及美林零售部的 4 位高级执行官之一汤姆·穆勒三世，都能从人员操控中获益。他还告诉仲裁组，艾利斯和他因为这次活动赢得了旅游机会，之后他们不得不偿还其旅游费用。

这时，康纳主席宣布休息 10 分钟，期间，我离开会议室，在走廊上，我看到艾利斯从对面走来。自从我们在听证会之前握手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狭路相逢”。

我们走近时，我伸出手，说：“你怎么样，艾利斯先生？”

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艾利斯盯着我说：“我不会和你握手的。”他一边说，一边把右手举到身后，并且举得尽量高，伸得尽量远。小昆特·艾利斯，这位曾经在俄克拉荷马市综合办事处呼风唤雨的人物，不想和他的前手下——一个前理财顾问——握手。因为这个前顾问给他的生活和职业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影响了他在美林的地位和前途。

休息过后，戈尔继续直接询问巴顿。戈尔问及我在 1992 年 1 月 20 日的那封信，这封信上，我提到美林的达拉斯办事处给我提供了一份小抄。戈尔问巴顿，他有没有看过我的这封信，巴顿说他看过。戈尔问巴顿，对信

中提到小抄的那一段有何反应。

“我告诉基思我读过信了，我会把它交给昆特处理，”巴顿回答，“但我后来离开了，回俄克拉荷马市当了销售经理。由杰克·托马斯和昆特来处理，他们采取措施时我不在那儿，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尽管巴顿在1月底就回到了俄克拉荷马市，但是直到7月才被正式任命为销售经理。

“据你所知，美林公司内部有没有人知道保险考试中是否存在小抄？”
戈尔问。

“没有，”巴顿回答，“我的反应是，如果有小抄，我何必还要去那个研讨会呢？”

戈尔继续问：“你是否知道，斯古利先生通过热线电话致电纽约总部的情况？”

“是别人告诉我的，”巴顿回答，“我是说，大约一年之后别人告诉我热线电话的事。”

“你当时知不知道，或者说，你现在是否知道，关于斯古利打热线电话的事，昆特·艾利斯早已得知了？”戈尔问。

“不知道，”巴顿回答，“事实上，我好像记得是海尔姆特事后告诉我的，又或者是我读了拜瑞·曼德尔的信才得知的。”

戈尔问巴顿，他被晋升为销售经理是在什么时候，是否是在第一次调查期间。“我觉得他们那时差不多已经结束调查了。”巴顿回答说。我发现，尽管各种证据表明那时调查已经结束，但是戴，以及之后的麦迪茨，都试图让仲裁员相信在巴顿晋升时，第一次调查尚未结束，而是仍在进行中。

戈尔接着问：“你是否曾在丽莎·布琳娜德面前诋毁过斯古利先生？”
“我不记得了，但是……”巴顿回答。

“那么你记不记得，你称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说他思想扭曲？”戈尔打断他。

“我不记得我说过，但是有些时候我确实想这么说。”

“是吗？”

“是的。但是我没有说出来，虽然我准备这么说。”

“这么说，你同意这些观点？”

“是的，我同意。尤其是，经历了过去的3年半时间，我更觉得如此。事实上我想，这些评价并不为过。”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听到这里，我真是哭笑不得。巴顿居然有脸说，叫我骗子不为过。这个人起先跟我对峙，然后和我站在同一战线上，现在又和我对立了。他似乎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阵营的，没有真正的坚定立场。他只是一个随时准备搭顺风车的人。

戈尔继续询问神秘保罗的情况，他问巴顿：“你记不记得，在 1992 年 9 月 22 日，昆特·艾利斯、杰克·托马斯和从纽约来的保罗在伊尼德会面？”

“不记得。”巴顿回答。

巴顿的回答让我很奇怪。因为 1992 年 9 月 24 日的早上，也就是我和曼德拉、米哈利、迪恩在纽约见面的那天，克拉克曾告诉过我，巴顿在周二下午——即 9 月 22 日保罗和托马斯、艾利斯会面的当天——得知了我给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我猜，艾利斯和保罗会面后，回到俄克拉荷马市就告诉了他的第二把手，去伊尼德会面的原因以及和谁会面。然而，托马斯之后也作证说，他不记得这次会面，我更加怀疑这其中另有端倪。

“基思·斯古利在 1992 年 9 月 17 日给董事会写信之后，昆特·艾利斯是不是和你说过，希望基思·斯古利自食其果？”戈尔问。

“我不记得昆特这样说过。”巴顿回答。

“好吧。”戈尔继续问道，“你难道没有在电话里跟基思说过这事吗？”

“听上去那更像是我的话，而不是昆特的。”巴顿回答。

“好。那么你可能那样说过？”

“我可能是说过。”

“杰克·托马斯是否告诉过你，基思是伊尼德办事处的一个毒瘤？”

“没有。”

“杰克有没有向你表示过，他想让基思走人？”

“没有，根本没有。”

“杰克从来没有诋毁过基思，是不是？”

“据我所知，没有。”

我现在确定克拉克说对了，巴顿与美林的案子和解了，美林以此换来巴顿在我的案子中跟他们合作。发生了那么多事，要相信艾利斯和托马斯没有在巴顿面前诋毁过我，等于相信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没有辱骂过日本人。

戈尔问巴顿，在 1993 年夏的一次同学会上，他与凯丽·麦兹碰面，他是不是对她又骂又叫。巴顿回答说：“我知道我是朝她大吼了，但是不记得

有辱骂过她。不过，如果你说我说过，那我就说过吧。”

关于巴顿为客户签名一事，戈尔问了几个问题，随后他问：“你有没有告诉过斯古利先生，你觉得你被解雇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伊尼德事件？”

“哦，我当然说过。”巴顿回答，“我很可能告诉过他，我觉得这是伊尼德事件造成的，我现在还这样认为。”

“那么昆特·艾利斯是否和你说过，他被解雇也是因为伊尼德事件，而不是官方的所谓原因？”戈尔问。

“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说过了。”巴顿回答。

“他有没有和你说过，‘斯古利让我俩都栽了跟头’？”戈尔问。

“他可能说过，我不记得了。”巴顿说。

“你没有向基思传达过这句话吗——‘他让我俩都栽了跟头’？”戈尔问。

“可能说过，我不确定。”巴顿回答，“我那么想过，也许是我说的吧。”

接着问到艾利斯，戈尔问巴顿，为什么艾利斯会丢掉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职位。

“我认为是丢失市场份额的原因。”巴顿回答。

“那个原因成立吗？”

“有可能。他们有权做任何决定。”

“你有没有告诉过基思，你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可能吧。”

“丢失市场份额，这不是他们评估经理的一个标准，是吗？”

“据我所知，不是的。”

“此前佩因韦伯公司不是在俄克拉荷马市新设了办事处吗？”

“对呀。”巴顿回答。

“你不是也说过，丢失1%~2%的市场份额还算正常吗？”

“是的，确实可以这样解释。”巴顿回答。

戈尔接着询问有关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巴顿回答，仲裁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员没有找他谈话，也没有找过艾利斯。戈尔让巴顿读自己写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抗议其警告的一封信，信上他说，“由于美林在准备应付可能的官司，事实上1994年8月9日斯古利先生就向俄克拉荷马州立法庭提起了诉讼，所以美林的意图一直想控制、歪曲事实

来保护自己。”

巴顿告诉仲裁组，美林只歪曲了一个事实——说他以预先偿付的方式出售市政收益基金。巴顿宣称，他没有用预先偿付方式出售市政收益基金。我现在确信，在我的仲裁案中，巴顿和美林是一伙的。

戈尔接着问：“你有没有说过，所有的事体现了三流的盗窃和一流的掩盖？”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说过。”巴顿回答。

“如果你说过，你觉得会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

“很可能，我当时觉得整件事越来越像水门事件了，这个经典的三流盗窃、一流掩盖的案例。”

“你是不是说过，‘就像是你先撒了一个谎，你为了圆这个谎不得不又撒了一个更大的谎，如此下去，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了。如果他们第一次就能说实话，那么后面的事就简单多了，可我认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说实话’？”

“我不记得了。”巴顿回答。

“那么你有没有说过，你硬着头皮扛着，因为你觉得公司会补偿你？”

“我可能这样想过吧。”

“那么你是否说过美林试图保全鲍勃·谢曼？”

“也许说过。”

“你说过你觉得自己被害苦了吗？”

“是的。”

“在这件事上，你成了替罪羊是吗？”

“是的。”

“那么是谁让你成为替罪羊的？”

“我觉得是美林。”

“第一次调查之后你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对吗？”

“是的，那次调查后我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在董事会收到信后，才受到处罚的？”

“是的。”

“美林是不是让伊尼德看起来像个叛徒办事处？”

“我觉得是的。”

“你个人不喜欢斯古利先生，对吗？”

“这个假设很对。”

“那么你非常讨厌他吗？”

“可以这么说。”

“就他的职业习惯而言，他工作勤奋吗？”

“我从培训人员那里得到的所有报告，都说明他干得非常好，他在培训阶段表现出色。”

“他是不是很细致周到？”

“指哪方面呢？”

“工作习惯方面。”

“是的，我觉得是。他的考试成绩很好，他好像对考试很投入，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细致周到。”

“他做事专业吗？”

“我想是的。”

“你是否希望当初美林不要雇用他？”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是的。”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尽管当初美林的职位看起来很有前途，但是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益处。回想起来，我真有点希望自己从未被美林雇用过。

戈尔的话问完了，戴没有什么要盘问。我很庆幸录下了我和巴顿的很多谈话，这样他必须有所节制，不能随心所欲地站在美林一边。

听完之后，我觉得巴顿的证词确定了一些事实：他和美林都曾经试图掩盖真相——艾利斯食言；谢曼命令他们在环法 CMA 竞赛中操控经纪人数；哈尔给 8 个理财顾问提供保险考试的答案；我在 1992 年 1 月 20 日的信上曾报道，达拉斯美林人保办事处给过我一份小抄，而巴顿、艾利斯和托马斯知道此事；巴顿还从纽约方面得知我举报时用的是保密热线；第一次调查后巴顿没受到处罚；他认为他和艾利斯被解雇，是因为伊尼德的事而不是官方公布的原因；他因为我的举报而对我耿耿于怀。

听证会的第三天结束了，我感觉很好。大多数情况如我所愿。

艾利斯·爱德华兹：美林应当解雇一些人

今天是我的仲裁听证的最后一天。美林和我都将请一些有名望的证人以支持各自的立场。戈尔将传召一位专家证人，该专家现任俄克拉荷马

州的财长，曾担任一家证券公司的总裁，他也会传召有可能是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方面的顶级权威到场。戴将传召美林的内部审查经理、助理法律总顾问，以及来自洛杉矶的一位证券专家。戴还将传召托马斯。

这在我的仲裁听证过程中是特殊的一天，大量颇具影响力的证人将举起右手宣誓，陈述事实，完整且唯一的事实。我为美林方面证人的证词感到震惊，而最终我得出结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赢得战争，为此，事实真相是可以弃之一旁的。

最后一天，第一位出庭的证人是我方的一位证券专家——艾利斯·爱德华兹(Ellis Edwards)。爱德华兹向仲裁委员会介绍了他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包括他曾担任过 R. J. 爱德华兹经纪公司的总裁及俄克拉荷马州的财长。戈尔对爱德华兹的直接询问简短而有力。

戈尔首先表明，爱德华兹曾经管理过一家证券公司，对证券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戈尔询问爱德华兹，是否看过那封我写给美林董事会的 31 页长信，爱德华兹给予了肯定回答。“如果你的雇员交给你这样一封信，向你汇报这样的事，你将会做何反应？”戈尔问道。

“我将会很震惊，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查，”爱德华兹回答道，“如果发现属实，或者我认为是属实的，我可能会立即解雇一些人。但与此同时，我会暂时中止一些人员的工作。”

戈尔再次确认了，爱德华兹会坚持调查，确保与每个人进行面谈，如果发现指控是有根据的，他将解雇相关责任人。爱德华兹还说，他会把调查结果汇报到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并咨询律师以确定他做了所有该做的事。

说完这些，戈尔结束了对爱德华兹的询问，戴开始盘问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先生，你对此案了解的范围和程度仅限于看过的那封信吗？”戴问道。

“是的，先生。”爱德华兹回答道。

“我问完了。”戴说道。

爱德华兹于是说：“我应该重新回答这个问题。我看过几封已成为庭上证据的信件。”

“他指的是，写给董事会信件的几封附信，这些已经成为本庭的物证。”戈尔打断道。

戴接着问爱德华兹是否同意,从违反规章的层面来讲,保险舞弊指控,因其蓄意违法这一点,可能是最严重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严重的,但我认为这很可能是触犯法律的。”爱德华兹回答道。

戴问爱德华兹,我所做的所有指控中,他认为最严重的是哪一项。爱德华兹答道,他认为没能为客户的最大利益考虑是最糟糕的事情,他指出环法 CMA 赛作弊案造成的后果,以及滥用研讨会费用的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这些还是发生在公司内部。

“那么,如果美林对此进行了调查审计,并对那位经理采取了他们认为合适的补救措施,你的意见将会根据他们采取的措施而定,是吗?”戴问道。

“是的。”爱德华兹答道。

“对这些指控中的每一项都是如此吗?”戴继续问道。

“嗯,他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是解雇一些人。”爱德华兹答道。

“你会一直等到查明真相才采取行动吗?”戴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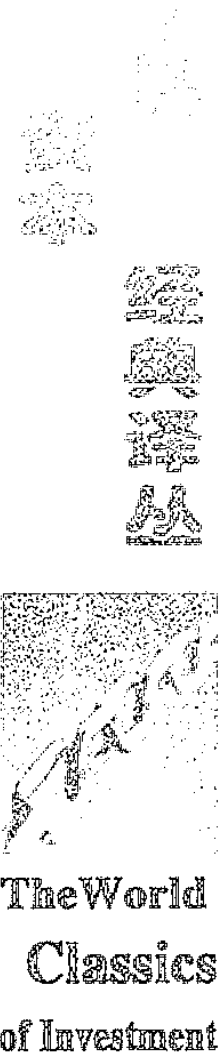
“是的,我会的。”爱德华兹答道。

戴没有其他问题了。爱德华兹从专家角度确认了,如果指控属实,那么一些人应该被解雇。在我看来,证据很明显地证明了我的每一项指控都是真实的。既然美林在收到我的第一份不正当行为报告后,既没有暂停部分人的职位,也没有解雇任何人,我希望仲裁委员会能够理解,我有理由怀疑有人想掩盖真相。

海尔姆特·麦迪茨: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得知道它必然会被一路送达高层

康纳主席确认,除了一位将在今天早些时候抵达的证人,戈尔已经传召了我的所有证人。至于美林方面的证人,薛皮恩已经作了证,仲裁员准备听取其他证人的证词。康纳先生要求戴传召他的下一位证人,戴传召了海尔姆特·麦迪茨。

麦迪茨从纽约飞来向仲裁员证实,美林已经负责任地全面调查了我所报告的所有不正当行为。然而,我听到的却是,美林的主要证人证实了美林企图掩饰大范围保险舞弊行为,这是唯一可能对美林公司产生严重影响



的指控。

麦迪茨向仲裁委员会提供了其教育和职业背景资料，包括他自 1972 年以来曾任职于一些证券公司的法规事务部。麦迪茨说他于 1987 年加入美林公司，任内部审查组的负责人。

“你是怎么知道基思·斯古利的，海尔姆特？”戴问。

麦迪茨提到我的备忘录，他说：“这是在 1992 年 6 月 29 日一两天后我收到的一封信，是斯古利先生写给杰克·托马斯先生的，我记得是俄克拉荷马市的管理层传真给我的。”

“那么你对此信的反应是什么呢？”戴问。

“嗯，我当然是很惊讶，并感到很不安，”麦迪茨答道，“他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与我过去经手的案件不同。”

麦迪茨解释道，他马上决定到俄克拉荷马州调查我的备忘录，并于 1992 年 7 月 6 日飞抵俄克拉荷马市。“我收到信的几天后，即南下来到这里，”麦迪茨说道，“我们立即竭尽全力着手调查，试图解决问题。”

麦迪茨告诉仲裁员，他曾与艾利斯、巴顿、托马斯和我进行过面谈。他也谈到了与我在伊尼德最佳西方酒店(Best Western)的会面。“我认为斯古利先生非常聪明，非常乐观，口才很好。”麦迪茨说道，“有趣的是，我认为谈话没多久，他就表现出对时任伊尼德办事处负责人的布兰特·巴顿，以及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的昆特·艾利斯这两人的强烈不满，并辱骂他们傲慢无知等，我在回顾笔记的时候找到了这些记录，他甚至称他们为骗子艺术家、暴徒、恶棍。斯古利先生说了他的顾虑，大概有七八项吧。科德尔先生和我听完后，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做了回答，我们做了笔记，并告诉他，我们将调查此事，随后再与他联系。”

“在调查过程中，你是否曾给斯古利先生说明过调查进度？”戴问。

“7 月 16 日，我打电话给斯古利先生，告知他我们内部调查的进度以及我们的发现，”麦迪茨回答道，“7 月 16 日的通话后不久，斯古利先生于 7 月 18 日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让我极为担忧，他认为我们会蓄意掩盖真相，又说，如果寻找真相对于我那么困难，他会帮助我找到它。”

“你需要斯古利先生的帮助来找到正确答案吗？”戴问。

“我不需要斯古利先生的帮助，也能找到正确答案，”麦迪茨回答说，“这是我的职业，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这封信冒犯了我。当然更不用说的是，它也干扰了我。”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戴问麦迪茨，调查结果如何。麦迪茨告诉仲裁委员会，他的调查发现，地方管理层在环法 CMA 竞赛中做出了错误决策，有悖于美林的政策和准则。由于这些错误决策，麦迪茨接着说道，我没有得到应得的奖金或是被送去纽约接受培训。麦迪茨所指的培训是在位于普林斯顿企业校园的公司零售总部进行的。普林斯顿校园距离纽约市仅 50 英里。因此，按照美林内部的说法，纽约和普林斯顿几乎是同义词。

戴随即问麦迪茨对小抄事件的结论。“小抄一事在最开始时非常令人烦恼，”麦迪茨回答说，“很显然，仅是小抄这一措辞就很让我烦恼。我联系了很多，做了大量工作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小抄。我们找过画刊公司负责考试程序的人员，也与据称告诉斯古利先生存在小抄的人员谈话，得出了以上结论。”

麦迪茨继而谈及我的其他一些指控，承认在研讨会费用、市政收益基金和开办州外账户问题上存在不正当行为。

“美林的高管层非常重视部门中个人做出的会有重大影响的决定，”麦迪茨告诉仲裁委员会，“因此，公司的法律总顾问海默尔曼先生，早在我加入美林之时就建立了一套程序，事实上在我加入后就开始实施了，我们称之为审查委员会，我称之为‘银发和秃头们’。其成员是法律及合规事务部的高层成员，我们聚在会议室讨论重大事宜。现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法规部主任、诉讼部主任、人力资源总监、首席律师、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区域官员、前纽约证券交易执行区域总监。这些就是围坐着听取这些事的人！当然，并不是每次做决定都要把所有成员召集起来，但碰到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时，我们会这么做，就像这件事情，因为此事很不同寻常。”

“麦迪茨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戴说道，“遇到重大问题时，你们才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你又说这个问题不是重大问题？”

“我正要——你打断了我，我正要谈到这一点。这件事非同寻常，但这不是重不重要问题。这是在我处理法规调查的生涯中从未碰到过的，我需要在审查过程中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所以，在 8 月 5 日，我们开会谈论此事。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委员会要求我做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因为此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困惑的，或者说是非同寻常的。”

我觉得麦迪茨在试图假装——假装我在备忘录中报告的不正当行为，连他这位有着法规专长的人也弄不明白。比赛作弊、保险考试舞弊、滥用

乡村俱乐部成员名单、虚报研讨会费用、对市政收益基金的失实陈述、滥开州外账户、对财务顾问进行资产许诺，弄明白这些问题有那么困难吗？我不相信，麦迪茨需要权威的审查委员会的帮助才能理解这些问题。

我认为，海默尔曼让审查委员会参与进来的原因，与麦迪茨在7月7日问我那些问题的原因是相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把备忘录发给杰克？你得知道，它必然会被一路送达高层”，以及“基思·斯古利在这一步之后会怎么做？”美林面临一个重大问题，高管层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既然我在我的备忘录里书面提出了指控，即“对大范围使用小抄或是在寿险执业资格的自我监管考试中存在的其他不正当手段，采取明显的纵容和鼓励的态度”。我相信，审查委员会必须就如何应对这一指控做出决定。

麦迪茨告诉仲裁员，他和诺布克在1992年8月13日与我见面，告知我调查的结果。麦迪茨说，他告诉我，报告涉及的问题还没到需要解雇美林一些雇员的程度，但我表示强烈反对。

“想想看，我是以此谋生的，”麦迪茨说道，“我在进行主要调查的一年中，与100多人面谈过，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纽约，我偶尔也去一些办事处。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像斯古利先生这样在这个行业从业不久的人，居然要求解雇那些为公司服务了21年之久且无任何不良记录的人。”

“你第二次听说此事是在什么时候？”戴问道。

“是那封有名的信，即9月17日呈交给董事会的、由斯古利先生写给美林公司董事会每位成员的长达31页的信函，”麦迪茨答道，“自不待言，此信引起了轩然大波。收到信后，纽约法律及合规事务部高层成员的会议就决定再次开展调查，此次另派人员负责，不再由我负责。此次任命的人员是我们诉讼部门的高级律师拜瑞·曼德尔先生，由纽约州立证券部的前主席奥瑞斯忒斯·米哈利负责协助。他们开始全面调查此事。”

“你参与了掩盖事实一事吗，如同斯古利先生在致董事会的信函中所指控的那样？”戴问道。

“我没有，”麦迪茨说，“这一指控令我很生气。我为我在美林所做的工作深感自豪。我认为美林是一家诚实守信的公司，我们都相信这一点。”

戴没有接着问问题，所以轮到戈尔交叉盘问。戈尔试图确认，麦迪茨在针对我的备忘录的调查中，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处理那些参与了不正当行为的人。结果，我才向董事会发出了指控麦迪茨试图掩盖的信函。

“8月13日你与斯古利先生会面时，美林一方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而你却告诉他调查已经结束，不管发生过什么……”戈尔问。

“不，不，不，”麦迪茨打断道，“调查一直在进行。我那时应审查委员会的要求，正在准备一份备忘录，试图理清这一切。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进度，我们和审查委员会开完会，我想和他交流一下。我觉得，他，即斯古利先生，希望我们解雇管理层的两名成员，而我想告诉他，这不可能，但是我们会继续调查，弄清楚其他问题。”

戈尔然后问道：“几分钟前你刚作过证说，8月5日和审查委员会会面时，你的调查就已经结束了，然后8月13日你和斯古利先生会面并告诉他调查结果。这不是你在几分钟前刚说过的吗？”

“是这样的，调查已经结束了，”麦迪茨回答，“但是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仅要弄清楚每件事的原委，还要得出各个解决方案。”

戈尔紧追不舍，问道：“麦迪茨先生，这是你8月5日调查结果的备忘录吗？”他指的是美林的一份证物。

“这是我准备的一份现状报告，因为8月5日召开的审查委员会议，要我总结并且报告我的调查发现。”麦迪茨回答。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要做的事，就只剩下你在解决方案中列出的那几项了？”戈尔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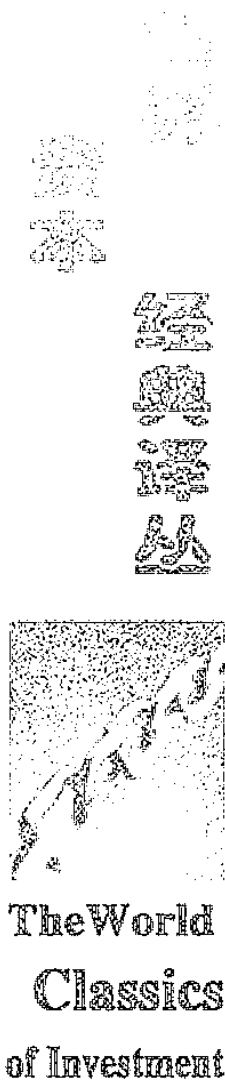
麦迪茨问戈尔，他指哪一页上的解决方案。戈尔提醒说，在每一个问题后面麦迪茨都写了一段，作为解决方案。戈尔问：“你刚刚说，你的调查只剩下找出解决方法，然后一一执行。很显然，你在这里已经列出了解决方法，对吗？”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麦迪茨回应道，“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嗯，我只是想问你，”戈尔说，“是不是就剩下最后采取措施了？你已经搜集了所有的事实资料，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了，也就是你列在这里的解决方案，对吗？”

“那是关于事实的结论。”麦迪茨回答。

戈尔和麦迪茨继续这样来回辩论着。戈尔试图确认，麦迪茨的报告中列出的那些解决方案就是美林所采取的全部措施，而麦迪茨说，那只是针对我的顾虑而提出的直接措施，高管层仍在继续决定，根据调查结果还应采取什么其他措施。麦迪茨说：“那时候，我们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做出处罚决定和最终的结论，我想尽快联系斯古利先生，向他报告审查委员会开过



会了，而委员会的建议，有悖他所愿，不是解雇那两位管理人员。但是，那时我们尚未做出所有的处罚决定。”

我很震惊，因为麦迪茨和他的上层，似乎把我这个 1992 年的新晋理财顾问当作一个重要人物，就像麦迪茨说的那样，“我想尽快联系斯古利先生，向他报告”。麦迪茨不仅 7 月份飞到俄克拉荷马州和我会面，而且 8 月份又来了，要“尽快”向我报告。我还记得麦迪茨几分钟前的证词，他说，“我在进行主要调查的一年中与 100 多人面谈过，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纽约，我偶尔也去一些办事处。”我也记得麦迪茨和诺布克在 8 月 13 日不停地深呼吸，因为他们没有完成那天的任务，即最终平息问题。

“在 8 月 13 日与斯古利先生会面之前，我们尽可能得出公正的结果，”麦迪茨继续说，“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已经审查过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行为还不足以招致解雇，公司会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处罚或补救措施。关于这一点，我想，在我的记录上也有反映，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5 号的时候，还没有采取所有措施，13 号也还没有。所有的措施要晚些时候才完成，有一些在 13 号与斯古利先生会面时就已经解决了，有一些是之后才解决的。”

麦迪茨，这位华尔街最大最著名的证券公司的内部审查经理，似乎在千方百计地掩盖一个事实，这就是美林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直到我 9 月 17 日写信给董事会。

“所以说，1992 年 9 月 17 日以后的事，是第二轮调查的结果，对吗？”戈尔针锋相对。

“不对，”麦迪茨回答，“更确切地说，关于我调查得出的一些结论，其处罚措施最终是在第二轮调查的同时实施的。”

“好，”戈尔说，“你今天的证词是不是说 1992 年 8 月 13 日，你与斯古利先生会面时，你并没有告诉他调查已经结束，你们已经采取了所有措施，事情已经终结了？”

“我告诉斯古利先生，到那时为止我们调查的情况，”麦迪茨回答说，“我告诉他，公司将会采取任何必要的补救措施，这一点我说得很清楚。”

戈尔接着盘问麦迪茨关于我提出的其他指控。康纳主席打断戈尔，请他说明他的交叉盘问与不当解雇案有什么联系。

“证人在试图说明，斯古利先生的每项指控都没有依据。”戈尔回答道。

“嗯，请明确告诉我，这与不当或者实质性解雇有什么关系？”康纳主席

问。

“如果一个检举人员信口雌黄，那就不是合格的检举人，”戈尔回答，“不当解雇行为的公共政策也就不再适用了。”

“好的，”康纳主席说，“那么交叉盘问是为了证明，这些指控到底是信口雌黄还是正当合理的吗？”

“正是。”戈尔回答。

戈尔继续交叉盘问。他问麦迪茨，在我提出的指控中，有没有一些属实的情况？麦迪茨回答说，“在8月13日的会面中，我告诉斯古利先生，我很感谢他让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我还告诉他，有些问题上他是对的，可有些他搞错了。”

“哪些问题他搞错了？”戈尔问。

“小抄一事。”麦迪茨回答。

“好的。让我来问问你，你说你约谈过莎拉·格拉汉姆，对吗？”

“没有。”

“你从来没有约谈过莎拉·格拉汉姆吗？”

“我和她是在电话里谈的。我相信曼德尔先生和她见过面，我没有。”

“你从来没有和她见过面？”

“我和她在电话里谈过，没有当面谈。”

“那好，你和她在电话里谈过？”

“是的。”

“好。嗯，电话里谈也一样。好，那么你的确约谈了莎拉·格拉汉姆，你和她谈过，是吗？”

“是的。”

“你还和什么人谈过？”

“画刊公司的人。”

“也就是组织考试的人？”

“对。”

“他们是不是告诉你存在小抄？”

“我问他们这个所谓的小抄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份模拟考的答案，不是他们组织的那次考试的答案，而是一次模拟考试的。”

“好吧，先生。你指的是格拉汉姆女士给斯古利先生的那张纸？”

“我相信，他是从她那儿拿来的。”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戈尔问麦迪茨，在小抄事件的调查中他还和谁谈过。麦迪茨告诉仲裁组，另外他只跟几个理财顾问谈过，他们参加了哈尔主持的会议，后来被要求重新参加考试。

我简直不敢相信交叉盘问中麦迪茨给出的证词。他的调查很明显只是装个样子。戈尔继续盘问：“在莎拉·格拉汉姆所在的达拉斯办事处，由谁负责组织考试？”

“我不知道那个部门的主管是谁，那是谁的管区，由谁领导。”麦迪茨回答。

“和他们谈话不是更有助于调查吗？”

“据称莎拉·格拉汉姆是提供那份答案的人。我们和她谈了，我也和参加考试的人谈过。”

戈尔问麦迪茨，他有没有找格拉汉姆的老板，或是薛皮恩，或是哈尔谈过。他的回答是，没有，没有和薛皮恩谈过，也没有和哈尔谈过，因为他说哈尔那时已经不在公司工作了。

“那能成为你约谈他们的障碍吗？”戈尔问。

“通常不会，但是如果那人已经离开了美林，我一般不会再找他，除非是很重大的事情。”麦迪茨说。

“你是一个调查者，在你调查的时候，范围仅仅局限于美林内部的员工吗？”戈尔问。

“我没那么说。”麦迪茨回答。

“对不起，我误解你的意思了，”戈尔说，“那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除了我觉得有必要约谈外部人员的重大事件以外，通常我只会约谈美林的员工。”

“那么这件事不重大，你觉得没有必要约谈其他人？”

“我相信那时哈尔先生已经离开了，我想我们试图联系过他，没有联系上。我手下的一个员工，我记得是汤米·博伊德(Tommy Boyd)，他试图联系哈尔，但是没有成功。他离开了，在那之前他就被解雇了。”

“除此之外，你认为，关于斯古利先生的其他指控，有没有哪一项是缺乏根据的？”戈尔问。

“在其他问题上，斯古利先生的顾虑是合理的。”麦迪茨回答。

戈尔接着问麦迪茨有关第二轮调查的结果。麦迪茨说，他对结果有大致的了解，包括艾利斯和巴顿必须偿还他们的旅游费用；艾利斯的年终奖

金受到很大影响；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发出的警告信；艾利斯被上级谴责；巴顿也受到责备，被革去销售经理一职，并且不准其参加一个内部晋升的必须培训项目。

接着，戈尔问：“你有没有和斯古利先生说过，‘为什么要做备忘录？你应该明白，它最终会到达高管层’？”

“我记得我好像是问过他。”麦迪茨回答。

“针对斯古利先生给客户的 15 美元所谓折扣，你有没有威胁要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戈尔继续问。

“我向他表明，他提出的很多指控涉及一个程度问题，有的比较严重，有的则不然。”麦迪茨回答，“而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很严重。我告诉他，在我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跟他说，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则，那个 15 美元的折扣，可以认定为与客户账户分担损失、共享收益的行为，证券交易所可能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他们来说，撇开 15 美元这一数字，给客户折扣，这个事实本身在他们眼里属于严重的违规行为。我相信斯古利先生觉得这不是严重的违规，所以我想提醒他，这是一个程度问题。我在这一行干了 27 年了，曾经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纪律委员会的成员，也做过仲裁员。我知道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在折扣情况下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我对此很熟悉，因为我曾在那里工作过。所以我想要提醒他，在某些人看来，他的行为的确很严重。这不是威胁，我不会威胁任何人，我对人很友好。”

戈尔问麦迪茨，他是否知道巴顿为什么被解雇，艾利斯为什么会丢掉俄克拉荷马州综合办事处的地区副总裁的职务。麦迪茨在巴顿被解雇的问题上与公司持统一口径，认定他是因为代替客户签名而被解雇的，虽然他已经得到了客户传真的授权。至于艾利斯的事，麦迪茨说他不清楚其中原因。

麦迪茨的作证结束了，他的精彩表演，与其说是为美林作证，不如说是对我的支持。我相信现在可以明确这一点，美林自己的内部审查经理也确认，我对于违法行为的指控是准确的，当然除了小抄一事。

然而，更加精彩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麦迪茨在海默尔曼和审查委员会的领导下，一再回避我对于保险考试中广泛存在的不当行为的指控。

麦迪茨说，他在调查小抄一案时，约谈了周六早上参加哈尔会议的几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名理财顾问,但是,正因为他们参加了周六早上的会议,我并未指控那 8 名理财顾问使用小抄。麦迪茨说,他找画刊公司的人谈过,但是我也没有指控他们参与保险作弊一案。在他的约谈者中,可能是保险舞弊丑闻参与者或是知情者的,唯有莎拉·格拉汉姆一人。

麦迪茨没有约谈时任达拉斯驻地保险专家的薛皮恩,也没有找哈尔,这位达拉斯的前驻地保险专家。哈尔已经作证说,美林一直都有他的永久地址,显然,仅仅过了 3 年,戴想要在仲裁听证之前找到哈尔简直易如反掌。再有,麦迪茨连格拉汉姆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听了以上种种,我觉得,麦迪茨也许真的需要我帮忙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拜瑞·曼德尔:我不知道当经理以起诉相威胁时,我能不能在办事处继续待下去

戴的下一个证人是拜瑞·曼德尔,美林的助理法律总顾问,公司的另一个主要证人。他是公司内部负责第二轮调查的人。

曼德尔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教育和工作背景,然后说他是 1992 年加入美林的。他说他在公司的诉讼部,处理各种诉讼和规范性事务。曼德尔解释说,他第一次正式接触到案件是在我写信给董事会的时候,然后他立即开始审查前一次调查是否充分,以建议董事会采取合适的行动。

“曼德尔先生,你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你的调查吗?有什么结论,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戴问道。

“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找有关人员谈话,”曼德尔回答道,“我们和斯古利先生谈,重新研究文件。我仔细研究了麦迪茨先生整理的资料,和他交谈。最后我们集中研究了斯古利先生在前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和在后一封信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某个角度来看,它们属于涉嫌违反保险法的范畴。而我们认为,斯古利先生提出的最大问题是作弊——他称之为小抄。我们无法证实小抄的存在,虽然发现有分发答案册的情况,但那是在模拟考中。然而,我们找到了或许能排除小抄存在的证据。我们发现,保险人员曾经开过一些会议,会上他们解释并强调保险法,这几乎是与考试同时的。所以,如果他们在利用事先的考试答案,就不太可能还开这种会议,至少我们按常理可以这样推断。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至少有人会质疑在

考试期间,开这样的会议是否合适。所以,我们要求这些开会的人员重新参加考试,开会人员我们都有记录。”

“在篡改研讨会开销的问题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斯古利先生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准确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我们最终要求巴顿先生返还部分金额。至于对市政收益基金的误导陈述的指控,我们认为,有可能是巴顿先生在谈到市政收益基金是否提前偿付的问题上,误导了客户,因此我们给予客户解除合同的权力。在注册违规问题上,即在没有注册的州开立账户,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只发生过两次。至于操纵比赛人数,我们发现斯古利先生的描述是准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要求因比赛获胜而获取免费旅游的艾利斯先生和巴顿先生自掏腰包。还有新加坡航空的股票未经登记就进行出售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斯古利先生的那封信。我们的结论是,至少在某些场合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我们于是给购买者提供了解约的机会。最后,给巴顿先生开出了警告信——降职以及一段时间内从管理层除名的警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想,这就是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和采取的措施。”

曼德尔告诉仲裁组,他认为托马斯向我宣读的解雇通知是托马斯自己准备的,美林的法律部没有参与。他说,从10月1日起他就与斯蒂芬·琼斯约谈,他告诉琼斯有误会,托马斯并没有辞退我。曼德尔解释说,琼斯认为托马斯确实已经辞退了我。

“之后为了应对监管人员,你们有没有策划隐瞒斯古利先生提出的问题?”戴问道。

“绝对没有。”曼德尔回答。

“由于缺乏监管,实际上要判断那些指控还有你们的补救措施是否合适很难,是这样吗?”戴问道。

“是的,”曼德拉回答,“我们显然注意到了,有几个监管机构在查看我们的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了确实存在斯古利先生提出的不当操作,或者说不法行为,而它们得出的结论是,美林采取的行动恰当地处理了那些不法行为、不当操作。”

“我没有问题了。”戴说道。

戈尔开始了交叉盘问。他说,他觉得曼德尔对于之前调查的回顾非常全面。曼德尔说,他觉得我提出的两项指控,即使用小抄和乡村俱乐部名

单的滥用，缺乏根据，但是其他问题还是有所依据的。

曼德尔解释说，为了调查小抄的问题，他联系了相关人员，也就是那些可能提供小抄的保险人员。可是很显然，他们肯定会矢口否认的。他说，他也联系了办事处的其他理财顾问，问他们是否有小抄，他们都说没有。曼德尔得出结论，既然理财顾问在考试前进行特训，那么他们可能并没有小抄。因为如果有小抄，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参加特训了。

“你说你同提供小抄的人员联系了，”戈尔说，“对吗？”

“是的。”

“有哪些人呢？”

“我想我联系了哈尔先生，还有莎拉·格拉汉姆。”

戈尔惊讶地回答道：“哦？你联系了哈尔先生？”

“不是我，是我的同事奥瑞斯忒斯·米哈利。我相信他找过哈尔先生，并最终跟他联系上了。”

“你能证实吗？”

“他仅仅是作证。”康纳主席插了一句。

“我没法证实，”曼德尔回答，“至少我记得是这样的，我回去可以问他，可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记得没错。斯古利先生告诉我们，他从莎拉·格拉汉姆那儿拿到小抄，我和莎拉·格拉汉姆谈过，她否认了。”

“好的，先生，”戈尔说，“比尔·哈尔作证说，一些办事处不仅有而且可以提供小抄。你问他的时候，他告诉你了吗？”

“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没人告诉过我们。”

“不管怎样，哈尔先生跟你说的和跟我们说的不一样，你是这个意思，对吗？”

“嗯，如果你是说，哈尔先生告诉你们，他们利用事先准备的答案或者小抄去考试，那么，是的，他没跟我们说这些。”

“你和其他人谈过吗？”戈尔问道。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艾利斯先生、巴顿先生，可能还有托马斯先生谈过，还有那个理财顾问莎拉·格拉汉姆、哈尔先生和斯古利先生。我想，没有其他人了，现在我想到的就是这些。”

关于乡村俱乐部名单，戈尔告诉曼德尔，麦迪茨已经作证说，乡村俱乐部经理表示这个名单只能用于发放参观日的邀请。

曼德尔不久就承认，巴顿可能利用这个名单群发过三四次邮件。曼德

尔又说，他想这个名单已经从巴顿的电脑上清除了，不会再使用了。

戈尔接着让曼德尔看他自己在 1993 年 4 月 16 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关于曼德尔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陈述，戈尔问了几个问题。

在哈尔给 8 名理财顾问做保险考试培训的问题上，戈尔说：“你说带回家的考试卷必须独立完成，不能借助任何外部资料，你说‘当理财顾问回答问题时，威廉·T. 哈尔的确花了几个小时给他们上课’，这是你信中的原话，对吗？”

“是的。”

“你接下来的话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试是否违法，尚待商榷’？”

“是的。”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签署一份声明或者说宣誓书，保证他们不借助外部资料完成考试，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么他们在考试时得到答案，怎么能说不违法呢？”

“他们是否得到答案，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结论。我们不清楚，那是是否属于应予以禁止的外部帮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听到这一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肯定会有相互讨论，这或多或少都有些违禁性质，所以我们要求，在那种情况下参加考试的人重新考试，单独地，换一种考试方式。我们不想让这个再成为问题了。”当然，巴顿已经作证，在回答每个考试题之前都有一个讨论，会提供答案。

针对曼德尔信中提到的 1992 年 1 月已经停止使用画刊公司的考试系统一事，戈尔继续提问。

“我有一封画刊公司的信，表明从 1992 年 1 月 1 日到 1992 年 8 月 26 日，157 位理财顾问的考卷和他们以前考过的一样，”戈尔说，“如果是这种情况，违法吗？”

“我无法得出结论，”曼德尔说，“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真是惊呆了。曼德尔是负责第二次内部调查的，但他似乎对很多东西都不确定。他认为，他在这场保险舞弊丑闻的调查中找艾利斯、巴顿，也许还有托马斯谈过话，而他们当中没有人把我在 1992 年 1 月 20 日信中提及的一个问题——有人给我提供一份小抄——当回事。曼德尔认为调查还涉及同哈尔的谈话。他认为，美林在 1992 年 1 月已经停止使用画刊公司的考试系统，但是他不确定。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戈尔继续问有关我被解雇的细节问题。曼德尔坚持认为，在我的 U-5 表上写上“擅离职守”的目的不是让我上黑名单，只是我拒绝回去工作，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描述词。他说，他有一份托马斯声明的复印件，也注意到了其中有威胁起诉的意思。他还说，他也知道伊尼德办事处很小。

“你觉得如果在一个公司工作，老板威胁要起诉你，你还能若无其事地继续上班吗？”戈尔质问道。

“嗯，我不知道。但是他之前并没有起诉，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起诉他，”曼德尔回答，“我认为他有考虑过这件事。但是那时，他还没有起诉，我也不认为他真的着手起诉了。”

“如果经理以起诉相威胁，你能不能在办事处继续待下去？”戈尔问道。

“我不知道，”曼德尔回答，“如果我有机会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我会去解决。我不能说，我能和每一个一起工作的人相处得很好，但是我有一套相处的方法。”

戈尔认定曼德尔没有在托马斯威胁起诉的时候帮过我。他问曼德尔：“那么实际上，你是希望斯古利先生回去继续与——或者说试图与——托马斯共事，对吗？”

“是的，”曼德尔回答说，“我当然希望他回来，我们本来希望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他不回来上班，问题就解决不了。”

戈尔要问曼德尔的就是这些。我再一次觉得，美林的证人对我比对公司更上心。曼德尔认为，我关于违法行为的报告是准确的，当然除了对使用小抄的指控。同时，我也看到他的第二次内部调查甚至比第一次还要马虎。我给董事会的信中提到特克索马地区的 14 位高管成员和 281 位理财顾问，画刊公司给我的信息，显示他们就是参加考试的人员，但是他一个都没有约谈。除此之外，曼德尔说他记得约谈过哈尔，这也不对，据他自己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上说，他那时候不知道哈尔的住处，尽管据哈尔自己说，美林有他的永久地址。另外，曼德尔和米哈利还是没有约谈那位第二次内部调查时在达拉斯的驻地保险专家薛皮恩，不过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和第一次麦迪茨的内部调查一样，这次他们唯一约谈过的只有莎拉·格拉汉姆，她可能是保险舞弊丑闻的参与者或知情者。

然而，在我被不当解雇这一问题上，更重要的是两件事。首先，曼德尔找了一个借口，说公司在我的 U-5 表上写上“擅离职守”，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描述词。其次，当戈尔问曼德尔，他能不能在老板威胁要起诉的公司

里工作，他的回答是“不知道”。这正是我要表明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要回到伊尼德办事处是不现实的。

杰克·托马斯：我会用任何可能的罪名起诉斯古利

接下来是杰克·托马斯。美林当然想表明，托马斯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得知我给董事会的长达 31 页的信时，和任何一个被冤枉的人反应一样，说我是骗子，威胁要起诉我，然后让我离开伊尼德办事处。

托马斯向仲裁组介绍了他的背景。他说他 1990 年进美林，1992 年 2 月左右当上伊尼德办事处的驻地经理，1993 年离开公司。他坚持说，他的离开和我的指控没有任何关系，他说一个叫罗布·布莱维的人让他去另一家证券公司做分公司经理。康纳主席在之前说过，布莱维是他的股票经纪人。现在康纳主席将要听取这位关键人物的证词，他正是我说的真正辞退我的人。根据巴顿的证词，他恰好也是康纳的股票经纪人的好朋友，而康纳私下里肯定很信任他的经纪人。既然布莱维和托马斯是好朋友，那就有理由相信，康纳主席会觉得托马斯的证词是可信的。

• 戴开门见山地问：“你是否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解雇了基思·斯古利？”

“不，我没有。”托马斯回答。

“你在 9 月 28 日早晨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戴问道。

“我在椅子上发现了一份呈给董事会的信件复印件，不是在桌上，也没有人亲自把它交给我，”托马斯回答，“它在我的椅子上，所以当我拉开椅子，就看到它了。”

“你在 9 月 28 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或者之前任何时候有没有和拜瑞·克拉克说过，斯古利先生是一个毒瘤，你不会让他影响另外两位理财顾问迈克尔·迪兰先生和斯通先生？”戴问道。

“我说这话不是针对他本人，这一点我很确定，”托马斯回答说，“我只是针对某些对公司的负面看法和言论。正如基思一样，我也选择了这个公司想干一番事业，因此，为了让其他经纪人不受那些负面看法的影响，我愿意做任何事。”

戴问托马斯，他看信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我不得不说，我大为光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火。”托马斯回答。

“你为什么光火？”

“嗯，我在 1987 年 41 岁的时候进入这个行业，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可谓是一个重大转折。从那时起，在事业上我一直一帆风顺，在此之前无论是做职员还是做经理，我都没有招致任何投诉，也没有任何人针对我向监管机构发出过正式投诉或投诉信。我从事这一行那么多年，我不能容忍破坏我事业的任何问题，况且现在的问题还不是事实。”

“你之后做了什么没有？”

“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律师，他是我的朋友，现在仍然属于高等法院级别。他建议我找基思，跟他说他写的明显是谎话，大家也都知道那是谎话。我觉得我办不到，因为我太生气了。所以我选择写在备忘录上，然后再给他，我不希望有什么误解，所以叫了迈克尔·迪兰，让他作证，一字一句地确认。”

“那么，你受雇于美林时，没有在公司里参与或者察觉到小抄现象，是吗？”戴问。

“是的，绝对没有。”

“那么你有没有察觉在州立保险继续教育考试中的其他不当操作？”

“没有。”

“那么你写的这份声明用的是什么语气？气愤？不安？还是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我没有公然表露愤怒，我的语气应该是有所节制地表达了气愤。”

“斯古利先生的反应又如何？”

“事实上不算什么回复，他只是要了这份声明的复印件。”

“你那时是否要斯古利先生离开美林办事处？”

“没有。”

“那么他呢，事实上离开了吗？”

“不，他没有马上离开。”

“第二天他来上班了吗？”

“是的，他来了。”托马斯接着解释说，第二天他和我说，由于我在纽约同曼德尔、米哈利和迪恩开会，错过了培训，所以需要补上。关于这点我已经作过证，托马斯宣读那份声明的第二天，也就是 9 月 29 日，我在办公室里待了几个小时，准备文件以应对托马斯可能的起诉。下午 2 点半我准备

出门去和斯蒂芬·琼斯会面时，托马斯说起了培训的事，但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其他事。因为托马斯前一天对我的敌对态度，我当时觉得他提起那个培训，只是因为他在考虑改变一下对我的态度。

“在此之前，你有没有和哪个美林的律师谈过你对基思·斯古利的声明？”戴问。

“没有。”托马斯回答。

“那么，你是不是以美林办事处经理的身份行事的？”戴问。

“你是指在写这份声明的时候吗？”

“对。”

“是的。”

“你告诉他，作为美林办事处的经理，你将代表美林起诉他？”

“没有，根本没有。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私人问题，美林并没有和基思·斯古利对立起来，只是我想让他收回威胁到我事业的一份声明。”

“那么你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可以和基思·斯古利共事吗？”

“我觉得可以。”

“拜瑞·曼德尔有没有试图说服你，不要起诉基思·斯古利诽谤？”

“有。”

“但他不是你的私人律师，没有权利让你那么做，是吗？”

“是的，他没有权利。”

“你到底有没有起诉斯古利先生诽谤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拜瑞·曼德尔的请求。我觉得，他想从公司的角度考虑，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火上浇油。”

“那么你今天的证词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斯古利先生那时回去工作，你认为只要他能够尽职，你是可以和他共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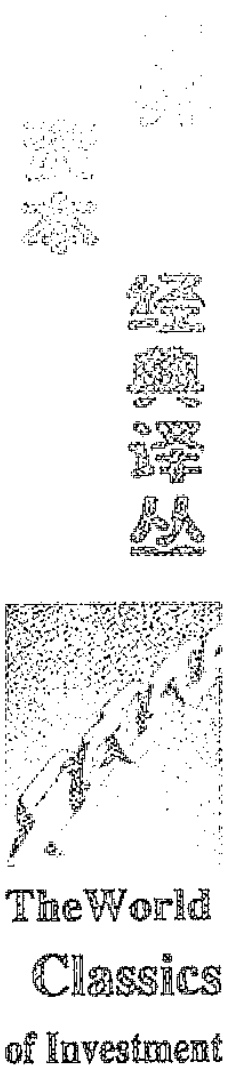
“是的。”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我再次强调，因为这是我和基思之间的事，也只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戴问托马斯，如果他向我宣读的声明是关于私人问题的，为什么他使用有美林笺头的纸张。

“这是我能找到的第一张纸。”托马斯回答说。



“你是否知道，私人信件是不允许用美林笺头的？”戴问道。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托马斯回答，“我拿起那张纸就开始写，也没有去找便签簿之类的东西。”

托马斯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他给我的那张纸，不是他最初所写的那张，而是经费特纳打印的。

托马斯接着作证，说我的指控——他是保险考试不当操作的知情者或者参与者的指控——是谎话。这是他为什么要起诉我诽谤的原因。

然而，我相信他的证词缺乏根据，我有证据证明，他之前就知道我怀疑存在小抄，因为我在1月20日的信里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而根据巴顿的证词，是托马斯和艾利斯处理的。我也认为，托马斯知道由哈尔帮助逐题通过考试的那8个理财顾问，因为麦迪茨的调查，需要重新参加考试。毕竟，早在托马斯威胁要起诉我的很多天之前，这件事便发生了。

戈尔交叉盘问时，问到托马斯关于1月20日的信。“托马斯先生，我想让你看一下控方的20号证据，你以前看到过吗？”

托马斯回答说，他看到过，戈尔就问是什么时候。

“我想，直到我必须翻阅一些文件的那天，才看到那份正式的备忘录。”

托马斯回答说。

“那么你在1992年1月的时候还没有看过？”戈尔问。

“是的，我记得没有。”

“你记得有一次基思在纽约吗？我猜大概是在9月24日前后。”

“嗯。”

“在伊尼德办事处，你和一个从纽约来的叫保罗的人会面过，记得吗？”

“不，我不记得。”

“当斯古利先生把信提交给董事会的时候，有没有人打电话告诉你？”

“我记得我是这样知道这件事的。平常，我来到办公室，就会打电话给伊尼德办事处或者俄克拉荷马市办事处，或者两个都打，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生产经理人，所以会打电话问有没有我的口信。那天也一样，我想我就是在那时知道这件事的。”

“不好意思，那天是几号？”

“我猜应该是周一早上，28号吧。”

“不好意思，再问一句，是谁告诉你的呢？”

“不是布兰特就是昆特。”

“好的。我记得你说过，斯古利先生把一份 9 月 17 日呈给董事会的信件复印件放在你的椅子上，对吗？”

“对的。”

“你看到他那么做了吗？”

“没有。”

“你是否记得 1992 年 9 月 22 日前后，斯古利先生和迪兰先生起身前往纽约？”

“是的，先生。”

戈尔再一次问：“你那时没有在办公室里和昆特·艾利斯还有一个从纽约来的叫保罗的人会面吗？”

“在伊尼德办事处吗？”

“是的，先生。”

“我不记得。”

“好的。你是否记得你叫迈克尔·迪兰在去机场之前等几分钟，见一下保罗？”

“不记得。”

虽然还不知道保罗是谁，但是我不相信托马斯不记得和他的会面。托马斯清楚地记得我和迪兰去纽约的事，还有 9 月 28 日当天和之后的情况，以及那段时间发生的其他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记得和这个纽约来的保罗的会面。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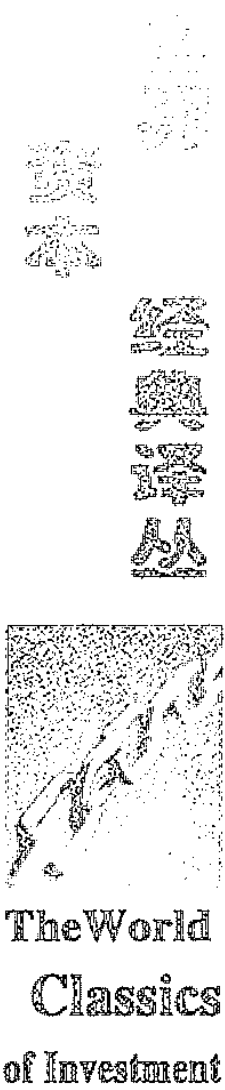
戈尔简短地问了托马斯，关于我针对他的其他指控，然后就回到托马斯对我信件的反应这一话题上。

“拜瑞·克拉克在此前作证时说，9 月 24 日你讲过类似这样的话，说斯古利先生是一个毒瘤，你不会让他影响到迈克尔和格雷格，”戈尔说，“我知道你已经被问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你真不记得了？”

“是的。我不记得说过基思这个人是毒瘤。”托马斯回答，“在我看来，他的负面态度，如果听之任之，就会像毒瘤一样扩散，影响到办事处其他人的态度，而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

“克拉克先生表示，你在那天，也就是 9 月 24 日，极度气愤，”戈尔接着问，“你是否记得你那天说话时的情形？”

“不，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是在 28 号拿到这份备忘录之后才极度气愤的。”



“你指的不是 9 月 24 日董事会给克拉克先生的信?”

“是的,我指的不是那个。”

“那么克拉克和你在这一点上有分歧,我指的是,克拉克先生记得你是为了这个才生气的。”

“不,不是的。”

“那么你为了什么而生气?”

“那时候我没有生气。如果我记得没错,我那时认为他去纽约和那里的人讨论他的情况,而没有去参加职业发展项目(PDP)。我想,与拜瑞的谈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谈话的内容是关于那封信……我是说,与那次会议有关的所有问题。”

“好的,先生。”戈尔说,“你给基思的信中威胁要起诉他,对吗?”

“是的。”

“你要起诉他什么呢?”

“我能想到的所有罪名,尤其是诽谤和人格污蔑。”

“那时候,你肯定对他非常生气,是吗?”

“是的。”

“而你到现在还讨厌他,是吗?”

“我不得不说,是这样的。”

“你恨他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不用再看到他,你也挺乐意的?”

“那没什么不好。”

“你有没有收回对他的起诉威胁?”

“没有,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也没有和他说过,你不会起诉他?”

“是的。”

“在你看来,美林也没有对他做过类似的行为?”

“没有告诉他我不会起诉他吗?”

“对。”

“据我所知,是没有。”

“他们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授权,是吗?”

“是的。”

戈尔继续提问，同托马斯确认了，伊尼德办事处确实很小，无论从机构大小还是人员数量的角度。他问托马斯：“如果老板起诉你，你能否继续工作？”

“可以。”托马斯回答。

“真的吗？”

“是的。”

“你真的能够和起诉你的老板共事？”

“只要他把它当作私人问题而不每天提起，或是采取敌对态度什么的。”

“你有没有告诉斯古利先生，你不会天天提起起诉，你会把它当私人问题处理，你们也不用在工作时间为这件事烦恼？”

“我们没谈过，直到今天都没有和他说过话。”

那天迟些时候，施密特告诉戈尔和我，托马斯说老板起诉他而他还能继续工作的时候，他看到仲裁员巴恩斯笑了。我的律师们和我一直坚信，我的离职理由非常充分，而巴恩斯的这一举动更加鼓舞了我们。

戈尔接着向托马斯施压：“你是不是和斯古利先生说过，他的停职信不会公开？”

“是的。”

“你曾说过他是一个骗子，对吗？”

“是的，我说过。”

“你说你会起诉‘你及你的家人’，‘你的家人’是指他的妻子吗？”

“不管是谁。”

“你能否告诉我，斯古利先生怎么撒谎了？”

“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任何小抄计划的参与者，我甚至不在场。”

“谢谢，”戈尔说，“我问完了。”

戴继续询问：“那么，你虽然愤怒，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除了那次备忘录事件。但是，你说你不会以此作为工作中抵制他的理由。你还说，在斯古利先生受雇期间……你有没有用其他方式向他表示过愤怒？”

“没有。”

“那么有没有制造什么敌对的工作气氛？”

“没有。”

戈尔想再交叉盘问，所以就问托马斯：“你从没有和基思说过，你不会

起诉他，是吗？”

“是的。”托马斯回答。

轮到戴问话了：“你是不是没有任何机会收回声明，或是采取调整措施以便和他共事？”

“根本没有。”

又轮到戈尔：“你从未给他写过信说，‘顺便说一声，我收回我的声明，我不会起诉你的。’你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吗？”

“是的。”托马斯回答。

“而你本可以这样做的，是吗？”戈尔问。

“是可以的。”托马斯回应。

接着仲裁员普雷斯顿问了托马斯一些问题，而我发现，他的回答极为有趣。

“托马斯先生，在你 1992 年 9 月 28 日把备忘录发给斯古利先生之后，有没有美林职员或者代表美林的人员和你谈过那份备忘录的事？”普雷斯顿问。

“没有，”托马斯回答，“除了我刚才说过，拜瑞·曼德尔让我不要起诉。”

普雷斯顿接着问：“有没有人提到过，那份备忘录是写在公司信笺上的？”

“没有。”

我再一次惊呆了。如果托马斯给我备忘录是他的个人行为，而他却没有因为在那样敏感的时刻做出如此激进的行为而受到直接上级或是纽约总部的指责，这也太不合常理了。我想知道，托马斯是如何避开这一麻烦的。

之后，在我知道保罗的身份以后，我才得出结论，托马斯未受指责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很可能是，1992 年 9 月 22 日保罗与他在伊尼德会面是向他传达高层的计划。

我真不敢相信，托马斯会说他直到星期一，也就是 9 月 28 日，去伊尼德办事处之前才得知我那 31 页的信，他竟然还说看到他椅子上的信件复印件，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拿起一张纸，写下他的声明。事实上，托马斯在那个星期一下午给我的声明中写道，“你大概不会奇怪我早就得知事情的原委了。”确实，要说我的经理在我那封 31 页纸的信件到达纽约一周后才获

悉此事，实在讲不通。在我看来，杰克·托马斯撒下了弥天大谎，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仲裁组也看得出来。

在我看来，美林和托马斯是通过两份在仲裁前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法律文件来掩盖他和保罗的会面，以加速仲裁进程。

美林在它修正过的回答中表明，托马斯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得知我写给董事会的信，在声明中还添加了托马斯的书面证词，说明他是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前后得知这封信的。如果保罗在 9 月 21 日，也就是我的 13 封信件连夜送达纽约总部的当天，飞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伊尼德办事处，那么以上的两项声明均很难成立。我相信，托马斯和美林认为，如果他们坚持托马斯是在 9 月 28 日得知此事而临时做出反应的，会对他们更有利。

迈克尔·鲁斯塔德教授：铁证如山

我的最后一位证人是迈克尔·鲁斯塔德教授，惩罚性赔偿问题的专家。鲁斯塔德教授基于他在惩罚性赔偿方面的工作在法律界享有盛名，被很多人誉为研究该问题的权威。鲁斯塔德大体介绍了他的法律背景，包括在哈佛法学院关于惩罚性赔偿方面的课题。鲁斯塔德告诉仲裁组，他在其学术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事的是惩罚性赔偿问题的实证工作。

鲁斯塔德说，他被美国律师协会委任写一篇关于惩罚性赔偿问题的论文，他还写过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文章，也曾经在国会的两个分支——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供过这方面的证词。

鲁斯塔德告诉仲裁组，他是第一次作为个人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我很高兴能请到他来帮忙，我是从伊尼德的一位律师那儿得知他的。当我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我和美林之间的官司的时候，他很感兴趣，让我把相关文件寄过去。看了资料以后，他的兴趣更大了，他认为，我能够挑战这样的巨头勇气可嘉，而且公司的行为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他看到我的案子中需要有惩罚性赔偿方面的证词，当得知我被美林解雇后的经济状况，便同意减少出庭费，以便我能够负担得起。

戈尔问鲁斯塔德：“俄克拉荷马州惩罚性赔偿的官方标准是什么？”
“官方标准是要证明，被告是由于故意或者疏忽，或者用压迫、欺诈、蓄意侵害的方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可以是事实上的，也可以是推断的。”鲁

资本
经典译丛



斯塔德回答，“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恶意的动机或者心理状态判处惩罚性赔偿，那是所谓的欺诈和蓄意侵害。也可以根据过失程度更高的故意或者比有意识的不当操作程度更低的疏忽，来证明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那么俄克拉荷马州的惩罚性赔偿有什么功能？”戈尔问。

“嗯，功能是法定的。”鲁斯塔德回答说，“惩罚和威慑是最基本的也是密不可分的两项功能。关键是确定被告是否应该赔偿损失，无论是给基思·斯古利，还是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假设如果指控属实，如果仲裁组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保险经纪人的注册过程中确实存在违规操作，那么问题就是，美林是否应该为其违规操作受到惩罚。至于威慑功能，首先如果你想要给整个金融行业传递一个信息的话，就属于一般威慑。然后是特殊威慑，只是针对美林，制止它重复同样的操作。”

“据称，有人把举报热线的信息泄露给了伊尼德办事处。基思·斯古利指控美林把他列入黑名单，报复他，毁了他的生活，这种情况适用威慑功能。问题是，你是否想传递一个信息来制止重复行为的发生？那么你就要确保美林不再重复同样的操作。如果小抄确实存在，如果有人确实得到并且利用小抄考试，甚至更糟，他们根本就不用考试，那么这些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事实上，确实有人把举报热线的信息泄露给了伊尼德办事处，而之后杰克·托马斯先生就改变了对斯古利的态度，那么他们就必须为斯古利的损失和对俄克拉荷马州消费者的侵害承担赔偿责任。我们有执照法，这我很熟悉，而且也查看过，经纪人必须有执业证。”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明。”鲁斯塔德继续讲道，“惩罚性赔偿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很重要。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私人检举，这在惩罚性赔偿中经常被提及。我们认为，公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看了美林的宣言，它宣称自己不仅秉承高道德标准，而且是最高道德标准，可是有一个员工到那儿不到一年，就发现了很多偏离这些标准的做法。我是指，这样的案子迫切需要有私人检举来维护‘吹口哨’制度，即检举制度。人们常常看到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而不去揭发，这不奇怪。举个例子，在林肯储蓄和贷款项目中，我们就缺少一个基思·斯古利。成百上千的人在处理那些会计报表，他们看到问题却不揭发，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法律系统应该保护像斯古利这样的人。‘吹口哨’这一概念来源于英国，那时警察用的是哨子。而现在，美林却让基思·斯古利自咽苦果。”

“我觉得那是你们应该考虑的。即使我们不关心他会怎么样，那么以

后呢？金融行业又该何去何从？这方面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不可能一一发现，想一想，75岁高龄的老太太们在购买人寿保险时，怎么能知道（理财顾问们）是不是有合法的执业证，有没有参加考试？如果他们没有参加考试，他们就有可能做出增加消费者风险的决定。要想规范所有可能的不当行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外部资源，只能依靠内部人员揭露。”

鲁斯塔德接着解释说，如果有充分而明确的证据证明，以故意或疏忽、压迫、欺诈、蓄意侵害的方式侵害他人的权益，那么惩罚性赔偿的上限可以提高。戈尔接着问，我的案子是否适用上限提高的情形。

“在这个案子中，提高上限是……如果事实是……我所看到的那些证据，它显然适用，”鲁斯塔德回答，“毫无疑问，提高的空间很大，我们看到不只一个，而是有很多个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应该予以制止。显然公共规则强调，我们不能参与任何违法或者不道德的行为。他们让基思参加这个环法现金管理账户竞赛，这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想把他的积分分给所有经纪人，美林也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你有没有看过美林的资产，对于赔偿的数额是否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嗯，在惩罚性赔偿数额问题上，可以把被告的财产状况考虑进来，”鲁斯塔德回答，“这个数字必须能够给美林的董事会一个警示，可以考虑多大的数额才能惩罚美林，制止它再犯。关于美林的销售额，我是从它公开的1994年12月30日报表上获悉的，他们的净销售额是182.33亿美元，可以用净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参考。你应该不想让美林破产，但同时，你也不能隔靴搔痒地意思一下。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虑被告的资产，可以是净销售额，也可以是净收入的一定比例。关于净收入，打个比方，1994年是10.2亿美元，我们说的可是全球500强公司。问题是，多大的数额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你能不能给仲裁组提供一个大致的你认为合适的范围？”戈尔问。

“从全国的惩罚性赔偿案件来看，平均赔偿额是330万美元，”鲁斯塔德回答，“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数额是否合适。我想这必须考虑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还有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美林的净资产。我查看了1987～1994年间的59个惩罚性赔偿案例的赔偿额，大多是以资产作为标准的。针对希尔森或者某个大型能源公司的案件，赔偿额就是8000万美元，而这些公司与美林规模资产相当。再举例说，针对美国大陆公司这种强大的公

司，像储蓄、贷款、证券案件，赔偿额就高达 4.1 亿美元。我没有说有哪个数额符合……而是你必须把赔偿额同惩罚威慑功能，还有资产联系起来。但是，在这个领域，一直有高额赔偿的先例。出现亿位数高额赔偿，通常是针对那些顶级巨头，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石油案，这也是一个商业合同案，其赔偿额就高达 30 亿美元。”

“裁定那么高额的赔偿，不是因为审判员疯了，而是赔偿额是同公司资产对应的。所以我们说，裁定必须与公司规模和资产对应，那么在找到确凿证据证明确实存在侵害后，就可以进行对应的赔偿裁定，而我相信本案证据确凿。”

戈尔问完了。但是，出现了百万和亿的数量级，你可以认定，戴一定会交叉盘问的。

“教授，你经常对没有听说过的案件发表惩罚性赔偿方面的意见吗？”戴问道。

“事实上，是的。”鲁斯塔德回答。

“好的。”戴说。

鲁斯塔德希望进一步解释：“让我来回答一下。媒体经常请我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发表评论，我通常是研究的多，评论的少。举例说，我在《全国律师日报》上做过关于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案件的评论，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做过通用赛拉皮卡案件的评论。我还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针对赔偿额、证据充分性等问题评论过。”

戴显然不想再听了，他的话问完了，戈尔也没有再问。鲁斯塔德的证词很关键，他给仲裁组的信息非常明确，他作为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一个顶级专家，表示我的案子可以提高赔偿上限，而且提高的空间非常大。他说明，我们有一系列确凿的证据表明，美林的行为应该得到惩罚，仲裁组和证券行业也应该对其予以制止。

麦迪茨和曼德尔的证词已经表明，我报告的违法行为确有发生，当然除了保险考试中广泛使用不当方法的这一项指控。然而，有了哈尔的证词和画刊公司 77 页纸的打印资料，我相信仲裁员们肯定能看穿麦迪茨和曼德尔的证词，特别是，这两个调查员在各自的保险考试舞弊问题的调查中，只约谈了莎拉·格拉汉姆一个人。而现在，鲁斯塔德又表示，对这样的行为应怎样处理，我希望仲裁组能够明确地接收到这个信息。

艾伦·罗克勒：我有点糊涂了，这件事拖得太久了

戴准备好让美林的最后一位证人艾伦·罗克勒出庭了，他是洛杉矶的一位证券专家。

罗克勒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背景，说他从 1953 年就进入证券行业，1985 年他开始以专家证人的身份进入咨询领域，已经为大约 200 个案件提供过证词，也曾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美国仲裁协会等机构担任过仲裁员，参与了 150 多个案件的仲裁。

戴问罗克勒，他认为美林在该行业中的地位如何。“嗯，首先，你知道，这个行业划分为好几类，美林可以归入大型的全方位证券服务公司，”罗克勒回答，“你这么说的话，大概有六七家可以与之相当的公司。而据我所知，不管在哪种排名中，美林都名列前茅。”

“听了本案的证词，”戴说，“对于美林对斯古利先生的指控所做出的反应，你有什么看法吗？”

“是的。”罗克勒回答。

“你有何看法？”

“我还是要把美林和其他的证券公司做个比较。我曾经做过这些公司的服务人员、对手和同事，可以说，美林在这个案件中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该行业对于该类问题的一般反应，他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非常卖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先是麦迪茨先生带领的小组，然后是拜瑞·曼德尔的调查组。他们显然研究了每一项指控，给予回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后，他们还必须回应监管机构的调查。我看到了曼德尔先生写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俄克拉荷马州保险委员会等机构的一系列信件。他们真的是尽其所能，积极参与调查，我认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其他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做到他们那样的程度。”

“对于斯古利先生指控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你有什么看法？”

“嗯，我认为，唯一会影响到公众并属于监管范围的问题是所谓的保险小抄，而这个问题没有被证实。”

“关于斯古利先生的 U-5 表，你有何看法？”

“在我工作过的公司，U-5 表通常是由总部的登记部门签发的，但是真

正同业务代表或理财顾问结束雇佣关系的是办事处的经理。如果是我，我作为一个办事处经理，通常会告知登记部门，在 U-5 表上写什么内容。在看过本案的情况后，我认为没有比擅离职守更合适的词了。”

戴问完了。施密特接着交叉盘问，他要让罗克勒彻底瓦解。

施密特很快表明，罗克勒没有听完案件的所有证词，这一点戴自己也说过，他是前一天才到的，前两天的听证会都没有到场，我的证词也只是听了 1 个小时。

“好，”施密特说，“那么你是基于什么做出以上判断的？”

“我看了文件、信件等证物，”罗克勒回答，“我是说，他们给我寄了那么厚的一本关于证物的本子。”他用手示意了一下。

“斯古利先生的证词里，关于他在美林的遭遇，你听了多少？”施密特问。

“正如我刚才回答的，我没有听到他的证词，”罗克勒回答，“我那时不在这儿，不过我看了他的信。”

“也就是说，从斯古利的角度来讲述的案情，你根本没听到？”

“我认为，看了他的信件之后，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嗯，我指的是，他在仲裁庭上的直接证词。”

“哦，那没有。我显然没有听到。”

施密特把话题转到我的 U-5 表上。他向罗克勒表明，在离开公司的原因一栏，不必非要写“擅离职守”，可以写“与管理层意见不合”，这样就不太容易使证券行业其他可能的雇主对他产生成见。

“你是否知道，《俄克拉荷马州蓝天法》(Oklahoma Blue Sky Law)规定，证券行业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应受到惩治？”施密特问。

“我想是的。”罗克勒回答。

“你昨天有没有听比尔·哈尔的证词？”

“有。”

“你有没有听到他说，在小抄问题上，还有更深的内幕？”

“关于这一点我很困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坐得太远了，没有听到他讲的每句话。”

“嗯，以你这一行专家的身份，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斯古利先生觉得存在小抄，或是更严重的问题，比如为经纪人代考，他必须报告吗？不是吗？”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先生，我猜如果他觉得是，那就是吧。你知道，我们可以抓住一个事件，把它扩大，使它最后偏离事实或者让它变成事实。我不确定斯古利先生是否真的清楚，那天是怎么回事。”

我再一次惊呆了。不仅如罗克勒说的那样，我困惑了，他自己也糊涂了。“那天”，他应该指的是那个周六上午的会议，哈尔手把手地领着 8 个理财顾问通过了考试。这跟小抄还有哈尔证词中所说的销售小姐代理理财顾问考试，完全是不同的问题。

“好的。”施密特说，“你是说，斯古利不应该在小抄问题上做些什么，因为这是他凭空编造的？”

“因为他没有事实支撑。”

“好的。那么他是应该作为调查者，还是报告给美林要求展开调查呢？”

“我觉得——不过我的看法也许不对，斯古利先生在充当一个调查者，他到处调查，盘问了很多，问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他是在调查。”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有点糊涂了，这件事拖得太久了。”

施密特问完了。

美林著名的证券专家，这位曾经在大约 200 个案子中担当过专家证人、在大约 150 个案件中担任过仲裁员的先生，居然糊涂了。但是有一点他说对了，这个问题拖了太长时间了。然而，他和其他人没有料到的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结陈词：一件极不寻常的案子

到了总结陈词的时刻了，由戴首先陈述。

“这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案件，我想这一点我们都是认同的。”戴说，“如果要回答本案中是否确有解雇的事实，我认为，证据很清楚，美林不想解雇基思·斯古利，事实上，他也不是真的被美林解雇的。”

“杰克·托马斯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本可以谨慎考虑一番的，但他的反应也合乎常理。斯古利先生的指控，尤其是对托马斯先生的指控，令人无法容忍。而托马斯先生也说过，他听从别人的意见，不打算以损害、诽

谤或其他名义提起诉讼。”戴选择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托马斯虽然不打算起诉我，但他的这个打算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公司一再要求斯古利先生回来上班，”戴继续说，“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他的举动，还有证词中发现这个事实。我们看一下构成实质性解雇内部检举人员的要素：首先，揭发的主要问题必须是违反法律、法规和宪法，而且造成社会影响的行为；其次，揭发人必须出于善意，不能怀有怨气和恶意，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后一点事实上是指，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必须觉得他不可能继续工作。”

“让我们再快速地看一下这些指控和证词吧。在 CMA 账户竞赛中存在的违规操作，是由艾利斯先生的错误判断引起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客户受到影响，没有造成损失，也没有其他经济上的不良影响。这不是什么公共事件，而是公司内部事件，美林对艾利斯先生也进行了责罚。”

“对巴顿先生利用那份乡村俱乐部名单发送广告的指控，我认为，这几乎是，也的确是，斯古利先生工作态度的生动写照，他是一个到处找事投诉的人。至于研讨会费用一事，纯粹是内部的账务问题，没有欺诈，也没有挪用、侵占资金，没有证据或证词表明巴顿先生因此事非法动过公司的一分钱。将他从管理层除名 18 个月的处罚已经足够了。这是公共问题吗？当然不是。”

“给拜瑞·克拉克转移资产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里谈论吗？如果美林给过一个员工这样的承诺，那么这也是美林和那个员工之间的事。这不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它显然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乔·巴采尔的解雇一事。想一想，选择一，美林解雇一个违规招徕客户的员工；选择二，找律师，同另外一家纽约证券公司打官司。试问，他们是否有这个权利解雇他？是的。”

“再看市政收益基金。巴顿先生是犯了错，但是客户投诉了吗？实际受到损失或是有损失危险了吗？是公共问题吗？不是。”

“经纪人州外销售时未按规定注册一事。我曾是一名证券监管人员，每次都会积极地要求州外经纪人支付本地费用。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斯古利先生的投诉是从他小舅子的账户中得出的。而他摇身一变……他以检举者的身份指控托马斯先生没有在那个州注册。这实质上是一次技术违规。”

“斯古利先生在给董事会的 31 页信中说，‘我可以理解偶尔的违规，

我不会谴责偶然的单独的错误和违规现象,但是如果存在大范围的违法行为,已经到了应受到法律监禁的程度,那么我就不能容忍了。”

“请告诉我本案中应受监禁的例子,告诉我其中哪些是公共事件,告诉我在今天呈给仲裁组的材料中有这样的证据吗?你们不得不承认,从来没有一个案子的指控像这个案子一样,受到监管机构如此广泛的介入,以后也不会有。”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难道美林不是和他谈过,和他交流过吗——问题并不严重,你提出的问题不是生死攸关的,我们会处理解决,会采取行动的。感谢你让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戴说到这儿,我禁不住想起巴采尔因为帮助客户而被解雇;我也接到过警告,如果再给其他客户提供 15 美元的折扣,就会立即被解雇。

“美林方面不会惧怕任何一项指控,”戴继续说,“说他们因为这些指控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密谋掩盖真相,根本毫无根据。”

“你们听听,包括美林最高层在内的全国范围内掩盖真相的密谋!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可能称得上公共问题,就是斯古利先生所称的小抄。”

“这项指控还真是及时,在他开始咨询斯蒂芬·琼斯的前 30 天里,他还是理财顾问。就在那时,他听到莎拉·格拉汉姆说,‘我会给你寄一份小抄。’就这样,他拿到了一份模拟考试卷答案,那么斯古利先生有没有给她回电说,‘我的天,莎拉,我很担心你所说的。你说小抄,我的天,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真的很担心,我绝对不希望我的老板们卷入此事’,斯古利先生这样说了吗?”

“如果你们没发现这个细节,我想提请你们千万注意了,过了不到 9 个月时间,在 9 月 17 日他的信中,开始的 1/3 部分都是对全国范围内违反州立保险法使用小抄行为的指控。斯古利先生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知道,没人给他提供过小抄,他也从未看到过什么小抄,他的指控更没有任何依据。他想让莎拉·格拉汉姆做指纹测试,指纹测试?!”

“我观察了他在庭上的行为……特别是,比尔·哈尔在这儿的表现,我也看得一清二楚。他致电哈尔先生,想套他的话,这还是发生在 9 月 17 日信件风波之后。他未经哈尔先生同意,就录下他们的谈话。哈尔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完全否认存在小抄,否认自己在继续教育过程中有任何违法行为。”

我希望仲裁员们能按照戴的要求,记录下这段话。哈尔完全否认存在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小抄？他不是说了吗，如果没有我的规劝，小抄会泛滥成灾！戴肯定是希望仲裁员们像美林的证人那样，记忆力差得不得了。

戴接着说，我的指控充满恶意，因而我先前表明我的指控是出于善意的这一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他说，把问题说成公共事件是大谎话，没有任何证据或证词能表明问题的公共性。

戴接着表示，哈尔“攻击”薛皮恩仅仅是出于个人对他和美林的厌恶。他说我唯一的实质性指控，即保险考试舞弊的指控，是缺乏依据的恶意控告，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会给被揭露的相关人员及其职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一个合格的检举人，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戴继续说，“这个人应该是怎样的？他应该怎样行事？他不能心怀愤恨，不能出于恶意，不能为了个人得失。可我不觉得他符合以上标准，听好，我是一个律师，不是精神医生，我没有办法猜测这个人在想什么，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在咨询律师。”

“最后一项要点是，杰克一做出反应，他就被解雇了这一说辞。斯古利4天后在电话里承认，他一直在欺骗自己。在本案中，我们听到的证据最多不过是基思·斯古利记录的有关他的行为及其动机。”

“4天之后，他显然不认为自己真的被解雇了，也不认为自己实质上被解雇了。事实上，当他们请他回去工作时，他有一个终极保护者，鲍勃·迪恩，公司的第四号人物。周一早上迪恩就打电话给他，说，‘基思，你有任何问题，任何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号码。’”

戴继续为美林进行冗长的辩护。我要说的是，与托马斯对峙后的几天，琼斯和我都确信我被解雇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事实上也强调了好几次了。我们这一方对此没有任何困惑，我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一次也没有，更别提如戴所说，一直“欺骗”了。我真是诧异，他怎么能听完我的话之后，在自己的辩论中完全无视或是完全曲解我的意思呢？

戴接着控诉我沉迷于跟美林的官司，他宣称我根本无意继续工作，他再次无视证据。我清楚地表明，我想在证券行业谋生，而事实上我也回到了石油气行业。

戴总结道：“这种沉迷必须停止了。你失败了，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你没有证据。美林被迫再一次经历仲裁，它支付的仲裁费用应该首先得到补偿。我们恳请仲裁组裁决对方支付我们在辩护过程中支付的费用。谢谢。”

我对戴的总结陈词并不感到意外，我已经领教过了。当然，如果托马斯是在9月28日才得知，我在给董事会的信中提到他参与了保险考试舞弊案，那么他的反应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相信他之前就已经得知了。当然，如果你像戴和美林一样，全然不相信我提供的证据——也包括哈尔本人的证词，那么我对保险考试中存在作弊的控告就是恶意的，没有考虑公众利益的。

我很清楚，我的案件符合戴的三个条件，即实质性解雇内部检举人员的三个条件：首先，大部分指控是针对违法、违规或造成社会影响的行为；其次，我是出于善意，而没有考虑个人的经济得失；最后，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都会认为他不可能继续工作。

轮到戈尔总结陈词了。

“美林是行业最高道德标准的拥护者，或者说标榜自己是拥护者，或者说它希望别人这么认为，”戈尔说，“他们要求员工签署一个宣誓书，上面写明，每个员工都宣誓秉承最高道德标准，并在工作的每个方面都以此为标准。是的，他们真的让员工那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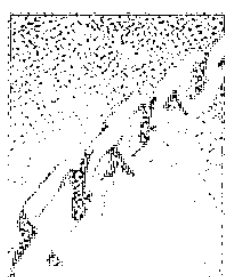
“斯古利先生是……在这次听证中没有任何地方能说明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也没有任何地方能说明他是一个不道德或是没有原则的人，然而，美林却尽其所能地把他说成是一个极端分子。”

“也许我们可以说，他是有些不同。他显然做任何事都很有激情，他在系列7考试中的确排名第一，在6个月还是8个月之后对400名执业者的排名中，他位列前10名。我认为，他不管做什么，都会付出加倍的努力，那就是我们能得出的关于斯古利先生的唯一结论。”

“如果他是一个麻烦制造专家，那么他会整天寻找打官司的机会，企图通过一次诉讼一劳永逸。可事实是，他之前在几家石油公司工作过，而在石油行业也会有很多麻烦。我确信他在之前的职业生涯中，肯定碰到过劳资争议或者适用诉讼的其他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起诉过，这回是第一次。”

“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们要求他签署的那份宣誓书，他非常当真，比我们听说的其他任何人都要当真。他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他看到他认为不对的事就予以报告。他必须亲自去调查吗？他得成为警察局或是FBI吗？他要亲自去搜集证据证明确有其事吗？如果他从独立的第三方得到消息，说存在不当操作，那么他报告给有关当局，这做得还不够吗？”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再则，什么是举报人员？是那些看到不合适的行为予以报告的人。美林的《商业行为准则》里有一条是报告不当行为的义务。‘雇员应当勤于质疑那些在自己看来违背重要美林道德标准的情况。应将不正当行为上报给任何一级可以处理该问题的管理层。’这是美林自己的准则，还有‘为了对举报行为保密，法律总顾问的办公室开通了一条热线’。它没有说，‘如果不是滔天大罪，你就不用向我们报告。如果不是有人要被判刑入狱的案件，你就不用报告。如果不是有人要被停职的情况，你就不用报告。如果不是有人要被罚款，或是被监管机构公开谴责，你就不用报告。’它说的是，‘即使是很小的不道德行为，我们也希望你能予以报告。’那么我想，如果是比不道德行为更严重的问题，他们也愿意听了，或者说，他们只是这样对外宣称的。”

“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告诉他，那条热线可能并不保密，他们会泄露给老板，也可能传到他的经理那边。本案涉及的经理，其中最主要的是昆特·艾利斯，他一直坐在法庭上，却从未出庭作证过；还有布兰特·巴顿，他作证过，我说的经理指的就是他们。我想，我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基思·斯古利，他们甚至希望从未见过他，没有聘用过他，还很有可能因为他才丢掉了美林的工作。显然，有很多记录在案的证据能表明这些。”

戈尔和施密特决定不传唤艾利斯出庭作证，因为其他证人的证词已经把他的不法行为和道德缺失昭然于众。另外，我们相信，他不太可能支持我说的任何事项。

“基思·斯古利仅仅是看到了他认为的违法行为，然后予以报告，”戈尔继续说，“就那么简单。美林说，我们在做调查，然后告诉他，调查已经结束了，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要么你所看到的不是事实，要么这些只是小事。这个结果让他无法接受，他的报告经历了重重障碍，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事实就是这样。然后麦迪茨先生说，‘嗨，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这个问题该宣告结束了。’这就是在8月13日的会面。”

“你们已经听过各个证人的证词，你们愿意相信谁，我没办法干涉，但是我相信，他们是要他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像其他人一样继续工作。意思就是，‘你既没有亲眼看到，也没有亲耳听到，现在你给我闭嘴，赶紧出去卖股票，出去做你的事。’第一次调查的结果基本上是，谁都没有受影响。”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所以斯古利先生自己动手，给董事会写信，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他已经向所在机构的最高层报告了，但是没有人理他。他和纽约来的调查员会谈，而他什么都做不了。我是说，他还能向谁报告？他不得不转向董事会，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事，他按照他们的指示，同任何他认为必要的管理层接触。”

“他这样做了，而管理层对他的敌意也当然随之升级，甚至连他在纽约碰到的人员也对他的报告挖苦讽刺，然后(米哈利)说，‘是啊，你当然是报告了每件事。’而麦迪茨先生为什么说，‘唉，我希望你的报告不是书面的。’这话今天他自己也承认了。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报告是口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闻不问；但如果是书面报告，我们就必须做点什么的了。’”

“斯古利先生在纽约的时候，巴顿先生说，‘哦，基思是个骗子，他的想法让人不太理解。’而杰克·托马斯说，‘他是办事处的毒瘤，我不想让他影响迈克尔和格雷格。’基思听说了这些话，他猜想他们马上要拿他开刀了。在他看来，他从纽约回来后，他们确实拿他开刀了。他被叫到办公室，他们递给他一封信，一封有美林笺头的信。意思是，‘我有一个证人，我想让你在上面签字，写上时间，立即离开这儿。’”

“我想，你们怎么认为，我不能干涉。但是，如果信是我的老板写的，他说他要起诉我和我的家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曾经当过一两次被告，当被告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虽然我是律师，可还是不舒服，我也做过证人，我什么角色都做过，让我告诉你们，我不可能和一个起诉我的人共事，更不用说这个人是我的老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这是我听过的最难容忍的事。”

“事实上，我想斯古利先生也非常震惊，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震惊的，我也会。我认为他没有其他选择，他搜集了资料，找到律师，然后听从律师的建议，他做的就是这些。他去见了斯蒂芬·琼斯，听从其建议。而从那天开始，斯蒂芬·琼斯就一直代理这个案子，替他出谋划策，直到我们接手为止。”

“斯古利先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托马斯先生要求他收回他说过的话，而他拒绝了，因为他相信，他的每句话都是有充分依据的。托马斯先生又威胁起诉他，他仍然坚持原则。当然直到今天为止，美林仍然声称这些指控是多么骇人听闻，他们不喜欢斯古利先生，我知道美林不喜欢斯古利先生。然而，证据摆在面前……”

这时候，戈尔简要回顾了我和莎拉·格拉汉姆的谈话、周六早晨和哈尔的会面、哈尔的证词、画刊公司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有关我对美林指控的证据。戈尔问仲裁组，如果美林认为它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采取某些措施呢？比如，要求那些周六晨会上的理财顾问重新参加保险考试、让巴顿删除那份乡村俱乐部名单的电脑记录、给予市政收益基金和新航股票的购买者解除合同的权利，以及让巴顿和艾利斯自己负担环法 CMA 竞赛后的旅游费用。

“我觉得真正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在他的 U-5 表上写了擅离职守，让他永远或者几乎不可能再从事证券行业，”戈尔接着说，“特别是，他们这样写并没有按照公司手册行事，他没有连续 3 天不予通知就缺席。他们能预料到所发生的任何事，他们知道他并没有擅离职守，知道有个经理威胁要起诉他，也知道他认为自己被解雇了，他们知道出了问题，却全部归罪于他，都是他的问题。”

“雇主不当解雇内部揭发人员，违反公共政策，而雇主的违法行为也暴露无疑，就是那么简单，这就是本案的性质。如果不把它归入这类案件，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类了。”

“在我看来，美林进行了雇员清理，从而把在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损失降到最低。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布兰特·巴顿在 1994 年被清理了；昆特·艾利斯在 1994 年的晚些时候也走了；里奥·诺布克也退休了。短短的 4 个月时间，他们清除了 3 个人，当然名义上是以其他的理由。不用说，他们不会承认，真正的理由是，不这么做，就会对他们的官司不利。”

“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尽其所能地把官司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因为他们知道损失不可避免。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他们也解雇了比尔·哈尔，他很早就被解雇了。他们没有在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开始调查前 4 个月，没有在报告公布时解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是这么想的，‘我们已经做了清理，你们处理吧。’全国证券交易协会的确予以了处理——用警告信的形式。”

“正是因为斯古利先生的报告，保险经纪人的测试和执业过程会更规范，不会再有客户名单的滥用，不会再有虚构费用损害美林股东利益的情况，经纪人将准确地向消费者描述证券，经纪人将在其他州正当注册，内部的竞赛不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未经批准的证券也不会再发行。”

“斯古利先生为美林做了一件好事，他们不应该解雇他，而应该感谢他，他们应该说，‘托马斯先生，你用美林的笺头威胁要起诉那个人、那个举报者，你的行为太离谱了，我们必须把你调到俄克拉荷马市，或者给你什么其他惩罚。’然后说，‘斯古利先生，我们清理了办事处，这里不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你可以回来了。’他们没有那么做，他们说的是，‘嗨，忘了它吧，回去工作，我知道你的老板在告你，但是别去想，继续工作，你应该能够克服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克服。”

“这样的不当解雇违反了公共政策，是侵权行为。判决惩罚性赔偿，这是有法可依的。我们请求你们判处惩罚性赔偿，来制止这种行为；否则，它还会继续发生。我想，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据莫过于拜瑞·克拉克的证词。”

“因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所有的事，你知道基思正在做的事，每一个细节你都看到了。那么拜瑞，你为什么不报告呢？’我也知道拜瑞是一个低调的人，你们也听到了他说，‘对不起，但是后果我承担不起，我承担不起失业的后果。’所以，拜瑞·克拉克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只有像斯古利先生这样有些另类的人，才有勇气站出来，并且承担最终一无所有，以离婚收场的结果。”

“克拉克先生做不到，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如果斯古利先生不能得到赔偿，那么我认为你们在告诉世人，‘是的，你不要报告什么违法行为，随大流吧。如果你看到了，就忘了吧，别去告发。’谢谢。”

这时候，康纳主席提醒我们，仲裁组的决议将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他代表仲裁组感谢各方的陈述，然后宣布听证结束。

我和美林之间历时 3 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该经历的程序它都经历了，现在是最终的有法律效力的仲裁，不管当事人愿意与否，这次的结果是最终裁决，不得上诉。我感觉很好，我知道我表现很好，完全达到了我的律师和我预想的要求，我彻底放松了。终于，我可以把 3 年的紧张对峙抛诸脑后，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情绪低谷。4 天来，在一个会议室里与一些人还有一个公司当面对峙，我的情绪跌宕起伏，他们憎恶我的胆量，而我从来没有屈服过。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赔偿额有多大，尤其是在鲁斯塔德教授提供了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有力证词之后，更让人有所期待。

那天傍晚，我请鲁斯塔德教授吃饭。我们讨论了当天的听证，我很高兴，他也认为事情很顺利。鲁斯塔德很了解我的案件，也相信美林应该为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它的道德行为负责。我向他表示了谢意，感谢他来俄克拉荷马为我作证，那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次是他第一次为私人官司作证。

第二天，我和戈尔、施密特还有其他几个马哈菲—戈尔事务所的律师一起吃午餐，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能赢得这次为期4天的仲裁听证。戈尔告诉我，在他20年的诉讼经历中，每一次诉讼结束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他希望能做得更好，总有一些事他觉得没来得及做或者不应该做，可他说，这次听证是唯一一次无可挑剔的经历。既然胜利属于我们，我们都同意在等待裁定的同时保持低调，不要洋洋得意，以防厄运找上我们。

戈尔和施密特告诉我，他们拿到书面裁定后，会让助理打电话通知我，并把裁定结果给我，从而我就能像他们那样亲眼看到结果了。

我驱车返回伊尼德时，不仅为听证的顺利而高兴，同时感觉如释重负。真的是有法律效力的，终于结束了。当意识到以后不必与美林再有任何瓜葛，我真的感觉一身轻松。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精神上，我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把过去抛诸脑后。

我相信，美林最害怕的不是它将要赔偿我多大数额的损失，而是裁定会暴露它的高管在保险作弊案的两次调查中试图掩盖真相的事实。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有关作弊案的各项事实是如何暴露出来的，我有自己的判断。

我猜想，当哈尔把1991年夏的作弊事件报告给他的上级时，纽约总部就得知了保险考试中的小抄或者其他不正当行为不仅涉及俄克拉荷马州的理财顾问，还涉及得克萨斯州的其他美林办事处的理财顾问。其结果，我相信就是，总部给地方办事处下达指令，考试不准再作弊，否则会给公司的良好名誉造成严重影响。总部的这份指令让他们——至少是一些理财顾问，采取了新的考试方式，即周六的晨会。画刊公司的打印文件显示，参加周六晨会的那8个理财顾问，也就是哈尔培训的那8个，在1991年9月6日得到了学分。

然后，1991年11月15日，格拉汉姆在电话里跟我说，理财顾问利用小抄应付考试。格拉汉姆现在仍任职于达拉斯圣哈辛托办事处，而薛皮恩是直到最近才离开那儿的，我猜她是想延续她在薛皮恩领导下的一贯做法。但是我怀疑，格拉汉姆告诉了她的新上级哈尔，她准备给我寄的东西，而哈尔告诉她无论如何不准寄。结果，格拉汉姆给我寄了一份模拟卷的答案。

这其实也是不能向参加《房地产规划训练课程》考试的理财顾问提供的，但她却给我了。

同时，美林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代替画刊公司的系统，因为该系统存在作弊的空间。据我所知，画刊公司制作的考试并不经常更改，这会提高考试者作弊的几率。本来，从 1992 年 1 月起，美林就应该全面启用另一个供应商的新系统，但是，一些美林的理财顾问在 1992 年 1 月 1 日到 8 月 26 日之间参加的画刊公司考试仍然算数，该公司的电脑打印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的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艾利斯、托马斯还有巴顿从未问过我在 1992 年 1 月 20 日的信里提到有人给我提供小抄是什么意思，也可以解释 1992 年 3 月 11 日我说要揭发问题，反对使用小抄时，为什么墨菲——这个要处理纽约总顾问办公室里全球范围内证券的人，从来没有浪费口舌来问我，具体指什么问题。按照我的假设，对此没有人需要询问我，因为当地和纽约的管理层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有些事我觉得很好奇，特别是想到如果掩盖真相的行为被揭穿，高层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是不是美林从来没有针对我的案件提出过慎重的解决方案。它是提过给予 1 万美元赔偿的方案，但是如此微小的数额根本算不上什么正式的提议。然而，美林在数月前处理巴顿和克拉克的指控却游刃有余。

我知道大多数大公司面对官司时，会进行商业决策——其中包含对诉讼成本和财务等方面的潜在成本的考虑，然后试着以适当方式解决问题，以避免可能的不利判决带来的影响。然而美林出于某些原因，在本案中没有这样做。

我相信，我知道美林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依我看来，海默尔曼的目标是防止外部调查人员得知美林的违法行为。他会告诉监管人员，根据第一次调查，我的指控或者不实，或者并不严重，因而不需要独立的调查者。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制定了正式的解决方案，就显得他们承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与海默尔曼的声明背道而驰，会减弱他关于不需要外部调查介入这一说辞的可信度。

1995 年 10 月 16 日，我接到了期待已久的马哈菲—戈尔事务所助理打来的电话，她通知我已经收到了仲裁决定，马上会给我传真过来。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我即将看到的结果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都会对我的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考虑到我的律师们和我对这次仲裁听证感觉很好，我对结果有着很高的期待。

过了几秒钟，我听见楼上的传真机响了，它开始接收 4 页纸的结果，此时我走上台阶，坐在工作桌旁等待裁决所在的那一页，也就是第 3 页。我急急地扫过裁决，寻找损失赔偿额，很快我看到了 230 万这一数额。我感到挺满意，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事实上，由于鲁斯塔德表示应给予美林惩罚的有力证词，我本以为数额会远远高于 230 万美元。

然后，我意识到，这 230 万美元只是我对美林提起诉讼时所要求的实际损失赔偿额。我看到下一行的裁定栏数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伤害赔偿 0 美元，惩罚性赔偿也是 0 美元。

第十章 冗长的诉讼

我决不退出……

——基思·斯古利

我呆呆地看了这个判决好几分钟。我的意识和情感都在努力地去理解我所看到的東西。当我坐下反思时,并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完全的不可置信。如果我还是一年前的我的话,此时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想要撞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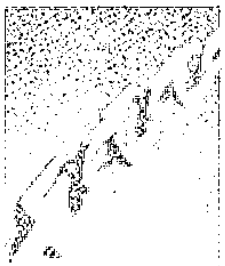
相反,现在的我却打电话给正在焦急等待我消息的家人和朋友。我把判决结果告诉了我的姐姐安娜,我说:“我不能理解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但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是上帝安排了这一切。我本以为我会得到好报的,但显然上帝自有他的打算。也许是因为,我得到的那一大笔钱抵消了我去年一整年所做的事。

但是,我的冷静并不表示我就听天由命了。审判还没完。我知道仲裁者面对这些证据和事实得出了一致的决议,但这个判决是错误的。

我打电话到马哈菲—戈尔事务所找施密特。他说,当他看到这份决议时都傻得说不出话了,而戈尔则是气得火冒三丈。我问他,我们还能做什么。施密特说,因为这是强制性仲裁,无法证明整个判决过程是错误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本来毫不怀疑,我们能在仲裁听证会上胜诉。却因为某些原因,仲裁官偏向了美林。这是不公正的。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特别地，仲裁者认为我在 U-5 表格中所说的我是自己放弃工作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光凭这一点就让我确信，这个判决是错误的。我是因为托马斯对我的敌意行为才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离开公司的，随后琼斯马上在 3 天里通知了美林我离职的事情，这点是肯定的，毋庸置疑的。另外，仲裁还认为我擅自离职，就像美林监管手册说的那样，是相当恶劣、不道德的行为。如果美林说，是我引起了 1929 的证券市场的动荡，我想仲裁官们大概也会点头称是的。

很显然，从对我“擅自离职”的仲裁决议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仲裁官们同样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是有失偏颇的。为什么仲裁官不裁定伊尼德办事处是以恶意、敌对的方式对待我，逼迫我在那里待不下去，而自己走人呢？美林也没有向我保证，会保护我不受托马斯的威胁。托马斯承认，他那时就是想告我，不管以什么名义。而巴顿，原俄克拉荷马综合办事处主任，也表示那时他非常讨厌我，甚至要昭告天下，我是世界上脑子不正常的头号大骗子。就连美林御用首席代表律师曼德尔也表示，如果他的老板威胁要起诉他，他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继续干下去。

我唯一能想象出的就是，艾利斯对他手下的理财顾问新兵的看法。艾利斯和巴顿是我在备忘录和 31 页信中的关键人物。我在和麦迪茨、诺布克、曼德尔以及迪恩谈话时，从不忌讳说，他们两个应该被解雇。

现在我很平静，但并不开心。我想起这几年我一直和热爱运动的儿子说的话：“你要努力寻找通向成功的道路。”仲裁结束了，但是我还远远没有结束。

鲁斯塔德教授要我告诉他仲裁的结果，所以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当我告诉他最后的仲裁判决时，他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大约 20 分钟，他说在他 20 多年的法律生涯中，看到过一些缺失公正的案子，但我的案子是最为突出的。

我又忙碌了起来。1995 年 10 月 27 日，我传真了 10 份我认为能对案子有帮助的资料给我的律师。但是，戈尔和施密特阅读后都持保留态度，他们并不认为我们可以规避强制性仲裁。

11 月 1 日，戈尔打电话给我，说报道法院听证会的专业通讯社告诉他，美林有一份麦迪茨和托马斯供词的副本。我对此很感兴趣，但并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我想要得到每个人的证词副本，但是苦于我自身的经济原因，我只能等。所以，当我知道我可以以便宜的价格得到美林手

上的麦迪茨和托马斯证词的副本时，我就立刻买下了。

我相信，麦迪茨和托马斯的证词一定有假。所以我急于拿到他们的证词副本，这样我可以仔细地梳理一下，从而找出破绽。11月8日，副本到了，于是我开车去俄克拉荷马取。同一天，当我读完证词副本后，我觉得，我首先要找出托马斯在证词里所提到的那个保罗到底是谁。托马斯在证词中说，他不记得1992年9月22日曾与一个叫保罗的人会面。

1992年，我曾在美林的伊尼德办事处听另一个新晋理财顾问提到过，保罗曾在当地的华美达酒店住过一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保罗这个名字。

我去了华美达酒店，询问前台经理，有没有1992年客人的住店记录。前台经理告诉我，这家旅店被出售过，所以这么久之前的住店记录都在以前的经营者手上，也就是说，现在在伊尼德的达菲尔公司。

然后我来到了达菲尔公司，找到了卡罗·卡彭特(Carol Carpenter)。她告诉我，他们应该有1992年的住店记录，但她需要到档案室查找一下。于是，卡罗和我一起来到了档案室，大约10分钟后，卡罗就找到存放1992年9月住店记录的文件箱。我告诉她，我想知道在9月21日星期一，有没有一个叫保罗的美林职员在这里住店。

卡罗快速浏览了这些住店记录，然后找到了，在9月21日晚上，有21名客人住在华美达酒店。其中有2个叫保罗的人。第一个叫保罗·斯坦(Paul Stein)，第二个叫保罗·彼得森(Paul Pederson)。卡彭特告诉我，她可以肯定，那个保罗·彼得森不是在美林工作的。于是，保罗·斯坦是我找出1992年9月22日和托马斯、艾利斯见面的那个来自普林斯顿的神秘人的唯一希望了。我原先觉得，保罗应该是总公司派来评估地区工作的。但是，既然托马斯和美林都声称不知道这个总部派来的叫保罗的人，所以我怀疑，他们是有意在仲裁听证结束前不让我知道这个人的。

我向卡彭特要了1992年9月21日住店记录的复印件。我要去搞清楚这个保罗·斯坦是不是在美林工作，如果是，他又是什么职位。

在回家的途中，我记起美林有些年报会列出高级管理层成员。但想到美林相对少之又少的高级管理层，我觉得不太可能在那些列表里找到保罗·斯坦。快到家时，我看了一下1992年的年报，因为保罗是在那一年来到伊尼德的。正当我浏览这些按字母排列的高级管理层成员名单时，突然我的双眼定格在了姓氏以S开头的那列。我被我所看到的惊呆了。保罗·斯坦确实是高级管理层成员。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托马斯和艾利斯

世界
资本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在我提出关于保罗的问题时，他们居然说，不记得有和这么个人见过面。可笑，他们居然会忘记和这样一位高官的会晤！

我想要了解更多。我要知道，这个保罗·斯坦在美林是什么职位，他为什么要和托马斯以及艾利斯见面，又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于是，我打电话到位于纽约的美林总部。接线员给了我保罗·斯坦在普林斯顿公司的办公电话。我打了过去，是保罗的秘书接的电话。我向她询问，保罗在美林的具体职位，她告诉我，保罗是美林特别市场办事处的总监(Director of Special Market Offices)。我觉得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

斯坦是负责美林特别市场办事处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伊尼德办事处。我相信，斯坦来伊尼德的那天，就是我的 13 份给董事会的 31 页信寄到纽约的那天。但是在仲裁听证会上，纽约方面、托马斯还有艾利斯都声称，不记得 1992 年 9 月 22 日有一个叫保罗的人来到伊尼德和托马斯以及艾利斯见面。他们居然在仲裁这一敏感时刻，完全忘记和这样一位美林高官的会晤，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就好像他们不记得美国总统以私人名义访问美林伊尼德办事处一样。

我一下子意识到，我忘记问保罗的秘书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我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个答案。我又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并询问，斯坦任特别市场办事处总监已经多久了，他的秘书回答我说，他是从 1991 年就开始任职的。

不经意间，居然被我发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我相信美林在斯坦这件事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很显然，9 月 21 日和 22 日，在保罗来过伊尼德之后，托马斯在 9 月 28 日之前就知道了我写信给董事会，于是就有了那些针对我的举动。我还记得费特纳曾告诉我妻子，他无意中听到保罗和托马斯、艾利斯谈话的内容，但是他觉得我那时不会想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另外，托马斯在 9 月 24 日和克拉克谈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写信给了董事会，尽管如此，他却还在听证会上宣誓说，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些。所以，这一切证据表明，美林的策略就是把那些天里所发生的一切都隐藏起来，让我找不到托马斯恶意针对我的任何证据。

我把我的新发现告诉了戈尔和施密特。我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林隐瞒保罗的身份，才造成了我的败诉。我觉得这个案子处处都在作假，所以我要把它们纠正过来。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戈尔和施密特都不相信这一新发现能推翻强制性仲裁的判决。11 月 3 日，戈尔在考虑了对仲裁

决议上诉的可能性后,正式通知我,他的公司不愿意继续当我的代理辩护律师了。他们觉得,这个强制性仲裁的判决是没办法改变的了。我感到非常失望,现在不是胆怯、退缩的时候,而是拨乱反正、继续前进和战斗的时候。

2 周前,美林接到了联邦法院确认仲裁判决的决议。很不幸,我又再次孤立无援,失去了我的辩护律师。

我绞尽脑汁地想,还有什么律师可以帮我,这时我想起了 1992 年末我和克雷格·多德(Craig Dodd)的谈话。那时斯蒂芬·琼斯还是我的代理律师,而多德是伊尼德律师,他正租借琼斯的公司办公。因为多德有过很多劳工案子的经验,所以琼斯拜托他看一下我的案子。多德看完我的案子的材料后,说我的案子很有挑战性。所以,我觉得多德应该是那种不畏惧战斗的人。于是就在 1995 年末,我找到了多德。

就在戈尔告诉我,他的事务所不再代理我的案子的那天,我和多德第一次通了电话。多德完全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天生即使面对逆境也不断寻求出路的律师。虽然在此之前我就知道,多德享有战士的美誉,但我并不知道他具体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现在通过几分钟的谈话,我肯定多德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律师,所以,我终于可以停止寻找辩护律师了。多德,一个头脑清楚、内心无畏的街头战士,很快就看出我的案子里漏洞百出。然而,即使是面对华尔街最大的证券公司和俄克拉荷马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也丝毫没有使他感到胆怯。他唯一担心的是,他本已打算不再接棘手的案件,因为他过去的 10 年都在忙于代理这样的案子。所以,他想和家人一起过几年休闲、舒适的生活。

但是,多德见我那时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而且考虑到我的案子的特殊性,他知道,如果他不帮我,我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辩护律师。多德对我说,他知道他不应该插手这个案子,但他还是这么做了。所以我非常感激他。

很快地,我深深折服于多德的法律意识和想尽一切办法获胜的能力。不久后,另一个曾经是琼斯的合伙人的伊尼德律师告诉我,琼斯认为多德具有杰出的法律头脑。我知道,像琼斯那样的人,在众人眼里已经是法律奇才了,但他却如此夸赞多德。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多德有丰富的劳工案件的经验,还因为他有很多上庭的实战经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我觉得自己又绝处逢生了。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詹姆斯·克雷格·多德(James Craig Dodd)是退伍的越战老兵,他还当过检验员。1994 年因为违反职业准则(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而被吊销俄克拉荷马的律师执照 90 天。现在,多德能够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和第 10 巡回申诉法院从事其律师职务,但是还不能在俄克拉荷马西区美国地区法院从业。而这家法院正是最近确认仲裁决议的法院。

在过去的几年里,多德打赢了很多棘手的案子,但同时他也树敌无数,无论是政界的还是其他领域的。多德在 1996 年 8 月写给另一个想要诋毁他的伊尼德律师的信中,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他在信中说:“我曾经成功地扳倒了俄克拉荷马受贿最多的法官,也成功地起诉了自大卫·哈尔(David Hall)以来贪污最多的官员。我还曾经迫使俄克拉荷马保险委员会委员,以及她的代表委员和首席代表律师下台……因为我做的这些无偿性的服务,我破坏了很多贪污受贿者好几百亿美元的美事。所以我得罪了那些位高权重的危险人物,这些人没有是非观念,并思量着让我永远消失。我有争议性的名声,来源于我从不向金钱和权力低头。我就是要把那些用金钱贿赂政府官员的和那些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混蛋们全部送上法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多德没有当上 5 年任期的民主党教会职员(Democratic Incumbent),所以 1984 年,他在美国众议院的发展并不怎么成功,但即使这样还是很有意义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还是俄克拉荷马共和党的首席代表律师。

1986 年,多德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选上州首席检察官。那年是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y),一个老道的民主党州级立法委员,赢得了这个职位。这两人是互不友好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7 年,正是已经成为第 10 巡回法院法官的亨利写了一份文件,论述有关我和美林案子仲裁判决的恰当性。

1991 年,亨利任州首席检察官第二年,因为想要成为第 10 巡回法院法官,所以他决定辞去现任的检察官职位,接着他就帮助沃尔特斯(Walters)政府找接替者。那时尽管已经有人选了,但戴仍然是亨利接替者的最佳人选。而现在,戴和其他 3 名律师在第 10 巡回法院为美林辩护,看来美林和戴还真是息息相关,但这并不会使我却步。

多德马上就投入我的案件中,他仔细查阅了我手上的 4 份仲裁听证会记录。看完这些记录以及仲裁决议后,多德说,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败诉。他说,通常民事案件只要有数量上占优的证据就可以了,但现

在我不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还提供了针对任何可能疑点的证据。

多德在听取了施密特对我的案子各个方面的简要介绍后,告诉我说,我的前代理律师之所以不愿意继续为我辩护,原因很可能是,戴的律师事务所威胁他们,如果我对强制性仲裁决议上诉的话,他们将会对其律师事务所进行制裁。后来事实证明,当我们双方经过了长时间艰难的法律较量后,1998年6月,戴的律师事务所企图用同样的伎俩威胁多德和我。他们威胁我们说,将会对我们进行制裁,除非我们撤回动议并放弃任何法律途径的申诉。但是,多德和我丝毫不为所动。

埃里法官是基思·斯古利对阵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案件的主审法官,并在不久前确认了其仲裁判决。所以,我首先要向第10巡回申诉法院提交上诉。1995年12月5日,我向俄克拉荷马西区美国地区法院提交了上诉通知。我是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上诉通知的,因为多德的执照还不能在俄克拉荷马西区美国地区法院使用。

同年的12月22日,我又以自己的名义发了一份驳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动议。因为我觉得,我在仲裁听证会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我这么做是希望,埃里自己能否决该仲裁判决。在我的动议中,我指出,美林在法庭上欺骗法官和仲裁陪审团,从而导致我无法全面地为自己辩护。我进一步指出,美林称自己没有关于“保罗”的文件和资料,这完全是在说谎。保罗的身份以及,更重要地,他在美林的头衔和职位,对于我的案子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地,他还是特别市场办事处总监。所以美林隐瞒保罗这一关键人物,导致了我的辩护律师不能传唤保罗出庭,从而向他了解他和托马斯会晤的事情。

1996年2月2日,埃里法官退回了我的驳回仲裁判决的动议。因为法院发现我动议上的签名是有问题的,是不符合法规的。另外,埃里法官说,他的法院不再有审理这件案子的司法权。我既然已经把上诉通知发给了第10巡回法院,那么他这边就没有必要再做无用功,而且这样会干扰正常司法程序的效率。

多德告诉我,埃里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尽管我发给了第10巡回法院上诉通知,但埃里的法院仍然能自行决定是否过问我的动议,同样他也能自行决定是否容忍少许不合法规的诉讼书。多德说,埃里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将来法官的立场。所以,我并没有在埃里的决议上多花工夫,也没有再发出希望他重新考虑的动议。相反,我选择让多德处理向第

10 巡回法院申诉的事情，主要是针对 1994 年 9 月埃里同意美林的动议进行仲裁，并迫使我接受强制性仲裁的做法是否正确。稍后再由我向州立法院陈述，美林在保罗事件上作假的事实。

从美林申请仲裁的动议到随后的仲裁判决，再到美林申请确认仲裁判决以及现在我自己的驳回仲裁判决的动议，我在这 4 个回合中都败下阵来，所以我对美林的比分是 0：4，但这不过是上半场的较量结果。

1996 年 1 月 30 日，在我以 57.25 美元的价格购得美林的股份后，我成了美林的股东。所以，我远远还没有完，而且正蓄势待发。

6 月 26 日，多德向第 10 巡回法院发了一份概要，根据法律修正议案，指出一审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第 347 条法规，决定对我和美林的案件施行仲裁是错误的。多德认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相应法规，美林没有权利提出仲裁请求，因为这样的请求直接违反了美林和我私下协商签订的劳工合同。因为这份合同是受俄克拉荷马法律制约和保护，而俄克拉荷马统一制裁条例并不适用于劳工关系，所以我和美林的案子只能由陪审团受理。

1996 年 9 月 3 日，美林对我的概要做出了回应，当然是全盘否定了我的论点。

9 月，多德跟我说了，他最近在伊尼德碰到的怪事。他说虽然过去几年他和各种政府官员对抗，但他在接这些案子时都是有选择性的，他尽量避免涉及伊尼德地方政府的案件，因为他的家人住在伊尼德，他有责任确保他的妻子和儿女的平静稳定的生活。所以，即使他树敌无数，但这些仇敌都是在伊尼德之外的。

多德说，这件事发生在 1996 年初，那时他正在整理我案子上诉的记录。多德给我看了他写给当地的一位知名律师的信。这名律师曾经企图使多德被警方逮捕。这件案子是有关多德、多德的儿子和这名律师委托人之间发生的汽车交易纠纷的。这名律师并不认识多德，却给他写了一封粗鲁、不礼貌的信。信中，他对多德进行了不实的指控，并扬言要起诉他。

对此，我感到很困惑，多德解释说，在接手我的案件前，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很平和的。那个挑衅的律师碰巧和 1992 年 8 月 25 日与托马斯一起吃午餐的那个律师同属一家律师事务所，而恰恰就在前一天，在 TGIF 比赛结束后，艾利斯写信给托马斯，通知他要防着我一点。我想知道，这仅仅是个巧合吗？还是说，有人，比如在距离伊尼德北部 18 公里的庞得克里

克(Pond Creek)长大的，同时又是艾利斯的铁哥们的戴，拜托他朋友的律师事务所去寻多德的事端，使之知难而退呢？毕竟我没有辩护律师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除此之外，我现在的律师对于戴和美林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因为他正直无畏并且具有卓越的法律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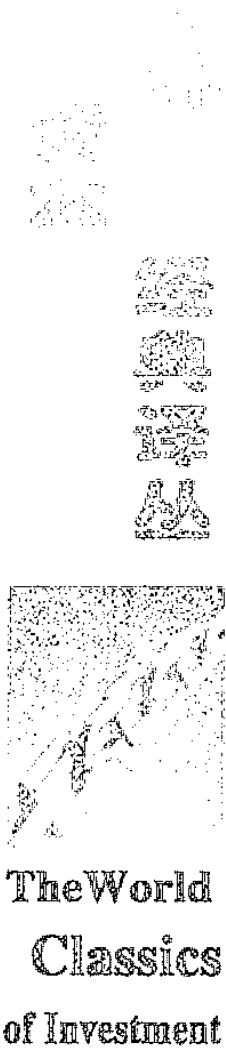
1996年9月22日，多德对美林的答复做出了回应。多德指出，美林的回复中没有一条可以支持对美林和我的纠纷案进行仲裁的法律或法规。多德信心十足地指出，在我所签的美林劳工合同的U-4表格中，清楚写明了只有在我所注册的机构有法律、法规仲裁要求的情况下，我才同意在发生纠纷、争议时接受仲裁。多德认为，任何慎重的分析、研究都会发现，我所注册过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关于对纠纷、争议进行仲裁的要求。所以，我相信第10巡回法院会同意多德的意见，允许我接受陪审团的审判。

那些奇怪的事件还继续的多德身上发生。多德告诉我，在最近的3个月里，他已经收到5次死亡威胁了。他说，他过去也接到过这样的恐吓，但那也是18个月前的事了。多德说，对他的恐吓、威胁来自伊尼德的各个角落。现在他时刻处在备战状态，他告诉我，不要相信任何人，甚至是多德他自己。

1997年2月5日，第10巡回法院公布了对下级法院实行强制仲裁的认可文书。我在概要中论述的多德本以为是翻盘重点的论据，都被反驳。在法院认可书的注脚处，指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某条法规规定，除了U-4表格外，还需要一份仲裁的书面同意书。但是，我没有在地区法院或者在我的概要中提到这点，所以他们不予以考虑。多德说，法院应该有自行斟酌这条法规的决定权，但他们却不这么做。于是在这一回合我又输了，现在是0：5了。

当我看到第10巡回法院的决议时，我看到了亨利的名字，原来是他写了这份认可文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我想，国内应该没有比亨利对我更加不利的受理上诉的法官了。我知道，在实际中，法官在判决时可能会带有下意识的个人偏好，譬如因为友情、政治因素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所以在我的案件中，显然亨利利用了他的自行决定权，对我百般阻挠。

我还相信，我的前妻并不希望我赢得这场官司。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在离婚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她对我十分恼火；第二，即使我胜诉了，我们的离婚协议使得她最多也只能拿到美林案子的12 500美元的赔偿金。



所以她不会希望，看着我赢得上百万的赔偿金，而自己只分到其中可怜的12 500美元。

我知道，我前妻的想法使这件案子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亨利在政治上和她父亲关系密切。另外，亨利还是她妹夫的好朋友。如果我假定我的前岳父和前妹夫100%支持我前妻的想法，而亨利又和这两个反对我的人关系密切，那么他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1997年2月24日，多德发了一份申请重审的诉状书，其中指出，陪审团拒绝考虑我在回复概要中所提到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法规是错误的。当天，多德还发了一份全体出庭法官受审的建议书，要求第10巡回法院所有法官都参加重审。

1997年4月1日，第10巡回法院驳回了重审的诉状书和要求全体出庭法官受审的建议书。于是比分变成了0：7。

但是，我还没有完。1997年9月27日，我向加菲尔德法院递交了对托马斯、艾利斯、斯坦、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的诉状。在诉状中，我列举了在1991年6月1日~1992年6月29日期间我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我觉得美林这么对我是不符合公司的职业道德规范的。我指出，我举报这些行为也是严格遵守公司的《商业行为准则》的。我描述了我上报的整个过程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指出托马斯对我进行的“粗暴的辱骂、有失身份的恐吓信等，都是保罗·斯坦事先安排好的、不合法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为了制造出不友善的、无礼的、令我尴尬的工作环境，从而迫使我自己主动离开公司。

我还指出，斯坦的计划是一个“非法的民事阴谋”，目的是为了掩盖美林的违法行为，并限制我的作为，使我不能将其行为公之于众，或者是引起法律执行会的关注，而使美林的不法行为曝光，并得到应有的惩处。

1997年11月5日，美林和其他几个被告，一起向俄克拉荷马西区美国地区法院发了一份移交通告。他们的理由是，我诉状中所有的被告都不是俄克拉荷马的居民。

很快案子移交到了埃里法官那里，显然他不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多德和我都觉得，这次我们还是会输。所以11月21日，我向联邦法院发了一封撤销通告，撤销了我对托马斯、艾利斯、斯坦以及美林的起诉。

因为只有戴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是俄克拉荷马的居民，所以我们决定向联邦法院起诉，他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预谋地、故意地隐瞒了保罗·斯

坦这一关键人物。于是我在 11 月 26 日,将我的起诉书递交给了加菲尔德县法院。

很快,多德问我,我斗争下去的决心是否还在。他说,他现在所做的任何事都使其他律师对他感到不安,这点他并不在意。但是,他不想一个人孤军奋战,除非我真的愿意继续打下去。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一定会撑到最后一刻的。

1998 年 2 月 4 日,我的新对手——戴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向法院递交了 4 份冗长的动议和概要。

于是,我们双方都剑拔弩张了。我决不退缩,我誓将斗争进行到底。而同时,美林也决定采取攻势。2 月 12 日,美林和他的盟友们向俄克拉荷马西区美国地区法院提出了对我的起诉,企图把我一举歼灭。

1998 年,我以个人名义递交了撤销美林对我的起诉的动议。很快 4 月 7 日,美林做出反击,提交了反对撤销起诉的动议。

4 月 17 日,加菲尔德县级地区法院决定,将我起诉戴及其律师事务所的案子移交给俄克拉荷马县。

5 月 11 日,戴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提交了撤销我对他们起诉的动议。5 月 29 日,多德也提交了动议以回应戴的举动。大约一周后,戴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对此又提交了动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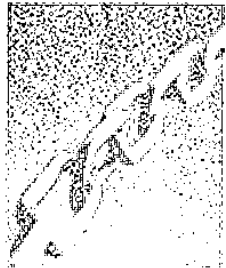
6 月 8 日,埃里法官驳回了关于撤销美林对我起诉的动议。于是,这个案子又被转到州联邦法院。

6 月 12 日,戴和他律师事务所关于撤销我对他们起诉的动议得到了批准,于是我对他们的起诉就这样被退回了。法院对此的解释是,除非联邦法院先撤销对仲裁判决的确认,否则我在州法院将寸步难行。

6 月 22 日,多德又向法院递机动议,请求重新考虑,撤销我对戴及其律师事务所起诉的决议。对此,海格写了一封信给多德,信中说,他代表所有被告方提议,如果我肯撤销对他们的起诉,并放弃其他任何申诉的权利,他们将不会对我们进行制裁,而且不会追讨与案件相关的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

多德给他回了信,明确指出,他们在保罗·斯坦事件上作假是证据确凿的,他希望戴的律师事务所不要企图再用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来逼他屈服。多德告诉我,海格的信明为提议,其实却是最卑鄙、最阴险的威胁。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所谓的提议。于是美林方面就我撤销对戴和他律师事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务起诉的动议提交了反对书。

1998年6月29日，迈克尔·罗伯茨上交了我的答复。迈克尔曾在琼斯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而在琼斯做我的辩护律师那会儿，我就认识了迈克尔。

同年的6月，艾利斯成为了美林圣地亚哥办事处的驻地副主席。显然艾利斯因对其纽约上级们的“密切配合”和“忠心不二”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现在他达到了近27年在美林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6月24日，法院又驳回了我申请重新考虑我对戴及其律师事务所起诉的动议。这个决议对我而言，无疑又是当头一棒，于是比分变成了0：10。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出路可寻，在我做完所有我能做的之前，我决不懈怠。

8月24日，多德向俄克拉荷马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提交了对撤销我对戴及其律师事务所起诉的决议的起诉书。9月8日，戴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对此做出了回应。很快最高法院将这个案件移交给了民事上诉法院，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案子将由3个法官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理。

11月17日，我又提交了对美林和他同盟的起诉书，但这次我是提交给了俄克拉荷马县级法院而不是加菲尔德县级法院。这样做是为了满足限制期限的法令要求，这样我的胜算能大一点。

1999年2月16日，民事上诉法院确认了撤销我对戴及其律师事务所的起诉的决议。于是，比分又被刷新成了0：11。

同月，发生了两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第一件事是，巴顿被他的证券公司开除了，因为他向客户借钱而违反了公司的章程。巴顿就是这样，总是做事毛躁。

第二件事是，埃里法官发了一份决议，声明他将不再审理我和美林的案件。因为他的妻子在1998年11月16日购买了美林的股票，而他直到1999年2月21日才知道这件事情。于是，这件案子就被转交给了维基·迈尔斯·拉格兰奇(Vicki Miles-LaGrange)法官。

罗伯茨告诉我，埃里选择在这个时候退出是很有问题的。在关于原告动议的所有概要都被呈交上去并等着几周后总结性判决的时刻，埃里却宣布退出了。罗伯茨说，埃里说出他妻子购买美林股票一事，是为了看我和原告谁会反对。显然应该只有我会对此表示反对，但事实上，即使是对我有利的判决，也不会对美林的股价有任何影响，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考虑我的反应。

我感到很吃惊，埃里法官竟然就这样心甘情愿地退出了对这个案子的审理。我知道，他是一个强硬、正经、严肃的法官，他从不惧怕做任何困难的判决。埃里在审理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爆炸案时，曾被要求撤换法官，但他没有同意。因为这起爆炸案件就发生在联邦法院对面的一条街上，爆炸影响了很多和埃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要求换其他法官。最后，第 10 巡回法院不得不强行把他调离这起案件。

我觉得，假定埃里法官知道他妻子有在股票市场投资，那么他应该会在接手美林的案件时，就告诉他妻子，这个公司是他将要审理的案子的被告。这样她就不会一不小心地购买了美林的股票，而使埃里到最后不得不要求撤换法官。

我知道在他妻子购买美林股票之前，埃里在 11 月就知道了我和美林的官司纠纷。这使我不得不猜想，是不是埃里在 11 月知道了他妻子会去买美林的股票，所以他想要找个借口从这个案子中摆脱出来，他是有这么做的动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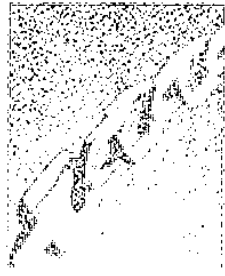
1999 年 3 月 8 日，多德向俄克拉荷马高级法院递交了诉讼书，要求重新考虑民事上诉法庭做出的撤销我对戴及其律师事务所起诉的确认决议。接着就和以前一样，被告提交回应，然后多德再提交回应。最终，俄克拉荷马高级法院还是驳回了我的诉状。于是，比分变成了 0：12。

我和戴及其律师事务所之间的诉讼案，最后还是以我的失败告终了。同样对托马斯、艾利斯、斯坦、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的诉讼也没有了希望。因为俄克拉荷马高级法院已经驳回了关于民事共谋的起诉。我再也没有机会在法庭上陈述，发生在仲裁听证会期间有关保罗·斯坦的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就这样被掩埋在无谓的法律的条条框框中了。

1999 年 8 月 24 日，迈尔斯·拉格兰奇法官公布一项决议：对于美林和其他起诉我的案件，当事人双方不能再向州法院提交任何关于欺诈行为的上诉。这也就是说，法院取消了诉讼。

在我连败十几场的颓势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则好消息。这意味着，美林将不能再起诉我，但同样，我也不能再起诉他们。看起来，似乎我的案子已经走到头了。但是，我觉得事情还没完结，我还有路可走。每天清晨当我醒来时，战斗始终萦绕心头。也许有一天我醒来时，发现这场战役已经结束了，但在那之前，我还是会战斗下去，我要亲眼看着美林身败名裂。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十一章 最后的较量

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想成为第一。我们不想成为第一，甚至不想出现在畅销书单上。

——斯蒂芬·海默尔曼

在我写 31 页信给美林每个董事会成员的 7 年后，我决定，现在作为一个美林的持股人，我要再写一封信给董事会。于是 1999 年 9 月 17 日，我将我的第二封信发给了在美林外部的 10 个董事。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让这些美林的股东代表们了解，美林的高级管理层或其内部董事在那两次内部调查中是如何蒙混过关的。

在信里，我首先提醒这些董事们，依法管理公司并为美林的股东谋福利是他们的法定责任。随后我介绍说，我是美林的前职员。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向公司举报了公司内的某些违法行为。我的主管却对我进行报复。结果我因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被公司不合法地解雇了。

我告诉这些外部董事，他们应该注意 1995 年 9 月我在仲裁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它和一些其他信息使我有理由相信，美林有意对外部董事隐瞒了我两次举报所带来内部调查的彻底性和真实性。我相信外部董事们一定会对这虚假的、粉饰的调查感到很震惊、很恼怒。但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又指出麦迪茨和曼德尔在法庭上的证词（以及米哈利写给俄克拉荷

世界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马保险部的信和曼德尔写给证监会的信),其中都声称美林的内部调查是彻底的。除此之外,米哈利和曼德尔的信中都带有浓厚的不属实的、有误导性的言论。曼德尔还在法庭上作证说,是他建议董事们这么做的。所以,我推测美林的内部调查报告和曼德尔写给证监会的信的内容,本质上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作为美林股东代表的外部董事们完全被美林给误导了。

在信中我还指出了,美林在进行内部调查时的欺骗行为。我说,董事们可以参考我随信附寄的先前写给董事会的信,信中详述了保险考试作弊丑闻案。我还讨论了,为什么美林找不到这些显而易见的证据的原因,譬如大量使用的作弊纸,或者是保险考试中使用的其他不正当手段等。

我还告诉董事们,美林的调查人员是如何去寻找并查问与案件相关的人员或者其他知情人士的。调查人员要么就是问被寻访者一些低级、无用的问题,要么就是根本不去联系那些重要的关键涉案人员。所以,这样的调查结果是很不尽如人意的。我在美林的举报信中列出了 300 名涉案领导,其中包括 15 名管理层成员、4 名保险专员以及在敏感时期通过画刊公司考试获得学分的特克索马地区 281 名理财顾问。而在我列出的 15 名管理层成员中,有 14 人可能获得了学分。另外,哈尔也没有接受内部调查,即使美林有他的永久地址,因为后来在听证会前,他们很快就联系到了他。我提供给董事们有关哈尔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从中可以看出,他所知道的情况应该对内部调查有重大意义。

我又说:“作为负责美林那两次内部调查的以及监管任务的人员,都应该对上述提到的使用作弊纸条和其他作假行为有高度的警觉性(或者必要的警觉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告诉董事们,我相信从一开始,美林压根儿就没打算揭露事实的真相。所以我希望作为美林董事的他们,能履行他们的法律责任,揭露内部调查所掩盖的真相。

我还引用了海默尔曼的话,“让正直屈居收益之下,这个代价可能会是致命的!”

最后,我总结说:“美林需要一个正直、公正的高级管理层,即使面对任何艰难险阻,也能保持内心正义而毫不退缩。任何对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容忍和对股东的欺瞒,最终都会对公司的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我写给 10 个外部董事的信件,在 9 月 21 日早上 10:30 寄到了世贸大

厦的美林总部。但是令我吃惊的是，在 10 月 1 日早上我的电话里，有美林邮件收发室某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我打了回去，更令我吃惊的是，我的信竟然还没有被送到外部董事们的手上。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收发室不知道该怎么投递这 10 封信，因为这 10 个外部董事在不同的地方办公，他们有的在世贸大厦的南、北楼，也有的在百老汇上的诉讼办事处，所以这些信都被退回到了收发室。

美林居然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投递这些信，这些信的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每个收信人的地址。我想，估计是海默尔曼担心高级管理层的罪行会被曝光，所以才找了这么一个拙劣的借口来搪塞。

我觉得美林这样做只是在虚张声势，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信件都发给一个外部董事，然后由他转发给其他的外部董事。最好的选择是阿拉那·彼得斯(Aulana Peters)，她是吉布森—邓恩—克拉彻(Gibson, Dunn & Crutcher)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斯是证监会的前委员，并在 1994 年成为了美林的董事。于是 1999 年 10 月 4 日，我把我写给所有外部董事的信都寄给了彼得斯，并向她解释，因为美林的不配合，所以我需要请她将其余的信转发给另外 9 位外部董事。

几个月过去了，我却没有收到彼得斯或者其他外部董事的任何回应。我也没收到 10 封信成功寄出的确认消息。一年过去了，还是毫无动静，所以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000 年 9 月 17 日，正好是我写给外部董事信的一年后，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海默尔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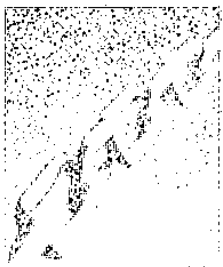
我告诉美林的首席顾问兼美林副主席，一年前我曾写信给外部董事，却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回应。我还提到了海默尔曼在美林的《美林人》1992 年 5/6 月刊中说的话，他说：“看到我们的杂志在众多商业杂志中位列第一，是令人振奋的。但在这件事上，我们不想成为第一，我们不想成为第一，甚至不想出现在畅销书单上。任何只是将正直当作一个词语的人，都应该去阅读《烧毁的房屋：E. F. Hutton 的倒塌》(Burning Down the House: The Fall of E. F. Hutton)一书。正直对美林来说不仅仅是重要的，更是我们的命脉所在。”所以我请海默尔曼告诉我，我寄给外部董事的信发生了什么事。

2000 年 10 月 11 日，我收到了现任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公司高级副主席兼首席顾问乔治·希伦(George Schieren)的回信。希伦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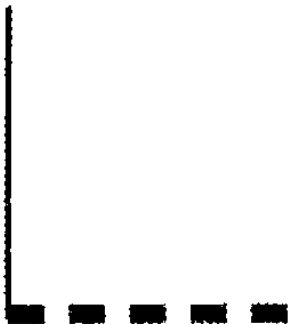
中说,我写给外部董事的信已经被认真审阅了。除此之外,他还表示,美林对 8 年前的调查结果很满意,并且那时也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对于他的回答,我并不感到吃惊。即使我有证据证明,美林 8 年前的内部调查结果远非所谓的“完全、彻底”,但我知道美林是不会承认的。如果他们承认了,那么就意味着那些负责调查的人员,以及包括海默尔曼、审核委员会和那些董事在内的监管人员,都会一一被曝光。

世界
经典
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十二章 公众法庭

你才是法官。

——基思·斯古利

这个案子一拖就是 10 年。在这 10 年里,和其他人一样,我知道了一件事,就是法庭并不总能伸张正义。我们的司法体系中有许多贪污、受贿和利用职权施加压力的案件。有谁真正知道法庭是怎么做出判决的呢?因为某些原因,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比他们的诉讼对手更有胜诉的可能,即使正义并不在他们那里。

虽然我在法庭上并没有获胜,但是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应该胜诉的。令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仲裁结果。我坚信对我的仲裁判决完全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而对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也只能自己猜想了。我不确定,在这个案子上法庭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受到影响,但有一点我敢肯定的就是,那个影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但是,我还有公众法庭,在这里,我能为自己讨回公道。我要把和我案子相关的证据资料都真实、全面地公之于众。我要用事实说话。

我相信,如果我在美林顺顺当当、安安稳稳地工作的话,那么我的家庭和婚姻还是完好如初的。当然,我并非指责是美林毁了我的婚姻。因为只有我和我的前妻才该为这段不幸夭折的婚姻负责。但是我想,如果就像我当初进公司时所设想的那样,在美林的工作能为我提供经济上的安定,那

么我一定可以维系我的家庭，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遭受家庭变故。

现在，我还是在从事油气买卖。但是似乎我前妻的工作显得更有意思一些。2000 年秋天我遇到了她，得知她接受了美林在伊尼德办事处的职位，将从 2001 年 1 月去那里开始工作。她将和她的哥哥一起合伙工作，他哥哥在美林干了大约 3 年，这次也是他把这个工作机会介绍给他妹妹的。我不禁感叹，真是有趣的际遇呀！

大概就在海默尔曼收到我于 2000 年 9 月 17 日写给他的信（在信中，我引用了他说美林不想位列畅销书首位的那段话）的 2 周后，我第一次听到，唐娜向儿子说起我在写书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唐娜说起过我出书的计划，但显然她已经知道了。在谈到为我儿子的高校教育建一个基金时，唐娜对我儿子说，我应该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我正在忙于写书。我怀疑纽约方面大概是通过中介找到唐娜的哥哥，并托他通过唐娜打听出我究竟在写什么书。所以我告诉我儿子泰勒，他可以告诉他妈妈，我的书就快写好了。

然后我发现，唐娜要去美林的伊尼德办事处工作了。这仅仅只是巧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不是因为过去 10 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我对唐娜感到很失望，特别是对于她竟然将我的两个孩子也卷了进来。父母一个在为美林工作，而另一个却在设法揭露它的真面目。

数月之后，仿佛已经没有这么多巧合了。但我还是被震惊了。2001 年 5 月 16 日早上，当我在浏览《伊尼德新闻报》（*Enid News & Eagle*）时，一则新闻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美林的伊尼德办事处将要搬去到俄克拉荷马市（OKC）”。这则新闻说，美林将把它在伊尼德和埃德蒙德的办事处搬到距离俄克拉荷马北面很远的一个新地方。埃德蒙德是俄克拉荷马的一个郊区，它位于新办公地点东北处几公里远。所以埃德蒙德的搬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伊尼德却距离俄克拉荷马新办公地点有 80 公里远。所以在我看来，伊尼德办事处并不是所谓的“搬迁”，而是彻底关闭了。毫无疑问，美林已经放弃了它在俄克拉荷马西北部的客源竞争。

看了这则新闻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前妻。我很担心我的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的妈妈要搬去新地方的话，那么他们谁将跟着他妈妈去，谁又将待在我这儿呢？万幸的是，唐娜告诉我，她不用搬。她只需要每隔两周去一次俄克拉荷马新的办事处，而在伊尼德，她会有一小办事处，方便她会见客户。美林伊尼德办事处在 2001 年 1 月刚刚被重组、搬迁好，美林还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调拨了 7 组新的理财顾问过去,但是现在,这个新的伊尼德办事处却马上就要被关闭了。

我对此很是怀疑。美林的伊尼德办事处已经有 10 年的历史了。同时它所创的利润也非常不错。伊尼德办事处不仅新增加了理财顾问,而且还搬迁到了设计精良、外观漂亮的新的办公楼。另外,办公楼的 5 年期租约才刚刚过去了几个月。唐娜说,她也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很吃惊,而和她一起合伙的哥哥对此也表示不能理解。

我对此事非常好奇,而且满腹疑问。所以,我决定打电话给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什么。那个记者同样也对伊尼德办事处的停业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也觉得伊尼德办事处是很赚钱的。他告诉我,是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的。他曾经问过美林伊尼德办事处的常驻经理,是否公司还要关闭其他地方的办事处,那个经理说,他并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地方的办事处要被关闭。我猜想,作为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还有其他办事处要被关闭的话,应该会通知伊尼德办事处常驻经理的。

我相信,关闭伊尼德办事处决不仅仅是个巧合,现在我怀疑,因为美林知道我要出书了,所以关闭伊尼德办事处是出于公共关系的考虑。显然,如果因为我的书而导致暴风雨来袭,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使公众相信,他们不仅已经把始作俑者赶了出去,甚至是伊尼德办事处也被一锅端了。我认为整个事件自始至终都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严重错误:事实上应该是纽约总部需要整改,而不是伊尼德。伊尼德办事处早在几年前就没事,但纽约总部却是乌烟瘴气、公道不再。

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在乎的、可以左右我的两个人,就是我的孩子们了。如果在 2000 年父亲节前,我还曾担心他们是否会支持我,那么在那天之后我的顾虑就完全消失了。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分别收到了我 12 岁的女儿和 15 岁儿子送我的卡片。他们一起过来送我卡片,我先朗读了我女儿泰瑞的卡片。卡片上印着,她还记得“被爱”是我教她的第一件事。接着泰瑞自己在卡片上写道,“那是当然的。”而在卡片的底部,她还写道,“我非常爱你! 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快乐的时光!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使我的生活更加快乐幸福!”

这是一张感人肺腑的卡片,传递着我和泰瑞之间真实感人的父女深情——那都是满满的爱意呀。我知道这都是发自泰瑞心底里的真心和真

情。

泰勒把他的卡片递给我，然后我开始朗读他的卡片。卡片上有部分写着：“当我想到力量这个词时，我就会想到你，想到你信念的力量……想到你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你教会了我，正直就是永不向是非对错妥协。”这时，我不禁感动地无法继续朗读下去。眼泪从我眼眶中溢出，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把剩下的部分读完。

在剩下的部分里，泰勒赞许了我对家庭、对上帝的爱的力量。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有多么爱你，爸爸……你在我们心中有多么伟大。”

我知道泰勒为什么会写这些，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经常会谈论美林好几小时。他知道我所经受的痛苦和我的付出与牺牲。他告诉我，当他在商店看到这张卡片时，他就知道这是他要送给我的。

我感激地抱了抱我的两个孩子，我告诉他们，我有多么爱他们，以及我有多么感谢他们这几年来对我的支持。我知道，因为我的处境，他们也遭受了牵连，牺牲了很多。这一时刻，我清楚地知道，无论与美林的诉讼案结果如何，我都是一个真正的胜者，因为我的孩子们了解他们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并且一路走来，在我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这真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诉讼之路。这些年来的所有片断都一一呈现在我眼前。无论此刻我有多么疲惫，我仍然觉得应该继续坚持走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会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前行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如果真是那样，我想知道那会是哪一天。就像我所说的，我真的想要结束这一切，但前提是，正义首先得到伸张，否则我绝不放弃。我相信，这本书能做到法庭和监管者所做不到的事。如果没有，只要我心中继续斗争的信念之火不熄，那么我就能找到其他有效的方法。我一定会坚持的。

我相信，公众通常有辨别是非对错的头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愚弄。美林一直享有完美无缺的好名声，但在我看来，他们根本就不配。我相信在美林内部，有很多杰出卓越的人才。但是我也肯定，那些高级管理层的主要成员绝不在这群人之列。我希望能让人们看到我所做的事，尤其是那些只关心什么对自己有利而从不在乎什么是道德的人。

我想请你们考虑以下问题。在你们思考这些问题时，请记住，美林在公众宣讲会上一一直坚持声称，自己重视正直，决不会容忍任何不道德行为。

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请告诉我：

你是否认为，理财顾问和管理层成员在保险考试中作弊？

你是否认为，高级管理层掩盖了保险考试作弊的真相？

你是否认为，杰克·托马斯在威胁要告我和扬言要把我踢出伊尼德办事处之前，并不知道我写信给了董事会？

你是否认为，每个人都忘记保罗·斯坦在 1992 年 9 月 22 日曾访问伊尼德办事处是合乎情理的？

你是否认为，美林是在有预谋地故意隐藏，托马斯对我采取敌对态度前所发生的事？

你是否认为，我是擅自放弃了我的工作？

你是否认为，美林和仲裁者认为我应该回到那个威胁要告我的经理的手下继续工作，是合情合理的？

你是否同意，迈克尔·鲁斯塔德教授所说的证据确凿，所以这些行为应该得到惩处？

你是否认为，美林真的奉行以客户为重的准则，并尊重个人、公民权益和正直？

查理·美林会怎么认为？

这次，你才是真正的法官。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作为美林证券公司的理财顾问，曾几何时，本书主人公（亦即本书作者）——基思·斯古利，以美林为骄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美林的一件违规操作，出于正义感，他对此通过正规渠道进行了反映，希望可以防微杜渐。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却是一个长达10年诉讼的开端！

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大卫挑战巨人歌利亚的艰苦战斗！但与之不同的是，大卫最终割下了歌利亚的头颅；而基思却被仲裁小组宣布败诉。然而，基思通过自己的正直、勇敢与坚持，为世人揭开了这一曾经纵横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的面纱，揭露了美林内部的种种违规和不道德行为。

虽然，在此过程中，基思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失去了爱人和家庭，甚至法律最终也没有站在他的一边；但是，面对利益和权势，基思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在这个世界上，何为正义！

逆规则行事，最终必将被规则颠覆。事隔多年，基思回到了他原先的油气行业，继续着他的人生旅程；而美林，却已因亏损严重而被收购，不复存在。

的确，年轮转过，已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风尘滚滚，不废江河万古流……

本社网址：www.sufep.com

ISBN 978-7-5642-0658-1



9 787564 206581 >

定价：29.00元